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

#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

George Oakley Totten III

[美国]陶慕廉 著

赵晨 译

周纪荣 校





## 中文版自序

我很高兴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一篇序言。我自己对亚洲的兴趣起始于幼年时对中国艺术和中国古典仪式的喜爱。后来，当我15岁时，也就是1937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更促使我想要进一步了解亚洲。这样，我还在读高中时就想要学习中文，但是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后，我才能够这样做，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我志愿参军后，被首批选送去学习日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只是因为我已开始学习中文。

我在东南亚同日本军队战斗。其后，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我被指派为东京美军总部的翻译。那时我遇到许多日本左翼活动家，他们反对这场导致日本失败的侵略战争。我也注意到美国占领当局没收了日本内务省和外务省的图书馆。内务省保存有从1900年前到当时的那些被查禁、被部分删节或被认为是“危险”著作的左翼人士(包括共产党人)著作。这些材料，都被送到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1949年，我作为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接触到这些材料，将其用于我的博士论文中。

本书是以权威的日本材料和笔者对许多活动家的采访为基础。有许多材料没有脚注中标明。\*

我认为80年代的中国人民将会对本书产生特殊的兴趣，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

\*：中文版均用章尾注。——编者

1. 随着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日益深化，必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要进一步了解那些反对日本进行侵略和为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村佃农利益而战斗的日本人的生活，同时也进一步了解日本“受压迫”的妇女，在日朝鲜人以及“特殊部落民”的情况。而大多数日本官方的历史学家都忽视了或是仅仅稍微涉及到这个方面。

2. 日本左翼的发展同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关系密切，中国革命的经验对日本左翼运动有很大影响。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导致日本社会运动分裂的试金石。中国人如果认为所有日本人都支持日本侵略中国，那就错了。

3. 我只是在整个左翼运动的背景下描述了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极右翼运动，因此本书中没有专门谈及日本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我非常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理解战前日本革命斗争的不同背景与其原因，以及其后直至今天的发展。

本书出版以来，美国和日本出版了一些更详细的专著，更深入地描述了战前日本社会运动的各个方面。但是我高兴地看到，美国研究战前左翼政治运动的学者仍认为本书是一本经典的基础著作。在日本，同那些往往倾向于某一左翼或右翼的日本著作相比，本书被认为是一本更为“客观”的著作。我认为，在有关该主题的论著中，本书在一段时间内将会继续作为一本基础著作而存在。

尽管本书可以作为一本标准的参考著作，但它对该重要主题的各个方面未能深入探讨。限于笔者的水平和能力，书中尚有许多疏漏之处，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给予批评和指正，并就该主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George Cabley Totten III*

陶慕廉 1985年8月

## 英文版自序

战前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兴起和衰落包含着希腊悲剧的许多因素。20年代，它满怀希望，抱着坚定的决心登上政治舞台。国内国外鼓励的贺词纷至沓来。但从后台的合唱中，已经能够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反调。命运似乎注定它要遭到反对。

社会民主运动克服了周围的巨大障碍而诞生。事实上，正是在国内外的事件开始显示厄运即将来临的1936~1937年，它获取的成功最多。它试图采用痛苦地否定自己生存权利的方式，作为一种反抗运动来拯救自己。它过晚地才察觉到，当时以“圣战”名义进行的全国规划和改革基本上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从中很难产生社会主义，更谈不上民主了。

然而，一个运动不象一个英雄人物，它可以重新恢复生命，从自己的灰烬中兴起。1945年战败后，社会主义者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迅急崛起，而又疾速衰落，然后又在坚实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这次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必将取得政权，这个目标有时近在手边，却又令人沮丧地延至将来。

日本出现了新的自由，一些新的世界联盟建立起来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阻碍社会民主运动的许多社会经济结构性的因素依然存在。从主观上说，这个运动仍旧受到它战前经验的约束。它的那些老资格的领袖们为什么非常保守，这只有借助于战前时期的幽灵——或者魔影，才能充分理解。

本书试图分析战前社会民主运动的性质，这不仅是以此为



先导，来理解当代日本政治中的主要反对派，而且也把它作为一个运动本身来考察其具有的意义。它的行为所显示的特点，对比较政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他国家的类似运动都反复出现过这种共同的模式，但日本的运动带有许多特殊性。同时，了解社会民主运动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日本现代化进程也是必要的。

本书中所说的社会民主运动，主要指的是日本从1925～1940年存在的非共产主义的各无产政党。但除此之外，也论及在地方选举和全国选举期间以及两次选举的间隔时期，支持这些政党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社会运动、少数民运动和其他运动。本书不过分拘泥于词意的一致性，而以“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词泛指社会民主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甚至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指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主干运动以及从其派生出来的其他运动。本书有时可能用“社会运动”或“无产阶级运动”来代替“社会主义运动”一词。本书中以大写字母“C”开头的“共产主义者”一词是专指日本共产党的党员和在其直接领导下的人。

本书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词虽不包括共产国际承认的日本共产党人，但这个词象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条件下所用的含义一样，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的条件下，无产政党的领袖们必须作出明确的决定，他们打算在被允许的政治自由的狭窄范围内活动呢——当然，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要经受考验——还是试图直接推翻天皇制呢，如果选择后者，他们一旦被捕将会被控告“触犯天皇罪”。本书的重点是研究那些合法的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政党谋求维护无财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或是工人、农民或者其他种人。这整部书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战前日本条件下的社会民主运动的定义。

本书第一部分提出如下的基本问题：社会民主运动在日本是怎样产生的？日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对社会民主运动是否有利？哪些先例为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并规定了其所继承的传统？是什么进程促使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同社会民主运动的各种派别——无论马克思主义派、费边主义派、基督教派或其他派别——分道扬镳？最后，哪些事件和合理化改革迫使无产政党的领袖们背离他们早期信仰的许多原则呢？

第二部分集中研究领袖。哪种类型的人成了各类非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其次，各不同领导集团在接纳新成员的标准上，如年龄、所受教育和其他背景因素方面有何不同。我的研究表明，了解各派的凝聚性和持久性是理解千变万化背后的连续性的关键。

以此为基础，第三部分进而探讨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内心所想的无产政党的职责，他们想代表什么阶级，他们进行了哪些议会斗争和非议会斗争，他们为国内改革、日本外交以及他们自己的国际交往提出了哪些方针政策，在与时代的变化相适应中，哪些线索显示出政策的连续性。

第四部分研究选举和组织支援问题。以前的研究没有太多注意社会民主运动在1936年和1937年选举中获得的巨大成功，也未试图说明获得成功的原因，而是假定革命热忱已经消失。在这一部分中，把错综复杂的组织支援关系分解开来，以便暴露出令人迷惑的组织形式变化背后所隐藏的派别继承性。在这方面，还注意研究了妇女在社会民主运动中的作用，以及以前被视为不可接触的少数部落民团体和在日朝鲜人卷入社会民主运动的程度。

在结尾一章中，陈述了社会民主运动的全部特点及其在日本的环境下所起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促使人们用比

较方法使用这种知识。这涉及到对整个社会民主运动及其各分支的作用进行说明。由于这些说明所依据的材料迄今为止在英文著作中出现很少，因而作者感到在本书中包括这样一部分对其他研究者可能会有益处。这里具体探讨了以下问题：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从外国输入的，这个运动的领袖以及对这个运动的支持来自哪些社会成分，从意识形态上看，社会民主思潮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本书的考察并不认为囊括了社会民主运动的一切方面。笔者有意将无产阶级的艺术、文学和文艺批评等文化领域作为临界点。对社会民主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更详细研究留待以后出版。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只是在必须阐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作用及其局限性的范围内才会谈到。我设想读者们具备日本近代史的背景知识。我认为这部书是一本开创性著作，希望它能打开一条路，引出一系列更详尽的专著。随着基础的奠定，后继者将能够更容易地取得进展。

不管今后还需要做多少工作，不管本书有其局限性，但是本书所论述的主题，对每个认真研究20世纪的日本的学者来说，或是对任何一个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运动作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值得思考的。

本书能够完成，是得力于美国和日本的各种研究机构与基金会以及许多有关人士的慷慨帮助。本书实质上是我同我的两位主要合作者，即阿伦·伯内特·科尔和上原英男，共同执行“日本社会民主党研究”这一计划的成果之一，是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两卷本中的第一卷。第二卷书名为《战后日本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是我们三人合著的，其中有一章是罗纳德·P·多尔写的，这本书也即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项研究计划得到弗莱彻尔法律和外交学院的赞助，受到该院院长罗伯特·

伯吉斯·斯图尔特的鼓励，还得到约翰·斯科特·埃弗顿先生和克利恩·斯韦泽先生管理下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这项研究计划的日本文献目录部分已由上原英男出版，题为《日本左翼社会运动：注解目录》（日本东京，美国拉特兰与佛蒙特，查尔斯·E·塔特尔公司，1959年）。本书已无需再附加书目专章，因为这里使用的大多数日本文献，除了最近公布的一些次要材料外，都包括在那本资料集中。本书引用的日文材料和大多数西文材料全部放在脚注中。

为了帮助那些希望把本书作为参考书使用的人，我在索引中用罗马字母拼音列出了本书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和各种法律规章的日文名称（译本略——译者）。本书也为某些组织的名称和创始日期及个人姓名编制了附录。但只有研究过原始材料的人们才能充分理解那些有最后定论的问题，而在有些情况下，作出定论是不可能的。

这部书所以能完成也是由于有以前的著作，因为我主要以压缩形式将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分别使用于这部著作的某些章节。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埃尔布里奇·西布利先生的帮助，我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得到一笔地区研究培养基金，这使我能够在日本度过一年，同很多日本学者和社会运动参加者商讨，并研究只有在日本才能得到的第一手资料。

我最衷心感谢耶鲁大学的矢永千藤志教授，他为给予我指正和鼓励慨然花去大量时间。我还感谢耶鲁大学的戴维·恩·罗威教授，他曾提醒并建议我要把主题保持在易于驾驭的范围内。我特别要感谢东京大学的丸山真男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的鲇泽岩教授、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罗纳德·迪·多尔教授，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斯·科恩教授，哈佛大学的艾伯特·克雷格教授以及目前在东海大学的河上民雄教授，他们阅读了全

书手稿并提出了意见。我也感谢现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大河内一男教授和也在该校的卫藤沈吉教授，他们阅读了部分手稿。

在和我合作完成这项研究计划的同仁中，我最感激我的两位主要合作者阿伦·科尔和上原英男，因为我分享了他们的知识、观点和积累的资料，他们的富有创见的考虑和高尚的思想贯穿着这项研究计划。我也感谢罗纳德·多尔，他在一段较短时间内帮助了我。此外，我在这里要向为这项研究计划聘请的三位官方顾问表示真诚感谢，他们是，矢永博士、目前在国际基督教大学的蜡山政道博士和美国现任驻日本大使埃德温·O·赖肖尔，他们为帮助我花费了时间和精力。最后，我要感谢东京的自由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泉诚一，现任日本国际书店主任的蜡山道雄和目前在东京大学的吉田昌南，他们给予我们可贵的帮助，使这项研究计划得以真正完成。

我感谢八岛太郎先生，他的书《新太阳》(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43年)使我产生了写作此书的模糊的或最初的启示。我是战争时期在军事情报日语学校读到这本书的。

我也必须提到各图书馆给予我的特殊帮助，它们是：耶鲁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常石先生)、哈佛大学图书馆(楚凯明先生)、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凯女士，林顿先生和亚姆波尔斯基先生)、弗莱彻尔学院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黑田先生和比尔先生)、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图书馆、东京市政研究所图书馆(特别是田村仙元助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图书馆。我向所有这些图书馆表示感谢。

最后，我愿向耶鲁大学出版社中给予我巨大帮助的那些品格非常高尚的人们表示感谢。他们是鲁恩·勒·戴维斯小姐、戴维·霍恩先生和阿瑟·贝肯斯坦先生。

在这篇序言中，事实上不可能列出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这



里也不可能充分表达我对他们的深切感谢；尽管如此，我还必须提及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人，即我的妻子阿斯特里德·玛丽亚·安德森·托顿。

但是，无论我得到了什么帮助，我对本书采用或摒弃了的“事实”、书中的解释或校订\*负完全责任，我在本书中表达的观点，未必与有关本书的概念形成、调查研究、提供资助或负责出版的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的观点相同。

---

\*：指英文本。——编者

# 序 言

卞立强

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陶慕廉( George Oakley Totten, III)先生的学术著作《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即将在我国出版,他要我为他的这部著作写篇序言,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力不胜任的任务,尽管我们都是研究日本的同行,我从他的著作中学习到不少有益的东西,得到很多启发,但我们所研究的领域不同,所以我对他的著作不能妄加评论,只能写几句题外的话。

我跟陶慕廉先生相识,是1980年4月间他到北京大学来作有关日本政治的学术报告开始的。这次学术报告会恰好是由我主持,首先使我感到诧异的是,我面前的这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学者竟然有一个“陶慕廉”这样典雅的中国名字。我想,这与他的夫人是著名的华人妇女活动家李惠英女士当然有关系。但我后来了解,也并不完全是如此,陶慕廉先生本人就对中国的文化有着广泛的修养,对中国有着很深的友好感情,他和李惠英女士在美国一直积极从事美中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工作,他们所居住的洛杉矶市和我国的广州市结成姊妹城市,就是他们夫妇在中间起了促进和桥梁的作用。“陶慕廉”这个中国名字所体现出来的他对中国的美好感情,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和尊敬。

在那次学术报告会上，使我留下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陶慕廉先生为了照顾听众中有不少人是研究和学习日本问题的师生，他没有用自己的本国语言英语，而用流畅的日语作报告。后来了解，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懂法语、汉语乃至朝鲜语等；他主要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从事有关中、日、美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他还经常到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欧洲去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从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应该说他是一个具有广阔视野的国际性的学者。

自1980年以来，陶慕廉先生曾多次来我国访问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他不仅是一位学贯东西、视野广阔的学者，而且为人诚挚，态度谦虚，作风朴实，使我感到他是一位值得自己尊敬和学习的良师益友。

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我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荐出版陶慕廉先生的这部学术著作《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我推荐出版这部著作的理由是，这部著作是陶慕廉先生在60年代初期到日本实地考察、采访，深入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收集第一手资料和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写成的。这部著作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是他的代表作之一，1966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美国和日本均博得了好评。

我推荐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理由是，近年来我国对日本的研究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关于日本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运动以及人物和组织等的研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就我所知，不要说研究，就是翻译介绍也似乎很少。所以翻译出版陶慕廉先生的这部著作，可以暂时填补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和翻译的空白。尤其这是一部日本以外的学者研究日本的著作，我相信这会对我国的日本研究起到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最后我想就这部著作的译者赵晨同志作一点介绍。赵晨同

志是一位年轻的亚洲问题研究者，他具有较丰富的日本知识以及较扎实的日本研究的基础，英文和日文的水平都较好，他翻译陶慕廉先生的著作我认为是合适和胜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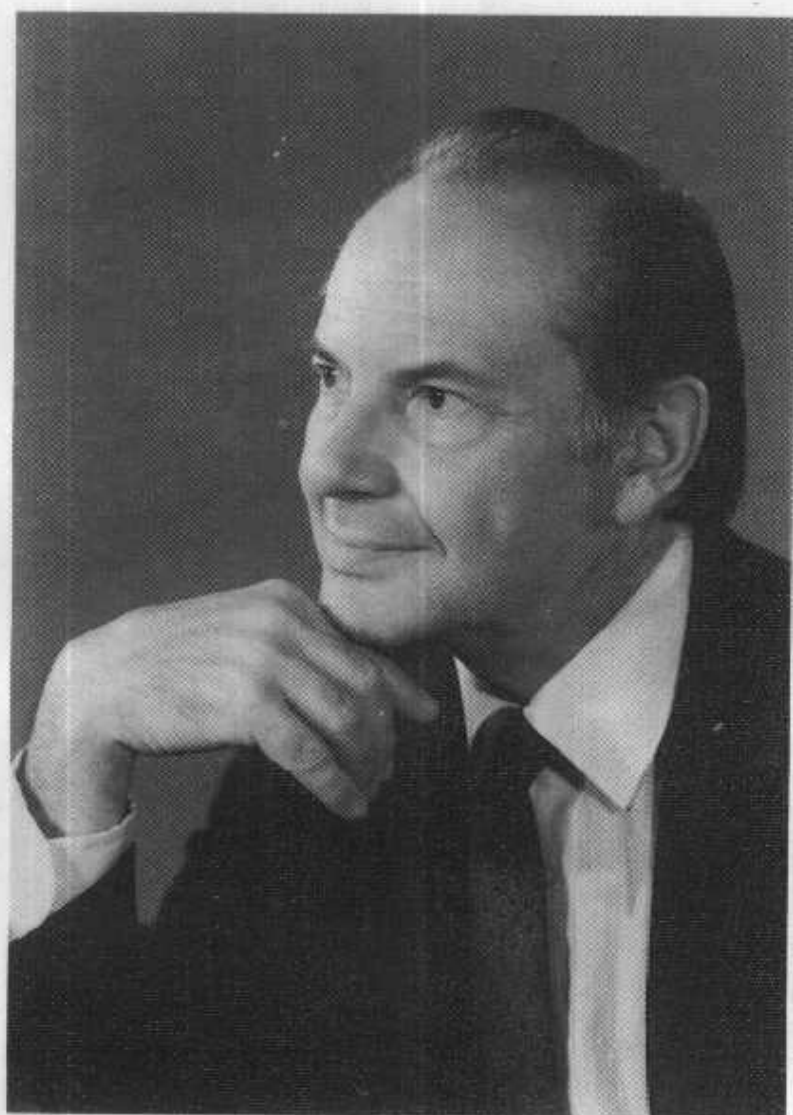
1986年4月3日于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 作者简介

陶慕廉教授是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也是该校东亚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他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中文。1942年他志愿参军，在军队中学习了日语。战争中，他作为翻译，被派到东南亚。在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他是驻日美军的翻译。他在日本遇到了许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人。他决定对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进行研究。他能够使用新闻检查机关和警方所搜集的材料。本书中，三分之一的部分是以压缩的形式采用了他在耶鲁大学时的博士论文。在另外的三分之二部分中，他解释了整个日本社会运动的背景，其中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妇女运动、在日朝鲜人运动以及部落民运动，并且进行了分析。

陶慕廉教授1922年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他早年对战争与和平、革命与逐步演进以及各国文化相互影响等问题很有兴趣。其著作(包括合著)有：《战前日本的民主》、《战后日本社会党》、《发展中国家：寻找模式》、《捕鲸，美日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日本的新海洋政策》、《阿里兰之歌：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党人》。陶慕廉教授还翻译了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本书在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中已被公认为是一本经典著作。





George Oakley Totten IV

陶慕廉



1926年建立社会民众党的三位发起人：吉野作造、安部矶雄和堀江归一（《朝日新闻》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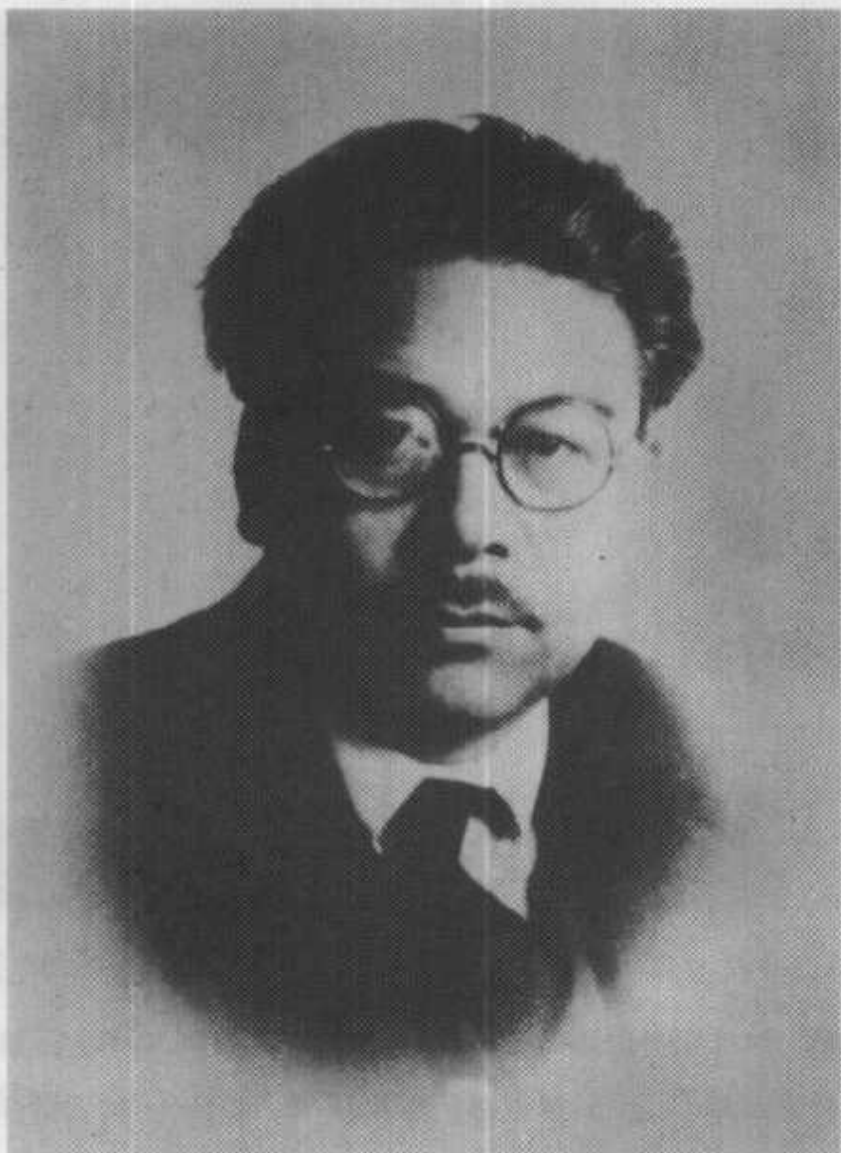


1927年12月，劳动农民党代表大会。

大山郁夫站在讲台前主持会议。墙上是要求所有人都有自由、立刻解散国会和反对那些反对联合阵线的人的口号。台侧的方箱上放着友好组织的贺信。注意那些警察，他们有的在观察发言者，有的在大厅中巡视。台下站着一个人，可能是在向大山提问题。多数人都穿着大衣，因为大楼里供暖很差（《朝日新闻》提供）。



1936年4月，24位无产政党国会议员中的部分成员。从左至右，第1排：冢本重藏(大阪)、山村保太郎(大阪)，第2排：松本治一郎(福岡)、冈崎宪(神奈川)、川俣清音(秋田)、佐竹晴记(高知)，第3排：富吉荣二(鹿儿岛)、山崎剑二(静岡)、河上丈太郎(兵庫)、浅沼稻次郎(东京)，第4排：黑田寿男(岡山)、田万清臣(大阪)、水谷长三郎(京都)、麻生久(东京)、龟井贯一郎(福岡)，第5排：铃木文治(东京)、安部矶雄(东京)、杉山元治郎(大阪)。上面列出的这些人中，除松本和富吉外，都是社会大众党党员。感谢河上丈太郎的儿子现任东海大学教授河上民雄先生提供此照片。



社会大众党总书记麻生久。感谢麻生久的儿子现在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国会议员的麻生义方先生提供此照片。



# 目 录

中文版自序·····	1
英文版自序·····	3
序言····· 卞立强·	10
作者简介·····	13

## 环境与历史

第1章 荒芜的环境·····	3
1.1 政治的限制·····	5
1.2 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8
1.3 传统的社会关系·····	11
第2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渊源：19世纪70年代～	
1922年·····	18
2.1 初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22
2.2 早期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	29
2.3 新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30
第3章 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共产党人的分裂：1922～	
1932年·····	44
3.1 共产主义者领先·····	45
3.2 政府社会政策的变化·····	50
3.3 工人运动方向的转变·····	52
3.4 工人中的分裂·····	54
3.5 无产政党中的分裂·····	58
3.6 共产党人影响的衰落·····	66

<b>第4章 转向支持战争和极权主义：1931~1941年</b>	73
4.1 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满洲事变”的态度	75
4.2 日本国家社会主义	83
4.3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联合及其随后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态度	91
<b>领袖、集团和派系</b>	
<b>第5章 社会民众派</b>	121
5.1 权威人士：著名人士	124
5.2 管理者：工人血统	131
5.3 鼓动家：大学毕业生	135
<b>第6章 日劳派</b>	142
6.1 领导集团的同一性	145
6.2 学生运动背景	150
<b>第7章 劳农派和其他左派团体</b>	162
7.1 初期的劳农派	164
7.2 后起的一些有影响的团体	167
<b>意识形态、战术和政策</b>	
<b>第8章 阶级概念、战略和战术</b>	189
8.1 阶级的概念	190
8.2 基本战略：合法性问题	195
8.3 各无产政党在国会中的竞争与合作	205
8.4 议会外的战术	210
<b>第9章 国内政策：从民主主义的政策到极权主义的政策</b>	218
9.1 工人政策	222
9.2 农民政策	231
9.3 社会政治政策	235

9.4 经济政策 .....	241
<b>第10章 对外政策：从反对战争到支持战争 .....</b>	<b>259</b>
10.1 人民的外交 .....	261
10.2 对不断变化的中国问题的态度 .....	263
10.3 对外交往与对西方国家的态度 .....	278
10.4 对苏联的政策 .....	289

## 选举和后援组织

<b>第11章 选举中的后援力量 .....</b>	<b>301</b>
11.1 男子普选权展示的前景 .....	302
11.2 1928~1942年间6次选举的结果 .....	304
11.3 各无产政党力量的分配 .....	310
11.4 党组织同其工农支持者的联系 .....	322
<b>第12章 工人组织 .....</b>	<b>333</b>
12.1 1928年大选中各工会同无产政党的结盟 .....	334
12.2 其后各工会同无产政党的结盟 .....	340
<b>第13章 佃农组织 .....</b>	<b>354</b>
13.1 1928年大选中农民对各无产政党的支持 .....	358
13.2 其后各农会同无产政党的结盟 .....	362
<b>第14章 妇女组织和少数民团体 .....</b>	<b>378</b>
14.1 无公民权的妇女 .....	378
14.2 特殊部落民：社会少数民 .....	382
14.3 在日朝鲜人：少数民族 .....	389

## 结 论

<b>第15章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特征 .....</b>	<b>403</b>
15.1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特点与共性 .....	403
15.2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构成 .....	412
15.3 意识形态的作用 .....	421

跋.....高桥彦博 429

## 附录

图1 日本社会民主政党的变化 .....	435
图2 日本工会的变化 .....	436
图3 日本农会的变化 .....	437
各无产政党代表大会的日期.....	438
各次国会议员选举中的各无产政党候选人及当选者...	441
日本人名译名对照表(汉字——罗马拼音).....	456

# 环境与历史

荒芜的环境

社会民主运动的渊源：19世纪70年代～  
1922年

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共产党人的分裂：  
1922～1932年

转向支持战争和极权主义：1931～1941  
年





# 第1章 荒芜的环境

政治的限制  
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传统的社会关系

20年代末期，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甚至能够使它的6位代表当选为帝国议会的议员。这是一个成就，考虑到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非常不利于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这个成就的意义就不能仅以表面数字的大小来衡量。这是30年艰苦奋斗的最高成果，在这30年中，工人、佃农和其他阶层群众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团结起来共同行动。根据欧洲的经验，人们能够论证，这只是工业化的一种必然产物。然而，考虑到日本在其他方面现代化的迅速发展，社会民主运动在日本战败前的发展则是迟缓的。

一种传统文化在以有力的步伐转向现代化时，似乎无力去更多注意农民，以及他们的在处于萌芽状态的非农业经济部门中已经做苦工的弟兄们的福利。很显然，在日本从旧统治者向新统治者的权力转移是在一场令人瞩目的冲突的最小限度内完成的，很多政界和商界领袖同是出身于武士阶级，对可能的外国侵犯的恐惧又加强了民族团结感，情况确是如此。

尽管工业化给统治者带来权力和财富，但对那些因受诱惑

而奔往城市、工厂和矿山的人来说，却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幸运。日益严重的物价动荡和越来越不稳定的工作，不能不使人们考虑通过集体行动和组织起来而增强自身力量的可能性。对外国一些先例的了解推动了工会运动和后来的农民运动。由对外国思想流派更为敏感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具有政治倾向性的各种团体，携手联合起来。所有这些为适应由引进资本主义而产生的新条件所进行的活动统称为“社会运动”。<sup>〔1〕</sup>社会民主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他还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特殊部落民解放运动以及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最后还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它们的起源都相同。

其起源可上溯至1868年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及其之后的巩固政权是由一些杰出人物领导的，他们和以前德川幕府时代的统治者不同，了解变革的必要。封建经济体制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所代替。那些阻碍大多数企业积累财富的法律限制亦被清除。在农村中，逐渐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农村各阶级中，地主憎恶高额的地税。这些地税是由政府为增强自身的力量，以及为在工业化中创立新的企业筹措资金而规定的。但是，佃农阶级中不满情绪迅速增长的危险性很快就使地主确信，他们的利益在于支持一个强有力的、能够镇压起义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中央政府，而不是削弱和限制明治政府的力量；这个政府日益以国家权力的神秘化身——天皇的名义进行统治。

在1894~1895年、1904~1905年和1914~1918年三次战争的刺激下，工业化席卷了大城市、港口并蔓延到矿山、林区和农村的小作坊，但它突然发展起来并具有一种不均衡的形式。尽管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大型企业却是架在其顶端，

在两者之间没有中间规模的企业。卡特尔化在经济的较高层次中盛行，而无情的竞争则是小企业的特色。这阻碍着公开的横向的劳动市场的发展，从而阻碍着工会运动的兴起。企业吸收新成员是凭个人间的直接联系，维持着传统的家庭主义。非常落后的农业部门如同一个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经济危机期间，它又象一块海绵，吸收着失业者。由于丢失职业对失业者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有关生死的问题，因而它就更容易被政府和工厂主所忽视。同这些政治经济条件紧密相连，各种封建行为的社会模式继续存在，从而使阶级关系中的相互服从和相互对抗都超越常态。所有这些不利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在初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中留下了特殊的印迹。

## 1.1 政治的限制

在社会环境方面，最明显的限制是缺乏政治自由。明治维新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不同，它并没有产生出一个明确的《人权宣言》。但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最初10年内，确实兴起了初期的民主运动，它以“自由和民权”的名义攻击政府。然而，该运动的那些原属于武士的领导人很快分裂，他们同政府妥协，以政府许诺将于1889年给人民一部宪法为条件，放弃了自己的斗争。因而，日本缺乏中产阶级民主的群众基础。

《明治宪法》中规定的政治自由实际上并没有“保障”。它很容易被政府用法律和行政命令取消。当19世纪90年代日本第一批产业工人开始出现时，他们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德国伙伴在几十年前所处的地位相同，即不仅要为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同工厂主斗争，并且还要为争取言论、集会和组织自由而同政府当局斗争。官僚们使用暴力镇压可能会搅乱

大多数顺民安宁的那些活动，但没有民主传统可以约束他们。政府当局的态度和主张是，阻止各种社会运动的发展。事实上，当权者倾向于使社会运动内部产生出非民主的倾向。当在法律允许的狭窄范围内很少有机会进行社会变革时，极端主义则更加有号召力。各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以牺牲朝气蓬勃的自由讨论为代价，鼓励个人崇拜和设法使各派在意识形态方面达成虚伪妥协。

1900年前的大量禁令和禁律主要是针对自由民权运动的，但自由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在1898年作为内阁成员而担负起政治责任后，在1900年却并没有反对通过《治安警察法》，而该法案的第17条实际是禁止成立劳工组织和进行罢工。此外，该法案并没有改善那些终会导致日益频繁发生罢工和纷争的条件。工人的互助团体建立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其中许多团体已发展成为有足够力量迫使当局不能严格执行《治安警察法》的工会组织。在争取废除该法案的政治斗争中，必然会提出将有限的选举权扩大到包括工人阶级的要求。1925年公布了《男子普通选举法》，1926年废除了《治安警察法》第17条，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并没有很多的自由。

在扩大选举权的同一年，一个严厉的但词句含混的《反颠覆法》开始生效。该法案称为《治安维持法》，它禁止改变“私有财产制”或改变“团体”的各种活动。该法案声称是针对共产党人的，但实际应用的范围很广泛。此外，以前制订的一些其他法律——诸如1890年的《行政强制法》、1908年的《关于攻击警察的惩治条令》以及一些县级治安法令——仍然有效。很多其他方面的法令，例如，关于妨碍行政事务、扰乱治安、阻碍交通、非法侵占、诽谤、使用暴力、恐吓以及中伤一个人或一个

企业的信誉等法令，也被用来控制工人的活动。

然而，废除《治安警察法》第17条却使《劳资纠纷调解法》得以在1926年通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法案中关于成立三方调解委员会这条表面上的民主条款几乎从没有实行过，而政府和警察则根据该法案的其他条款继续干涉劳资纠纷。<sup>[2]</sup>事实上，他们所得到的经验诱使他们后来扮演了在产业报国会(产报)中的角色，政府在太平洋战争中通过产业报国会控制了劳资关系。

日本政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颁布的那些镇压工人的法令，意味着工人被剥夺了寻求改善自身条件的合法手段。如果政府为保护工人免受过分虐待和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而自上而下地实施一项社会立法规划，工人寻求组织起来和参加政治运动的必要性就可能会减少。俾斯麦正是试图这样做，但日本政府却没有这样做。日本只是到1911年才通过了第一个保护工人的重要法律，即《工厂法》。<sup>[3]</sup>《工厂法》直到1916年才实行，但即使在那时，它也不适用于规模较小的作坊和工厂。<sup>[4]</sup>随着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军事侵略日益扩大，社会立法问题再度引起注意。这次的起因，与其说是由于政府感到工人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不如说是因为发现帝国军队中新兵的身体素质很差而受到震动。政府制订了一些比以前稍有改进的法律，其中包括一项提供了社会保险的法律。<sup>[5]</sup>

在战前，日本官方尽管从没有停止过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但镇压的程度和手段却时有变化。虽然早期对工人组织的禁止已经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思想的兴起而废除，但由于对工人的镇压都比对社会主义团体的镇压更为严厉，当时已经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智化，以致使其如同一个同工人分离的宗派。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期间直接提供的条件，才使得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能够融成一个混合的运动。政府为对付这种形势，采取了一种镇压激进派同时鼓励改革派的新政策，这为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基础，尽管范围很狭窄。

但是，日本对中国大陆军事侵略的扩大使日本有必要加强对工人的控制。日本政府因而在1937年对非共产党的人民阵线所代表的唯一仅存的左翼运动进行镇压，并且在40年代初授给那些同政府合作的社会民主分子半官方的职位作为奖励。对广大工人群众却没有给予这种报偿，而他们却是在国内阵线中对战争作出贡献的主要支柱。随着在太平洋战争中实行人员的强制分配，政府对工人的控制达到了顶峰。从此为工人的利益进行鼓动已长期成为不可能。

## 1.2 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然而，仅仅用人民缺乏政治权利来解释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限的发展仍旧是不充分的。19世纪末德国的社会环境同日本大体类似，但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仍然十分显著。要解释日本的落后还必须看看经济和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也许是经济上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明治维新时的“土地大纲”，尽管废除了关于农业财产的封建权利和义务并承认土地私有，但却征收土地税——只能用货币来交纳，决不能用农作物或其他商品替代——这很快就迫使许多被解放的农民陷入一种困境，由不久前刚得到土地的所有者变为租佃户或半租佃户。其他一些人靠不知疲倦地辛勤劳动保留了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也未能逃脱借贷者的命运。

仅靠经营农业成功的人极少。明治政府在初期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地税，以便为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和建设主要工业提供资金。这样，农村仅剩下很少的资本能够用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

农民从没有被大批驱赶离开土地；他们受吸引而离开土地只是由于需要在非农业部门中工作。例如，1920年日本有收益的就业人口中，在农业部门工作的占50%，而在工业部门工作的只占19.7%。由于经济形势不稳定和低工资，工人们承受不起割断同农村联系的后果。在城市里，由动力带动的机器无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已很普遍；但是在农村，农业生产方式仍旧是非机械化的，依靠劳动强度很大的手工工具。农民们为了免遭饥饿，被迫在村庄中搞一些辅助性的工业，或将自己的家庭成员送到城市里去工作，或既搞辅助性工业又派家庭成员去城里做工。<sup>[6]</sup>

稳定的工业人口的规律仍旧非常小，这严重地限制了支持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的力量，而不管政府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是采取十分容忍或十分敌视的态度。这也意味着，工人运动要在政治上强大起来，必须得到农村投票者的支持，特别是佃农的支持，甚至在都市中，它也必须争取那些临时来城里做工的人。

经济发展中严重的比例失调，不仅表现在工业和农业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工业部门本身，在轻工业和重工业（例如纺织业和机械制造业）之间，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以及巨大的垄断企业和无数的小企业之间，都可以看到不平衡的发展。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性质有深刻的影响。

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可以用纺织工业成长的例子来说明，纺织工业在进入本世纪后不久即成为日本雇佣工



人最多的工业部门。1929年仅棉纺织工业就占有全部工厂工人的54.7%。相比之下，钢铁和机器制造业中工人的数目则很少。1929年钢铁和机器制造业工人(281,093人)只相当于纺织工人(997,690人)的28%。

多数工厂规模过小也是工人组织难于发展的一个因素。1935年，在雇佣5人或少于5人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数量，相当于在雇佣5人以上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总数的1.5倍。<sup>[7]</sup>那些小工厂在同经营得更好的大企业的竞争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能够通过一种转包合同的制度生存下来，这种制度产生出一个分等级的集团，财阀在最上层。每个从属的下一层都有一个较低的利益范围和较差的交易位置。工业上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在那些为军事系统和海军服务的巨大国营经济部门中也很明显。在那里，组织富于战斗性的工会是不可能的。

日本工人构成的一个特征是女工所占的比例非常高，这是因为早期兴起的纺织工业装备着妇女能够操作的机器。随着产业经营的多样化，女工的比例降低了，但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女工仍占全部工人的约60%。直到1937年前后，男女工的比例才颠倒过来。许多纺织女工是临时性的，她们的父亲只为她们签订去工厂工作两三年的合同，然后令其回家结婚。女工们生活在宿舍中，大多数都服从严格的家长式管制。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建立有战斗力的或进行政治活动的工会。

由于仍旧广泛实行长子继承制，男工主要招自农村家庭中那些二男或三男。他们在心理上感到“家”仍在农村，在发生工业危机或是罢工失败时他们仍旧可以回到那里去。<sup>[8]</sup>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目的是挣了足够钱后就退休回到农村去。他们希望在城市中得到成功。但是，他们能够期望危机时从他们老家得到帮助的事实，使他们在同被视为保护他们生活的诸如工会

这类组织的关系中，保持着某种“独立”性。工会会员在危难时刻的离散削弱了工人运动的政治基础。

尽管官方的失业数字较低，但农村存在大量未充分就业的状况却帮助维持着所谓廉价劳动力。同其正与之竞争的那些先进国家相比，日本工人除工资低外，工作条件无论从形式看还是从内容看也都很差。工资所得照例不足以供养全家，一家所有身体健壮的成员都必须工作，以帮助全家维持生活。<sup>[9]</sup>工资低虽然使日本能够成功地同外国竞争，但它也延误了新机器的采用，以及可能带来的劳动条件的改善。

劳动力价格低廉增加了对带政治性的工人运动的需要，但恶劣的条件却又阻碍着它的实现。工会金库中的钱很少；疲劳使会议难于进行甚至无法召开；缺乏公开的劳动市场使失业成为一个更加恐怖的幽灵。工人的绝望促进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策略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工人生活无保障有时也使更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和极端爱国主义团体从中得到好处。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促使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极端化的特征。

农村也有类似城市中廉价劳动力那样的情况，大部分佃农由于要偿付极高的地租，也具有某种类似的不安全感和极端主义。佃户作为村社的成员尽管本质上是因循守旧的，但他们也会因受严酷环境所逼迫而不顾一切地采取激进行动。

### 1.3 传统的社会关系

除这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外，残留的封建社会关系也阻碍着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虽然工业化一般为实现更加自由和民主的人与人的关系创造了机会，但是在日本，

那种农民对当权者的服从也被从乡村带到城市的工厂中。工人们将封建的服从关系带到新的环境中，他们在祝贺仪式、拜访、初次见面、相互尊敬等方面仍维持旧有的习惯，而在诸如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家庭生活中也保持着合乎时宜的行为。

村社间的联系和家族间的联系成为直接招收工人的基础。通过经济人、转包人、掮客，企业能够绕过招工站而同各个乡村地区直接打交道。这种招工形式使工人们无论是在工厂内还是在工厂外都很容易被置于一种等级制度中，这使工会难于建立，即使建立了也很难扩展到所在的企业之外。行业工会的发展因而受到严重阻碍。企业工会——建立在某个企业之中的工会——绕过行业工会这一中间组织而直接隶属于全国工会联合会。<sup>[10]</sup>全国工会联合会不熟悉各地情况，也没有得到工厂主的承认，它不重视就劳动条件同工厂主进行谈判，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在事实上还只是把各种不同规模和力量的单个企业工会松散地杂乱地联合在一起时，就发表声明，仿佛它代表整个工人阶级。

只要是在企业(而不是阶级)就能在其中发现封建家长制概念的流行。连教育制度都在传播应保持“主人和雇员友好相处”，仿佛企业是一个家庭。那些上一代或上两代的祖辈往往是武士的雇主力图象父亲那样保护他的工人，但当工人表现出对雇主“缺乏尊敬”(抱怨)或“阴谋”(采取集体行动)反对他时，他也会震怒。当雇主发怒时，工人们常常感到有罪和绝望；因而，任何以严肃认真的方式进行的集体谈判都受到严重阻碍。

雇主从这种封建心理中得到好处。小工厂的老板利用他的“长辈地位”控制处于“晚辈地位”的雇员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甚至安排他们的婚姻。相反，通过签订合同大工厂主更强调传统的尚武精神——在工厂中建立等级制，按一定条件授予

雇员等级勋章，戴在他们的领子上。<sup>[11]</sup> 一个人的“面子”是由他得到的荣誉和功过报偿决定的。

除了企业主在这方面作出的个人努力以及地主对待佃农的做法外，国家本身也在积极促成一种软化社会政治运动的社会风气。学校、国家资助的寺社以及其他大众宣传工具都在灌输无条件服从以天皇为首的政府当局的思想。对工人进行强制教育的全部后果，不只是给了他们以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技术，而且也使他们感到知识很有限，要想反抗现存事物毫无益处。普遍兵役制加强了这种思想的灌输。

缺乏平等主义的观念对日本社会民主运动有深刻的影响。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带有造反和叛乱的性质。效忠于谁的疾速变化在工会和党的领导集团中造成很大的动荡。领袖们很容易因突然的后退或某一部分普通成员表现出意外的好战而被孤立。英雄般的自我牺牲式的领袖有时也会出现，但工会领导人(他们也是政治家)通常是靠工人的顺从建立专制性的控制。比较谨慎小心的领袖们同那些充满热情的左翼领导分裂，左翼领袖的号召力往往限于少数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广大的占多数的工人甚至还没有同工人运动发生接触。事实上，日本在战前，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合格的工人中从未超过7.9%(1931年)，实际人数则从未超过420,589人(1936年)。

然而，恶劣的环境却驱使工人运动开展各种程度不同的政治反抗斗争。工人需要朋友和同盟者。无产政党适应了这些需要。无产政党寻求把一切可以联合的因素，如佃农的反抗同工人运动和不满的市民群众，以及诸如被歧视的部落民甚至在日朝鲜人等，都联合在一起。

社会民主运动要是能够在选举之中赢得3~10%的公众选票——假定这些选票能代表全部人口中同样比例的人自由表达

的意志——由此判断这样规模的运动是大还是小，是处在发展的早期还是晚期，这要依据同谁比较而定。马克思主义的流行使日本多数左派把英国作为比较的对象。日本的工业化比英国仍旧落后很多，日本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规模也比英国落后。比较缺少耐性的列宁主义者则继续指出，俄国的经济和政治在许多方面比日本更为落后，然而，俄国却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那些信奉“社会政策学派”的官僚和亲政府的学者们则引证德国的历史，希望俾斯麦式的政策能够防止革命。美国的模式表明不适用于日本。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它的资本主义是从肥沃的土地中成长起来的，它的较充分的政治自由并没有迫使工人必须发展自己的政治运动，工人能够简单地通过中产阶级政治家来报答朋友和惩罚敌人。

然而，把日本同中国以及殖民地世界相比较，日本的工业化是一个奇迹，但连日本左派也未因这一特点而对这种比较感到满意。在日本左派中，并没有出现诸如从研究后进社会而学到社会变化本质的某些知识。日本在战前，左派中没有一人提出，残存的封建社会准则能够使日本的迅速工业化成为可能，而事实上企业主却本能地认识到这个道理并按其行动。日本是社会民主运动能够发展起来的唯一亚洲国家。其他初步建立议会制度的地区——如印度、缅甸和菲律宾——都被外国统治着，民族主义的种子播入了一切反抗运动中。中国不存在议会制政府，任何运动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支持都不能够得到发展。

在这种意义上进行比较，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确实是先进的，尽管它还不是革命。它们是一个强大的正统的土生土长的政府所发动的工业化的产品，这个政府从没有在外国的枷锁中呻吟，它立志革新，了解教育和向人民灌输的价值。它也重视秩序和稳定，并有足够的经验在面临动乱时使用强制手段维持它的全

部权威。

但是，在20年代中期，明治时代的第一代领袖都去世了，留下他们的那些处在分裂中的继承者管理着已创建起来的各种组织机构——即相互竞争的政府各部、各政党和各军事部门以及各财阀利益集团。在这种形势下，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领袖竞相争取获得政权。他们面对的是一些巨人。尽管由于工业化的进展和日本正在卷入纷乱的国际事件，使他们即使不是必然也是有可能争取到政权，但在直接的较量中，同对手相比，他们力量较弱而且环境也不利。

## 注 释

[1]对这个词的绝妙解释见平凡社编：《大百科字典》（东京，平凡社，1932年）第12卷，第142～143页。关于这个词在欧洲的起源及其在英语中的运用，请看鲁道夫·赫伯利：《社会运动》（纽约，阿普尔顿—森图赖—克罗夫茨公司，1951年）第4～6页。此词的经典的德文定义同它在现代日文中的定义非常近似，这也是本书中所使用的定义。

[2]末弘岩太郎：《日本工会运动史》（东京，京都图书社，1950年），第69页。

[3]《工厂法》只适用于雇佣15人以上的工厂中的工人和那些承担危险任务的工人。大多数保护性法律只适用于妇女和青少年。也制订了一些保护孕妇和有关工厂检查的规章。关于该法案的讨论，请看国际劳工局的专题研究报告《日本的产业工人》第1集《产业关系》第37卷（日内瓦，国际劳工局，1933年），第138页以及该卷的其他部分。

[4]该法案的实行推迟了，因为工厂主要由于三个原因而还没有为实行该法案作好必要的准备：（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衰

退；(2)内阁急速更迭；(3)因1910~1911年幸德秋水审判而出现的恐惧。风早八十二：《日本社会政策史》(东京，青木书店，1952年)第1卷，第188~190页。

[5]不仅想以这些补救性的法案改善应征新兵的身体条件，而且也能借它们来向工人和农民显示，同正在兴起的军方合作，将比追随社会民主领袖或其他工农领袖能更有效地抵制资本家的影响和在改革中取得成果。

[6]在日文中临时离家去做工以帮助家庭增加收入叫“出稼”。东京大学的大河内一男教授论证，这是日本几乎所有工人的特点。大河内一男：《初期的日本工人运动》(东京，岩波书店，1952年)，第4~7页。

[7]1935年日本工人总共约有590万。其中约95%的人是在雇佣30人以下的工厂中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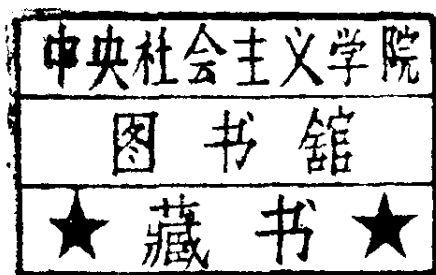
[8]大河内一男：《社会政策的经济理论》(东京，日表新社，1952年)，第216~217页。

[9]大河内一男论证，在日本，工资不是亚当·斯密所规定的那种传统含义，即足以购买维持工人家庭的生活必需品的款额。毋宁说，在日本，工资或其大部分只不过是贫困的农民家庭收入的零散小额贴补。见大河内一男：《劳工》，载矢内原忠雄编《现代日本小史》(共2卷，东京，水鸟书房，1952年)，第1卷，第130页。关于大河内一男的廉价劳动力的定义，请看他的《初期的日本工人运动》，第10~11页，和他的《劳工问题》，载《经济学全集》第11卷(东京，宏文堂，1955年)，第40页。

[10]对这种企业工联的英文的简明解释，请看所罗门·B·莱文：《日本的工人运动 and 经济发展》，劳工和产业关系研究所再版丛书第36号，《伊利诺斯大学简报》第53期(1955年9月)，第7~12页，和《战后日本的产业关系》(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01~107页以及该书的其他部分。

[11]关于陆军、海军和民用工厂工人中那种类似军队的等级制的许多例子，请看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东京，岩波书店，1934

年)，第135~159页。有趣的是，一个工人，无论其如何有才智和勤奋，都极少能晋升到工头以上的职位。在企业管理的最低一级，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垄断了晋升为管理者的机会。这意味着，虽然对薪金不满的工头从逻辑上说就是潜在的工人领袖，但他们通常因害怕失去工作和经过漫长时间才达到的等级序列而受到抑制。





## 第2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渊源：19世纪70年代～1922年

初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早期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

新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只有在社会民主运动近期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充分理解其之所以于20年代诞生的原因。由于公认日本现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起源于土生土长的传统，因此我们只需上溯至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运动。自由运动虽然是从“宫外”武士反对“宫内”武士的权力斗争开始的，但它受到外国——主要是法国和英国——的鼓励。自由运动不过是昙花一现，表明其领导者的自由信念是多么肤浅。尽管如此，但它却有助于产生出一个议会制“形式”的政府，当选举权予以扩大和通过政党竞选后，议会政府的内容就及时得到充实。

19世纪90年代时外国的东西又一次引进日本，即仿照美国组织工会，从而使那些被吸引到新建的钢铁、机械、铁路等部门中工作的不满的人得到一种组织形式。对日益发展的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的认识，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去研究西方社会主义理论，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当时要产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为时尚早。工人对发展工会还没有充分准备，社会主义者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工会就这样被敌视它的政府当局扼杀。要具备建立工会的基础必须耐心等待互助福利会

的发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工业繁荣。在工人组织起来之后，佃农在20年代初期也开始组织起来。社会主义者们相互间展开了争论，在对工人和佃农提供的各种理论思潮中，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良药。由此出现了三种主要理论：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各式各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样，甚至在各社会民主政党尚未形成有群众基础，并尚未使其代表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进而在议会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之前，混乱的社会主义运动就已经分裂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党的起源也可以上溯到古老的自由运动。

为实行宪法而进行宣传鼓动是首次带有明确的民主色彩的反政府斗争。它抛弃了更带有传统性的反抗方式，而是以值得纪念的1874年板垣退助号召建立“民选议会”作为发端。它虽然开端于一位杰出人物的反抗斗争，但由于反映了农民对政府征收难以负担的地税的不满情绪，从而获得群众支持。这场斗争以“自由和民权运动”闻名。<sup>[1]</sup> 为了指导运动，前土佐藩的板垣退助在1881年建立了自由党，这是后来建立的一系列政党的先河。肥前藩的心怀不满的政治家，即被逐出政府不久的大隈重信，也企图从这场反抗运动将来可能得到的成功中获取好处，他于次年建立了一个更温和的团体，名为立宪改进党，其后半个世纪内，那些相互竞争的主要政党都起源于该党。<sup>[2]</sup> 土佐藩和肥前藩都怨恨新政府被萨摩藩和长州藩所操纵，因为事实上是4个藩合作才使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在地方上，是原来的武士、富裕商人和较富裕的农场主领导着运动。群众的支持则来自雇农、各类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由诸如植木枝盛和中江笃介(笔名是中江兆民)等人所阐述的该运动的基本原理，主要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理论和卢梭的社会矛盾概念。<sup>[3]</sup>

这个带有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而陷

于停滞。从1881年到1885年，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和持续的高额赋税，使日本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sup>[4]</sup>这使大批农民失掉土地并因而使土地集中在通常是高利贷者兼小企业主的地主手里。<sup>[5]</sup>经济危机一方面是促进自由运动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又阻碍着自由运动的发展，它不可避免地要促使自由运动分裂为两部分。处在少数一些更激进的领导人影响下的贫苦农民，组成了以诸如借金党、租佃党、困民党甚至东洋社会党命名的地方政治团体。这种农民活动使较富有的领导者感到恐惧，他们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地主特权。对他们来说，宁愿让警察保护财产和让政府镇压那些群众集会，这些集会甚至已敢于讨论延缓偿付利息和租金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在自由环境中开展经济活动以获取利益已开始显得较为不可取了。

这样，恶化的经济形势促使自由运动发生分裂，它促使农民不顾一切地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同时，它也促使半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更紧密地同现存的法律和秩序站在一起。明治政府领导人完全有能力利用这种形势，以便扩大分裂。他们运用两手战术：镇压和许诺。他们以1875年的《新闻条例》和1880年的《集会条例》为法律基础，动员警察布下侦探网镇压小型集会，同时动员新征召的军队镇压较大的骚乱。政府在1881年作出最重要的许诺，当时天皇宣布将在8年内颁布一部宪法并在宪法颁布的次年建立议会或国会。政府还在幕后运用一些政治战术，例如诱使板垣退助出国，从而使其所领导的运动在最动荡的关头失去领导者。<sup>[6]</sup>

这些战术是成功的，农民遭到镇压，自由运动的领袖被建立国会的诺言所安抚，而反对自由的封建思想仍旧在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天皇仍保有最高权威，而官僚机构，特别是军队，也保有其独立性。1889年的钦定《明治宪法》

几乎没有承认自由运动所要求的那些权利，而于1890年召开的那个国会，权力很少，以至它更象一个名义上的议会，而不是事实上的议会。

在这种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1890年实现了出售官办工业的方针，资本开始集中在财阀手中。仅仅几年前，即在1882年，建立了日本银行，统一了货币。在1890年日本首次因生产超过购买力而发生经济危机前，工业资本主义不再象以前那样离不开政府津贴，它健康发展的前景似乎是光明的。

除其他原因外，建立新工业的耗资也导致在经济部门中占有巨大多数的农民十分贫困，当时这种情况限制着国内市场的扩展并产生了对国外市场的需求。1893年日本向国外装运了第一批用进口机器生产的货物：向中国和朝鲜的市场输出了11,000包棉纱和棉布。<sup>[7]</sup>正当扩大输出对日本经济日益重要时，这两个国家对日本货物强征进口税并规定限额，这增强了日本要在同中国面对面的抗争中显示其力量的决心，同时，日本也借此提醒其他各国，它希望被视为一个大国。

可以认为，日本生产能力的增长是引起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一个间接因素，此外，它也是使日本能够打败中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战争的胜利使日本经济得到好处，由于日本政府从中国拿到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因而能够偿付它拖欠的大量战争债务，日本经济也因而得到新的资本。此外，日本也因此能够实行金本位制，开始对它的新殖民地台湾投资和扩大它在中国市场的立足点。

## 2.1 初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然而，日本产业工厂的扩展也带来了雇佣工人增加的新问题。1892年在新兴工业中的工人总数只有294,425人，但是到1897年已迅速增加到439,549人。其中，丝织业工人占23.4% (68,793人)。工业化的真正先驱机器制造业已经出现，虽然机器制造业工人还只占全部工人的0.4% (1,041人)。<sup>[8]</sup> 战争也使赋税增加并使通货膨胀加重。因而，发生了一些劳资纠纷。仅1897年下半年就发生了33起罢工，参加罢工的共有3,517人。而1898年发生了43起罢工，参加罢工的共有6,293人。<sup>[9]</sup> 当时的观察家们已日益认识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问题。例如，19世纪90年代末期，一位杰出的记者横山源之助对“社会下层”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他报道说，“我相信，中日战争是产生新时代劳工问题的原因。我并不是说战争直接和劳工问题有关联，但是，作为战争的后果，机械工业得到繁荣，它带来了劳工问题”。<sup>[10]</sup>

日本的工人运动是以试图把工人的自发行动纳入秩序而开端，进行了各种建立工会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于1897年4月发生在东京，当时海员泽田半之助、鞋匠城常太郎和记者高野房太郎这三个从美国学到如何建立工人组织技巧的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另一位归国者即后来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献出一生的片山潜也参加了会议。<sup>[11]</sup> 他们共同建立了职工义友会。<sup>[12]</sup> 1897年7月该会改成为工会期成会。同年12月1日，工会期成会成功地建立了日本铁工工会，它有1000余名会员，主要由在东京—横滨地区综合军工厂和炼铁厂中工作的钢铁工人和机械工人组成。这是日本第一个在组织和章程上以美国工

会为样板的工会。工会会员们选举片山潜为书记，由片山潜任编辑出版了《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实际是当时唯一的工人运动的机关报。<sup>[13]</sup>

次年2月，日本铁路公司的司机和司炉，以威胁要举行全体罢工，并成立了日铁矫正会，从而在改善待遇的斗争中赢得胜利。大约在同时，深川印刷公司的一百多名工人，在几次失败之后，终于建立起一个工会。该工会1900年宣称已拥有会员两千多人。在片山潜和其他人的努力下，工人组织以较有秩序的形式得到发展。1900年，日本铁工工会的会员已超过5,400人。<sup>[14]</sup>

事实证明，前面提到过的1900年3月《治安警察法》的颁布给予工人运动的发展巨大打击。<sup>[15]</sup> 在此之前，同认为工人运动发展道路上困难重重的悲观看法相比，认为工人运动发展有光明未来的乐观看法更占上风。事实上，那些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因资本家对工人的要求缺乏抵抗而感到惊奇。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日本企业主更带家长式的态度能够使日本工人阶级避开更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中工人所遭受的某些痛苦。然而，他们从最初就因受警察监视的程度而感到苦恼。<sup>[16]</sup> 现在这个新法律使当局握有更大的镇压工人反抗的权力。

但是，甚至在这个法律颁布之前，组织和联合工人运动的努力就已经遇到各种实际困难。诸如掌握新技术的铁路司机这样的更现代化的工人拒绝同那些新从农民中招来的粗笨的非技术工人联合。同时，锯木工等各行业的工人则坚持排外的行会传统，而纺织业中的大批妇女和儿童很难为建立工会奠定深厚基础。在那些西洋化的知识分子和受悲惨命运所迫并大体接受这种命运的粗笨工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工人们哪怕是一分钱也不愿捐给工会，他们都怀疑经费会被工会领袖们浪费，

而不是给他们带来所许诺的福利，而他们的这些怀疑往往是正确的。除去资本家——其中有一些人事实上同情初期的工会运动<sup>[17]</sup>——的反应外，在政府采取严厉态度使运动停滞之前，另外许多因素也阻碍着运动的发展。那些无论用何种方法同工人进行联系都遇到巨大困难的工会组织者，现在比以前更加确信，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有弊病的，仅仅试图治疗表面上的病症，工人不可能得到“拯救”。由于法律障碍是最直接的障碍，他们也确信工人必须转向政治斗争。

1901年5月22日，片山潜和一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工会特别是日铁矫正会的支持下，试图建立社会民主党，这可以认为是促使带有政治性的社会主义运动诞生的转折点。1925年公民权大幅度扩大后成立的那些所谓的“无产政党”，其起源都和这个党有关，该党在日文中称为“社会民主党”。<sup>[18]</sup>事实上，建立该党的那些人后来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各主要流派的代表：幸德传次郎（幸德秋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片山潜成为共产主义者；安部矶雄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那些得到初期的工人运动短暂支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及其同志们的出现，是此前20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各色各样思潮的影响的结果。参加民权运动的一些较激进分子开始阅读和帮助翻译以各种方式探讨社会主义的西方著作。在早期激进后来变为保守派的加藤弘之于187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首次出现了“社会主义”一词，它被音译为“索欣里日姆”。<sup>[19]</sup>该词被译为“社会主义”首次出现在1878年的印刷品中，当时报界报道了社会主义者试图暗杀威廉一世（为警察的猜疑提供材料）。但该词的流行（肯定是在有限的读者中）则是始于1887年，当时首期《国民之友》开始连载亨利·乔治的一篇文章的译文，亨利·乔治在该文中常常使用“社会主义”一词。<sup>[20]</sup>该杂志在一段时期内

成为自由党左翼的喉舌，它仍坚持“自由和民权运动”的传统和信奉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它刊载那些研究法国、德国或刚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写的文章。

在此阶段，社会主义者不只是得到外国人写的书和文章，而且得到第一手报告。一些小团体开会讨论西方有关各类“社会问题”的“先进”思想，力图找出哪些能够应用于日本。这些团体大多数都是短暂的，但其中有一个，即成立于1896年4月2日的社会政策学会，却长久存在下来。该团体从研究当时德国社会政治学派得出结论，否定“社会主义”和放任自流，同时督促国家实行福利政策。它由政府人士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们组成，一方面，它是受英、法、美影响的人道主义者的长期对手，另一方面，它又是稍后的带有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对手。

基督教的影响是促进社会主义者队伍扩大的另一个因素。在日本长期同外界相隔绝之后，基督教在日本发展起来。这次，基督教的传播促进某种社会觉悟以及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对他人幸福的关心，日趋高涨的新教徒运动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一些日本人对基督教的这种因素有深刻印象，他们欢迎对其来说似乎是更为忍让的唯一神教派，但由于教义上的分歧而受到各新教教派的排斥。而十分忍让的唯一神教派却又促使某些人最终完全抛弃基督教而支持各种社会主义原则。

在受大量西方社会主义作家的翻译作品影响的过程中，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团体开始和自由党左翼在东京唯一神教派协会的大厅中聚会。他们在1898年秋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始比较系统地讨论圣西门、蒲鲁东、傅立叶和马克思等著作家的理论，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理论应用于日本。<sup>[21]</sup> 两年后，研究会的一些成员急于行动。这导致对理论失去热情的那些人



退出了研究会，而该研究会在1900年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尽管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人靠自己做不了很多事，但他们却形成了一个核心，试图结成一个更广泛的团体并赢得工人的支持，从而建立社会民主党。当时6位发起人中，有5位是基督徒。<sup>[22]</sup>

社会民主党得到足够的支持并终于采取行动的事实引起伊藤博文(表面上倾向于自由民主的寡头独裁者)内阁的十分注意，以致内务省命令该党立即解散。在任何情况下，党能否在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都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只有少数富裕的有产阶级才享有投票权。诸如片山潜、安部矶雄和幸德秋水等党的领袖如果在党纲的某几个方面同政府妥协，是不致被政府命令解散的，但是他们拒绝这样做，以免这样一个先例使社会主义运动从它诞生时起就受到约束。

回顾一下，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确实是一个温和的纲领，它的大多数直接目标带有民主的性质，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sup>[23]</sup>该党声明，它不只是维护穷人的利益，但也不敌视富人，而是希望为整个国家的繁荣工作。它的目标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具有民主主义性质——人民参政和废除贵族院——或和平主义性质——终止军事开支。这些主张被执政党政治家攻击为是“煽动”，其中一些人还是前民权运动领袖。这个事实表明日本自由主义者抛弃他们以前对于政治自由和普选权的要求已达到何等程度!<sup>[24]</sup>

在1900年以后的10年中，政府的专横态度和工人运动的软弱，使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搞理论，而不是采取行动。《治安警察法》压垮了初期的工会运动，解散社会民主党的命令甚至没有为温和的政治改良主义留下活动的余地。因此1900年后，社会主义运动只限于在教育和宣传方面开展活动。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分离，使得当时较为温和并重

视组织的片山潜失去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由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的幸德秋水及其亲密助手堺利彦所代替。其结果是，倾向于鼓吹激进理论而不是实际行动，这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明显特征。

如果把社会主义运动视为一个单一体，那么在1899年到1902年它包含着两个方面：即工人和社会主义者。1899年，少数社会主义者在讨论和研究社会主义的抽象理论，而早期的工人运动及其领袖则在为具体的工作条件而进行谈判并实行罢工。在1901年，那些急于进行政治活动的社会主义者发现，早期的工会活动家接受了一个讯息，即工人如果要真正改善其境遇，纯粹的经济要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但是，1902年工会运动被扼杀，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选择，只有把自己局限于在教育和宣传领域中活动。<sup>[25]</sup>

政府尽管采取严厉手段反对工会和工人活动，但却继续容忍社会主义协会的存在。在1902~1903年前后，社会主义思想在有限的标新立异的知识分子中间甚至成为一种风尚，但是同时，社会主义者却和他们称之为其利益奋斗的真正工人阶级失去了联系。

然而，随着同沙俄对抗出现爆发战争的危险，社会主义运动又遇到一个关键问题：战争会给日本劳苦大众带来益处还是会成为他们的负担？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似乎铭记着战争就是邪恶。社会主义者以这个信念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反战运动，它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领导，这两人共同建立了平民社，并于1903年11月15日开始出版《平民新闻》。<sup>[26]</sup> 该杂志刊载了许多反战文章，其主要论点如下：(1)战争和人人互爱相矛盾并破坏社会正义的原则；(2)战争有利于资产阶级而牺牲平民；(3)赞同战争的国会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不代表平民。因此我们反对

战争，甚至也反对我国军队的存在。

社会主义运动这时开始遭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则更是如此。社会主义者和政府斗争了一年多，以写文章、发表演说、召开会议等方式坚持推进和平运动。但是，在1905年1月29日，《平民新闻》第64期遭到查禁，而在1905年10月9日，平民社被命令解散。这个由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们同非宗教的社会主义者联合在一起——所支持的反战运动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但是其影响很少超出有限的知识分子的范围，它没有能扩展到工人队伍中去。<sup>[27]</sup>

当更自由化的西园寺公望继桂太郎首次成为总理大臣后，社会主义者即刻建立起日本社会党，该党由于鼓吹“宪法限度内的社会主义”，而在1906年1月28日得到许可成为一个合法的党。唯物主义者出版了一份名为《光》的杂志，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则出版了《新世纪》。继而，两个团体于1907年短时期地联合起来并恢复了《平民新闻》，这次是作为日报出版。他们的活动尽管有所扩大，但除反对东京市电车票价上涨的斗争取得胜利外，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事实上，他们是社会主义协会的直接继承者，主要是在教育和宣传领域中开展活动，工会几乎已不存在了。

但是，恶化的劳动条件正在对工人产生影响。日俄战争使工人已经很低的生活标准进一步降低，并给工人带来更大的痛苦，这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自发性罢工，从1903~1907年这种罢工有107次，参加的工人有20,789人。因经常遭受挫折而感到灰心使工人队伍中滋长了无政府工团主义。

## 2.2 早期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

1906年幸德秋水的完全转变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这种激进思潮的发展。幸德秋水因日俄战争中的反战活动在1905年11月前一直被关押。他在释放后去美国旅行了将近一年，在美国，他对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有深刻印象。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议会特色和它强调直接行动，似乎是适应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贫困、社会动荡以及严厉镇压社会主义思想的形势而产生的。

幸德秋水思想的新转变影响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的社会主义运动流派。<sup>[28]</sup> 1906年6月28日，幸德秋水在社会党为欢迎他回到日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sup>[29]</sup>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否定了议会主义，因为他发现英国独立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并没有立刻导致进入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他不仅否定改良主义而且也否定当时倍倍尔和考茨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作为替代，他呼吁和雇主直接谈判，如果必要就进行罢工，并论证了反对卷入政治问题，因为它将使工人在反对资本家的真正斗争中分散精力。

在1907年2月的社会党会议上，被当时足尾铜矿工人暴动所激动的幸德秋水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说，鼓吹他所谓的“直接行动”。其结果导致西园寺公望内阁命令社会党立即解散。其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两个主要派别：一派相信议会手段（片山潜、田添铁二和西川光次郎）；另一派相信直接行动（幸德秋水、堺利彦和他们的年轻追随者大杉荣、山川均）。

幸德秋水所标榜的那种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日本独有的。欧洲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立法

机构中处处妥协已不起作用，政治已成为资产阶级迷惑工人阶级的一套诡计，因而，依靠组织严密步伐整齐的工会采取直接行动是能够取得成效的唯一方式。与此相反，在日本，工人甚至无力在国会中赢得一个席位，工人的任何活动都受到警察的严厉镇压，到处弥漫着限制一切对国家本质批判的“天皇制”思想；最后还有不断发生的分散的自发罢工，它近似小规模暴动，而不是现代化工人的有组织行动，无政府工团主义对这些情况感到灰心失望。

当时，片山潜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批判了这种工团主义，认为它是一种危险的倾向。<sup>[30]</sup>他们鼓吹和平地把工人组织起来，不刺激统治阶级。尽管如此，但工团主义却在不断加强和发展，它引起的第一次事件是1908年的“红旗事件”，最后一次则是1910年～1911年的“大逆审判”。在审判中，幸德秋水和其他11位社会主义者因被指控密谋暗杀天皇而被判处死刑。现在看来，“大逆审判”似乎是桂太郎政府有意搞的一个阴谋。<sup>[31]</sup>

“大逆审判”后，警察加强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警察对诸如大杉荣这样的工团主义者和诸如片山潜这样当时支持第二国际的正统社会主义者不加区分。片山潜领导了东京市电车系统工人的一次罢工，但这是他在日本的最后的活动。他完全灰心了，终于在1914年离开他的祖国，后来再也没有回去。<sup>[32]</sup>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停滞状态。

### 2.3 新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由于受到连续的镇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工人一直处于无组织状态。一个重要的例外是铃木文治领导的友爱会。友爱会是那些有良好心愿的人所建立的，形式上是一个工人互

助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它才试图发展成为工会联合会。

战争本身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投资于企业的资本比1914年增加了16倍。工人人数也增加了一倍多，工人人数1914年是853,964人，1919年则为1,777,177人。<sup>[33]</sup> 重工业迅速发展，大工厂的工人迅速增加，钢铁、机械和化学工业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909年的13.6%上升为1919年的24.2%。同一时期中，在百人以上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所占的比例从43.5%上升为55.6%。和传统的临时性工人相比，固定在城市中工作的工人大有增加，从而为群众性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战争导致物价迅速上涨，劳动强度更大，而俄国革命的影响则促使工人采取更大行动并使其觉悟提高。1918年“米骚动”显著地揭示出广泛存在着的极度不稳定。在这种环境中，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事件迅速增加；1918年发生417起纠纷，有66,457人卷入，1919年发生497起纠纷，有63,137人卷入。尽管在法律上工会仍是非法的，但工会却从1911年仅有的40个增加到1918年的107个，到1919年已有187个，而1920年则为273个。<sup>[34]</sup> 友爱会1912年成立时是以调和劳资关系原则为基础，以温和的福利协会的面目出现，而在1919年则公开地转变成为工会联合会，致力于为工人谋利益，同资本家战斗，并采用了一个和它的新观点更相宜的名称，即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两年后它从名称中去掉了“友爱会”三个字。

从人数上看，友爱会发展迅速，直到1917年才处于停滞，当时其会员人数约保持在30,000人左右，1920年其人数又开始增长。甚至在改变名称之前，它就以变成为产业工会为目标，因为其成员中大多数人是在小工业、混合工业或地方工业中就

业的普通民众，区域主义也是总同盟的一个特点。关东和关西两个地区的总同盟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那些地区集团及其所属地区集团内部的联系比工业或行业间的联系更有力量。总同盟的活动包括福利、娱乐、教育、储蓄、调动工作、组织消费者联合会以及在被授权时同企业主谈判或向企业主抗议。

这时，争取普选权运动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支持，而在1919年，工人在全国范围内参加了争取普选权运动。但是，当1920年2月政府宁肯解散国会而不许对提出的普选权法案进行投票时，工人的兴趣又淡漠了。战后萧条的到来削弱了工人的谈判力量，并迫使工人在战略上从进攻转为防守。1920年5月以后，随着工人争取组织权斗争的失败，由大杉荣最出色地鼓吹的革命工团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蔓延，并在1921~1923年期间达到其顶峰。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工团主义和日俄战争后幸德秋水所鼓吹的以直接行动为原则的工团主义没有本质不同，但比以前在工人运动中有更大影响。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实际领导了反对企业主的罢工和反对警察干预的斗争。对国会的幻想完全破灭和没有力量确保赢得组织权导致了激进主义。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主义者又开始组织起来。工人运动逐渐活跃的事实不能不使残存的社会主义者受到刺激，他们通过杂志上的文章和举行会议又开始相互进行联系。1920年12月，他们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其成员包括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布尔什维克”，从议会主义者到国家社会主义者。它既包括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也包括在大战期间开始活动的新社会主义者。其结果是，它掀起了生活的激浪，直到在1921年5月被政府解散。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同盟促进了有经验的社会主义者同工

人运动紧密结合。占有支配地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论战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主张，以自发罢工的方式，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在政治方面采取直接行动，谋求最终达到实现工人控制生产的“总罢工”。它鼓励领导人即使面对暴力也要勇敢行动，而贬低工人组织的作用。与此相反，当时在日本工人运动中以布尔什维主义闻名的一派，则强调建立强大的工人组织，使各组织紧密团结在一起，在劳资纠纷中争取公众支持，将工人的要求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日本劳动总同盟(前友爱会)拥护这种类型的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它与总同盟把其他一切工会集结在其队伍中的想法吻合。

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冲突在1922年9月30日达到顶点，当时工团主义者试图以各工会独立和自治为基础，将所有重要工会组织成一个松散的总联盟，但没有成功。其所以失败是由于遭到了总同盟的反对。总同盟提出了一个替代提案，即成立一个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同盟，在统一领导下采取行动。其后，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开始迅速衰退。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处于不利地位的经济衰退时期采取进攻战术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许多工团主义工会因此遭到彻底失败，工人不再追随他们。警察由于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人搞暴力活动而大肆搜捕和迫害他们，致使他们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而国外，特别是在无政府主义是一支重要力量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也遭到严重挫折，这使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确信他们走错了路。而在同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中似乎成功地保卫了他们的革命成果。

新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使工人领袖重新注意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因而促成了一种赞同在工农组织基础上建立政党的舆论。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领袖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



即没有最低限度的农业人口的支持，他们不能期望在未来的政治上有所成就。

工业化是促使农民运动兴起的间接因素，同工人运动相比，农民运动的发展甚至是更无组织、更带自发性和更不稳定。在整个德川幕府时代和明治时代初期，农民暴动确实不断地发生。但整个说来，工业化之前的那些暴动不过是在绝望的愤怒中要求恢复一些传统权利的简单进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使佃农组织起来的个别尝试，其特点是，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对金融经济的增长以及对国内市场越来越依靠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相互联系而导致的经济波动，所产生的更自觉的反抗。

当工人运动在片山潜、高野房太郎和其他人的领导下发展起来时，一个名叫大井宪太郎的人试图在某种程度上使日益增多的农民暴动组织化。他于1899年在大阪建立了租佃条例期成同盟会。大井宪太郎由于曾在1892年负责建立夭折的东洋自由党，因而已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他并未能使该同盟会做更多的事情，只不过是短期内收集了关于租佃的情况并在发生租佃纠纷时提出建议。<sup>[35]</sup>

实际上，直到1918年“米骚动”后，佃农才开始大规模地尝试建立自己的组织。战争所带来的不同利益使农村中的社会结构解体。除其他影响外，战争还导致加工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不但稻米的价格上涨，而且农具、耕畜、肥料的价格上涨得甚至更多。稻米的价格高涨使地主获利，它使土地的价格上涨并为从事投机获利提供了更大机会。土地交易比率的增长反过来使不在农村的地主收入增加。随着手里有更多的现钱，地主能够以高利率向那些通常必须以较高价格购买工具和肥料的佃农出借更多的钱。

战争尽管给地主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对小自耕农和佃农

来说，却只带来灾难。许多小的土地所有者被迫典当土地而成为佃农。战争期间，中等规模农户的数目减少了，而最小的和最大的农户的数目却增加了。佃农们被迫用实物交付更高的地租。许多佃农在履行他们的义务后，甚至没有足够的稻米留下供自己的家庭生活，能够出卖的就更少了。他们面临着必须按螺旋上升的市场价格去购买大米的困境。农村地主、稻米商和高利贷者为一方，较穷困的农民和佃农为另一方，双方经济上的差距日益扩大。随着环境的恶化，农村中很多人在忍饥挨饿，这是爆发蔓延到30个县长达42天的“米骚动”的原因之一。<sup>\*</sup>尽管大米价格即刻降低了一半，但这次骚动已在农村留下深远的影响，并埋下了长期不能消除的紧张状态。“米骚动”后出现的暂时的松缓没有维持很久，因为就在两年后，战后世界经济危机又使日本农业遭到打击。

其后，佃农的不满日益发展为行动。许多纠纷主要集中在要求降低租税，1920年只有408次，1925年就增加到2,751次。看一下卷入的人数，就可以得到一幅关于那些纠纷发展程度的清晰图画。1920年，租佃纠纷涉及地主5,236人，佃农34,605人。1925年，地主和佃农的人数则分别增加到35,705人和151,061人。一般说，每个佃农代表了一个家庭，而地主的数字却常常是重复计算的，因为地主可能是在不同的场合同各种各样的佃农发生争端。因此，佃农活动所构成的这场群众运动，比初看那些数字所显示的，要更为广泛。<sup>[36]</sup>

除上述同农业有关因素外，还有许多因素也促使佃农的斗争高涨，并更带有组织性。其中，重要的是工人罢工和工会组织的增加。下述情况是很典型的，即去城里工作的二男和三男

---

\*：原文如此。——编者

等回到农村探家时，会讲到工人罢工和工会组织。有时，他们还能够运用自己的经验帮助佃农在纠纷中和地主进行斗争。俄国革命中农民如何烧毁地主房屋和夺回地主一直占有的土地的故事，通过口述或迅速发展的传播媒介也传到了日本农村。<sup>[37]</sup>

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工组织对日本全国有直接的影响。它虽然主要是对工人斗争策略发生影响，但它也刺激了农民运动，因为它宣称，佃农有权为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在日本，这是一个非法的行为，但日本政府由于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因而日益感到难于拒绝它。最后，佃农运动受到那些去国外旅行或学习归来的日本知识分子所鼓吹的基督教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影响。

租佃纠纷在战争初期开始逐渐扩展到日本全国，直到30年代中期，它几乎一直是在稳步发展。<sup>[38]</sup> 这些斗争最初的确使佃农得到一定的救济。在1920年的租佃纠纷中，大约有半数是对佃农有利而结束。但是在1922年，形势逆转。其后，纠纷拖得更长，在诉讼中更混乱。越来越多的佃农，在认识到以现存法律为基础的法庭裁决是如此经常地不利于他们时，便确信需要进行政治活动。<sup>[39]</sup>

在这种环境下，第一个全国性佃农组织诞生了。1922年4月9日，在温和派社会主义者——其中一些人，如贺川丰彦，是基督徒——的领导下，成立了日本农民协会。它的一些领导人，包括贺川，已经在领导劳资纠纷中取得经验。农民协会要求给予佃农更好的教育机会，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提高道德标准和农村文化水平。它针对佃农发出呼吁，要求制订法律，纠正滥用租佃权利，并为佃农与地主的纠纷提供仲裁。日本农民协会在成立4年后拥有会员67,876人，这是它在战前会员人数的最高峰。<sup>[40]</sup>

1922年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开始具有群众规模，表明它们在日本的环境下正在成长。以前的自由民权运动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所提出的观点，甚至在1911年幸德秋水遭审判前推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都是从外国移植来的。但是2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在日本的土壤中扎下根。随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崩溃，各种社会主义运动注意政治活动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迫。当时被日本人模糊地理解着的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它主张进行政治活动——的胜利，为更系统更有经验地输入列宁的以及稍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第三国际的组织方式与战术，开辟了道路。它引起的反响是，社会民主主义开始在日本的环境下形成。首先在工人组织中，尔后在农会中出现了一场斗争，它使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处于分裂。

## 注 释

[1]“自由民权运动”或“自由和民权运动”。在英文中，常常简称为“自由”或“民主”运动。有关它的一系列解释以及它所取得的成果，见乔治·O·托顿：《战前日本的民主：基础还是外观？》（波士顿，希斯公司，1965年）。这包括一个英文文献目录，其中同该运动最有关系的条目有如下一些：池信鹰：《日本早期的政治民主》（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0年）；E·赫伯特·诺曼：《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出现：明治时期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纽约，太平洋国际关系研究所，1940年）；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战前日本的民主和政党运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3年）；乔治·M·贝克曼：《明治宪法的制订：日本1868～1891年的寡头独裁和宪法的发展》（罗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

休·博顿简单地称它为“争取民权运动”，《现代日本100年》(纽约，罗纳德出版社，1955年)，第103页。

[2] 见乔伊斯·C·莱布拉：《大隈重信和1881年政治危机》，《亚洲研究杂志》第18卷(1959年8月)，第475~487页。关于他的对手的详细研究，见C·B·科迪：《明治日本民主运动的领袖板垣退助生平研究》(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1955年；大学微缩胶卷第14,245号)。

[3] 池作了一个关于这两人的意识形态的有趣研究使这两人在一段时间被忽视后，又重新受到注意。池，第124~137页。

[4] 有人也曾论证过这次危机标志着从显著的重商主义向产业资本主义转变。山田：《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第5~6页。

[5] 交不出土地税或“地方税以及区和村为谋经费而征收的土地税”的人，被迫失去自己的土地(在公众交易中或被政府和地方当局没收)，在1883年~1890年这段时期，这类人有367,744人。其中263,965人即77%，甚至在政府的统计中也被划入因贫困而无力交税的一类人中。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东京，岩波书店，1934年)，第388页。

[6] 关于政府在用暗杀除掉板垣失败后，怀有恶意地秘密策划使板垣出国旅行，池提出了一种似乎可信的理由。池，第151~153页。

[7] 矢内原：《现代日本小史》第1卷，第181页。

[8] 这些数字取自岸本英太郎：《日本工人运动史》中的表格(东京，宏文堂，1950年)，第12页。笔者下面对20年代初期以前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历史的概括，已经以某种类似的形式，出现在他所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工人和农民斗争》，《经济发展和文化的变化：日本的城市和乡村》第9卷(1960年10月)，第187~212页。

[9] 在1899年确实有下降的趋势：15次罢工，参加的有4,284人。岸本，第38页。

[10] 横山源之助：《日本的下层社会》(东京，岩波书店，1953年)，第304页。横山的书首次出版于1899年。

[11] 片山的最好的传记是海曼·库布林写的《亚洲的革命家：片山潜的一生》(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同这个时期有关的事，见该书第105~128页。

[12] 非常有趣的是，该研究团体是1890年在美国成立的。城、高野、泽田、平野荣太郎、武藤、木下和当时在旧金山工作的其他人建立该组织准备解决日本的工人问题。他们认真研究已经在西方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出现的那些问题。见片山潜：《日本的工人运动》(东京，岩波书店，1952年)，第18页。该书同这里有关的那一部分是片山在1901年同西川光次郎合写的。现已证明，职工义友会可能是劳动骑士的日文译名，见海曼·库布林：《明治时期工人运动史中的一幕：高野房太郎的生活和思想》(东京，有斐阁，1959年)，第54页。职工义友会成立后不久，美国工人联合会的力量和影响就使“劳动骑士”黯然失色。结果，高野在从日本写信给塞缪尔·冈普尔以及美国工人联合会的其他成员时，将职工义友会译为“工人之友”。

[13] 见片山潜：《日本的工人运动》(芝加哥，查尔斯·H·克尔公司，1918年)，第38页。

[14] 大河内一男：《初期的日本工人运动》，第70页。顺便说一下，前面所引的一位较早的工人历史学家错误地认为该数字是54,000人，未弘的书，第26页。

[15] 人们经常说，日本工人运动的历史是漫长的被镇压的历史。《治安警察法》第17条就是特别用于镇压有组织的工人的活动。将它同英国企业法比较很有教益，英国的法律把工人的有组织行动视为干预雇主同每个雇员的谈判进程。相反，日本的法律却把类似的行动看作是搅乱公共治安。《治安维持法》和稍后产生的《纠纷仲裁法》是以同样原则为基础。见氏原正治郎等：《教育，日本的问题》第二卷(东京，岩波书店，1952年)，第218页。

[16] 在高野寄回美国的信和报告中，清楚地显示出工人领袖对资本

家和警察的态度。关于英文译本，见库布林：《明治工人运动》，第3~114页。

[17] 佐久间贞一就是这种人，他办了一个印刷厂，由于试图为他的工人建立一种理想的环境，他常常被称为“日本的罗伯特·欧文”。

[18] 可以肯定，有些可以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先驱的“政党”出现得更早，例如前面提到的东洋社会党，它是樽井藤吉在1882年建立的，于成立后一个月解散。这样，安部矶雄称樽井是社会主义者的先驱，见大隈重信：《开国50年史》，马库斯·B·休伊什的英译本（伦敦，史密斯·埃尔德公司，1909~1910年），第2卷，第505页。事实上，他描述了构成自由运动一部分基础的农民暴动。库布林为探讨直接建立了标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诞生的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先驱，对当时情况作了更远为可信的分析。海曼·库布林：《日本社会主义传统的起源》，《政治杂志》第14卷（1952年5月），第261页，注释13。他谈到下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研究会。

[19] 加藤弘之1870年的那本书名为《新政大义》，见田中惣五郎：《日本社会运动史》（3卷，东京，世界书院，1947~1948年），第1卷，第50页。

[20] 通常将“国民之友”，译为“国家之友”，因为该名称是因美国杂志《国家》而产生的。亨利·乔治的文章的译者是城常太郎，前面提到过，他是劳动骑士社（职工义友会）的一个组织者。关于《国民之友》刊载的那些文章的副本，见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日本社会主义文献》（大阪，同仁社书店，1929年），第110页。

[21] 关于叙述了该目标的那个原始说明书的副本，可以参阅石川旭山和幸德秋水的《日本社会主义史》，吉野作造编《明治文化选集》（东京，日本评论社，1929年）第21卷，第363页。

[22] 这些人是安部矶雄、片山潜、河上清、木下尚江和西川光次郎。幸德秋水除外。在其他被基督教人道主义激动而积极关心早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们中，有村井知至和内村鉴三。当时唯一神教派特别强调人道主义，它使那些不久前刚皈依它的日本人以新的眼光看待

其周围环境，因日本的不人道的劳动条件而感到震动，并为寻求解决而关心工人问题和社会主义理论。见大河内一男：《早期的日本工人运动》，第89页。

[23]关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副本可以参阅田中惣五郎：《日本社会运动史文件集》（东京，东西出版社，1947年），第1卷，第328~340页。英文译本见河上清：《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艾奥瓦城，1903年），第364~365页。显然，激进主义是相对而言的，虽然该纲领受到《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影响，但连《共产党宣言》也因1848年以来的社会进步而丧失了它的很多冲击力。

[24]那些“老自由主义者”这次重新集结成宪政党，该党支持伊藤政府。

[25]政府采取严厉行动的一个例子是，派军队平息了1902年7月吴海军兵工厂约5,000工人的罢工。

[26]由于在此之前片山的住宅一直是活动中心，而他这时去到国外参加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平民社继而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总部。荒畑寒村：《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东京，每日新闻社，1948年），第56页。

[27]片山指出，幸德、堺和其他人非常精通日本文学，英文也很熟练；他们倾向于以一种只能吸引学生阶层的兴趣和只能赢得学生阶层支持的方式介绍社会主义。片山：《日本的工人运动》，第102页。关于对整个反战运动的生动描写，见海曼·库布林：《日本社会主义者和日俄战争》，《现代史》杂志第22卷（1950年12月），第322~339页。

[28]关于研究幸德从美国回来后其思想变化的一些更大的影响，见盐田庄兵卫：《幸德秋水的思想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第1卷（1948年4月），第52~75页。

[29]《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见丝屋寿雄：《幸德秋水传》（京都，三一书房，1950年），第168~169页。



[30] 荒畑胜三当时是这些社会主义者之一，他指出，总罢工这种战术必须靠大规模的组织完好的工会同盟去实行才能产生效力，而这种工会同盟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不存在。鼓吹总罢工而没有这种强有力的支持，就等于是自寻毁灭。荒畑，第199~200页。

[31] 例如，见坂本清马：《所谓的叛国者：在狱25年：幸德事件的真相》《中央公论》第10卷（1952年9月），第120~127页。

[32] 片山随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最终成为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一员。这个转变过程是海曼·库布林一篇文章的主题，即《片山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诞生》，《社会科学探求》第1卷（1956年6月），第1~30页（或第389~369页，日文是倒序的页码）；另外见《亚洲的革命家》，第261~287页。

[33] 关于这些数字和下一段中的数字，见岸本，第122~125页。

[34] 协调会：《近期的社会运动》（东京，协调会），第255页。

[35] 见罗纳德·P·多尔：《日本的土地改革》（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68页。大井也卷入了工人的活动；根据矢永的看法，东方自由党是“第一个为保护工人阶级而工作的政党”。矢永千利：《佩里以来的日本》（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49年），第232页。然而，事实上大井关心的是逐步建立起人民的队伍以便能追随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该纲领见田中：《西洋……》第1卷，第227~228页。他的这方面的思想表现在他的《时事要览》，1886年发表，重新刊登于平野义太郎：《大井宪太郎真传》（东京，1938年），第379页。大井确实代表了工人和农民中那种最初的转而支持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和向海外扩张的倾向。

[36] 这些数字基本来自农林大臣秘书处统计部：《农林省统计表》，东京（1936年、1940年），第13、14卷，见小野武夫：《现代日本农村发展史论》（东京，火得卡书房，1950年），第64~66页。

[37] 有时，入伍的农家二男、三男在日本的西伯利亚冒险中回来后，会对派他去平息的那场革命发生兴趣，并因受其激励而采取某些行动。

岐阜县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日本派到西伯利亚军队中的一名下士，就是如此。他在西伯利亚的经历使他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好奇心，在回到日本后，他开始阅读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其后不久，他领导村里的佃农在同地主的纠纷中首次采取有组织的行动。他们把土地交还地主，在重新同意耕种土地之前要求地主降低租金。青木惠一郎：《日本农民运动史》（东京，民主评论社，1947年），第13页。

[38]关于佃农斗争的发展，同上书，第17~19页，以及小野的书，第66~68页。更详细的情况可以看协调会的书，第384页。各县的农民斗争可以看内阁统计局：《工人统计要览》（东京，1932年），第256~257页。另见笔者的《工人和农民斗争……》，第194~195页。

[39]这意味着纠纷更经常地被提交给法庭。在没有任何相反立法的情况下，法官象看待其他契约一样看待租佃契约，要求实行它而无视社会牵连。以契约和既存的有关契约的一般法律规定为依据，判决必然是不利于佃农。由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佃农确信，需要进行政治活动，以其作为改善立法上的不利局面的唯一方式。见川岛武宜：《现代社会和法律》（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第59~70页、第158页。

[40]协调会的书，第434页。

### 第3章 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共产党 人的分裂：1922～1932 年

共产主义者领先  
政府社会政策的变化  
工人运动方向的转变  
工人中的分裂  
无产政党中的分裂  
共产党人影响的衰落

1922年全年几乎每个月都爆发一次重要罢工，几乎每次罢工都以失败告终，举行罢工的工会则遭毁灭。战后经济危机在不断深化，加上日本政府实行削减军队的计划，失业人数因而迅猛增加。仅仅一年前，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还使工人感到有希望通过投票实现改革，这场斗争却似乎因原敬首相的顽固反对而以失败告终，仍旧由政府裁定和挑选“工人代表”参加国际劳工会议使工会领袖感到懊丧。

在国外，世界经济衰退似乎支持了共产主义者断定世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然引起危机的论断，而1919年3月第三国际的成立则预言世界革命运动将早日成功。由于国际上共产主义者强烈呼吁反对工团主义，而国内工团主义工会的大部分努力又遭受到挫折，因此，毫不奇怪，日本的主要工人组织日本劳动总同盟在它1922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攻击工团主义被解

释为是默默地赞同布尔什维主义。1922年8月20日，日本劳动总同盟中央委员会谴责国际劳工会议，并修改了其最初的纲领，它在纲领中增加了以下几条，使其更为激进：(1)我们以集体行动作为威胁手段，并且依靠互助组织，从而努力促进工人的经济利益和传播启蒙知识；(2)我们依靠勇敢和坚定，并采取有效的战术，为反对资产阶级的迫害与压迫而战斗到底；(3)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共存。我们依靠工会的力量争取工人阶级的完全解放和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sup>[1]</sup> 这个出自日本主要工人组织的声明反映出当时的革命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日本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了。

### 3.1 共产主义者领先

欧洲和美洲的共产党是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中的一部分人按照伏·伊·列宁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21个条件建立起来的。几乎从各个角度判断，它都意味着，是那些支持列宁在俄国所采取的战术的左翼分子，从已经存在的运动的主流派中分裂出来。

在日本，还完全没有社会主义政党，因而议会中也没有工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斗争发展成为一个群众运动才5年。与已经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德国或法国不同，在日本，与其说，它是一个轻视过去的机遇、以整顿组织和重建纯洁的意识形态另辟新途的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在一片虚无中摸索制订一个纲领，从而开始创立一个组织的问题。在这方面，日本共产党人和亚洲各殖民地区的共产党人处境相同。但是日本和所有其他亚洲国家也有所不同，它本身是一个拥有现代陆军和海军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两方面情况混杂在一起给日本共产

党人带来一些很特殊的问题。

在日本，共产党诞生时是一个小派系——实际上，最初是若干个小派别，这些小派别都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极大影响。事实上，共产国际人士（很有趣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朝鲜人）认为，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是当然的发展对象。日本共产主义者在信奉共产主义后必须以非法的方式组织起来。其后，在领导、训练和资金方面则非依赖共产国际不可。在几次尝试之后，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7月15日正式成立，当时它在东京秘密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尽管党的创始人在建立合法组织还是非法组织的问题上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但在某种意义上，处于非法境地却使他们比以前日本的任何社会主义组织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山川均、堺利彦、荒畑胜三等一些创始人已有组织社会主义“政党”俱乐部和出版社的20年的经验，但是，他们不去寻求当局的批准，这还是第一次。这不仅为日本投降前历次重建的共产党树立了榜样，而且也为公开的各组织的“联合阵线”解体后仍坚持活动的那些非法的工人组织树立了榜样。他们处于非法状态就没有必要妥协或从他们的纲领中删掉任何东西。自明治时代初期以来，第一次出现一个主张废除君主制或天皇制的团体。但是他们一致默认，要极其谨慎地使用这个词，以免给党员的生命带来不必要的危险。

查阅一下创始人的传记资料可以看出，他们几乎都是知识分子。<sup>[2]</sup> 这个事实也许是共产党人在西方化的学者、时事评论家、艺术家、律师和学生中比在劳动群众中获得更大成功的反映，也是促使其进一步发展的原因。这些知识分子创始人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激进协会的领袖。这样，他们就把大量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带进了这个“先锋”政党，从而显示出当今整个

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特征。但是，也不能忽视诸如渡边政之辅和锅山贞亲这样的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严格说不算是知识分子的党的创始人。党在初期虽然有一些主要人物在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活动，但它在工人运动中并没有深厚的根基，也没有很大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党的一些创始人最终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些人一旦被确认属于日本共产党创建人之后，就要在余生中用很多时间去同属于共产国际承认的党的成员划清界线。<sup>[3]</sup>其中一人，即山川均成了当时一个人数极少的共产主义团体的领导人。他是一个老社会主义者，从《平民新闻》时代就是堺利彦的信徒。他已经有很高的声望。在组织秘密共产党时，他可能比以前更加认识到深入群众的必要性，他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写了一篇促成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最终出现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为《无产阶级方向的转变》，刊登在激进的《前卫》杂志1922年7月—8月的那一期上。<sup>[4]</sup>

山川均详细阐述了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发动群众”的口号，该口号含蓄地呼吁利用一切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的机构——无论它是多么有限——以便发动群众。实际上，山川均向日本民众讲的是，直到那时无产阶级运动已经处在一个“先进”分子组成的小集团的影响下，而这个小集团，把他们的精力用于确定他们的目标和推敲他们的理论时，却把工人阶级这支主要队伍扔在脑后。当时是占少数的社会主义者回到群众中去，用他们的先进理论武装群众的时候了。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在发现什么是群众当前的要求，并帮助确保其实现时，它才有希望赢得群众的强大支持。山川均督促说，“我们必须代表群众的当前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政治上的抵制是一种消极战术，通过政治活动来进行

反抗才是积极的战术”。

虽然共产党人当时仍旧是一个小团体，不能够贯彻这个口号，但这个主张是非常适宜的，它表达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人已经具有的想法。尽管遭到官方的检查，这个“转变方向”的声明仍被广泛传播，并引起强烈反响。

在前三年中对各种社会运动给予影响的极端主义已被甩在后面。1918~1919年，罢工日益增多并且一般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特别是出现了川崎和大阪钢铁工人的“怠工性”罢工。但是在1920~1921年，工人逐渐越来越处于守势。最明显的标志也许是，贺川丰彦领导的1921年6~8月神户川崎造船厂工人的大规模罢工。贺川为工人制订了一个控制造船厂的计划，其基本思想是，罢工发生后停止生产，使政府感到难堪和造成浪费。但是，更激进的分子却将罢工视为向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迈出的第一步，并认为日本即将发生革命。政府感到恐慌，派军队粉碎了工人的指挥系统。罢工因贺川丰彦和其他领导人被逮捕而彻底失败（贺川也因此失去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转而去组织佃农）。

政府的干涉表明，政府的战术已从对罢工持某种中立态度改变为采取进攻性的方针，以镇压左翼分子。政府强有力的行动使那些相信革命将很快爆发的人在思想上产生了疑虑。这次罢工的失败也促使许多人确信，仅仅靠直接行动是无用的，还必须采用政治手段。自由主义者长久以来为普选权而奋斗，但是这时，那些自认为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取得了领导权，他们主张创建一个统一的团结一致的政治运动，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并利用选举达到自己的目的。

新成立的共产党在尚未能够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了解它的纲领以前，其大多数领导人已在1923年6月5日那次出人意外

地大规模搜捕中被逮捕，那次搜捕大约逮捕了100人。由于当局很少透露有关这次行动的背景消息，一些报纸大肆宣扬耸人听闻的故事，宣称特别高等警察偶然发现一个暗杀全体日本政府要人，并以政变来建立共产党专政的阴谋。很难了解突然揭露出存在着一个共产党这个事实，对公众舆论到底有什么影响，但是当局没有透露出详细情况，这既有可能导致夸大对新组成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产生恐惧，也有可能导致同情它。其长期后果是：一方面，警察监视加强了，另一方面，有更多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努力为共产主义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象共产主义运动随后急速发展所证明的那样。<sup>[5]</sup>

6月逮捕共产党人和其后报界对激进分子的渲染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随着1923年9月1日东京和神奈川工业中心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大地震，在一片混乱中对激进分子和少数族团体进行了令人恐怖的打击。在烟火弥漫和废墟瓦砾中，歇斯底里的暴徒带着被种族仇恨和报纸反“颠覆”宣传所激起的愤怒，残杀了大约数千名朝鲜人和上百的中国人。大批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和激进工人领袖被警察以“维护治安”的名义拘捕。一些人遭受酷刑折磨，一些人从处于军事管制下的东京地区被驱逐。据称是共产党员的8位南葛工会领导人和一位其他工会的领导人在龟户警察署被枪杀，而在东京另一个警察署的牢房中，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大杉荣和他的妻子，著名的女权活动家伊藤野枝，以及她七岁的外甥，一起被宪兵团长甘粕正彦绞死。

强烈的地震和熊熊的大火摧毁了东京和神奈川大约80~90%的工业区，使2,000多工人死亡，大约68,000人失去工作。这样，劳工问题在重建关东地区的巨大任务中居于最优先的地位。



### 3.2 政府社会政策的变化

政府在刚发生地震的9月最初几天中，鼓励警察和极端爱国主义组织进行极端恐怖的活动，其后，首次企图采取行动同工人组织合作。在内务省领导下，匆忙建立起地震紧急救济办公室。同时，总同盟也成立以铃木文治为首的灾难救济委员会。在地震后的混乱中，9月2日成立的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内相后藤新平，把铃木文治召到他的办公室，表示如果铃木能够立刻召集1,000名工人，政府愿意为救济他们而在芝浦填筑地为他们提供卸货的工作。稍后，政府和工会商定，政府给总同盟一些钱，为在地震中失去房屋的工人安排建房，政府还援助一些工会，使它们在就业机关的合作下，帮助工人在城市重建中找到工作。

后藤新平召见铃木文治和邀请总同盟参加救济工作，表明政府的社会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其变化的开端可以回溯到1918年“米骚动”的时代。当时统治集团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敏锐地认识到，日本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是不会轻易地被消除的。其后不久，内务省建议允许工人运动“自然发展”，实际上是建议取消《警察治安法》的一部分条款(第17条，第1项，第2款)，如前所述，这些条款从法律上明确地否认工会有权生存和发展。促使改变政策的另一个事态发展是，1919年12月成立了促进工人和资本家相互“协调”的协调会，它是在原敬内阁的内相床次竹次郎参与筹划和推动下成立的。内务省逐渐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参加社会运动的人都是“危险”分子，其中“有理性”的那些领导人能够对政府有所帮助。后藤在任寺内内阁(1916~1918年)内相时，和铃木文治有过秘密谈话，得到过关于工人运动

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秘密消息，继而，床次竹次郎也这样做过。<sup>[6]</sup>

地震后的动荡促使精明的政治家犬养毅劝说保守的首相、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公开答应将通过所有国民有选举权的法案。它发生在地震后的恐怖主义之后，时机很适宜。它事实上反映了民众对普选权的要求，尽管短命的山本权兵卫内阁在实现它之前就倒台了，但民众仍相信，扩大选举权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政府除答应扩大公民权外，还对工人运动做出另一个让步，即修改了选择参加日内瓦国际工人会议工人代表的方法。第五次国际工人会议于1924年夏季召开，政府这次允许每个会员超过1,000人的工会组成一个投票单位，选出一名代表，由政府委派去参加会议。铃木在选举中获胜。这个改变的意义不只在事实上鼓励了温和派，而且在于，尽管还没有通过劳工法，但日本政府已经在事实上默认了工人组织。<sup>[7]</sup>

此外，同这个新开端相一致，政府开始在职业变换委员会和1924年清浦内阁时成立的帝国经济会议中任命工会干部。次年，在加藤内阁任内，终于废除了《警察治安法》的第17条和第30条，事实上废除了视罢工权为非法的禁令。

然而，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态度的最明显变化是始于1923年地震时期。在此之前，内务省和警察倾向于把工人的动乱完全视为是破坏治安，并认为所有工人即使不都是叛乱暴徒，至少是由于无知而受危险的犯罪分子挑动而起来叛乱。政府认识到确有必要推行一种更复杂的社会政策。默认工人的组织和活动以及把选举权扩展到没有财产的阶层，使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取得一定社会地位，尽管其地位仍旧很低下。政府的这样一种变化必然影响到各种社会运动中彼此竞争的那些领袖的相互关系。

### 3.3 工人运动方向的转变

有机会体面地开展工会活动的前景吸引着许多工人领袖，日本文化传统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更加强了这种倾向。作为工人代表或顾问被派到国外去参加国际工人会议被认为是一种极大的光荣，而最终有可能成为一名帝国议会议员以及议员所享有的荣誉，对那些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实现这种志向的人确实是一种诱惑。

同时，在总同盟中居于高位的共产党人遭到揭发和逮捕使其他工人领袖受到很大震动。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发现组织中有一个秘密核心在活动，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认识到警察也会对他们发生猜疑，甚至总同盟也有可能被政府解散。

铃木文治在总结地震后出现的形势时写道，“工人运动从大地震中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对工会来说，炮制理论是完全无用的。工人必须有基金和互助机构，不如此，他们将被每一次危机所粉碎。一个松散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运动最终不能建立起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南葛工会和纯工会的干部被军警……(杀害)……如果他们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就不会遇到这样恐怖的命运。工人领袖要牢记这个深刻的教训。行动胜于言辞，实践胜于理论，现实胜于理想，工人的头脑将变得更加清醒。这是正确的道路”。<sup>[8]</sup>

同温和派上层或右翼领导人对立的是左翼分子，铃木文治对他们的评论是善于“炮制理论”并且很善于“甜言蜜语”。左翼分子虽然可能会因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尽管这个消息是因共产党的许多领袖遭揭发和逮捕而透露出来的——而感到鼓舞，但对于那些逮捕和随地震恐慌而来的恐怖主义没有进行有组织

的抵抗，确实使他们感到吃惊。他们也准备采取一种更“现实”的态度：少依靠英雄主义战术，更多采用改良主义手法，以便动员群众。

这样，从表面上看，左翼和右翼似乎是团结一致的，双方都希望采取更“现实”的态度——当时这也称为工人运动的“自由化”。左翼和右翼在1924年2月总同盟第13届年会上以共同发表称为《改变方向声明》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一致。<sup>[9]</sup> 根据该《声明》，为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策略上的临时变化是必要的。该《声明》给人的印象是，它并不主张根本改变方针。它强调，议会手段只是用来得到某些特定的政治利益和从政治上唤醒群众，但不能认为议会道路打开了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道路。左翼和右翼对该《声明》各有其自己的解释，但他们都把这个《声明》视为总同盟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对该《声明》的不同解释，基本上是由于他们对促使改变策略成为必要的客观条件的认识是相互对立的。总同盟中的右翼领导人认为，改变之所以必要，只是由于旧方法一直很少成功，而诸如马克思主义者等左翼分子却把挫折视为日本资本主义“反常”发展的必然产物。换言之，右翼领导人相信，过去的失败是由于工人采取非常极端的行动，以致刺激了统治阶级，使它对工人采取了激烈手段。他们推动工人采取温和策略，并督促工人利用政府做出的让步，诸如选举参加国际工人会议的代表，许诺扩大公民权等。左翼反主流（反中央委员会）派认为，“客观”条件是使过去那种斗争方式遭受挫折的原因，虽然必须把斗争扩展到包括参加议会选举，但过去几年在如此困难条件下建立的“革命”精神不应该丢掉。两派尽管同意更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并试图深入群众，但是，在关于如何解释这个政策声明的争论中，临近分裂的征兆已经很明显了。

### 3.4 工人中的分裂

工人运动由于其内部的这种分歧，因而一方面向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也向五花八门的社会民主运动——该运动在初期分裂为左翼和右翼——提供支持，而在1923年，这种分歧取代了以前“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冲突。其影响在有关的各社会运动中都可以见到，但它最公开而明显地表现在总同盟1925年的所谓“第一次分裂”中。

当左翼由新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人带头开始在总同盟内部联合成一个固定的派别时，总同盟之外的其他左翼工会也建立起来。在总同盟1924年的年会上，一些左翼工会被允许加入总同盟，这就加强了左翼的力量。在1924年4月关东钢铁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左翼分子首次对工会的右翼领导人发起攻击。左翼分子成功地驱逐了老的工会干部，并把他们自己的代表选进领导层。如其所做的，左翼分子是集中精力进行一场赤裸裸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他们这次突然的成功，立刻使斗争转为以人事为中心，而不是以争论的问题为中心。

总同盟总部的领导人发现自己被人冠以“右翼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带有贬意的名称，于是开始团结队伍，决心完全不给左翼分子以任何可乘之机。在1924年10月5日召开的关东同盟会秋季代表大会上，松冈驹吉领导右翼分子向左翼进攻。由于代表大会的主席职位牢固地掌握在得到大多数工会干部支持的右翼分子手里，使左翼分子在每一个场合都受到压制，因而，1923年大搜捕时被逮捕的29人中获得保释的东京东部混合工会<sup>[10]</sup>领导人渡边政之辅站出来发表了一个声明，并在28位代表的伴随下退出了会议大厅。这使右翼控制了代表大会，右

翼随即正式决定，从总同盟中驱逐渡边和其他4名(稍后是5名)左翼高级领导人。

此后，中央委员会审查并否决了关于驱逐这些人的决定，因为这破坏了总同盟的章程。中央委员会尽管对左翼分子的兴起感到关切，并且乐于接受驱逐左翼的决定，但是它很难赞同象驱逐个别领导人这样明显破坏工会自主权的行为。左翼分子发现，批评顽固的官僚领导人破坏规章的行为，是有效的进攻方式。这场斗争引起很大骚动，以致必须做一些事情来解决它。

由于左翼的让步而达成一项临时解决办法，即被驱逐者自动辞职，左翼工会退出关东同盟会，而作为替代，左翼分子建立一个直接隶属于总同盟总部的日本劳动总同盟关东地区评议会，但这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两派的冲突起源于对日本工人组织的作用和任务的根本不同的认识，力图保持自己位置的顽固领导人，同那些后起的企图谋取职位以便推行其必要改革的左翼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使这种冲突更为复杂化。建立地区评议会只是意味着左翼分子在总同盟内部有了独立的组织。总同盟内部两派的斗争开始以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解决办法虽然是临时性的，但据说它是由西尾末广想出来的，西尾末广是那些顽固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关西同盟会的“老板”。关西同盟会还没有被左翼和右翼的派别斗争所困扰，它反对松冈驹吉和其他关东同盟会右翼领导人的非法的驱逐提案。西尾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也是松冈的亲密朋友，他和关西同盟会两位高级左翼分子锅山贞亲(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村义明协商，使他们确信应劝说渡边和关东同盟会其他4位左翼分子辞职，作为回报，左翼分子则可以在同关东同盟会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直接受总同盟总部领导的工会联合会。总同盟向他们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准许他们出版自己的报纸《劳动

新闻》(该报于1925年1月开始发行)。关东地区协议会是日本第一个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联合会。<sup>[11]</sup>

在派别斗争的紧张气氛中，总同盟1925年年会于3月15日在大阪召开。左翼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抨击右翼的方针和活动。如所预料，右翼准备提出动议驱逐左翼领导人和左翼工会。在第3天，会议发生激烈争吵，驱逐左翼分子的动议显然不能够通过。但是，右翼分子利用混乱，机敏地提出并通过了代表大会议程的若干修改，其中之一是，实际上把驱逐个别的成员和工会的权力从代表大会转移到中央委员会；另外一个，对中央委员会选举制度作了有利于右翼分子的修改。3月27日中央委员会在大阪开会讨论驱逐左翼分子的提案，但即使在那里，该提案也没有能够得到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然而，在会间休息后，中央委员会同意要求关东地区评议会作为一个独立组织自己解散，这意味着如果关东地区评议会拒绝这样做，它将因不服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而自动被驱逐。

这不仅使毫无防备的左翼分子感到突然，而且是一个比驱逐领导人更大的打击。左翼分子立即予以反击。他们劝说总同盟中的其他工会组织，推动他们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解决办法，并发动了一场“清除堕落的”总同盟上层干部的斗争。他们在向中央委员会的请愿声明中要求：(1)重新考虑使中央委员会而不是代表大会有权驱逐所属成员的新规定；(2)审查解散关东地区协议会的决定；(3)改变对中央委员选举区的修改(中央委员会通过的这些修改加强了右翼代表)；(4)就该事件的处理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不信任案。反对上层领导的情绪是如此广泛和强烈，以致左翼分子能够争取到25个工会在这个请愿书上签名。<sup>[12]</sup>

在极大的惊慌中，右翼领导人以强化他们的立场作为回答。他们宁可使总同盟中只剩下那些忠于他们的工会，即使这些工

会只占少数。1925年4月12日，右翼领导人拒绝了请愿书的一切要求。4天后，松冈驹吉命令驱逐关东地区评议会，中央委员会在25日以拒绝尝试最后的调解而支持松冈的行动。左翼分子和其他一些关心此事件的总同盟领导人12日来东京探听中央委员会将作出什么决定，当他们得知没有希望按现在的组织保留在总同盟内时，便着手在总同盟内建立一个新的基础更广泛的组织，称为日本劳动总同盟革新同盟。该同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相当规模的发展，而中央委员会则在1925年5月6日决定驱逐一切支持该同盟的工会。对保守领导的不满甚至在那些于1925年5月支持中央委员会决定驱逐左翼分子的人们中得到广泛传播，一年后，总同盟再次分裂，这次并不涉及共产主义者的问题。

左翼已被逼迫到无论如何要进行反击的地步。革新同盟在神户召开了一次大会，会议于1925年5月24日开幕。会议在中途突然转变成为日本工会评议会成立大会，而日本工会评议会随即被简单地称为评议会。所有材料都证明评议会已争取到32个工会从总同盟分裂出来，而总同盟中只剩下35个工会，但对这些工会拥有的会员人数的估计，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一个右翼的材料指出，总同盟有19,460人，与其相对的评议会则有10,778人，而一个左翼的材料提供的双方人数则分别是13,110人对12,505人。<sup>[13]</sup>

随着作为总同盟竞争者的评议会的成立，工人运动的核心力量分裂成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两派，分别处于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下。由于两派都在留心变化着的政治前景，因而，工人运动中的这种分裂立刻导致争取普选权斗争的分裂，并形成各种“无产阶级”政党。

在1918年协约国“争取民主的胜利”的鼓舞下，日本工人运



动发起一场长达两年的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总同盟中的关西同盟会特别积极。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贺川丰彦在那里领导运动，在1920年1月要求演讲的人中，也有老资格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尾崎行雄。但是，随着1920年原敬首相否决给群众普选权的议案和工人运动中工团主义的兴起，总同盟对政治失去兴趣，于1923年1月收回了实现普选权的要求，并否定了议会主义。但是在地震和山本权兵卫首相发表声明许诺给人民选举权后，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0月成立了一个国会政策委员会，它很快就改成为总同盟政治部，偶然的机使赤松克磨成为该部的领导，他的立场比两年前参加创建共产党时远为右倾。这一行动和主张更多运用政治策略的“改变方向”声明，在1924年2月总同盟代表大会上被同时批准。

### 3.5 无产政党中的分裂

正如创建总同盟政治部所表明的那样，对从事政治活动日益感兴趣的倾向，并不是仅出现在有组织的工人中。左翼知识分子也于1923年12月18日在东京成立了政治问题研究会，探讨在有可能很快实现普选的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研究会的早期领袖有岛中雄三，青野季吉；铃木茂三郎，高桥龟吉和赤松克磨。他们很快就确信，只是进行研究和讨论是不够的，应该实际着手准备组织一个代表那些可能很快就得到选举权的没有财产的民众的政党。

他们感到需要一个更正规的组织，于是推选出一个以安部矶雄为首的组织委员会，负责起草章程和说明书。新的政治研究会从其最初的名称中去掉了“问题”这个词，它于1924年6月28日正式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具有鼓动性

的演说家贺川丰彦致开幕词，律师布施辰治是大会主席，精力旺盛劲头十足的岛中雄三作主要报告。大会收到包括总同盟和日本农民协会在内的各种组织的贺信。该组织在东京建立了总部，总部除了做其他工作外，还创建了《政治研究》杂志。该组织的目标是，研究关于创建代表无财产的一般大众的政党的问题，以及必须团结各工农组织以便为这样一个政党提供组织支持的问题。

最初，工人组织对研究会态度冷淡。总同盟尽管宣称赞同研究会的宗旨，但只是勉强同意其成员参加一个被怀疑为暗中企图变成一个新政党的团体。总同盟企图通过其在研究会中的个别成员，使其能比以往更多地控制无产政党的成立。

然而，研究会确实发展起来了，1925年4月，它在全国拥有4,000成员，53个支部，其成员包括还没有参加工会和农会的那些农民、工人以及小商人、职员、学生和专业人员。1925年4月该团体的机关刊物改名为《民主政治》，同时，该研究会组织了一系列会议，教育人民关心它所宣称的“阶级政治”。它于1925年4月19日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除了其他事项外，会议还决定政治会应该：(1)为将成立的无产政党准备纲领草案；(2)加速组织无产政党；(3)为废除新通过的《治安维持法》而斗争；(4)要求给予妇女参政权。政治会向一切人敞开大门，其成员广泛地包括了各种政治倾向的人。

由于1925年2月21日国会开始辩论普选权法案，该法案可能获得通过的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为建立一个有可能存在的无产政党而进行的活动相应加快。各保守政党了解这些活动，并对此保持警惕。然而，就整体而言，他们仍对自己充满信心。加藤高明首相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主张给予人民选举权，尽管他不得不三次延长国会会

期，仍设法使普选法案获得通过。不甘心的反对派寄希望于早在1911年就否决过类似法案的贵族院，但是面对人民支持普选法案的那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他们的企图未能实现。《普选法》于1925年5月5日颁布。由于取消了选举人的纳税资格，有选举权的人变成原来的4倍，从300万人猛增至近1,400万人。

尽管仍旧保留着一些限制，甚至还新增加了一些限制，但对那些希望利用工人投票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极大的机会。妇女仍旧完全没有选举权，实际上禁止她们参加政治运动。有投票权的只限于年满25岁的男子，有资格被选为议员的是至少30岁的男子，此外还有一个附加的条件，即每位候选人必须交付2,000日元的保证金。尽管直到20年后才放宽这些限制，而《普选法》对民主化的促进又被其他因素所抵消，但当时，它却给日本政治发展带来了新曙光。

共产党人和后来成立的日本工会评议会的领导人并没有忽视尽力开发新投票者这块处女地的重要性。因此，评议会积极关注着政治研究会，并督促其成员以个人名义参加研究会。处于早期的共产党人影响下的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于1924年9月14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督促其成员参加研究会。随着这些组织中的大量左翼分子的加入，研究会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趋向激进了。“自由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或“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共产党人”之间的论战变得更加激烈。

作为利用扩大了选举权而组织无产政党的第一步，日本农民协会推动工人组织和佃农合作。为成立无产政党筹建委员会，日本农民协会于1925年6月21日正式向一切有关团体发出邀请。政治研究会草拟了两个纲领作为讨论的基础和未来的无产政党纲领的指南。但是这两个纲领草案都不合日本工会评议会的口味。评议会侮蔑它是“资产阶级”的纲领，并另外起草了

一个自己的纲领草案。

1925年10月7日，研究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铃木茂三郎为中央委员会的草案辩护，而市川正一(后来是正式的共产党历史的作者)则发言为评议会的草案辩解。经过长久的讨论，评议会的草案成为研究会为新的无产政党准备的正式纲领草案的基础。<sup>[14]</sup> 同时还新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帮助创建研究会的岛中雄三以及三轮寿壮、高桥龟吉等右翼领导人则辞职。铃木茂三郎和布施辰治仍留在中央委员会，而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左翼成员则包括大山郁夫教授和佃农问题专家黑田寿男。此时自称拥有大约6,000会员、80个支部的研究会明显向左转，成了它正在激烈攻击着的总同盟的可怕对手。

总同盟在9月的下半月以要求从无产政党筹委会中驱逐研究会来进行反击。其理由是，由于研究会已变成日本工会评议会的代言人，从而使评议会在筹委会中的代表事实上增加了一倍。

在筹委会9月17~18日的会议上，为新党准备的纲领有47条得到通过，但是左翼分子反对右翼分子建议的13条。在10月18~21日的会议上，左翼作出让步，同意采纳总同盟支持者提出的大多数条款，但是后者的态度却进一步强硬起来，它要求不但驱逐研究会，而且还要驱逐水平社无产者同盟激进的特殊部落民(前称“秽多”)团体，理由是该团体也额外增加了日本工会评议会在筹委会中的代表权。<sup>[15]</sup>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总同盟和受共产党人影响的评议会之间的这场激烈斗争中，日本农民协会徒劳地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当被称作农民劳动党的新无产政党实际建立的日子来到时，麻生久代表总同盟宣布，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当天清早开过会，决定不再继续参加筹委会及其努力建立一个无产政党的活动。

它谴责日本工会评议会和水平社无产者同盟受“共产党人挑动”。筹委会立刻休会，以便参加筹委会的各组织能够讨论这个新的变化。

最重要的工会组织的退出对整个建立无产政党的运动是一个巨大打击。一些参加筹委会的组织当场建议解散筹委会，左翼分子感到惊慌，评议会建议它自己退出筹委会，研究会则答应在建立新的无产政党后自动解散。

由于已经为建立新政党做好了一切准备，那些左翼分子的让步被接受，从而，农民劳动党的正式成立大会，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中，于1925年12月1日下午5点30分，在东京神田基督教青年协会大楼举行。杉山元治郎当选为执委会主席，浅沼稻次郎当选为总书记。两个人都是日本农民协会的干部。杉山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而浅沼是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但是他很快就转变政治立场，变得更为温和。

下午7点，大会结束后刚30分钟，新党的干部就被召到警视厅，并被通知说，根据《警察治安法》第8条第2款，该党被命令解散。政府指责该党受共产党人影响，并具有共产党的目标，政府给该党贴上“共产党人”这种标签，是说它企图使无产阶级进行统治和使农民控制肥料与农业工具的生产和分配。共产主义被描述为和日本“国体”是不相容的。政府列举的解散该党的原因之一（这成为以后成立党组织的一个障碍）是，党承认以工会为单位的集体党员，而许多工会在其成员中包括有被法律禁止参加政治活动的妇女和少年，党因而违反了《警察治安法》第5条第5款与第6款。<sup>[16]</sup>其后，日本无产政党在理论上是以个人党员为基础，但实际上，也分别接受其领导人是本党干部的工会或同盟会的集体加入。

农民劳动党成立和遭到警察禁止的次日，日本农民协会中

央委员会在东京开会，痛心地宣布日本第一个无产政党的夭折。但是同时，它宣布已决定另作努力，建立一个代表所谓“无产大众”的全国性单一政党。

由于敏锐地认识到存在着广泛要求建立这样一个政党的愿望，同时也意识到政府反对同共产党人结盟的坚定立场，日本农民协会的山上竹尾和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的川村保太郎领导发起了将日本工会评议会、政治研究会、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和水平社无产者同盟四个左翼团体排除在外的重建无产政党的运动。1926年1月13日，他们在大阪召开第一次圆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1926年3月5日，新的劳动农民党(变动了以前名称中的各词次序)在大阪正式成立——它的方针、纲领和宣言的调子都变温和了。农民协会的杉山元治郎被选为中央执委会主席，总同盟的三轮寿壮是总书记。其他的中央委员是从各工会和农会中选出的。安部矶雄和贺川被选为党的顾问。

随着排除共产党人和所有受共产党人影响的组织，劳动农民党似乎将成为日本第一个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然而，当时工人运动内部总的气氛仍然很激进，或者说是很革命(使用“革命”这个词是否恰当是可以探讨的)，以致劳动农民党这个唯一的无产政党很难保持温和的立场。当党刚能确保合法存在，关于是否继续排除共产党人的问题就出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多次会议都因讨论实行“开门”方针还是“排外”方针而陷于分裂。1926年10月24日，该党中几个重要的工会组织表示它们对右翼和左翼的斗争感到厌倦，声明将退出该党。

在此问题上，最强有力地代表了右翼立场的总同盟，感到自己同鼓吹“开门”方针的日本农民协会有尖锐分歧，因而通过西尾末广声明退出。同时，顾问和总书记也一起辞职。事实上，

仍留在党内的重要组织只有日本农民协会和陶瓷工会。尽管如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却决定重新建立起党的组织机构，继续前进。细迫兼光当选为总书记，接替三轮寿壮，该党还计划于1926年12月12日在东京协调会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大山郁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接替辞职的杉山。党向一切参加者敞开了大门，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这意味着不再禁止共产党人参加该党。由于共产党人无疑是当时最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因而这也意味着劳动农民党将日益处于共产党人领袖的影响下。

退出劳动农民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排除共产党人的渗入，终于自由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党。该集团政治觉悟的程度可以回溯到1925年10月17日，当时他们因认为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日本工会评议会成员中左翼分子占多数而从政治研究会大规模辞职。如前所述，总同盟曾在农民劳动党成立前夕退出。政府刚刚取消农民劳动党，那些原政治研究会右翼成员就立即积极行动起来，并于1926年2月6日建立独立工人协会，当时安部矶雄被选为会长。其他重要成员有贺川、吉野、岛中和片山。

独立工人协会也为建立劳动农民党出了力，安部和贺川是劳动农民党的顾问。他们带头驱逐左翼分子和共产党人，并力图使党的方针变得温和，以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共产党人要把党的目标限制为“无产阶级”要争取的那些目标。虽然他们的“无产阶级”的定义也包括佃农和各类穷苦的农业工人。与此相反，右翼则鼓吹要建成一个“民众党”（民众的政党——日本词，在这里是指“代表大众”的政党，而不是指“民众管理”的政党）。他们要求制定一个对由小业主和职员组成的中间阶层或小资产阶级有号召力的纲领，而这些人对同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佃农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持某种谨慎态度——他们感到自己

的社会地位比工人和农民优越。

独立工人协会在1926年7月16日——当时它还没有退出劳动农民党——有关“开门”方针的争论刚刚开始时，就发起一个建立大众的或民众的政党的运动。在总同盟领导的支持下，并且还取得其准备取代的劳动农民党的中央执委会的赞同，独立协会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众党筹建委员会。新的社会民众党在前劳动农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仅一周，于1926年12月5日正式成立。<sup>[17]</sup>

那些成为这个新党的干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领袖，在几年中逐渐联合成一个明显的宗派集团，称为“社民派”。这是一个缩写字，意思是“这个领袖集团的成员曾经参加创建社会民众党”。鉴于本书的宗旨，将把他们称为社会民众集团或社会民众宗派或社会民众派。在最初的社会民众党不再存在后，仍将长久地把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来对待。<sup>[18]</sup>

但是，非共产主义者还远远不能团结起来。一个参加过建立劳动农民党的右翼农民领袖平野力三，为建立自己的更右倾的日本农民党，于两个月前退出了。而就在社会民众党成立前不久，一些曾经支持驱逐共产党人但这时又对总同盟上层领导不满的总同盟年轻领导人和日本农民协会的一些右翼领导人一起，于1926年12月9日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党，他们称其为日本劳农党。他们也联合成为一个宗派集团，称为“日劳派”，这个词是从该党名称的缩写中演变来的。在本书中，他们被称为日劳集团或日劳宗派或日劳派。在附录图1中，以图解的方式描绘出各宗派的各种政治表现。

在下面的几章中，将叙述和分析那些宗派集团的建立、构成和它们其后的活动。这里，仅指出它们代表了非共产主义左翼运动或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两种主要倾向就足够了。对那些



加入上述集团的其他宗派和组织，也将加以详细说明。<sup>[19]</sup>单是在社会民主运动内部存在着这些派别集团这种情况，在进一步阐明后，就能够理出一条贯穿于混杂的组织变化中的线索，并能勾画出曲折的政策发展的轮廓。同时，也能够以这种详细分解来区分和衡量工人、农民和其他集团对社会民主领袖的相对支持程度。

正如从附录中的各组织变化图表能够看到的，1926~1932年间各组织的变化最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在1932年，社会民主运动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团结。因此，分裂的各派才有可能联合起来成立社会大众党，该党存在了8年，一直存在到1940年日本一切政党都被解散。该党除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外，也把反对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之一。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人的影响已失去其重要性。共产党人是在1926~1929年活动最积极，也最为成功。政府的持续镇压是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运动分裂后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 3.6 共产党人影响的衰落

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成立后并没有能够稳固地取得进展。由于1923年的大搜捕，同时也由于党的最高理论家山川均认为日本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以致共产党很难发挥作用，党于1924年被解散了。然而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它又于1926年底复活，重新组织起来。在其后两年中，它通过学生组织、工会和无产政党——即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日本工会评议会和劳动农民党——等组织开展活动。

共产党人自1925年以来，其目标就是组织一个团结一致的工人运动和一个单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由于采取了攻击温

和派和右翼社会民主领袖的方针，而遭到挫折。共产党人政策上的另一个矛盾同它的下述目标有关，即一方面要建立非法的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合法的群众政党(劳动农民党)。<sup>[20]</sup>

当劳动农民党取得一定成功，有把握在一切无产政党中得票最多时，政府对它进行了镇压。在1928年3月15日清晨，政府大规模逮捕了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以及其他左翼分子共约12,000人。其中500人被拘留和起诉。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和全日本无产者青年同盟因大多数领导成员被逮捕，以及机关被搜查封闭而受到削弱和瓦解，政府根据《治安维持法》于1928年4月10日勒令他们解散。

尽管受到这一沉重打击，但这些组织又都逐步重新组织起来。共产党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避开了搜捕。他们重新同共产国际建立起联系，并接受它的援助。1928年12月25日成立了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它代替了被解散的日本工会评议会。翌年3月，积极活动的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以往的最高峰。1929年4月16日，警察再次在全国进行大搜捕，逮捕了千余名嫌疑者。其后，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或在自己家中，或在其藏身的茶馆，或在出国以及回国的途中，一个个相继被捕。1929年夏季，党再次缩减为一个小团体。此时莫斯科试图靠俄国训练的人来改组党，但这些人逐渐被警察逮捕。1932年以全体判刑结束了对1928年、1929年逮捕的高级共产党人的审判。1933年诸如佐野学和锅山贞亲等几个最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其被关押的监狱牢房中写了悔过书，政府公布了他们的悔过书。这在共产党的下层党员中掀起了一个放弃信仰的浪潮。共产主义运动在日本已经完全失去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从反对共产党人试图夺取总同盟领导权的斗争中产生的。继而，他们因自己试图留在

合法的组织中就必须和非法的共产党人脱离关系并帮助摧毁日本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后，在碰到一个带有极大刺激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前，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赢得选票方面确实不断地走向更大的胜利。虽然如此，但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却耗费了新生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很多精力。它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内部引起分裂，使它们在20年代刚刚诞生时就受到了损害，而在20年代中，国内外的其他许多条件是最有利于它们成长的。此外，寻求代表一般大众的那些力量组织联合阵线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他们反对共同敌人，即同各现存执政党和国家官僚机构各部门的斗争。由于他们的软弱，一些社会民主领袖很容易受日益武断的军方的主张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这使他们走上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如果在政府当局看来，在1922~1932年这一时期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为防止各种社会运动向左走得太远，从而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那么在其后10年中，他们的作用将是把那些运动推入支持侵略战争的轨道。

确切地讲，在日本投降前的这一时期中，使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分裂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关于“天皇制”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初看起来这似乎很奇怪，因为反独裁主义是西方早期民主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则。但是在日本的环境下，明治寡头独裁者不仅把效忠天皇作为维新的口号，而且还作为创建“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杠杆。据官方解释，日本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天皇精神（即使不是他的神力）万能的理论是国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日本国的“基本要素”或“不成文的宪法”。任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如果能够赞同保存天皇制，那么，伴随天皇制的日本的特色也就能够保存。沿着这种思路走下去，虽

然并不是必然会导致在国内形成“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在国外去完成“帝国使命”，但它却使这条道路更容易产生。

## 注 释

[1] 引自赤松克磨：《日本社会运动史》（东京，通信教育振兴会，1949年），第221页。

[2] “任何一个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或其他政党——极少有其创始人中知识分子占很大比例的”。罗杰·斯韦林根、保罗·兰格：《日本的红旗：1919～1951年国际共产主义的活动》（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17页。关于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共产党及其隶属各组织中的45位主要人物的名单，见山本胜之助、有田满穗：《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史》（东京，青木书房，1950年），第49～50页，所列出的党隶属组织中的那28人中，有19人属于政治或宣传团体，7人属于工会，1人属于农民组织。

[3] 上注中列出的那45人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后来成为各社会民主派系的积极分子。其他人则成为专门反共的人，其信仰接近国家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只有4人保持着他们最初的信仰，并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即野阪参三、德田球一、山本悬藏和年纪不大就于1928年惨死的渡边政之辅。

[4] 山川均：《无产阶级方向的转变》，《前卫》（1922年7～8月），第16～25页。这篇文章的题目常常被错误地译为《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转变》。我掌握着该文首版的微缩胶卷。当时，该杂志的主编是山川和他的妻子菊荣。

[5] 在日本，共产党在几个方面不同于在其之前的所有类似团体。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它是一个著名的世界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该运动已经在世界上一个地理面积最大的国家中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其

他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劝说那些愿做有可能成功的事业的支持者时则有负担,他们也更难于公开活动。二十年代初期,在日本,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共产党人的国际联系似乎更被当做是一笔资产,而不是作为普遍承担的一种义务,因为在那10年或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段时期内,日本人仍反对被战争所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支持国际主义者希望世界持久和平。在下一个10年中,这种气氛完全改变了。

[6] 铃木文治在其自传中讲到这些会谈,见其自传《工人运动20年》(东京,一玄社,1931年),第340~344页。

[7] 为确保选举参加国际劳工会议代表的新方法不会导致使激进分子当选,政府立即准许在海军和陆军工厂以及交通部门中的工人组织“工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取得选举工人代表的资格。其中很多工会只存在了很短时间,虽然也有一些工会独立发展起来。得到一张选举工人代表的选票这种诱饵,是促使1923年有组织工人数目几乎增加一倍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当时其人数从约126,000人增至约228,000人。协调会:《近期的社会运动》,第221~224页。

[8] 铃木的书,344页。“谋杀”这个词被出版前的审查删除并代之以X。在战败前的日本,这是一种典型的审查方法。在稍微左倾的书籍中,许多词常常被删除,但是人们往往能从上下文中知道那些词是什么。只有在整句或整段都被一系列的X或S或删除节点所代替或只留下空白时,人们才确实无法知道被删除的是什么。

[9] 《改变方向声明》,见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日本工人年鉴》(大阪和东京)第11卷(1925年),第301页。关于《改变方向声明》的英译全文,见西奥多·科恩:《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硕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纽约,1949年),附录。

[10] 东京东部混合工会是由在1923年地震期间被警察杀害其数位领导人的南葛工会经过扩大和改组而成的。警察并没能消灭共产党的影响,只是制造出许多殉难者。

[11] 谷口善太郎：《日本工会评议会史》(共2卷，京都，光藤书院，1948年)，第1卷，第67页。

[12] 协调会的书，第228页。

[13] 右翼材料的出处同上书，第231页，左翼的材料见谷口的书，第1卷，第93页。

[14] 有一点很有趣，这个为新无产政党准备的纲领的政治部分主张取消元老、枢密院、贵族院、参谋本部、军令部、军事警察、军事法庭、贵族和其他机构，而这些机构在20年后美军占领时期终于都被取消(草案中唯一没被最终采纳作为农民劳动党纲领一部分的，是取消枢密院的条款)。同样有趣的是，和政治要求相对照，其经济要求在日本投降后的十多年内几乎都没有实现。一些关于妇女应有更多平等权利的主张——这些主张后来在美军占领时期实现了——在纲领草案即将通过前也加进草案中，这些主张是以该会妇女部的建议为基础。协调会的书，第551～552页。

[15] 关于水平社的历史和以前是“贱民”的那些部落民的政治发展，见第14章《妇女组织和少数民团体》，第378～399页。

[16] 协调会的书，第566～567页、第645页。所引有关的法律条文，引书同上，第742页。1900年公布并于1922年和1926年修改了的《治安警察法》继续有效，尽管在1925年4月公布了《治安维持法》。

[17] 见附录。其成立大会一般被视为是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劳动农民党的新领导人认为，随着该党的发展，其成立大会并没有真正反映该党的面貌。他们关于成立大会并不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公开理由是，它并不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大约224名代表出席了广为宣传的正式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白扬社：《日本无产政党史》(东京，1931年)，第479页。

[18] 日文中的缩写并不象英文那样采用各词或各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它倾向于从每个复合词或重要的复合部分中取一个字(或音节)。社会民众党能够缩写为社民党。这种缩写同俄文中的缩写相似，例如，共产党

的国际组织就缩写为共产国际。我在翻译各派的名称时，试图尽量采用这种方法。这使我在社会民众党解散后仍能在下文中把社会民众派作为社会大众党的成员来讨论。

[19] 如前已指出的，本章的目的是描述社会民主分子同共产党人分裂的过程。当“共产党人”这个词大写时，它是指秘密的日本共产党的党员。当“社会民主分子”这个词大写时，它是指社会民众党在其存在期间的真实的党员。但当“社会民主分子”是小写时，它能够代表除那些明显划入无政府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者之外的，合法的非共产党左翼中任何派系的分子。

[20] 有关那些矛盾的政策讨论，见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日本的工人运动》未出版的原稿，第五章《分裂的年代》，第15—16页、第24页。

## 第4章 转向支持战争和极权主义： 1931~1941年

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满洲事变”\*的态度

日本国家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联合及其随后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态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同兴起的自由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对抗中，涌现出一些反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其中只有极少数得到群众起码的有保留的支持；而大多数极端民族主义团体都是由少数的坚定分子所组成。<sup>[1]</sup> 它们的精神传统可追溯到明治初期的玄洋社，而行动则同黑龙会（它常常被错误地译作黑色之龙会）相一致。它们这些团体极力施加压力要日本对外扩张，同时在国内凭借暴力阻碍社会变革。虽然有些团体同上层人士有联系，但多数是由诸如建筑承包商这类人，在下层所建立。他们要求其追随者要有封建服从的精神。他们有时候威胁温和派政治家，但更经常的是，进行各种破坏罢工的活动，或以暴力攻击左翼分子、左翼工会和农会，或攻击诸如特殊部落民（前被称为“秽多”的社会“贱民”）和在日朝鲜人等团体。上述活动表明，这些团体完全是出自于对“现代化”或“西方化”的不可避免的反抗。

---

\*：即“九·一八”事变。——编者



在这期间出现的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则具有更为复杂的动机。它们除了充满对左翼的反感外，还热衷于为转向极右翼而制订各种明确纲领。其领导人深受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将其同极端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因素结合起来。在日本，他们的理论因同较早形成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相类似，而逐渐被视为是法西斯主义的日本翻版。<sup>[2]</sup>

虽然30年代搞暗杀扔炸弹的大多数阴谋家或代理人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或年轻的军官和军士，但在法西斯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也可以找到极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几乎都受过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一辉、大川周明博士和高岛素之。北一辉是最重要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大川推动了北一辉，但很快就因宗派主义而和北一辉分裂——宗派主义象分裂左翼一样也使右翼分裂。最初以翻译马克思著作而闻名的高岛成为墨索里尼的信徒，并支持无产阶级右翼的平野力三。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1年的这一时期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准备时期，即日本法西斯主义各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传播以及法西斯主义者相互建立联系的时期。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它是传统思想和极端激进主张的混合体。北一辉虽然主张重要工业国有化和没收私有财产，但他最强烈的要求却是“消除国家和天皇之间的屏障”，这同明治维新号召的“尊王(天皇)”相一致。<sup>[3]</sup>

1931年标志着日本法西斯主义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当时军队中的激进分子首次积极参与一系列的暴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在那次事件中，首相犬养毅被杀害，日本银行遭到海军和陆军军官的炸弹攻击。这种趋势在1936年2月26日达到顶点。当时在天折了的暴动中，处于军队

皇道派影响下的约1,400名军人有选择地暗杀了一些高级官员，占领了新国会大楼、陆军省、警视厅和东京商业区的一些重要地点，打算造成一种局势，以迫使军队首领夺取政府领导权，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因天皇呼吁和督促，政府于第4天控制住了局势。北一辉因卷入该阴谋事件而被处死。

其后，同皇道派对立的统制派，以清除皇道派领导人和使用严厉手段防止下层发生任何更激进的暴动，而取得军队的控制权。军队不但没有因“五·一五”事件失去权力，反而利用这次事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统制派以对头脑发热的少壮军人保持控制为条件，要求国会和官僚们让步。这种进程使军队的力量最终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在1941年能够把统制派首领东条英机将军推为首相。当日本准备全力进行战争时，“军事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也在全国逐步形成。

#### 4.1 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满洲事变”的态度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个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在反对日本各种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中是否证实自己效力了？他们是否妥协了，或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同法西斯主义者步调一致？

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关东军侵占“满洲”，使日本各社会民主政党受到震动，并开始感到为难。尽管他们在纲领中鲜明地打出反战的旗号，但他们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很难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各政党内已经产生一些准备支持在国内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在国外实行扩张的派别。<sup>(4)</sup>

当时社会民众党中的这种派别是由赤松克磨领导的。赤松的行动很快就证明他是一个在10年中信奉过从共产主义到法西

斯主义所有各种政治信仰的顽固不化的机会主义者。在共产主义似乎越来越强大的1922年，他是日本共产党的支持者之一，他偶然地没有和其他共产党领袖一起被捕。而当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变得日益微小时，他立刻成为总同盟保守的右翼领导人中的一员。1926年他参加了创建社会民众党，而不是同大多数其他年轻知识分子一起，以从总同盟中被驱逐为代价，去建立日本劳农党。随着德国革命潮流的衰退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的巩固以及德国纳粹力量的日益发展，赤松的思想变得更右，他的声望也增长了。1930年3月15日，他被选为社会民众党总书记。

“满洲事变”爆发后，赤松及其追随者强迫党采取以下立场：“所有的人都有义务要求生存的平等权利。而只有日本人被限制于一个岛国，并被要求必须为‘世界和平’作出自我牺牲，这是不可想象的。”<sup>[5]</sup> 在公开支持日本侵略“满洲”这点上，赤松的立场和各“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不同。此外，他还主张，“结束资产阶级对满洲和蒙古的控制，并转而由国家社会主义者来控制”，从而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加以区别。他的这个主张使他同那些叫喊“结束金融资本对满洲的剥削并在满洲建立王道”的极端民族主义或军事法西斯主义团体站在一起。<sup>[6]</sup>

社会民众党内多数派的观点比较保守，同资产阶级政党比较接近。两派尽管在理论上有些分歧，但都基本同意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是正义的。日本军队在“满洲”的胜利，促使爱国主义高涨。与此相关，在准战时状态中，不断出现攻击“不爱国”的个人或团体的暴力行动，这无疑构成了社会民众党作出它的那些决定的背景。

但是，为理解社会民众党为什么会为形势作出那样的反应，有必要对支持它的各种力量进行更详细的社会分析。在后面几

章中的适当地方将进行这种分析。这里仅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即支持该党的大多数工人组织是从以下两个集团中产生的：(1)比较富裕的工人阶层(有时称为“工人贵族”——假定这个词对日本工人完全适用)，由船舶工会和陆、海军以及政府办的企业中的工会组成；(2)较穷的在纺织厂这类较大工厂中工作的工人阶层，实际由各公司中的工会或至少是完全支持劳资“调和”原则的那些工会组成。

“满洲事变”的一个结果是，使社会民众党的许多领袖能够加强他们自己在这些工人阶层中的领导地位。同“满洲战争”爆发前处在危机的泥沼中时相比，他们提倡的阶级调和似乎更为稳妥，而他们对工会的官僚式控制也似乎更为有理。“满洲”战事爆发后不久，在1931年11月15~17日召开的总同盟第21次全国会议上，他们发表了要工人保持和平的下述声明：“总同盟的方针总是使罢工次数保持在尽可能低的限度内。总同盟坚决反对把罢工转为政治斗争或鲁莽地发动罢工。”<sup>[7]</sup> 该《声明》所具有的这种缓和调子，出现在“满洲危机”后的环境下，这就不难看出，它暴露出总同盟部分领导人希望分享增加军事定货和在中国进行新的经济扩张所造成的繁荣。

虽然较保守的社会民众党多数派欢迎使工人保持和平的机会增加了，但赤松领导的激进的右翼少数派却急于直接采取行动。包括大川周明和所谓“少壮军官”在内的民间右翼分子，甚至在“满洲事变”前就已经计划进行暴动，推翻文官统治，建立宇垣一成将军领导下的军事专政。他们筹集了约300个炸弹和充足的基金，但是当失去宇垣一成将军的支持时，便放弃了阴谋。

赤松那时同他哥哥的同学大川恢复了联系，并同大川的亲密助手松延繁次和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法西斯主义者的高崑

的两个信徒津久井龙雄与石川准十郎一起，建立了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目的是要创造出一种日本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企图协调全国各种法西斯主义组织的行动。它有大笔资金可供使用。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使无产阶级组织信奉国家社会主义。<sup>[8]</sup>

赤松在得知大川和其他人计划暗杀全体内阁成员并使荒木贞夫将军担任首相的“十月事件”(1931)失败后，建议他的研究所创办一个名为《日本社会主义》的杂志。“十月事件”实际是原计划在3月发动的那次夭折了的暴动的复活，其目标也扩大了，但它的失败也更加惨重。赤松确信在“革新主义”的行动成功之前，需要使其目标被广泛理解并争取到更大的支持。其后不久，1931年11月29日赤松在社会民众党内建立了主要处于他那一派影响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他企图使全党都信奉国家社会主义或使党公开全面地分裂。

社会民众党内尽管在“满洲事变”上态度基本一致，但党内多数派的意见是要支持社会民主的原则。安部矶雄在1932年4月15日党最终分裂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出这种看法：“我把民主解释为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因而，我认为，无论是在国际主义问题还是在国会问题上，它都可以随着客观条件而有所变化。它就象一个钟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左右摆动。但是，它和独裁专政是绝对对立的。我将为反对独裁专政的民主事业贡献出我的一生。”<sup>[9]</sup>

赤松派在事件的进程导致分裂时似乎占有优势。在1932年1月19~20日召开的第6次党代会上，两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提案。片山哲代表多数派提出了“三反纲领”：(1)反对资本主义；(2)反对共产主义；(3)反对法西斯主义。赤松则提出了所谓“新战斗方针”，其中包括当时法西斯主义的许多主张，诸如“尊崇

国体”、用日本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反对国际主义和降低议会主义重要性等。<sup>[10]</sup> 非常奇怪的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尽管两个提案明显对立，但却都通过了。

但是在4月，两派的冲突达到了顶点。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是否同另一个无产政党，即全国劳农大众党合并问题，这个党网罗了迄今各色各样的所有合法的无产阶级派别。赤松同意多数派解散社会民众党的主张，但他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以“新战斗方针”的精神即“国民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新党。<sup>[11]</sup> 他得到党总部书记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以新成立的日本农民协会(不要同以前的那个较大的名称相同的组织混淆)为其组织基础的平野派的支持。得到总同盟支持的片山和松冈驹吉为代表的多数派，则坚决支持“三反纲领”和社会民主原则。在投票表决时，赤松的方案以13比11获得通过，当时多数派似乎成了少数派。

但是，由于票数接近，所以，已通过的决议案很难有约束力。问题又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提交给1932年4月15日在更大范围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先前中央执委会的决定以6比52的明显多数被推翻，从而对“社会民主”派有利。赤松、小池四郎和其他同情他们的人随即愤怒地昂首阔步走出会场。有趣的是，跟随他们退党的那些团体，除平野领导的一个地主支持的农民团体外，主要是白领工人(其所包括的，只有少数属于总同盟)的团体。<sup>[12]</sup>

刚好在“满洲事变”前，留在社会民众党中的所有无产阶级政治团体联合成为一个政党。它于1931年7月5日正式成立，称为全国劳农大众党。前日本劳农党或日劳派的领袖们和一些劳农派分子构成了该党的骨干。随着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连续被捕和叛变，经过重新改组并向右转的劳动农民党的残余分子，

也参加了该党。党还吸收了几个主要受劳农派影响的小党。劳农派是另一个左派集团，它的情况将在后面叙述（在附录图1《日本各社会民主政党的变化》中，图解式地描绘出这些变化）。

随着日本侵略“满洲”战争的爆发，该党立即谴责政府和军人集团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要求从中国撤回一切日本军队，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制订实现这个要求和防止战争扩大的斗争策略。

全国劳农党在它1931年12月5~6日召开的年度代表大会上，以下列词句攻击它的敌手：“在当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民众党的社会民主（实际是阶级合作）……正在迅速破产。可以说，在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社会主义已成为逐渐可以接受的目标，但如果试图回避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做正面斗争，其结果只能是蜕化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众党的观点积极迎合了近来流行的法西斯主义潮流，从而向群众无情地暴露了它的腐朽本质。为了工人和农民的解放，必须完全清除这些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支持者。”<sup>[13]</sup> 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议案，会上宣读了由病在垂危的党的“最有威望的老人”之一堺利彦写的支持该议案的激动人心的书面发言。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出席代表大会的爱宕警察署署长竹内不允许任何其他发言者发言支持该议案。当代表大会在麻生久主持下一致通过该议案时，警察署长命令从记录中删去“通过”一词，并结束大会。<sup>[14]</sup>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反战运动似乎仅限于在东京本所公众会议厅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虽然反战方针在公开的代表大会上受到代表们的完全支持，但领导人间幕后的意见冲突则使反战运动进一步陷于困境。1931年“三月事件”后不久，日劳集团的少数领导人开始同民间法西斯分子以及年轻军官们建立联

系，而同军方有明显联系的人在“满洲战争”爆发后实际访问了全国劳农大众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试图劝说他们支持军队的行动。<sup>[15]</sup> 党的右翼由得到诸如大矢省三和山名义鹤等人支持的麻生久领导；有些偏向中间的一派由河野密、三轮寿壮和田所辉明领导；左翼则由前东京无产党的铃木茂三郎和黑田寿男以及最初同日劳集团站在一起但是变得更左倾的加藤勘十领导。

加藤及其支持者的背叛，使左翼领导集团内部脆弱的结合首次出现严重分歧。其原因能够从党的领导层和支持党的工会基层两方面去说明。在党的领导层方面，加藤和麻生久之间的摩擦因双方都把东京第5区视为自己的选区而激化。尽管规定从该区选出4名国会议员，理论上他们两人都有可能当选，但他们的竞争无疑将分散无产阶级的选票，并会使双方都失败。

在工会方面，原因更为复杂。在“全劳”（全国劳动工会同盟的简称）领导人中，加藤的政策主张同包括麻生久在内的其他领导人发生分歧。全劳由日劳集团领导（见附录图2《日本工会的变化》）。1931年6月，它的大多数领导人决定，响应一些更右翼工会（隶属总同盟）关于联合建立一个名为日本劳动俱乐部的联络站的建议。但是，加藤谴责该俱乐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种新法西斯潮流的表现”。他于11月在全劳内建立了一个称为全劳抵制俱乐部战斗同盟的团体，该团体的名称已显示出其目标。多数派领导将这个以“抵制同盟”而闻名的团体驱逐出全劳，由于全劳是支持全国劳农大众党的主要支柱，因而对于加藤及其支持者来说，留在党内也就立刻成为不可能了。加藤一派后来多次试图建立一个更左倾的联合组织并终于在1937年建立了“人民战线”。在当时形势下，分裂清楚地表明党正在向右转。

随着“满洲事变”的发展和危机的气氛笼罩全国，党的一些



领导人开始感到党向右转得还不够快，即还没有跟上时代，因而开始出现一系列转向法西斯化的事件。

其中第一个事件是，阪本孝三郎领导的日本劳动工会总联合会实际背叛了全国劳农大众党。阪本孝三郎在1931年12月6日的党代表大会上声明，他的组织不是党的“附庸”，它“保持独立的行动和批评的自由”，因此它撤回对党的支持。<sup>[16]</sup> 紧接其后，京都地区的4个党派，在批评党不是完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党之后，也退出了全国劳农大众党。阪本孝三郎同那些党派于1932年1月和下中弥三郎及其支持者联合，准备建立日本的“国民社会党”。

然而，党在国会中的两名代表之一松谷与次郎，在同其他几名国会议员一起去“满洲”视察回到日本后发表的一个声明，却给予党已经很软弱的反“满洲战争”立场最严厉的打击。<sup>[17]</sup> 他明确支持日本在“满洲”的行动，认为派军队保护日本的利益并不是“帝国主义”行为。但他继续论证说，应当从资本家那里剥夺这些利益，而使工人和农民得到好处，并说应把日本的200万失业者送到“满洲”定居。有谣传说，他是受军队的压力而采取这一立场的。<sup>[18]</sup> 随即爆发了一场把松谷与次郎开除出党的运动，但由于诸如赤松和下中弥三郎等党外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党内的诸如田所辉明等领导人的合谋，而没有取胜。

此外，松谷与次郎的立场在1932年2月20日的大选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在东京他的选区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纵然从福冈的浅原健三至大阪的杉山元治郎都未能当选，但党确实抓住了另一个议席。然而，最坏的是，党所得的群众选票减少了。同上次竞选人在1930年大选中总共得到269,000张选票相比，党只得到约135,000张选票。松谷与次郎本人并没有真正取得群众组织的支持。他是位律师，是自由律师审判同盟成员，他

因争取平民自由的功绩而闻名后参加了党。他支持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似乎是他向选民呼吁的一个重要方面。

紧随着选举中的挫折，5名日劳派高级领导人转而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结果导致很大一部分党的后援组织离开了党。他们是：今村等，藤冈文六、安艺盛，望月源治和岩内善作。他们在1932年3月11日联名给中央执委会写了一份备忘录，暗示党应同军人合作并应尝试用扩大混乱的战术夺取政权。<sup>[19]</sup>这对国家社会主义者有利，是对党的沉重打击。那些人是党最强大的后援组织全劳的高级领导人。

1932年3月24日，中央执委会发表《特别声明》，反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日本共产党，尽管如此，但也肯定了它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方针。当时那些人试图以“政治隶属自由”为名使全劳撤回对党的支持，但在5月5~6日的全劳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们以6比7的一票之差而失败。次日，他们在大矢省三（他是早先从社民派转为日劳派的）领导下退党，相当大一部分支持他们的工人也同时退党。这些人转而参加了赤松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甚至在这些反对派退党后，留下的坚定分子也未能使党坚持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最初立场。

这一时期中，社会民主运动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西斯主义运动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人员补充的一个来源。<sup>[20]</sup>因此，对日本国家社会主义作些考察，将能够有助于阐明社会民主运动的意识形态、领导和活动的本质。

## 4.2 日本国家社会主义

下中弥三郎是当时和赤松同时转向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出生于兵库县，最初在小学教书，

后来去东京成为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他在1922年9月30日无政府工团主义试图使工人运动团结起来遭到惨重失败前，一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下中弥三郎当时是东京的一个大出版社即平凡社的编辑，他倡导的那些面向大众的通俗出版物有很大的影响。他在抛弃无政府主义后，逐渐转向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并加入社会民众党，但他离开社会民众党比赤松早得多。

下中弥三郎同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亲密助手满川龟太郎一起，在“满洲”战争爆发一个月后，发起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运动。他认为存在着能够建立起法西斯主义的新基础，即(1)无产阶级和工人组织同一些右翼团体相联合；(2)新闻记者、教师、政府和商业机关中的工人、艺术家、医生、律师，小商人和手工业者；(3)小农场主和中小土地所有者。<sup>[21]</sup>

赤松向下中提出，在他本人以及刚退出全劳的大矢的帮助下，能够在社会民主阵营中聚集更多力量，而在此之前，停止建立新党。在建立了若干个筹备委员会和研究团体后，新党计划在1932年5月29日正式成立。但那天，在仪式即将开始之前，两个主要的派别在党的名称和职位分配上发生争吵，谈判破裂，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党。赤松派建立了日本国家社会党，下中派则成立了新日本国民同盟。前者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后者宣传“大日本主义”，但是他们的纲领几乎完全相同。<sup>[22]</sup>

日本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多样化发展，使它几乎从诞生时起就受到阻碍。其后，两派进一步分裂，这里只需考察其过程。1933年初赤松转而信奉大日本主义。他当时被他自己的邮递员联合会驱逐，并退出了他帮助建立的日本国家社会党。他和津久井龙雄一起建立了国民协会的前身——国民运动社，试图传播大日本主义的精神。1937年赤松作为国民协会的候选人当选为国会议员。他在帮助建立了几个其他组织后，终于在1940年

加入了大政翼赞会。

赤松同伙中的其他人也分裂了。领导着1931年成立的日本农民协会的平野集团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参加了皇道会。1932年4月15日和赤松一起退出社会民众党的小池四郎，在一年后，当赤松转而信奉大日本主义时，便和赤松分裂了。小池最初仍很坚定，建立了复兴国家社会党常设会议，但后来也转而信奉大日本主义，并把该团体的名称改为爱国政治同盟。

在大矢领导下退出全劳并支持小池的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的日本劳动同盟，也因其中一派转而信奉大日本主义而发生分裂，分裂出来的一派于1933年着手建立了日本产业军。1934年，日本劳动同盟响应松谷与次郎的号召，支持建立勤劳日本党，<sup>[23]</sup>但是后来，在其下层要求建立工人联合阵线的压力下，该同盟的关东协会重新加入全劳，而关西协会(大矢领导)则加入日本劳动总同盟。全劳和日本劳动总同盟当时都支持社会大众党。

这样，激进的法西斯运动在1935年已处于衰落中，一部分以前支持它的群众又重新拥护社会民主主义。在那几年中发生了哪些事情，社会民主主义仍旧是有前途的吗？为什么激进法西斯主义的实际力量完全没有超出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范围？在进一步分析日本激进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原动力时，可以找到上述问题的部分答案。

从30年代到1945年，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军事法西斯主义”——学者们对于这个名称是否合适意见不同——并不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组现存政治结构为手段。它是由在组织上和精神上都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庞大的日本国家机构中最富于侵略性的军事暴力部门领导的。因此，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不同。后者通过反对其他政党的斗争团结了群众，并最终作为一个政党夺取了对整个政权机构的控制。它在国家

机构之外发展起来，垄断了国家机构。而在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则是要最终渗透进国家机构中。尽管它不是靠群众示威成功的，但是军事集团经常企图政变也起着对政府的政治靠山施加压力的作用。

在德国，人民经历了君主政体的垮台，人民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使其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人民也支持强大的工人组织。类似的情况在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必须直接向群众呼吁，他们必须鼓动群众并把群众的行动引向他们的目标，他们必须赢得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在日本，天皇制成为一切法西斯主义者思想和行动的准则。这种情况是因同时代不相符合的社会政治态度造成的。尽管大财阀托拉斯——它们的力量来源于他们的那些现代工业的联合企业——迅速发展，但传统的社会关系继续存在，特别是在乡村。这首先造成了一些特殊条件，使得以天皇为首的并受到古老的封建神话支持的中央集权国家官僚机构，能够转变成为一种冒充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把现代主义和过时的习俗与行为方式古怪地混合在一起。这种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是一个传统的保守政治结构在面临经济危机和中国民族主义以及全世界都对资本主义与民主失去信心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反应中产生的。

随着1929~1930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一些政府部门和军事官僚机构开始认真对待和接受西方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某些因素。那些出身农民，只受过狭隘军事教育的年轻军官则深受其影响。由于军队在农村很有威望，因而这些年轻军官能够在农村地区赢得广泛支持。军队在农村受到欢迎的部分原因是，它具有两个伪民主主义特色。第一，通向军官阶层的大门，甚至向日本全国地位很低的地主的子弟敞开着。它不象德国的容克

地主那样把军官阶层作为贵族统治的禁区。第二，在军队内部完全无视一切民众的社会地位区别和家庭背景，只注重军阶，而军阶在理论上是以能力、训练和经验为基础，对所有的人都敞开大门。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象北一辉这样一些用外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试图利用法西斯主义的传播和年轻军官的威望，从“下层”创造一个革命运动。<sup>[24]</sup> 当他们从军队或官僚政治机构得到资金和机密情报时，他们就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实际上，军队和官僚中的各种右翼派别只是在现存权力结构中为他们自己的发展而利用这些激进组织突然爆发出来的能量。军队领导人在发现他们不再有用时，就抛弃了他们。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预示了激进法西斯运动暗淡的前景。<sup>[25]</sup>

其后，政府采取行动反对其中一些激进法西斯主义团体，以防止它们被官僚所控制。在日本极权统治极盛时期(从第2届近卫内阁至战争结束)，其中某些法西斯主义组织实际以主张“自由表达”“群众要求”来抵抗极权主义倾向。这些组织不是遭到镇压就是被迫退出政治舞台。<sup>[26]</sup>

一部分转向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也遭到同样命运。阪本的总联盟从支持全国劳农大众党急剧地转为支持下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团体，从而推动整个工人运动进一步向右转。<sup>[27]</sup> 但是，军队在发现民间激进团体作用不大后，很快就抛弃了总联盟。不幸的是，受到军方打击的总联盟领导人却转而同正在鼓吹大日本主义的法西斯组织调情，这就如同跛子与跛子联合，结果导致他们很快就在政治舞台上完全消失。其他那些在“满洲事变”前后同法西斯主义拥抱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命运也和总联盟差不多。<sup>[28]</sup>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显然缺乏独立的反政府群众组织的大规模支持，而激进法西斯主义团体没有少壮军官阶层的援助和支持就无法存活。

据丸山真男教授分析，<sup>[29]</sup> 在日本中下阶层“伪知识界”无组织的群众中，比在受过更高教育而经济上居于中下阶层的无组织群众中，能够找出更多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成分。这些人构成地方团体的领袖，他们受过充分教育、地位优越，在知识更少的大众中处于权威的地位。但他们受教育的水平，特别是西方化程度，又还没有高到使他们孤立于群众之外。在这个范畴中，也包括有小工厂主、城镇作坊的老板、建筑承包商、小零售店老板、木匠和小地主以及地位低下的自耕农、学校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村政府的雇员、一般的低级仆佣、佛教徒和神道祭司等，所有这些人在地方团体中享有某种“地位”。他们靠行使家长式的权威统治他们的那些追随者、雇员、佃农、负债者和“下级”，他们帮助制造反左翼的社会舆论并鼓励效忠天皇。各种法西斯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进行政治暗杀并试图发动政变。

另一方面，据丸山真男分析，厌恶右翼或法西斯运动的社会范畴则包括，都市中的工资较高的职员、非官方知识界、独立的专业人员(如教授和律师)以及受到更高教育的学生阶层和现代化大工业中的工人。正是从这些阶层中产生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正如下面将更详细指出的那样，结果也是这些领导人抛开左翼的思想和主张，继而试图在日本创建一个以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组织。然而这些叛道者从未真正成功，因为他们虽然支持法西斯主义，却坚持要求反对资本主义，而这对逐渐掌握军队和国家上层机构的更保守的“统制派”来说，是太极端了。“统制派”为了军需供应和利用日本在

中国大陆的掠夺物，需要更大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合作。

虽然，第一个范畴中的伪知识界对日本在国外进行侵略和在国内推行极权主义一般是无组织的支持。但第二个范畴中受过更高教育的知识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最初却是积极反对这种倾向，继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又以“文化主义”的形式进行消极抵抗。例如，1931年前后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正处于最有希望的时期，著名的极左工会日本全国工会协议会或称全协被迫处于地下状态。但当时，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机关刊物即倾向于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杂志《战旗》，却维持着约23,000份的发行量，估计拥有10万读者，并能够继续筹集到足够其使用的资金。<sup>[30]</sup>此外，甚至在1933年京都大学教授泷川因倾向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被强制解职，使学术界的自由化运动停滞消沉后很久，在大学中还继续听到学术自由化的呼声。<sup>[31]</sup>

甚至在那些正式信奉国家社会主义、大日本主义或其他各种法西斯主义的工会中，原有的工会主张仍旧保留着潜在的活力。这些工会中的工人常常以要求增加工资和工作自由或提出各种政治要求来反对其领导者的“在国家危机时期工人要保持和平”的号召。1933年5月，邮政人员兄弟会的成员，在丰岛邮局发动的无先例的“野猫”式罢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会当时早已不再给予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政治支持，并建议避免采取罢工这种“破坏性行动”。<sup>[32]</sup>另一方面，一些已转而信奉大日本主义的工会领导人仍被迫在自己的工会中维持一种工联主义的方针。同知识界一样，工人组织似乎不能如在德国和意大利所见到的那样，为法西斯运动提供群众基础。

日本有组织的农民运动的形势则有些不同。第一个从社会民主主义阵营转而信奉法西斯主义的农民团体是由平野力三领导的。他领导的农会在1931年1月同社会民众派的一些成员联



合，共同建立了日本农民协会（如在附录图3《日本农会的变化》中可以看到）。当他转而信奉国家社会主义时——他即将同赤松一起参加日本国家社会党之前——社会民主主义者领导的少数派退出了日本农民协会，<sup>[33]</sup> 但是除此之外，该农会中只有两个地方分会，即神奈川分会和埼玉分会，抗议农民协会转向法西斯主义。

当平野后来在1933年转而支持皇道会时，他还继续保持有大批追随者。他甚至在激进法西斯主义组织衰退时期，也没有失去小地主和富裕农民中群众组织的支持，尽管还须以农民阶级路线当作背景，并使用与此有关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要求。在1931~1932年的农业危机时期，日本各地爆发了租佃农纠纷，佃农转而以要求占有租佃地来反抗地主。当时平野的主张如下：“回到被大城市剥削的农村去；借钱给农民，不要担保物；推翻正在自私地剥削着农村的资本主义。”<sup>[34]</sup> 这是力图将危难中的农民的愤怒引向城市，而使其偏离地主。

回顾一下以下事实，就可以进一步说明同一观点：最初日本军队中许多带有法西斯倾向的年轻军官都来自地主和较富裕农民的家庭，正规军中占绝大多数的士兵是来自农村。此外，同他们一起工作的民间团体是由农民的子弟们组成，参加1932年上半年的几起阴谋事件——犬养首相遭暗杀的5月15日事件是其顶点——的血盟团就是例子。因此，从农村中兴起的激进法西斯运动中的最积极分子，是那些叫嚷攻击“金融资本统治阶层”，即财阀及其工具——政党的人。这些人是极端反动的，他们要求倒退并重建以“农业主义”为原则的国家。这是一种同神道民族主义紧密相联，强调农村生活的价值，而反对都市主义和工业化罪恶的意识形态。<sup>[35]</sup>

平野的组织尽管为了给日本极权机构让路，而最终被解散，

但它直到最后仍能保持作为一个具有稳定性的群众组织，这是那些由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会干部组成的法西斯组织所从没有做到的。

#### 4.3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联合及其随后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态度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者退出全国劳农大众党和社会民众党，要求两党合并的呼声增强了。两党在1932年议员大选中成绩都很可怜，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互相攻击。全国劳农大众党由于其左翼中的一些人，如浅原健三，信奉了法西斯主义，而如著名的加藤勘十及其追随者等其他一些人也已退党并被全劳驱逐，因而其规模不再比残存的社会民众党更大。非法的左翼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在1932年爆发出最后能量时，两党几乎同样是它的攻击目标。

在工人运动内部，个人积怨是工会相互直接联合的一个明显障碍。但是两党认识到，扩大他们各自的后援工会组织间的合作是合乎合并需要的。他们决定为此目的而加强和改组联接两个工会组织的日本工人俱乐部。改组的日本工人俱乐部在两党合并两个月后，于1932年9月25日取名为日本工会会议。这为他们在1936年的最终联合开辟了道路（见附录图1《日本社会民主政党的变化》和图2《日本工会的变化》，在那里以图解说明了这一点）。

两党的合并大会于1932年7月24日在东京芝公园协调会馆举行。新党称为社会大众党，在《合并声明》中，采取了鲜明的反法西斯立场，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加强反法西斯阵线”。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致力于“推翻没落的资本主

义制度”，并继续在宣传中使用反对“阶级合作”和“议会主义”等激烈言词。这些措词的意思是指，把“选举作为政治活动的唯一方式。党显然不反对参加竞选谋求公职，但它要求以能够逐渐培养起群众战斗精神的街头示威作为其补充。它渴望成为一个单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并鼓励工人和农民合作”。<sup>[36]</sup> 安部矶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麻生久是总书记。

社会大众党在其初期曾鲜明地反对法西斯主义，但它逐渐转变为支持战争政策，继而又发展成为支持日本的整个军事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结构。第一步仿佛是几乎无关痛痒的，1933年党对“军需膨胀”的立场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军需膨胀”是政府摆脱1931年经济危机的方法之一，它包含扩大军事定货和用于军事消费的大规模赤字开支，这是一种必须向国外“倾销”商品以确保进口的方针。党1933年7月22日通过的《动乱时期重建日本的方针》<sup>[37]</sup> 显示出党的立场的变化。该方针宣称，“下层阶级发现大规模通货膨胀是合乎需要的”。在1933年12月8日~10日召开的第2次党代表大会上，这种倾向甚至更为明显，那次大会抛弃了无产阶级的“教条主义”，并通过了一个认真地向广大中产阶级呼吁的方针。这是日劳派调整方向的重要一步，它遭到铃木茂三郎和党内其他劳农派支持者的强烈反对，所持理由是，这种做法模糊阶级路线助长“社会法西斯主义”。

但劳农派是在进行一场后卫战斗。下述引文表明了它已偏离了社会民主的原则。“我们的阶级运动不是一个狭隘的运动。它没有忽视民族的永久性，也没有站在引起阶级间和人民间关系紧张的自私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必须加倍小心，正确对待战争问题。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文章和演讲中停止简单地反对战争，克服我们对待这一问题的机

械主义、教条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方式。”<sup>[38]</sup>

社会大众党(特别是其中的社会民众派),在工人政策方面,主张维护工业中的和平和使工人同企业主更多地合作。政府和军方对这一运动非常感兴趣,而党的工人领袖在该运动中增加了同当局的关系,开始鼓吹由政府控制工业和工人。日本工会会议在1933年12月16日同政府、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企业家以及学术界的代表举行会谈,讨论了上述问题。<sup>[39]</sup>这种潮流在大约6年后终于发展成为所谓的产业报国运动,该运动以全力推进战争为目标,使工人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有迹象表明社会民众派和各种资本家及财阀集团有秘密的金钱方面的联系,而日劳派则同军方(皇道派)以及“新财阀”逐渐建立起同样的联系。<sup>[40]</sup>总之,其后不久,麻生久就鼓吹无产阶级同军方结成更紧密的联系。

转折点是所谓的“陆军小册子事件”。1934年10月,陆军省新闻处编写了一本名为《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的小册子。<sup>[41]</sup>这本小册子以“战争是创造之父和文化之母”这种词句开头,继而阐述了军队是推动国家发展的主要力量。它鼓吹日本应以国防要素的民族主义体系化为基础,把极权经济作为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改革国家经济结构。小册子基本是一个反对日本政党制度的战争声明。由于以军队的威望为后盾,其影响很大。市场上股票跌落,而资产阶级政党则在国会中勇敢地批判军方抛出这样一本小册子。

然而,麻生久作为社会大众党领导人,却发表讲话,公开捍卫军方的行动。他说:“我们虽然在‘满洲事变’和‘五·一五’事件时反抗反动的法西斯力量,但考虑到日本的形势,以及从日本军队的真正本质判断,我们坚决相信,这里不可能存在法西斯主义……如果社会改革是靠推翻资本主义来完成,那

么日本的形势使无产阶级有必要明智地同军队联合”。<sup>[42]</sup>此外，麻生久还在国会声明，“最近陆军部抛出一本小册子……（它）论述了为保证我国未来安全，仅靠军方单独准备是不够的。我们的国防必须以真正稳定的人民生活为基础……从广义上说，我们实际上赞同国防的原则。但如果检查从那时以来提出的预算，我们认为似乎正是军队在某种意义上蹂躏了广义的国防思想……首先，如果将来一场战争在世界大国间发生，它不会象过去日中战争或日俄战争那样简单。我们尽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认为所有国家都会被卷入大混乱中。在这样一场严酷的战争中，我认为，任何国家，除非它有一个建立在促进全国团结原则基础上的稳固的国家结构，否则将不可能经受住极度的紧张或保护它的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缺乏民族感……我不能不认为，日本今天除非建立一种在军方同人民团结原则基础上的体制，从而实现真正的团结，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防。”<sup>[43]</sup>

麻生久以强调需要改革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拥护军事集团的理由。他在上述讲话中，还对资产阶级政党说道：“你们完全能够打倒我。但你这个在国会拥有303个席位的政友会为什么在5月15日（1932年）事件时因恐怖而变得这样呆滞？你如果真正相信人民大众，就不会害怕军方的‘手枪’。”

在社会大众党内部出现了批判麻生久支持陆军小册子的浪潮，这使日劳派和社会民众派不断发展的冲突更加激化。<sup>[44]</sup>因此，尽管有田所辉明的强烈支持，但赞同小册子仍没有成为党的正式政策。

社会大众党内部虽然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上继续发生摩擦，但它仍旧十分强调无产阶级联合。而不说明社会民众集团领导的总同盟和日劳集团领导的全劳的合并，有关社会民主主

义者联合的叙述就将是不完整的。1935年年中，工人组织要求工人联合起来的呼声如此强烈，以致工人运动的三位老政治家，即社会大众党的安部矶雄、总同盟顾问铃木文治和全劳顾问高野岩三郎，于1935年7月18日发表《联合声明》，督促工人联合。通常发生的争夺高职位的斗争和其他工会如何参加的问题，使联合在1935年下半年一直不能实现，但是在1936年1月15日，两大工会终于合并成功，新工会称为全日本劳动总同盟，主席是松冈驹吉，副主席是河野密和西尾末广。据报道，联合后的会员超过85,000人。

其他工会参加的问题包含有政治因素。当时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全世界的工人组织都已从德国的局势中得出一个深刻的教训，即任何工会如果希望维持自己的独立，就必须以实现联合加强自己，使局部利益服从更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1935年初，诸如日本运输工人总联盟这样一些至今仍留在大工会同盟之外的独立工会，主张一切反法西斯工会联合起来，同时内部实现民主化并改组为产业联合会。左翼工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同较大的右派控制的工会实现联合，同时又不因妥协而过多修改自己的基本政策致使联合变得无意义。

至于全劳，虽然它的一些领导人有亲法西斯观点，但是它的主张一直要比总同盟的主张更激进。由于其势力不如总同盟，因而它支持在新的联合体中增加非总同盟力量。相反，总同盟对接受那些似乎会破坏或威胁现存领导体制的新工会是谨慎的。三位老政治家提出一个折衷建议，其要旨是在两个组织合并时其他组织不能参加，但是，合并后将逐步地接受它们，这才使合并成为可能（并使高级职位较容易分配）。

总之，可以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起来的整个趋势意味着，随着以前某种程度上偏左翼的日劳派当时采取一种极右立

场，鼓吹和军方紧密联合以便加强反抗资产阶级政党与政府（特别是内务省和警察机构）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时也相对加强他们自己同更稳固的社会民众派相竞争的地位，从而巩固了右翼的权力。尽管如此，但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各种社会民主原则，同时他们又在自己同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因而他们的联合仍加强了反法西斯运动内部的力量，这是社会大众党在1936年和1937年大选中获得成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他们并不公开站出来，而宁可保持“潜在的威力”，这一点在考察所谓的“人民战线”时将变得更为清楚。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看到纳粹在1932年取得成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力量不断加强，他们本国中的法西斯运动也在发展，因而开始缓和彼此间的相互敌对，并在各具体问题上尽可能联合各种团体采取共同行动。在法国和西班牙，这种合作采取了有名的人民阵线的形式。由于它反对走向世界战争和军事集团的兴起，反对镇压和禁止演讲与集会，反对压制独立工会的活动以及反对少数恐怖主义团体，从而赢得广泛支持。这种来源于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团体广泛合作的人民阵线思想及其所具有的力量，吸引着一切在表达政治观点、展开经济斗争和发展文化方面受到日益增多的限制的人们，因而它必然能在日本找到适合其发展的肥沃土壤。

在日本，知识界对国外的事情最为敏感。这一时期，在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和撰稿者的文学杂志上，详细报导了欧洲的人民阵线运动，并在论战中受到赞扬。<sup>[45]</sup> 通过报刊杂志的宣传，人民阵线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渗入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共产党人在推进人民阵线上，影响似乎甚微。日本共产党虽然在《1932年纲领》中阐明其立场，之后又重新制订战略。但它的党员却因不断遭警方逮捕而逐渐溃散。读者可以回忆，在

1932年底，党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都被判刑和关进监狱，另外一些人业已背叛。<sup>[46]</sup> 随着最后一个仍然忠于其事业的党中央委员袴田里见被逮捕，共产党秘密出版的机关刊物《赤旗》的停刊，所有党组织都被压垮。其后，一些分散的共产党小组试图重新建党，但他们总是在能够完成任何实际事情之前就被逮捕。

这就是1935年7~8月召开第7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通过以统一战线策略反对法西斯主义时日本的一般形势。1936年2月，逃脱日本1931年搜捕并刚刚被共产国际大会选进其执委会的野坂参三，同参加国际工人会议的日本代表山本悬藏，联名写了《给日本共产党人的一封信》，解释了新策略，该信经过美国被送到日本。<sup>[47]</sup> 由于它近似于一个指令，因而必然被许多继续存在的共产党人作为行动指南来阅读。

这封信除谈到其他事情外，还建议党向社会大众党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农组织渗透。但是这封信和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报告书在日本秘密流传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却不清楚。此外，即使在继续存在的少数共产党人中，对如何将这个策略应用于日本等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例如，神山茂夫论证了反对社会大众党为“中心”建立人民阵线，他更反对以1937年加藤领导成立的更偏执的日本无产阶级为中心。<sup>[48]</sup> 共产党人的渗透减少，不只是由于其本身的混乱，而且也由于上述两个党坚持将可疑的共产党人拒之于门外。

日本无产阶级宣称自己是日本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中坚力量，但它却受到相当程度的反对。他们反驳的理由是，党同它的少数更激进的追随者建立无产阶级阵线就会瓦解。

日本无产党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加藤勘十在1932年全国劳农大众党同社会民众党合并，建立社会大众党之前不久退出全国劳农大众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加藤以其更公开的反军方和反法



西斯立场，吸引一些支持者离开社会大众党。例如，在1936年2月的选举中，社会大众党的几个重要派别并没有支持该党在东京第5选区的候选人麻生久，反而支持1934年成立的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的领导人加藤。加藤在那次选举中得到53,000张选票，比其他任何单个的候选人都多。这显示出人民阵线思想有巨大的号召力。支持加藤的社会大众党各派，在3月被该党驱逐。

结果，当加藤计划同早已退出社会大众党的铃木茂三郎一起创建一个新政党时，一些原来追随加藤愿意在他领导下联合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工农组织，却开始撤回对他的支持。反对创建新的无产政党的理由很简单，即它将破坏无产阶级阵线中已实现的联合。尽管如此，加藤和铃木仍继续推进他们的计划，于1936年7月将劳农无产者协议会改组成为一个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该协议会是于5月成立的——当时东京地区因“二·二六”事件(1936年)仍处于军事管制下——它当时是作为东京地区的一些工会同全国农民协会的联络站而开展活动(《军管法》一直继续到1936年6月)。加藤代表协议会及其支持者，从当年9~12月同社会大众党谈判。他建议合并，以便创建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社会大众党总是回答：如果支持协议会的组织直接转为支持社会大众党，问题就能解决。合并的建议被拒绝。

加藤和铃木不愿接受除正式合并外的任何东西，其原因也许是他们感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确保建立的新党将是反法西斯的党，但也许如其反对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试图以过高的要价讨价还价。就这样，他们于1937年2月20日，将其原来的组织改名为日本无产党，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党。该党在1937年4月选举中提出的5位候选人中，只有党主席加藤当选为国会议

员。

但是社会大众党国会议员却从24人猛增为38人，成为国会中的第三大党。报刊上出现了很多对这种变化的猜测。根据中国东北的紧张局势，一些观察家论证，它反映出人民大众对1932年以来缺乏政党内阁、对现存主要资产阶级政党丑闻不断增加的不满以及对可能爆发敌对行动的抗议。在这种意义上，选举结果构成了对人民阵线思想的含蓄的支持。

其他人尽管承认人民因战争阴云而感到忧虑，但却论证，投票支持社会大众党的手工业工人和白领工人群众以及佃农和小农场主，是赞同有必要在亚洲大陆保卫日本利益的，他们投票支持社会大众党是因为他们确信，该党能够在软弱而贪婪的政党政治和以各种形式把经济纳入备战体制的环境下，可能为他们做些事情。党在最后5年中似乎显示出空前的稳定，其国会议员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反复谴责政府，而是针对不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向政府质询。

7月7日夜里日本军队在中国北方的芦沟桥向中国军队挑起战端后，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事件，无产政党领袖当时面临的局面是，必须决定采取什么立场。党内的两派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变化。1931年迅速支持日本在“满洲事变”中的行动的社会民众派领袖现在却担心，外国的反应可能会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他们对军方势力的增长也保持警惕。相反，以前勇于反抗警方和蔑视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舆论而批判“满洲”军事行动是“帝国主义”的日劳派领袖，这次却要求党保证全力支持内阁，促进全国团结。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尽管麻生久和其他一些人同军方有联系，但是党内的大多数领导人确信应支持这一立场，是由于考虑到党在1932年曾因一些人反对军方“满洲”的行动而在选举中遭到惨重失败。当时获得的无产阶级大

众的选票，还不到1930年的一半。

日本无产阶级自我标榜拥护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人民阵线，因而它很难宽恕军方侵略中国，但它在紧张的气氛中不敢公开批判军方。它的态度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然而，党却对那些被剥夺了生活来源的家庭和军队在战场上的士气表示关注。

但是，随着战争狂热的高涨，日本政府要求所有国民都要以更为积极的“爱国”态度支持战争。内务省决定，对那些散布“不忠”的可疑的舆论“捏造”者，特别是所有卷入人民阵线“阴谋”的人，采取断然行动。12月15日，警方逮捕了数百名左翼工人领袖，还包括非党知识分子。加藤和铃木当然都在其中（本书在后面将论述，他们组织人民阵线的尝试，证明是太平洋战争和其后日本大惨败前民主活动的最后火花）。

显然，在日本，局势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无法组织起一个有效的反战运动。尽管如此，日本无产阶级本身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导致人民阵线失败的主观因素。

首先，它在人员方面有非常突出的弱点。党的最直接的组织支持来自加藤的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以简称“全评”而闻名），它由5个地区协会和40个工会组成，共有会员约12,000人。<sup>[49]</sup>在拥有会员近95,000人的全日本劳动总同盟中支持社会大众党的只有大约 $\frac{1}{8}$ 。此外，全评的会员分散在全国，组成人数从几十人至几百人的小规模工会，代表中小企业中的工人。这种结构使它不可能产生强大影响。

日本无产阶级在产业无产阶级中的唯一坚实基础是“合法左翼”中支持它的两个有很强的战斗传统的大的工会，即有1,100名会员的东京运输工人工会和约有1,400名会员的东京汽车工人工会。这些工会中有许多非法的全协——地下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其全名为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的秘密成员，也有大

量的支持右翼社会民众派的分子。这两派在这些工会内部经常为争当霸主而斗争。全协会员长期阻止这两个工会向右转。这种极左分子和右翼分子之间的斗争使合法左翼分子能够占有这些工会的领导岗位，他们作为领导维持着两派的平衡。

除这两个比较强大的工会外，还有东京市政工人工会，但它只有800名会员，实际力量很小。在全国农民协会内，黑田寿男的支持者也在为形成人民阵线而努力，但他们并没有充分开展政治活动，以引导农民从要求土地转向参加政治斗争。

日本无产党及其领导除去力量软弱外，它也没有认真制订出党的纲领。警方禁止发表它的运动方针。它在其他声明中，甚至没有暗示过要超出当时“合法”活动的十分狭窄的范围，而采取一些其他手段；加之，它那种党派政治的立场疏远了一些可能在某方面有助于人民阵线的组织。此外，它和社会大众党在选举中的竞争自然使它割断了同社会大众党内诸如田万清臣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合作。<sup>[50]</sup>最后，党在侵华战争刚刚开始后不久就停止了一切活动，使潜在着的反战抗议运动失去领导。

社会大众党甚至在日本无产党被命令解散之前，就闻风而动否认了自己成立时的原则。这表现在龟井贯一郎的一次国会演说中。在这次讲演中，他明确宣称，“我们的党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党”。<sup>[51]</sup>尽管，这个表态与事实并不相符，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运动却由此而发生危机。在党的领袖们决定发动一场解散一切政党的运动之后，它正式终止了活动。

对社会大众党来说，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表示其愿意自行解散。事实上，早在1937年12月，党中央执委会社会民众派委员、国会议员吉川末次郎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方针。吉川的理由是，需要团结全国以完成日本在亚洲的使命，为此应

该抛弃“政治”，这可以从党自行解散开始。但是党员大众还缺乏这一行动的思想准备。事实上，吉川在12月底被党驱逐。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时，党内最强烈支持人民阵线的两个人，全国农民协会的领导人黑田寿男和大西十寸男，也在12月15日的大搜捕中被捕。

尽管如此，有些人所持的按极权主义原则“改组”的主张，仍逐渐赢得一些追随者。社会舆论越来越倾向于反对“腐败的政客”。这种主张最初是要完全抛开国会，但因国会的存在是明治天皇本人给予人民的宪法中所规定的，于是就以建议成立一个单一的极权主义政党来代替国会。<sup>[52]</sup>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前一个月担任首相的近卫亲王早就表示赞同这种解决办法。根据麻生久的最新传记，麻生久似乎同近卫亲王有些秘密联系。在后来的评论中，这种关系类似于费尔丁南德·拉萨尔同俾斯麦首相之间的关系。<sup>[53]</sup>在近卫亲王方面，这种关系更为亲密，它还涉及到以典型的日本方式使用暴力。1938年2月17日，政友会爪牙中沟多摩吉领导反共报国团的约300名暴徒攻击了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社党的总部，试图迫使它们解散。继而，社会大众党的领袖们在6月15日一致决定，由麻生久起草制订一个“克服危机建议”。麻生久用了两个月起草该建议，他秘密地同中沟玉吉一起工作。这表明中沟玉吉攻击主要政党是近卫秘密安排的。从那时起，麻生久逐渐使党的政策转为完全支持近卫。麻生久相信，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完全从下层发动，它同明治维新一样需要来自上层的支持。

社会大众党在“芦沟桥事变”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即1938年7月7日，建议成立一个“国民党”作为实现“举国一致”的手段，以克服阶级冲突、宗派摩擦和互不信任。为此目的，党将采取

“自我克制”的态度，将和其他一切特殊利益集团一样帮助推进“圣战”。<sup>[54]</sup>

由于各主要政党对该主张反应冷淡，麻生久、三轮寿壮和社会大众党其他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同国会中的其他小党合并来加速这一进程。下一步行动是，社会大众党领导人安部矶雄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东方会的领导人中野正纲于1939年2月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他们两党将分别解散，一起建立一个“大和（日本古时的名称）精神的“团结的国民的极权主义政党”。<sup>[55]</sup> 由于中野刚从德国和意大利旅行归来，他确信日本需要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因而这显然是向法西斯主义迈出一步。尽管如此，但安部和党内的社会民众派却反应冷淡，中野后来承认，在国会中其他大组织显然不愿投入这种冒险活动，不是争夺职位，而是基本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合并运动毫无结果。<sup>[56]</sup>

尽管还在对党的前途进行争论，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部倾向解散独立工人组织的意见已很强大。这种意见认为，所有企业中的工人和企业主都应该加入产业报国会，在报国会中，双方都应当使各自的阶级利益服从国家在危机时刻的整体利益。在全日本工人总同盟内部，日劳派领导人（他们以前曾领导全劳）支持这种看法，而社会民众派（前总同盟）领导人却认为，保留独立工人组织是同政府合作和推进战争的更好方式。两派的摩擦一直发展到1939年7月24日该组织分裂。过去的全劳分子加入了产业报国俱乐部，而留下的人则把该组织的名称重新改为过去的日本劳动总同盟（见附录图2：《日本工会的变化》）。两派分离时虽然使用了友好的言辞，但他们之间潜在的对抗立即在社会大众党的各委员会中反映出来。

在该党内，日劳派认为社会民众派对党同东方会合并失败

负有主要责任，他们在1940年2月利用一个与此不相关的事件将社会民众派的主要领导人从党内驱逐。2月2日，民政党领导人斋藤隆夫在国会发表演说，批判日本军方自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在中国的目标。当他演讲时，反对他的愤怒的嚷叫激起其支持者的零散的呼声。结果，议长将一半演说从记录中删去。社会大众党试图乘机利用军方的威望，紧接着于当天下午就发表声明，攻击斋藤和民政党。来自各党的支持战争者逐渐加入了要求惩罚斋藤的大合唱。社会大众党中央执委会以12票对5票决定在国会投票支持驱逐斋藤。政友会要求5名反对驱逐斋藤的该党议员退党，但是一些中间人出来调解后，那5名议员被准许继续留在党内。社会大众党也驱逐了在国会投票驱逐斋藤时拒绝出席会议的9名该党议员中的8名，但是尽管这些人对被驱逐表示抗议，却没有人出来调解使他们回到党内。<sup>[57]</sup>

党的领导人安部也没有出席那次国会会议，但他是因重病未能出席，因此没有被党驱逐。安部于1940年3月21日辞去党内职务，宣布他打算建立一个新党。新党筹备会于4月建立，党的名称选定为勤劳国民党(更精确地说，是劳苦工人大众的党)。但是就在该党成立前夕，内务省以该党信奉“社会主义”而且“以无产阶级为基础”从而是破坏国家稳定的潜在力量为理由，禁止它成立。

社会大众党在驱逐社会民众派领导人后，再次试图发起一场“重新组织人民”的运动，1940年6月该党向所有其他政党发出呼吁，鼓吹各政党为给建立忠诚为国家服务的团结的极权结构让路而自行解散。

社会大众党在近卫首相认为其成为“新结构”的领导者的时机显然已成熟时，于1940年7月6日在东京协调会馆正式决定解散。离开病床向党发表演说的麻生久，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试图使人们相信，似乎国家的极权化是社会民主运动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标，他说，“我们组织人民的主张，现在已成为国家的号召，而我们所提倡的献身已成为对全民族的献身。我高兴这一天的到来，本党的理想传播到海外，我们的牺牲打开了革新的道路。”<sup>[58]</sup>

两天后，活动了28年之久的总同盟，由于1940年5月7日勤劳国民党遭到禁止而夭折后所产生的恐惧，与其说是被命令解散，不如说是自动解散了。总同盟曾答应支持建立勤劳国民党。

7月16日，米内内阁总体辞职，从而使第2届近卫内阁得以建立。几乎就在同时，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和残存的各小党都自行解散。随着日本农民协会和日本农会总同盟的解散，农民运动也迅速走向终结。

近卫首相在指定新体制筹备会成员时，也包括有麻生久，<sup>[59]</sup>但麻生久在9月6日去世，当大政翼赞会在1940年10月12日正式成立时，几个前社会党领导人被指定为该组织的干部。其中，河上是书记处书记，三轮寿壮是组织部联络局局长，浅沼稻次郎是国会委员会下院别选举制研究部副部长，河野密是国会委员会下院审查部副部长。<sup>[60]</sup>他们都是日劳派。

表面上，“新政治体制”获得很大成功，前无产政党领袖被包括在其中，并且担任要职。反对“新体制”并得到大企业优厚财政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党被解散。近卫首相表示希望结束侵华战争，这时他再次成为首相。

但是，实际上“新政治体制”是一个失败。建立“新政治体制”的计划是首届近卫内阁期间(1937年6月~1939年1月)，在“重新组织人民”的名义下制订的。近卫的顾问们认为，建立一个公开以法西斯党而暗中以共产党为模式的一党制，以此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工具就能够控制住军方。据认为，以解散军方经常



谴责的被金钱收买的腐败政党为条件，军方将会支持建立一党制度的计划。同时，有非凡强大魅力的近卫亲王作为最高领导人——他的复杂性格使他能被军方、贵族、文职官僚、知识界和日本社会中其他主要阶层所接受——将能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抱负真正让步，并以区域、文化、种族方面反对西方殖民国家的共同利益为基础，说服他们建立一个真正的东亚“共同体”。但如事实所证实的那样，近卫不是一个十分强大或坚定的领导者，他过早地谈论对中国民族主义让步，而他却没有力量在日本采取那些措施。军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事实上军方能够推出一个更强有力的领导人，即东条将军。那些企图以大政翼赞会来防止军方统治国家的人，甚至在该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前，从军方拒绝参加该组织的中央总部一事，可能就已意识到这个组织要流产。

由于大政翼赞会或其前身“新体制”运动以及“重新组织人民”运动都难于公开宣布其目的是要制服军方，因而很难判断麻生久在多大程度上是因意识到这一点才采取行动支持该运动的(战后，所有政治领导人，不只限于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试图表明他们的动机是要坚决反对军方，即使他们在行动中没有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使动机问题变得复杂化)。无论如何，一个极权主义体制被建立起来，但它并非真正极权，因为军方仍保持独立行动。事实上，军方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试图在某些方面修改该极权体制，以便利用它进行战争和达到自己的目的。

战争期间，前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国会中所进行的那些同其以前立场有关的活动，是指出恶劣的工作条件使产业工人成为劣等士兵以及为有利于推进战争应建立一些福利设施，以便使当局注意工人困境。例如，前社会大众党党员河上1943年在战

时特别管制条例议案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站起来向东条首相质询时说，“我并不是要否定农村构成了一个强健士兵来源地的见解，但是，如果工厂不能够提供强健士兵，那么就应该去弥补这个缺陷……过去农村和城市互相对立。我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去消灭这种对立，使工厂和农村都能够提供强健的士兵。”<sup>[61]</sup>正如东条在回答中所表示的那样，在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中，产业工人遭轻视，农民则被理想化。因而，对前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它们在尽力证实那些义务应征的工人并不适应这种环境，说明它将使他们变得非常低能上，还能起一些作用。

战争期间，即在上一次的1937年4月30日大选后4年，应该进行一次大选，但是东条政府却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将国会的任期额外延长了整一年。在1942年的大选中，一些前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参加了竞选；在当选者中，8人是得到政府支持的，11人没有得到政府支持。

甚至在政府的支持下，也不允许国会议员建立任何组织同大政翼赞会竞争。东条首相在掌握国家大权后，曾徒劳地试图以某种方式改组大政翼赞会，以使他能够象希特勒通过纳粹党所做到的那样，更稳固地控制全国。大政翼赞会最终于1945年6月13日，在建立国民义勇队后被解散。这个义勇队是准备对将在日本本土登陆的敌人进行“永久抵抗”而建立的。在大政翼赞会存在期间以及东条于1942年5月20日建立的翼赞政治会的活动期间，其大多数成员是来自日劳派的一些前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在其中服务，<sup>[62]</sup>由于这个缘故，这些人在美军占领的初期被盟军最高司令部整肃，暂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 注 释

[1] 关于这些团体的名称、宗旨、领袖、沿革、存在时间和势力以及在日本国内和国外的其他民族主义团体的一本较为合适的参考书是，木下半治：《现代民族主义辞典》（东京，关东社，1951年）。

[2] 关于对战前法西斯主义的说明，见伊凡·莫里斯：《1931～194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主义？》（波士顿，希斯公司，1963年）。近期关于战前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最好的英文著作是，理查德·斯托尔里：《具有双重性的爱国者：日本民族主义研究》（伦敦，查托和温达斯公司，1957年）。斯托尔里指出，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它从没有得到群众的大规模支持，并且反对公开的专政。见上书，第6页。在这个专题方面，最重要的日本学者中有丸山真男和木下半治。见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为》（共2卷，东京，三来社，1956～1957年）。伊凡·莫里斯将它编入英文的《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和行为》（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见木下半治：《日本民族主义运动史》（共2卷，东京，岩波书房，1952年），和《日本的右翼》（东京，阳书房，1953年）。

[3] 见田中惣五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源流：北一辉的思想和生平》（东京，白扬社，1949年）。

[4] 有关社会民主运动内部法西斯主义潮流兴起的最详细的材料，可见木下的《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特别是第2卷的第4章和第7卷的第3章、第4章。

[5] 《日本民主新闻》，1931年10月15日。这是赤松本人主编的一份社会民众党非官方机关报。

[6] 内务省警保局编：《从出版物看日本革新论的现状》，标有“密”

字(东京, 1933年12月), 第553页。

[7] 《劳动》, 1932年11月, 第7页。该杂志是社会民众党的机关刊物。

[8] 木下:《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第1卷, 第211页。

[9] 引自《劳动》, 1932年5月。

[10] “新战斗方针”的条文可参阅《日本劳动年鉴》, 第14卷(1932年), 第452页。

[11] 当时在日本, 赤松及其他人几乎是交替着使用这两个词。

[12] 关于各组织及其领袖的名单, 可见木下:《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第1卷, 第222页。

[13] 大会《声明》见《日本劳动年鉴》, 第13卷(1932年)。

[14] 警察官员允许所有尚未宣读报告的党的干部继续宣读, 因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 党的干部在代表大会正式结束后庄严地宣读他们的报告。中正雄:《先驱者的系谱:社会党前史》(东京, 社会思潮编辑局, 1949年), 第167~168页。当代表们离开大厅时, 其中一些人被逮捕, 当晚在爱宕警察局, 被捕者遭到竹棍和拳头的毒打。铃木茂三郎:《爱和斗争》(东京, 劳动文化社, 1949年), 第102页。

[15] 同上书, 第99页。

[16] 该组织的背景及其以后的行动说明, 工人运动中正在出现一种急速的变化。总联盟从最初就是由阪本个人组织和领导的, 1931年它宣称有会员25,437人。它最初是作为一个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出现。它作为工团主义组织, 没有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日本工会评议会。尽管如此, 但它也是一个激进组织, 因而它在评议会存在期间作为一个外部的组织支持评议会。随着政府加紧镇压左翼——如1928年3月15日和1929年4月16日大规模逮捕所表明的那样——总联盟缓和了它的政策, 并隶属于日本劳农党。在日本劳农党于1931年7月改组为全国劳农大众党后, 它仍隶属于该党。

在1931年12月不再支持该党后, 阪本害怕被孤立, 抓住国家社会主

义运动出现的机会，于1932年1月17日和下中弥三郎共同建立了国民社会党筹建委员会，该筹委会将在后面讨论。因此，总联盟的历史描绘出一条曲线，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继而又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国家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17] 松谷1930年作为日本大众党的候选人当选为国会议员，他在全国劳农大众党成立后，接受该党顾问这个名誉职位。

[18] 木下：《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第1卷，第225页。

[19] 木下的《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引用了备忘录的全文，第225～228页。

[20] 似乎应当指出，“法西斯主义”（无论是写作“法西斯”或“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舶来的带有外国味的贬义词。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下中、赤松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及“日本主义者”很自然要反对将他们“贬为”“法西斯主义者”。尽管如此，该词在日本仍被广泛接受为专指这一派人及其分支。关于赤松对他那种形式的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的探讨，见赤松克麿：《新国民运动的要旨》（东京，万利阁，1932年），第106～151页。赤松赞扬纳粹主义的行动主义以及承认国民利益基本一致，但是批评它反对资本主义不够。

[21] 木下：《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第1卷，第233页，注释 [1]。

[22] 木下的《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引用了前者的纲领，第1卷，第235页；也引用了后者的纲领，第1卷，第240～241页。

[23] 如我们所看到的，松谷1930年作为日本大众党党员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作为重新改组的全国劳农大众党的党员再次当选。但是他强烈支持日本在“满洲事变”中“捍卫”自身的利益。他确实参加了新的社会大众党，并在该党于1932年成立时担任了它的顾问，但是他由于持强烈支持日本扩张的立场很快就退出该党。在这种情况下，松谷在同安达的国民同盟短暂接触后，于1934年建立了这个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

勤劳日本党。

[24] 见丸山：《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第28页、第32页以及书中其余部分。丸山和其他人的所谓“上层”，不只是指军方和官僚，也是指政治家、财阀和其他强大的金融集团。但是“下层”的含义也很广泛，它包括：小企业主阶层、工头、下层白领工人、学校教师和其他能附和军事爱国主义并仇外的人。同上书，第59页。我们在这里只涉及数目很小的一批人——激进右翼或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要采取革命行动“变革”国内外形势。

[25] 下述引文表现出激进法西斯主义者在事件后的感觉：“根据我的观察，在那次事件(1936年2月26日)后，不仅在二月会的成员中，而且在全体改革运动战士的心里，开始滋生一种忧郁空虚的情绪……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区别已经消失，诸如选举运动和国民运动等事情转眼间失去了它们的全部力量，就如同露珠暴露在炎热的阳光下……军方智囊人物似乎认为，将国内改革的巨大工作托付给广田内阁比托付给日本主义的鼓吹者对其更为有利。这样，不管是有幸还是不幸，日本主义运动和军方的关系似乎再次倒退成为一片空白……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各无产政党更弱……自那时以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应脱离实际行动。”引自津久井龙雄(一个所谓“观合右翼”的成员)：《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论》，《中央公论》(1937年5月)，第190~192页。

[26] 最突出的事例也许是中野正刚的东方会。该会反对给东条以全权来控制言论和集会的法案，结果该会很快被解散，中野也被逮捕。见绪方竹虎：《中野正刚其人》(东京，万寿书房，1952年)，第40~56页。

[27] 例如，在1934年3月25日日本工会会议第3次执委会会议上，由大约27万成员组成的各社会民主工会受只有27,000成员——公开宣称的数字，可能有严重虚报——的日本工会总联盟的恐吓，将用于“五·一”节示威的口号中撤回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口号。见《大筑社会劳动问题月报》(1934年4月)。

[28] 邮政人员兄弟会的发展是另一种情况。兄弟会由于赤松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向日本主义而将其驱逐出领导集团后，让中野正刚担任了该工会的主席。中野正刚最初是政友会的政治家，他转而信奉法西斯主义并帮助安达建立了他在国会中所代表的那个党，即国民同盟——后来成为东方会。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组织认为中野的组织太“资产阶级化”，并回避邮政人员兄弟会。见细谷松太：《日本工人运动史》（共2卷，东京，同友社，1948年），第2卷，第145页。随着政府发起的产业报国运动的兴起，该工会因是一个独立活动的组织并反对政府的控制而受到当局的压迫。该工会的主席和其他两名领袖被从邮政系统解除了工作，“因为他们抵制命令和搅乱原则。”见递信省：《电信工作历史》（共2卷，东京，通讯文化新兴会，1949年），第1卷，第550页。关于递信省编写的该工会更详细的历史，见《电信工人运动史》（共2卷，东京，通讯文化新兴会，1949年、1951年）第1卷，第3~94页。

[29] 见《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及其思想》，收于远山茂树，服部之总、丸山真男合著：《忠君思想和绝对主义》，《东洋文化论集第二集》（东京，白石书院，1948年），第149页。在丸山《现代政治的思想和活动》中，该文重印作为该书的第二章，第25~82页。丸山本人将该文节译为英文，题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和思想》，这是该文的第一个英译本，收入《日本法律和政治年鉴》第1卷（1952年），第95~128页。该文由安德鲁·弗雷泽译为英文，题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动力和思想》，收在他所译丸山的《现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和行为》第25~83页。顺便说一句，我在本书中使用的“极权”这个词，更多的是指近卫首相和其他人的“尝试”，而不是实际的极权，因为日本的“极权主义”总是不能实现。

[30] 见山田清三郎：《无产阶级文化史》（共2卷，东京，理论社，1954年），第2卷，第264~265页。另见乔治·T·谢伊：《日本左翼文献》（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00页。

[31] 正是内相鸠山一郎（后来，在战后成为首相）在1933年5月命令

解雇泷川教授。由于这种做法违反固有的程序，京都大学的校长和许多教员辞职，试图捍卫“学术自由”和大学的“独立”。

[32] 递信省：《电信工人运动史》，第545～552页。

[33] 日本农民协会在社会民众派领导的农民于1932年4月退出后，还有26个地方同盟会，据说拥有38,000名会员。与此相对照，社会民众派在重新组成自己的日本农民协会总同盟后，只拥有12,000名会员，其中只有8,000人向社会民众党缴纳党费。《日本劳动年鉴》第14卷(1933年)，第446页。

[34] 在1932年8月19日日本农民协会九州同盟会的代表大会上，平野提出了这些要求。

[35] 这种意识形态已有很长的历史，它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当时它表现为反对那种大规模采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尝试。现在它已成为一种更加恶毒的攻击城市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各方面主张只是分别得到不同派系的拥护，而且其中一些很少涉及到世界性问题。见多尔：《日本的土地改革》，第60～64页、第77～78页、第92～93页。

[36] 《合并声明》发表于1932年6月15日的《日本民众新闻》。河上丈太郎是合并委员会主席。

[37] 《动乱时期重建日本的方针》，社会大众党小册子(东京，社会大众党出版部，1933年)。

[38] 引自《社会大众党竞选方针书》(东京，社会大众党出版部，1934年)。

[39] 政府代表由内务省、警保局、陆军省、海军省、运输省等部门的有关官员组成，大多数是各省次官级官员。吉田茂代表协调会出席。

[40] 例如，见井东宪：《关于基金问题》(东京，1935年)。该文宣称，在社会民众派中，铃木文治从三井和三菱的企业家那里得到资金，而松冈驹吉1927年从仅几个月前他在那里领导过一次罢工的野田酱油公司秘



密接受了20,000日元作为竞选基金。井东进一步宣称,日劳派的领袖麻生久及其亲密朋友龟井贯一郎——虽然他是一个社会民众派——从宇垣一成将军那里接受了资金援助。宇垣一成卷入了1932年3月由樱会的年轻军官和包括大川周明及龟井贯一郎本人在内的民间策划的一次不成功的政变。宇垣也大力支持促进朝鲜和其他地方的军工生产,因而同“新财阀”有紧密联系。据认为,麻生久通过宇垣同这些新财阀,特别是关西地区的新财阀,有特殊关系。

[41] 《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

[42] 出自社会大众党的机关报《社会大众新闻》(1934年10月28日),引自麻生久传记出版委员会委员河上丈太郎:《麻生久传》(东京,麻生久传记出版委员会,1958年),第457页。

[43] 《麻生久对一位内阁阁僚的质询》,速记稿第5号,1936年5月9日国会下院会议记录(日文)。

[44] 如附录图1中所示,在该党中仍可找出某些所谓劳农派的成员。在1935年1月20~22日召开的第3届党代表大会上,他们是最猛烈的谴责麻生久捍卫军部小册子的人。但是他们的立场并没有赢得其他党代表的很多支持。因此,决定由党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军部小册子的含义,以及如何利用这本小册子为党在后备役军人协会、青年团和产业协会的成员中赢得拥护者。这些组织都是极端爱国主义团体,但它们赞同军队的反资本主义宣传,党现在想利用它们加强自己的力量。见《日本劳动年鉴》第17卷(1936年),第501页。

[45] 当时其编辑部支持人民阵线的杂志有:《星期六》、《学艺》、《学生评论》、《当代新闻》、《自由》、《历史学》、《劳动杂志》、《职工》、《世界文化》、《社会评论》、《进步》、《大众政治经济》和《唯物主义研究》,此外,还有两个直接隶属于日本共产党的杂志,即《生活新闻》和《最底层》。

[46] 关于那些人的招供在共产党队伍中的影响,见山本和有田写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史》,第382页。佐野和锅山招供的某些段落可以在

该书第376~381页中找到。

[47] 这封信所阐述的政策要点如下:(1)在当前的纲领中,应删去“推翻天皇制”,而代之以“推翻军事法西斯专政”;(2)为增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全党要清除地方主义,把农民(包括富农和小地主)、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广泛地团结起来,建立一个人民阵线;(3)必须运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手段,为达到使社会大众党向左转的目的,必须尽一切努力参加该党和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和农会;(4)必须将军事法西斯主义压制下的群众所有各种日常需要和要求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并为之战斗,共产党人不要试图采取过于极端的斗争方式,而应努力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提高群众觉悟,引导群众组织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引文见《给日本共产党人的一封信》,载于山本和有田写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史》,第411~419页。

[48] 见神山茂夫:《反抗强硬的潮流》(东京,中央社,1949年),第145~147页。

[49] 这些地区协会及其所属工会的会员人数引自人们一般认为较为精确的《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但是由于没有核查过其准确性,因而这些数字也只能作为较为近似的数字。

[50] 田万的立场是,那些支持“人民战线”的人,与其另建一个党去反对社会大众党并同其竞争,不如参加社会大众党,促使该党更加反法西斯主义。见田万的文章,《什么是人民战线?》,《学生评论》第一期(1936年9~10月),第46~50页。

[51] 引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88页。

[52] 非常奇怪的是,赞同和反对独裁政府的人从其相互对立的原则出发,都支持成立单一政党的思想。见马场恒吾的很有预见性的文章《政府和政党》,载于《中央公论》(1938年4月),重新刊载于该刊(1960年11月号)第394~399页。

[53] 见河上:《麻生久传》,第474页、476页和478页。关于19世纪

60年代初期费尔丁南德·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关系,可参阅古斯塔夫·迈耶:《俾斯麦和拉萨尔》(柏林,1928年),该书是以俾斯麦和拉萨尔两人相互来往的信件为依据而写成的。龟井贯一郎似乎是麻生久同近卫亲王的联系人。龟井具有的条件使他能够这样做:他同九州的大名这种华族家庭有亲戚关系,因而同亲王有一些社会交往。九州是麻生久的“故乡”。田所辉明是麻生久的战略家,麻生久经常听从他的建议。他首先为麻生久同军方建立了联系。具体地说,田所希望通过军队统制派首领和大川周明的朋友永田铁山少将进行工作。永田鼓吹国家计划。对田所来说,这同社会主义的主张有些类似。但是,田所在1934年去世,而永田也在1935年被一些皇道派成员暗杀。其后,麻生久在日劳派中找不到代替田所的人。然而,麻生久却成为龟井的好朋友,龟井也就成为麻生久非常信任的得力助手。

[54] 见《日本劳动年鉴》第20卷(1939年),第248~249页。社会大众党认为,对于一个新的“国民党”来说,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条件:(1)它应当以极权主义原则为基础并代表国民的意志;(2)它必须不只是各种现存力量的联合,而且应成为一支革新的力量,为改革资本主义和建设新东亚而奋斗;(3)更具体地说,它应当使生产有计划进行,发展广义的国防,确保人民生活,以彻底改革日本为目标。

[55] 该《联合声明》可以在绪方的书中找到,第153~154页。

[56] 同上书,第155页。

[57] 这8人是:片山哲、松永义雄、水谷长三郎、西尾末广、冈崎宪、铃木文治、富吉荣二和米洼满亮。缺席的还有另一位无产阶级代表松本治一郎,他在国会内同社会大众党合作。

[58] 南贺的书,第238页。在其后的一个半月,国会中的所有其他政党都自行解散了。

[59] 关于成员的名单,请看下中弥三郎著:《国民大政翼赞运动史》(东京,大政翼赞运动史研究会,1954年),第82页。

[60] 同上书，第141页、第148页、第150~151页。

[61] 引自《国会记录》，载于丸山著：《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运动》，第50~51页，丸山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中将其译为英文，第111页。另见远山的书，第137页，以及丸山的书《思想和行为》，第49页（然而笔者将引文译为英文）。

[62] 下中的书，第458~460页。



# 领袖、集团和派系

社会民众派

日劳派

劳农派和其他左派团体



## 第5章 社会民众派

权威人士：著名人士

管理者：工人血统

鼓动家：大学毕业生

探寻战前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从其激进的开端到最后同极端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的过程，人们可能会奇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沿着什么样的必然的曲折轨道走到这条路的终端的。而其他人又是在什么地方停止继续向前，离开了狭窄的合法道路，或因遭逮捕而被迫停止活动。研究社会民主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战术将能够回答上述问题。但在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构成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特色的那些内部的复杂关系、意识形态分歧和派性。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社会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只是为了分析的目的而使用的一个名称，向来极少用于指明一个在意识形态或组织上是统一和稳固的运动。

本章及其后两章试图回答日本社会民主运动意识形态的领袖中谁属于哪一派的问题。由于这是首次试图分析相互竞争的各派系和集团，因此先讲一讲方法和步骤将是有益的。笔者发现，有关这一专题的论著中，对“右派”、“左派”、“中间派”这些意识形态术语的使用很混乱，而且将这些术语运用于从各政党名称衍生出的那些派系上，也十分含混不清。因此，第一步



似乎应从简单扼要地重复三个主要领导集团的产生及其相互关系来阐明“左派”、“右派”及“中间派”这些概念。继而，才有可能一个一个地考察各派，尽力以各派的名单去概括它们，同时以介绍代表人物来说明各派的主要特点。但是，必须强调，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人类的集团的行为而且受篇幅所限又只能描述一般类型，我们不可能研究那些较次要的更无规律的个人信仰的改变。同样，由于无法精确测定哪些个人可以被称为领袖，因而我们将只取名字最经常出现并居于权威地位的那些人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应该指出，本章及其后的两章将着重叙述领导集团组成情况，阐明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目的在于说明派系间的最显著不同。至于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共同点及其对一些特殊问题的具体态度以后将更详细的考察。

我们依靠对事后的实际情况的观察，能够认清社会民主运动领导集团中的派系是从1926年底建立各团体中逐步发展形成的。我们将按以下顺序考察它们：(1)建立社会民众党的领导集团，它在战后时期仍然存在并继续称为“社民派”——请读者记住这个词，我们把它译为“社会民众派”，这一派，因其在1926年时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以无产政党运动中的“右翼”闻名；(2)建立日本劳农党的集团，他们长期以来被称为“日本劳农派”或“日劳派”，在1926年，他们自称是居于反共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倾向于共产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中间派”；(3)相继从共产主义运动中游离出来，而在每一次遭到政府镇压的打击之后又都转而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仍继续坚持不妥协的反政府立场的那些集团，他们被称为“左翼”或“合法左翼”，以同非法的共产党人区别开，属于这个派系当然不只一个集团，但如将要说明的那样，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农派。

尽管这三个重要的领导集团意识形态立场不断发生变化，

理论分歧也变得模糊，从而使“右翼”、“左翼”、“中间派”这种区分毫无意义，但是，它们之间的分歧一直实际存在着。此外，时时游离出来一些单个领导者，他们虽然有足够力量建立自己的政党，但却不能长久维持，也不能避免和那些重要的集团暂时联合。<sup>〔1〕</sup>

为区别这三个主要集团，在后面几章中，将从一般特点和更精确的定义的角度去描述它们。为进行分析，可以将各个集团相互区别的特点列成为以下四个范畴，即结构、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和行为类型。本章及其后两章中重点说明其中的第一点。

从派系上看，社会民众集团由三类人组成：(1)“权威人士”，由在社会民众党成立前在日本社会中已占有一定地位的人们组成，他们尽管关心社会主义、民主和工人运动，却仍然“受到尊敬”；(2)“管理者”，由那些尽管缺乏高等教育，但却因在工人运动中的活动而从重要工会职位升上来的工会干部组成；(3)“鼓动家”，主要由那些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运动而决心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学毕业生组成。尽管鼓动家或宣传家积极确定首尾一贯的意识形态，尽力把它变为一个精确的政治纲领，但是该集团政治立场的温和调子却是权威人士定的。

用一系列描述性词句足以初步表达出社会民众派的意识形态的要旨，这些词句包括：基督教改良主义、渐进社会主义、议会民主、同行会工联主义联在一起的政治活动、阶级合作以及采取向上层的力量妥协但却支配下层力量的态度。

这种意识形态对该集团希望扮演的角色来说是必要的。它使社会民众派工人领袖能够吸引和组织日本工人中的较稳定阶层——这些工人同那些临时的或收入极低的工人相比，在一定

程度上工作更有保证。在选举期间，这样一个基础则能广泛吸引中产阶级的支持。随着从工人阶级之外得到足够多的选票，甚至该集团中的工人领袖也能够爬上有政治声望的显贵的负责岗位。

社会民众派的名流为扮演其角色，习惯于随风倒。它采取一种谨慎的、只反对日本的战争倾向和极权主义倾向的态度，除非，组成总同盟的工会的主要核心受到损害，因为这是它的主要支持者。它的高级领导人同军事扩张主义鼓吹者的合作，在“满洲事变”时期比日劳派更多，但是其后，却远比日劳派为少，而且社会民众派大都能在战争期间缩小了的政治活动范围中维持自己的活动。此外，他们甚至在独立工会正式消失后，仍能在地方的企业主同工人间保持一种中间立场。

上述社会民众集团形成时组成它的那三类人，应理解为是该集团的代表，而不是说该集团绝对只由这三种人组成。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集团的构成也因年老、死亡、输入新鲜血液和变换同盟者而发生变化。社会民众集团的特点在某些上层领导人身上表现得最突出，但是在等级较低的领导人身上却比较模糊不清。其他过于短期或间接地支持过社会民众集团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人或工人领袖，在任何富有意义的方法中，都没有归类于该集团。在该集团每派的著名领袖表中，列出的是1926年时的情况，同时对1926~1940年期间脱离该集团的那些人作了说明。

## 5.1 权威人士：著名人士

1926年社会民众党中的权威人士由下列人士组成：<sup>[2]</sup>

表5.1.1

姓名和生卒年	教 育	职 业	附 注
安部 矶雄1865 ~1949	同志社大学, 哈特福德神学 院	早稻田大 学教授, 早年在同 志社大学	“老社会主义者”, 稳健派, 基督徒; 在1928、1932、 1936、1937年均当选为议 员, 但在1930年落选。
马场恒吾1875 ~1960	同志社大学, 早稻田大学	记者	从30年代中期直至战后退 出政治舞台。
堀江归一1876 ~1927	庆应大学	庆应大学 教授	从主张自由放任转为主张 国有化。
贺川丰彦1888 ~1960	明治学院, 神 户神学院, 普 林斯顿神学院	作家	几次从一个集团转向另一 个集团, 以献身基督教著 称, 在美国比在日本更有 名, 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 选人。
片山哲1887~	东京大学 <sup>[3]</sup>	律师	安部的门徒; 在1928、 1930、1932、1942年是国 会议员候选人, 在1936年 和1937年当选为议员。
岛中雄三1881 ~1936	东京法学院 (现中央大学 的前身)	记者	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但在1932年离开该集团转 向国家社会主义。
铃木文治1885 ~1948	东京大学	工会领袖	友爱会创始人; 在1928、 1936、1937年均当选为国 会议员, 但在1930、1932 年落选。
吉野作造1876 ~1933	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 教授	引进“民主”概念的领导人。

该派系得以保持团结并统治着社会民众集团的那种思想的总要旨是一种共同的感受, 即认为现代日本社会中存在着深刻的非正义, 关心那些比较穷困的阶级的福利不是激进的或危险的事情, 补救的办法是通过议会立法把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变成带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

在经济更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中, 基督教新教派促进或影

响着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把他们推进社会潮流。安部矶雄的一生是整个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基督教倾向的标尺。<sup>[4]</sup>安部是一位因明治维新而突然没落的武士的儿子,他在同志社大学学习了西方的新知识,在1882年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公理会教徒。后来他到美国进入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神学院。然而在美国,他对在纽约市看到的社会改良工作不健全感到失望,这使他处于一种很容易接受贝拉米·爱德华《回顾》一书的精神状态。在通宵阅读该书后,他在合上书时,决心做一名“社会主义者”。他的这一信念从没有动摇过,尽管其观点有过很多变化。<sup>[5]</sup>安部回到日本后,如同许多关心社会问题的日本人所做的那样,成为一名唯一神教派教徒,同时他也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在1901年所有参加建立流产的社会民主党的伙伴中,安部的政治经历最长。

安部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成为社会主义者和基督徒为反战而形成联合阵线的化身。他当时甚至已走到这样一种地步,即表示,如果日本人不战斗的理由是他们主张不抵抗主义,那么他可以忍受眼看自己的祖国受到外国军队的蹂躏。<sup>[6]</sup>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部象欧洲的反战社会主义者那样,从这种理想主义的立场后退了。但他在30年代并没有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大陆,在1941年也没有支持日本进攻美国。他至少保持了一种他能称之为不是全力支持战争的立场。但是,安部在1900~1910年的10年中作为一个完全居于政府之外的年轻人,远比30年代作为一个老练的满头银发国会议员时更尖锐地批判了政府。

由于是老安部的亲密伙伴和崇拜者而被称为“安部第二”的片山哲,也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基督教倾向的发展。<sup>[7]</sup>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日本第一个基督徒首相,同时也是第

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首相。他身材矮小健壮，态度严肃，善于演说。他的演说不是火热的，但有一种庄严感。他不擅长圆桌会谈或迅速机敏地反驳质询。但他仍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政治家。他的最大缺陷是不善于决断或采取坚定立场，而这在许多场合证明是对他有利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日本政治新闻中，被称为“杰出的哲”。

早在日俄战争刚结束，片山哲于京都第三高中读书时，就已成为基督教徒。他从东京帝大毕业后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他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业余开展业务，尽力使法律更接近普通人民。在那里，他以民事法律顾问的身分活动，一般每件案子收50钱。他从1920年被任命为总同盟法律顾问时，开始参加工人运动。这导致他后来于1926年参加创建社会民众党。通过该党，他开始进入政界。其后，他一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他在1936年和1937年都当选了，但在1942年落选，当时他不是东条“推荐”的候选人。这次失败的原因之一似乎是他的基督徒身分。如果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的基督徒身分因具有道德的味道而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利条件，那么在战争时期，这已成为他的一个不利条件。

总同盟中的基督教影响并不始于这两位政治领袖。其开端可追溯到1912年建立的友爱会，可以用东京帝大著名政治学教授吉野作造的学生铃木文治的一生来说明。<sup>[8]</sup> 铃木是和吉野同村的一个趋于破产的富裕家庭的儿子，他在东京帝大上学时和年长的吉野建立起密切联系。虽然铃木的家人是天主教徒，但铃木由于受吉野影响而加入了基督教新教，并很快就参加了东京唯一神教会，编辑该会有影响的强调社会问题的杂志。他在东京唯一神教会堂建立的一个工人俱乐部逐渐发展成为以促进工人互助为目标的友爱会，并以克莱·麦考利博士(传教士)、

安部矶雄、内藤濯(军队教官)和内崎作三郎(牛津大学培养的早稻田大学教授)等基督教徒为顾问。

铃木从友爱会建立时起就担任主席，直到1932年他才被自己的一个追随者也是基督教徒的松冈驹吉接替。铃木目睹了1912年作为基督教社会救济工作工具的友爱会在20年代初发展成为力量强大的好斗的日本劳动总同盟。他在劳动总同盟不断分裂时仍主持着该组织，摆脱了社会民众集团内部大多数基督教徒的影响。

社会民众派的基督教倾向使其能够至少暂时地吸引著名的贺川丰彦。<sup>[9]</sup> 贺川作为一位被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烦扰并十分同情穷人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通过在神户的贫民区传播和实践基督教义，而使自己变得高尚。他逐渐从救济贫民转为参加工会运动，但其后他继续改变信仰。贺川借助一本描述他在贫民区生活的书<sup>[10]</sup>的收益，领导和资助了1921年的川崎造船厂罢工。

然而，贺川的兴趣并不完全集中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刚刚开始形成，传播社会福音在农村起着鼓动者的作用。日本农民协会7名最重要的组织者中有3名是基督教牧师(贺川、杉山元治郎和小川涣三)，另一位是“新觉醒”的退出基督教的佃农(山上竹尾)。<sup>[11]</sup> 杉山成为农民协会主席，一直是农民运动中右翼的柱石。而贺川虽然也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徒，但却乐于开创新事业，他不久就改变方向，离开了社会民众派而向日劳派更为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贺川常常被称为“至善的投机者”，他因其著作以及去国外演讲的成功，有足够的资金能够成为这样一种人。

在发现基督教是日本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原动力后，自然会联想到佛教和神道教是否也在社会民

主运动中起着鼓动者的作用。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文献中，除把这两种宗教视为在环境中因循守旧的因素并对进步起阻碍作用外，很少注意到它们。<sup>[12]</sup> 在一些事例中，一些佛教法师的儿子由于在学校中逐渐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因而加入社会主义运动，而没有继承父业去当和尚。社会民众派中的农民分子赤松克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sup>[13]</sup> 和基督教徒相反，佛教徒很少具体提出社会政策。例如，1926年日本基督教联盟发表文章，提出自己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看法，除其他方面外，它还要求实现机会均等，结束种族歧视，禁止酒精饮料和制订最低工资法；而佛教徒极少明确阐述他们对社会运动的态度。<sup>[14]</sup>

如果基督教的影响是社会民众派同日劳派、劳农派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相区别的最突出的特点，那么强调“民主”就是它的第二大特点。吉野教授本人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说明。吉野从1910~1913年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在国外周游，他在国外的三方面经验使他信奉民主主义。<sup>[15]</sup> 首先，他在英国观察了成功地限制贵族院权力的政治斗争。其次，他在维也纳亲身参加了反对物价上涨的大规模工人示威，他从观察中得到的印象是，公共秩序并没有被摧毁，而工人却赢得国家信任。第三，1912年他在比利时目睹了总罢工的准备。他宣称那些经验使他确信人民运动能够既是强大的又是正义的。

他回到日本后开始就如何才能在日本的环境下实行民主形成自己的看法，并通过报刊杂志向日本知识界阐明他的观点。他把“民主”一词重新译作孟子最先使用过的“民本主义”，而不是“民众主义”，以避免被指控犯有“不敬罪”。<sup>[16]</sup> 他主张实行直接普选制和限制贵族院、枢密院以及军队的特权。他和福田德三教授及其他人一起，在1918年12月建立了黎明会，试图启发日本人民。吉野最热心的听众是他的一群学生，他们成立了



新人会，并且很快就采取了比他本人更左得多的立场。其中，宫崎龙介和与吉野女儿明子结婚的赤松克磨这两个人的立场较保守，他们同吉野一起建立了社会民众党。

对吉野来说，民主意味着国会中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人。由于工人和穷苦人民大众在国会中没有直接代表，吉野感到他的责任是为他们的权利而战斗，建立一个温和的议会无产政党。随着社会民众党的建立，吉野在政治上比以前消极了，特别是“满洲事变”后，1933年他去世之前，他眼见自己的主张在日益遭到攻击。而事实上，这同“民主”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社会民众派意识形态中的衰落相一致。

除了倡导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强调民主外，社会民众集团中权威人士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其遵守“合法原则”。社会民众集团意识形态中的这种倾向，也可以用铃木文治为例子来说明。

铃木在衣着和风度上更象一个职业商人，而不象一个工会领袖。他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却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干家，他渴望使其领导的组织保持温和立场并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友爱会成立时，由于受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第17条的约束，任何目的在于为提高工资而采取联合行动的组织都是非法的。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工人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法律许可的范围，这在熟练工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友爱会各支部为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开始为提高工资而斗争。但由于法律没有严格执行，而工会和协会的活动在日本的西方盟国中已逐渐被视为合法，同时铃木本人也鼓吹废除第17条，因此铃木支持这类非法活动。没有这样一种有限的勇气，友爱会未必能成为日本最优秀的工人斗士，并在1919年公开自称为友爱会大日本工人总同盟。但除此之外，铃木反对其他一切非法活动，不管是沿工团主义路线发

展的那种“直接行动”，还是布尔什维克鼓吹的那种政治活动。合法成为社会民众集团从没有动摇过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有利于维持和保护总同盟，而总同盟最终构成社会民众集团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力量的堡垒。铃木创建了友爱会，他在友爱会中倾注了全部精力。一方面，他在1919年协调会成立时抵制了官方要解散友爱会的压力；另一方面，他确实赞同加强反对激进派的活动，以维持自己在总同盟中的地位。

## 5.2 管理者：工人血统

集结在铃木文治周围并日益影响他的是他重用的人，他的下属，他们都是些尽管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升到显赫地位的工人。他们同铃木一样，强调“合法”和“工会主义”。正是他们在1925年和1926年支持铃木驱逐了总同盟的近一半成员——其中包括一些领导人。他们是管理者，也是推动总同盟和社会民众派领导——无论是单独领导还是同日劳派等其他派系共同领导——的各政党活动的中坚力量。表5.2.1列出了他们之中的最主要人物。

所有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几乎是同一代人，相差不超过十一二岁。这表明一个事实，即日本工人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迅速发展，但很快就停滞不前。这些领导人尽管很少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努力提高自己，完全能够履行诸如发表演说、写报告、决定政策等政治职责。对他们来说，工人运动是一个能够使它们最终上升到日本社会中显赫地位的阶梯。表5.2.1中所列半数以上的人都能够去国外出席国际工人会议。

表5.2.1

姓名和生卒年	教 育	职 业	附 注
土井直作1900~	小学, 日本劳动学校, 1922年; 三田英语学校, 1924年	工会干部	1917年参加友爱会后受教育, 神奈川县议会议员。
原虎一1897~	小学, 早稻田商业学校	工会干部	东京市议会议员, 出席过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
井上良二1898~	小学, 大阪工人学校, 后来在那里任教	工会干部	1928年离开社会民众派, 加入日劳派, 但1932年后同社会民众派和解。1931年是大阪市议会议员, 1937年是国会议员, 1942年落选, 出席过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
伊藤卯四郎1894~	小学	工会干部	被选为福冈县议会议员, 1937、194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金正米吉1892~ 1962	小学	工会干部	194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出席过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
松冈驹吉1888~ 1958	小学	工会干部, 最初是钢铁工人	1932年接替铃木成为总同盟主席, 1930、1932、194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出席过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
三木治郎1885~ 1963	小学	工会干部, 最初是钢铁工人	当选为川崎市议会议员, 出席过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
西尾末广1891~	小学	工会干部, 最初是钢铁工人	总同盟在关西最重要的领袖, 1928、1930、1937、1942年均是国会议员, 1932年落选, 出席过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
大矢省三1893~ 1962	大阪西野田业余商业学校	工会干部	1929年同西尾不和, 退出总同盟和社会民众党; 1930年是全国民众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 1932年是全国劳农大众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 1932年转向国家社会主义, 但1934年又重新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米洼满亮1888~ 1951	东京海运高等学校	船长; 海员 工会干部	写过以海员生活为内容的流行小说; 1937年是国会议员, 1928、1930、1942年落选; 出席过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

社会民众派就这样以有大量出身工人阶级的人而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派系相区别。只有共产党人或倾向共产党的团体才明显具有同样的特点。从事实看，从工人运动中上升到领袖地位的那些工人，似乎不是倾向于很激进，就是倾向于很保守，常常从左翼转变为右翼，但至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很少有从右翼转变为左翼的。当时，激进派参加了评议会及其后继组织，而保守派则参加了社会民众集团。

松冈驹吉和西尾末广这两个品格和能力都极其不同的人是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那些擅长管理和组织并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社会民众集团领导人的气质和能力。松冈17岁开始在北海道室兰的钢铁厂工作。<sup>[17]</sup> 同样，西尾小学刚毕业就去工作，开始在一家小工厂，后来在住友钢铁厂。<sup>[18]</sup> 他们都是在1915年开始和友爱会有联系，松冈立刻就加入了友爱会，但西尾很怀疑友爱会那些远在东京的知识分子领袖，因而直到1919年才加入。

松冈年轻时是温和派，后半生被誉为是位“真正的绅士”。他早在1912年在室兰第一次试图领导一场工人斗争时就设法避免被捕。相反，西尾却暴躁和直率，以缺乏典雅著称，在社会民众派之外一般都讨厌和害怕他。西尾领导的罢工更富于战斗性，他在警察干涉劳资纠纷比通常相对要少的1921年被捕。他当时已快要成为一名共产党人，但在1923年地震时期的“白色恐怖”后，又很快改变立场，转而在总同盟中的保守分子站在一起。1925年，他在企业主合作下，建立起钢铁工人联合会，他能这样做是由于，他使那些公司经理们确信，有一个西尾将要建立的那种工会，比完全没有工会对公司经理更有好处。<sup>[19]</sup> 西尾在1928年男性公民有选举权的首次大选中，作为社会民众党候选人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据说他那时已经秘密接受小林裙

建筑公司的金钱，并许诺将来给予报答。<sup>[20]</sup>

这两个人都没有因其所信奉的宗教而得到特别的声誉。松冈由于受基督教家庭传统的影响而学习英文，在17岁他还在舞鹤工作时，就成为一名基督徒。<sup>[21]</sup>但和安部不同，他的基督徒身分并不是广为人知，特别是在30年代。<sup>[22]</sup>另一方面，西尾则继承其家庭的宗教信仰成为流行的佛教真言派教徒。

这两个人性格不同。西尾的更为暴躁的性格在国会议员选举时帮助他获得了更多的选票，但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例如，1938年他因在演讲中要求由一个“象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大林那样强有力的人”担任首相而被驱逐出国会。从该事件中可以看出，西尾没有很明确的政治信仰。尽管如此，他仍被认为比松冈更是一个理论家。他们两人的不同基本上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他们两人轮流参加间隔一段时间在日内瓦召开一次的国际工人会议，先是作为顾问，后来是作为正式工人代表。两个人在总同盟中都兼任书记和司库两个职务，松冈在关东地区，西尾在关西地区。他们作为司库掌管着经费，因而有很大的权力，而这，如我们将要说明的，促进了日劳派的诞生。

尽管据说这两人之间有竞争，但他们却团结一致地维持其权力基础总同盟不受损害。1932年铃木升任顾问这种荣誉职位时，接替铃木任总同盟主席的是松冈。但在1940年试图反对解散总同盟，和将一切政党并入政府发起成立的以纳粹全国阵线为模式而称为产业报国会的斗争中，松冈和西尾以及整个社会民众派却表现出团结一致。<sup>[23]</sup>他们为此而被当时在社会大众党中占统治地位的，同军方和官僚有紧密联系并能从“新体制”中得到更多好处的日劳派从社会大众党中驱逐。然而，松冈和西尾以及社会民众集团中几乎所有的管理者，仍旧能够在1940年

的大政翼赞会或1942年的翼赞政治会中,为他们自己找到位置。这个从工人队伍中提升起来的领袖集团是社会民众派的中坚力量。由于在领导者内部实际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上,权威人士越来越成为挂名首脑。这种趋势因大学毕业生的逐渐叛离而加强。大学毕业生是我们分析的下一个对象。

### 5.3 鼓动家:大学毕业生

那些擅长宣传或鼓动并因参加学生运动而导致决心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学毕业生可以排列如表5.3.1。

同管理者中的那些人年龄相差十一二岁相对照,这个表显示的年龄差距只有大约五岁。同年龄更大的权威人士相比较,受过大学教育的鼓动家和工人出身的管理者的年龄基本相差不多。这些大学毕业生怎样参加工人运动将在第6章中讨论。

这里说明一下工人领袖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将是有益的。劳动农民党和总同盟中的那些工人阶级领袖和年轻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对抗和竞争的,这使他们分裂成社会民众派领导集团和日劳派领导集团。但是工人领袖被谴责同知识分子对抗时,却能够指出他们支持真正的东京帝大毕业生铃木。他们相信铃木已经证明自己献身于帮助不幸者,但是他们不信任那些年轻知识分子,他们认为那些人受浪漫主义和冒险主义影响太大。<sup>[24]</sup>

考虑到社会民众集团成立时同其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中,一直是其忠实成员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似乎证明上述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如表5.3.1所示,在整个15年时间内,8人中只有3人一直留在社会民众集团内。吉野杰出的年轻学生、女婿赤松,在吉野教授死后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而转向国家社会主义和

表5.3.1

姓名和生卒年	教 育	职 业	附 注
赤松克磨1894 ~1955	东京大学	记者	最初是共产主义者，在1932年和岛中一起退出社会民众集团；1928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1937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42年落选。
原彪(彪之助) 1894~	东京大学	法政大学 教授	吉野和安部的学生，既教学又参加政治活动，194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龟井贯一郎 1892~	东京大学，福 特海姆大学， 1920年在哥伦 比亚大学	大学讲师， 外交官 (参加无 产阶级运 动的第一个外交官 员)	他最初在纽约和天津的领事馆等外交部门工作。作为一个后来者，他1928年辞去在庆应大学的教学工作进入政界，此后成为麻生久的亲密朋友，1928、1932、1937年是国会议员，1930、1942年落选。
小池四郎1892 ~1946	东京大学	工程师，1923 年是矿山负 责人，作家， 创建出版公 司，建立职 工组织	1928、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1932年当选国会议员，1932年随赤松退出社会民众集团转向国家社会主义。其后，1936年是国会议员，1937、1942年落选。
松永义雄1891 ~1955	东京大学	律师，作 家，农会 干部	一直忠于社会民众集团，东京市议会议员，1937年是国会议员，1930、1932、1942年落选。
宫崎龙介1892~	东京大学	律师，中 国问题专 家	1928年被驱逐，努力实现1932年的合并，1939年退出社会民众集团参加东方会。1928、1930、194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野沟胜1893~	盛冈农业高等 学校，法政大 学	政治家， 兽医	1930年转向日劳派，日本农民协会会员。1937年是国会议员。
佐竹晴记1896~	中央大学	律师	一直同社会民众集团在一起，1936、1937年是国会议员，1930、1942年落选。

“科学日本主义”，他的同道是重要刊物《中央公论》社长岛中雄

三，也同赤松站在一起。据说在学生运动中同赤松象孪生兄弟一样的宫崎，转向了左翼，被从社会民众集团中驱逐，然而宫崎随后又转向右翼。稍后，野沟转而同日劳派结盟，而龟井由于同麻生久的友谊也这样做了。马场恒吾在30年代脱离政治，保持了他作为一个自由记者的声誉。这些人的改变信仰以及权威人士中那些年龄较大的人的去世——堀江1927年去世，吉野1933年去世——使那些我们称为工人阶级出身的管理者趋向于成为社会民众集团的最主要代表。

在本章对社会民众集团的分析中，也涉及到该集团在意识形态及其所起的作用和风格上的特点。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总同盟内长久的私人关系使该集团团结在一起。该集团思想意识的各个方面是以权威人士中的那些领袖的活动来说明：基督教影响以安部、吉野、片山和其他人为例；社会主义影响以安部为例；民主主义以吉野为例；合法主义和工联主义，以铃木及其出身工人阶级的那些门徒，特别是松冈和西尾为例。

该集团各派为其自己的成员提供了体面的地位（同教授交往）、荣誉（作为政府指定的工人代表去国外旅行）和政治声望（被选进帝国议会）。从整个工人运动来看，该集团的作用是提供了工人队伍中更稳定阶层所希望的那种很温和或很保守的领袖，同时也对工人运动内部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激进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障碍。首先是，在政府当局和私营企业领导人眼中赢得“尊敬”。因此它能够在工人运动内部抵制诸如国家社会主义等右翼或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但是当那些“可敬”的日本政治家们赞同日本在国外走向军事冒险主义或在国内走向极权主义的趋势时，它就不能对此进行抵制了。该集团在命运攸关的1940年勉强遵照政府的要求解散了它领导的独立政党和主要工会。



## 注 释

[1] 这些团体、集团和派别的具体成员主要是根据研究1927~1939年间各无产政党在县级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中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而排定的。有关这方面的最可信的材料是南贺写的《先驱者系谱：社会党前史》。该书描述了1925~1945年间的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每章写一年或两年。尽管如此，但是我仍向实际参加者或学者核对了姓名。在此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河上民雄教授（河上丈太郎的儿子，一直同日劳派保持联系），他告诉我，区分那些参加者是哪派成员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是，观察他们出席谁的葬礼，因为每个人一般都要出席本派系的葬礼。

[2] 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以及下面有关领导成员的名单主要来自下述资料：(1)阿部真之助：《现代日本名人录》（东京，川手书屋，1953年）；(2)荒垣秀雄：《战后名人录》（东京，八云书店，1949年）；(3)伊夫林·S·科尔伯特：《日本政治中的左翼》附录A，（纽约，太平洋国家研究院，1952年）；(4)服部之总：《现代日本名人辞典》（东京，自由国民社，1952年）；(5)每日出版社编：《日本名人辞典》（东京，每日出版社，1952年）；(6)明贺房吉：《日本政党的现状》（东京，日本评论社，1929年）；(7)利报道社编：《无产政党的历史和现状》（东京，利报道社，1929年）；(8)思想科学研究所编：《改变信仰：整体研究》（共3卷，东京，新闻社，1959~1962年）；(9)本书作者的私人采访。

[3] 东京大学以前名为东京帝国大学。战后，所有政府办的大学的名称中，都删去了“帝国”两个字。

[4] 关于安部的材料来自：在1953年春采访安部的遗孀驹雄和他的女儿大井上夫人；安部的自传《我怎样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东京，1932年；民全社于1947年重印该书）；片山哲：《安部矶雄传》（东京，每日新闻社，

1958年);以及一些权威的参考资料。

[5]虽然确实可以说,安部在他的基本信仰方面没有动摇过,但必须认识到,这种信仰是乌托邦式的,非常含混不清。他所开列的塑造其思想的下列书籍表明了这一点: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汤姆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西尔·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见镗田研一:《第三个太阳: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第1部(东京,社会思潮编辑局,1948年),第18~19页。

[6]荒畑胜三:《左翼的面孔:传记文集》(东京,早川书屋,1951年),第16页。另见西里尔·H·波尔斯:《安部矶雄与基督徒在创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1895~1905年》,《日本论文集》(哈佛大学),第1卷(1961年6月),第89~129页。

[7]有关片山的概述是根据:荒垣的书中有片山的章节,第46~54页;权威参考资料;私人谈话。

[8]吉野和铃木关系的细节主要取自铃木的自传,其题目是《工人运动20年》;参阅吉野作造写的该书序言,第12~13页。

[9]贺川在他的小说《越过死亡线》中,描写了他年轻时在神户贫民区的生活。该书由I·福本和T·萨切尔译成英文,题目是《黎明之前》(纽约,乔治·多兰公司,1924年)。一本有些小说化的传记,是浅野晃写的《拯救:贺川丰彦的传记小说》(东京,东耕书屋,1952年)。一本学术性更强的著作,是横山春一写的《贺川丰彦传》(东京,新易书屋,1950年);它包括贺川丰彦的传略和生平的编年表。在英文著作方面,有威廉·阿克西林写的传记:《贺川》(第17版,纽约,哈珀和布罗斯公司,1946年)。贺川较短的英文传略包括有:玛格丽特·鲍曼:《贺川,日本的一位改革家》(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36年);肯尼思·J·桑德尔:《亚洲向何处去?3位领导人(甘地、胡适和贺川)传略》(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33年);海伦·托平:《介绍贺川》(芝加哥,威利特·克拉克公司,1935年);维克托·马里奥特:《贺川及其合作者》(小册子,芝加哥,1935年)。

[10]这是前面注释中提到的《越过死亡线》。

[11]其他3名是，专报道农业管理的记者古濑传藏、同贺川一起参加川崎造船厂罢工的行政长藏以及工人领袖岩内善作，参阅森户辰男：《日本的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东京，牛郎书屋，1950年），第62~63页。森户本人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者，根据他的材料，基督教的影响非常大，以致一些地主告诉农民，如果他们参加农会就成为基督徒，从而背叛他们的祖先，以此进行反对农会的宣传。同书第63页。

[12]参阅高津正道：《无产阶级与宗教》（东京，大保阁书屋，1929年），丰田剑陵：《佛教与社会主义》（东京，茂川书店，1924年）。笔者在《日本和缅甸的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2卷（1960年4月），第293~304页，一文中对这一点进一步详细讨论。

[13]赤松的父亲和伯父是佛教僧侣，他的哥哥在国立大学教授佛学。但是赤松的弟弟五百磨和妹妹常子都参加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4]三浦三玄洞：《左翼阵线与佛教》（东京，大保阁书屋，1933年），第22页。该书是一个年轻的僧侣写的，他试图使佛教仿效基督教，对社会问题采取积极态度。基督教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但在这里，情况正相反，是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了佛教（至少三浦所描述的情况是如此）。已经指出过，农民运动中的一些领袖是基督教牧师。三浦展示出佛教徒对佃农同地主间的斗争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尚完全站在斗争之外，保持中立或鼓吹调和。和尚在解决纠纷中从没有成为地方上的领袖。同书，第一章。然而，三浦本人却推动一些以前被称为不可接触的少数民（秽多）的“特殊部落民”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15]吉野作造：《鼓吹民本主义时代的回顾》，《社会科学》第4卷（1928年），第134页。另见吉野的文章《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中央公论》第29卷（1914年春），该文是以那三方面的经验为基础。关于吉野的生平传略，见学生书屋编辑部编：《战斗者》（东京，学生书屋，1948年），铃木东民写的关于吉野作造的那一章；赤松克磨编：《回忆已故吉野博士》

(东京,《中央公论》社,1934年)。一本全传是田中惣五郎的《吉野作造》(东京,1958年)。在英文著作方面,见笔者的《战前日本的民主》;伯纳德·S·西尔伯曼:《吉野作造的政治理论和纲领》,《现代史杂志》第31卷(1959年12月),第310~324页;沃尔特·斯科特·佩里:《吉野作造(1873~1933年):日本民主思想的倡导者》(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56年;大学微缩胶卷第17,734号)。

[16]吉野:《民本主义》,第127页。关于当时如何翻译“民主”一词的探讨,见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东京,川田书屋,1952年),第1372~1373页。

[17]有关松冈的材料得自笔者的私人采访以及一些最权威的参考资料,特别是荒垣书中有关松冈的那一章(第123~130页)。

[18]同上书,有关西尾的章节,第70~78页。一些材料也得自西尾的自传,该书是《同大众在一起:回忆我的前半生》(东京,世界社,1951年)。

[19]同上书,第304~307页。

[20]荒畑:《左翼的面孔》,第149~150页。

[21]来自作者同松冈的会见。

[22]来自作者对大宅壮一的采访。大宅壮一是一位政治人物评论家,以前参加过某些社会运动。在采访时,大宅正在写一本书,该书后来以《真相与假象:影响日本的人》为题出版,(东京,东西读买社,1953年)。

[23]产业报国会,简称为产报。关于它的说明以及以同情的态度将它同纳粹工人阵线进行比较,见森户辰男:《德国工人阵线与产业报国运动:关于其基本特点与职能的考察》(东京,改造社,1941年)。

[24]来自笔者1953年春季对松冈的采访。

## 第6章 日 劳 派

### 领导集团的同一性 学生运动背景

同社会民众集团相反，日劳集团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因具有参加学生运动经验而导致献身于新觉醒的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这里应理解为是指大学毕业生和那些在毕业之前就被开除或自愿退学的人）所组成。然而更具体地分析，该集团是由两个派别合并而成：（1）（同社会民众集团中“鼓动家”同种类型的）一部分总同盟领导人；（2）希望象总同盟领导人已经做的那样，因劳动农民党日益倾向激进而脱离劳动农民党的一部分日本农民协会领导人。

正是劳动农民党推行的“开门”政策使总同盟最终确信，应退出并考虑建立自己的党。在1926年11月20日召开筹建社会民众党的第一次会议时，一切显然都在顺利进行。但是两天后，总同盟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在麻生久的怂恿下，和一些日本农民协会右翼领导人秘密会晤，讨论是否再另建立一个新的党。双方在肯定应这样做的基础上，次日匆忙召开正式的筹建会议，从而导致在社会民众派组成4天后的12月9日建立起日本劳农党。

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对那些作为日本劳农党发

起人签名的领导人——其中也包括一些总同盟的中央委员——十分愤怒，要求他们辞职。这些人拒绝辞职，因而被总同盟驱逐。继而，这些人影响下的工会也随其领导人一起退出总同盟。作为日本劳农党的基础而建立的一个新组织名为日本工会同盟，它号称拥有12,000名会员（尽管它实际可能只有5,000或6,000会员）。〔1〕

分析建立这个新的党的原因，有助于说明日劳派和社会民众派的不同特点。诸如松冈和西尾这些出身于普通百姓的工人领袖在总同盟内部时常想把那些从大学毕业的领导人排挤出实权地位，从而引起工人领袖和年轻知识分子之间出现摩擦和相互不满。〔2〕

在具有大学学历的人中无疑是主要人物的麻生久的活动，是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好例子。麻生久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后，建立了矿工联合会，其成员又落后又穷困，它在向总同盟交纳会费方面总是远远落在后面。该联合会是分散活动，不得不依赖总同盟的财政支持。工人出身的松冈作为书记和司库掌管着经费，他利用矿工联合会的财政困难，嘲笑受过大学教育的麻生久和其他知识分子。

认识到工会和舆论因不满当时在总同盟领导人中居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而可能向左转，因而需要能代表工会和舆论的领导人，从而使出身工人的保守派集团和倾向于更激进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摩擦加剧。农民协会中诸如杉山元治郎等持较温和立场的领袖，对此认识更清楚。他们眼见其所领导的组织给予劳动农民党强有力的支持，而劳农党内混杂了倾向于共产党的评议会会员。同时，农民协会领导人对社会民众党筹建委员会中容许总同盟领导人居于统治地位并不感到高兴。特别是在关于劳动农民党中的共产党人的问题上，总同盟和农民协会相互谴

责，彼此都十分愤怒。正是这种局势导致总同盟中的抱有不满情绪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农民协会领导人秘密谈判，建立日本劳农党。

同社会民众派的基督教徒、民主社会主义的折衷主义以及劳动农民党内那些喧叫的领导人比较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相比，日劳派1926年是处于社会民众党和劳动农民党之间的“中间派”，它以修正马克思主义概念为特征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立场。假如社会民众派的立场可以被认为是反映了他们对英国工党的主张的仰慕，那么日劳派的意识形态则表现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分子的赞美。在20年代，马克思的名字确实有号召力，日劳派领袖试图利用这一点。但是，随着20年代的消逝，马克思主义的魔力开始减退，特别是在1931年“满洲事变”后，日劳派明显减弱了他们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这为他们1932年在社会大众党中和老伙伴社会民众派重新结盟，为最终否定“社会主义”打开了道路。

这一时期，日劳派领袖的作用已起变化。最初，它似乎比社会民众派领袖更机敏地表达出群众对当时环境的不满。更精确地说，它代表的一些工会属于对当局和总同盟中保守派的控制不满，而这种不满尚未达到使他们追随更激进的领导人的程度——追随激进的领导人可能会招致政府的镇压。1932年后两派重新联合为一个党时，它们共同代表了不满现状的非共产主义和非法西斯主义力量。在该党中，这两派很少替那些不满者说话，而是注重于将其纳入非激进的轨道。但是，1937年后，两派再次出现摩擦。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日劳派越来越代表那种试图在极权制国家中寻求生路的力量，而社会民众派则继续代表一些不满意极权倾向的潜在势力。

如果社会民众派的一般风格是谨慎小心，那么日劳派的风

格则相反，是富有战斗性。社会民众派领袖在总同盟中拥有稳定的支持者，而日劳派的支持者却多种多样，部分由工人队伍组成，部分由农民队伍组成。由于这些支持力量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因而对日劳派来说，从工人和农民运动之外的其他方面寻找力量来源，日益变得迫切。

日劳派领袖发现他们的运动仅依靠比例很小的工业人口不可能改变日本社会，同时他们看到军方也不满意资本主义并寻求在日本实现理想社会，因而开始主动接近军方。但是日劳派领袖发现，他们增进同军方以及诸如皇道会等亲军方的团体的关系，受到支持现状并担心军方的冒险主义的社会民众派领袖的阻挠。因此，日劳派在1939年领导那些受其控制的工会退出旧的总同盟(1936年他们并入总同盟)，1940年又利用国会的斋藤隆夫事件从社会大众党中驱逐了重要的社会民众派领导人，以率先解散为各大政党作出榜样，日劳派的极权主义倾向从而发展到顶点。

## 6.1 领导集团的同一性

日劳派在构成上的最显著特点，是其成员学历基本相同。表6.1.1列出了该派的高级领导人，除3人外都受过大学教育。

日劳集团在学历和年龄方面同社会民众集团中的鼓动家相似。表6.1.1列出的21人中，虽然只有1人在国外学习过，但只有3人不是大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比社会民众集团中工人出身的管理者小几岁。但是没有挂名领袖或权威人士主持日劳集团。麻生久在去世前一直是该集团公认的领袖，1926年他只有35岁，而当时该集团的平均年龄也是35岁。职业范围也显示出日劳集团的知识分子特色，他们大都在大学教书或在报社工作，



表6.1.1

姓名和生卒年	教育(学生组织)	职业	附注
浅沼稻次郎 1897~1960	早稻田大学 (建设者同盟)	政治家, 农民领袖	最初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农民协会书记,在党的组织部工作,东京市议会议员。1928、1930、193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1936、1937年当选国会议员,参加大政翼赞会。
麻生久 1891~1940	东京大学 (新人会)	新闻记者, 作家,工会 领袖	日劳派领导人,领导过工人斗争,后来支持军方和战争。1928、1930、193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1936、1937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参加大政翼赞会和翼赞政治会。
细野三千雄 1897~1955	东京大学 (新人会)	律师, 翻译家, 作家	农民活动家,日劳派拥护者中几个翻译马克思著作的人之一。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加藤勘十 1892~	日本大学	工会领袖	1932年脱离日劳派,最终在1937年和劳农派领袖一起建立日本无产党。1928、1930、193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1936、1937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加藤肇造 1899~	中学	农民协会 干部	1931、1935年是岐阜县议会议员,1937年是国会议员,1942年落选。
河上丈太郎 1889~1965	东京大学	关西大学、 明治大学 和立教大 学教授, 律师	基督徒,森户辰男的亲密朋友,永江一夫的内兄。1928、1936、1937、1942年是国会议员,1930、1932年落选。参加大政翼赞会和翼赞政治会。

续表6.1.1

姓名和生卒年	教育(学生组织)	职业	附注
川俣清音 1899~	早稻田大学 (建设者同盟)	农民领袖, 作家	事实上, 农民协会领导人, 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1936、1937、1942年是国会议员, 参加大政翼赞会。战争期间是一个部委员会成员。
菊川忠雄 1901~1954	东京大学 (新人会)	工会领袖, 作家	写过关于学生运动的书, 1931年是日本工人俱乐部创始人之一。
河野密 1897~	东京大学 (新人会)	记者, 教授, 工会领袖, 作家	翻译过马克思主义著作, 积极创立政府支持的工人阵线, 出席过国际劳工组织会议。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1936、1937、1942年是国会议员。参加大政翼赞会和翼赞政治会。
松本淳三 1894~1946	庆应大学	作家	鼓动家, 东京县议会议员。
三轮寿壮 1894~1956	东京大学 (新人会)	律师	翻译过马克思主义著作, 劳动农民党第一任总书记, 支持工人阵线, 1937年是国会议员, 参加大政翼赞会。
三宅正一 1900~	早稻田大学 (建设者同盟)	农民领袖, 作家	农民协会领袖, 193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1936、1937、1942年是国会议员。参加大政翼赞会, 战争期间是一个部的委员。
望月源治 1902~	小学, 后来 进工人学校	工会领袖, 领导罢工人	1926年是日本工会同盟的组织者, 1932年他转向国家社会主义。
永江一夫 1902~	关西大学	地方工人领袖, 政治家	河上丈太郎的学生和内弟, 神户市议会议员。1937年是国会议员, 1942年落选。参加大政翼赞会。
野沟胜 1898~	青森农业学校, 法政大学	政治家, 农民领袖, 作家	1930年从社会民众派转为日劳派, 1937年是国会议员(社会大众党)。支持皇道会。

续表6.1.1

姓名和生卒年	教育(学生组织)	职业	附注
杉山元治郎 1885~1964	大阪农业学校, 东北神学院	农技师, 基督徒部 长, 牙科 医生, 农 民领袖	农民协会创始人, 1928、 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 人。1936、1937、1942年 (被东条推荐)是国会议 员。参加翼赞政治会。
须永好 1894~1946	大分中学 肄业离校	农民领袖	日本农民协会和全国农民 协会的领导人, 在1925年 建立了日本第一个无产者 村。1928、1930、1936、 194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 人, 1937年当选国会议员。
田所辉明 1900~1934	早稻田大学 肄业离校 (建设者同盟)	作家, 工 人领袖	最初是共产主义者, 在理 论上接近劳农派。后来, 特别是同军方最初接触 时, 是麻生久的得力助手。
田原春次 1900~	早稻田大学, 密苏里大学, 丹佛大学	新闻记者	日劳派中的后来者, 战争 期间为海军研究东南亚移 民问题, 1936、1937年是 国会议员, 1942年落选。 作为一个“特殊部落民”, 他参加了全国水平社。
棚桥小虎 1889~	东京大学	律师, 1918 ~ 1919年大 罢工的工 会领袖	友爱会领导人, 领导日本 工会同盟, 1930、1937年 是国会议员候选人。
山名义鹤 1891~	东京大学 (新人会)	作家	最初在内务省工作, 后来 在大原社会研究所。他出 身贵族, 但他的爵位被政 府取消。 1932年他同赤松一起转 向国家社会主义。

多数人是为报纸或杂志写文章, 但由于他们忙于在工人、农民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作, 以致没有空余时间, 因而很少有人认

真从事研究或翻译。

表6.1.1“职业”栏中也许暗含了那些为无产阶级运动作出最重要的自我牺牲的人们——他们长期献身于各自的辛苦单调的专业工作。他们中约 $\frac{1}{3}$ 的人专门搞工人运动， $\frac{1}{3}$ 搞农民运动， $\frac{1}{3}$ 从事新闻工作。从事法律工作的只有2人。河上在1927年放弃大学的职位，全力以赴投入无产阶级运动。在细读表中的附注时——附注中仅指出后来受环境变化所被迫出现的右倾倾向——必须牢牢记住上述这些积极方面，特别是由于他们在激进活动中曾如此活跃。

只有2人是以基督徒而闻名，如果我们把贺川也算进去，就是3人。贺川尽管于1926年在组织上加入了社会民众党，但在其后一段时间内仍被认为是更接近日劳派而不是社会民众派。基督教在社会民众派中受到尊重，甚至在不信奉而只是容忍基督教的年轻的日劳派成员中也受到尊重。<sup>[3]</sup>

日劳派内，尽管在哲学倾向上有某些分歧，但私人间的纽带是强有力的。麻生久不只一次自称为是属于把“封建”的个人服从视为十分重要的人。他有这种看法和他童年时生活在九州有关，九州是日本在恪守个人忠诚方面最封建的一个地区。<sup>[4]</sup>在该派内部，一般认为，同在个人的看法方面退让妥协相比，危害集团的团结更应受到谴责。<sup>[5]</sup>因此，如从表中能够看到的，21个成员中，有2人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但只有加藤1人转向左翼，而这也主要是由于同麻生久的误会所造成的。<sup>[6]</sup>

日劳派部分由于其内部关系紧密这个特点，大多数成员都能于1940年所有政党解散后，在大政翼赞会中谋到职位，随之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例如，河上是大政翼赞会总委员会成员，这使他置身于那些最有权威者的行列。此外，他还是管制物价政策委员会和中央物价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河野密是大政

翼赞会的政治事务研究所的所长，三轮寿壮是组织局联络部长。<sup>[7]</sup>这些人在20年前都是学生运动中的激进青年，这时，他们在帮助推动解散一切政党，包括他们自己建立的政党在内，却在最高战时委员会中同他们以前的大学保守派同学坐在一起。

## 6.2 学生运动背景

日劳派主要产生于学生运动。其成员中几乎 $\frac{2}{3}$ 的人年轻时参加过新人会或建设者同盟。新人会和建设者同盟是日本社会运动主流的重要来源。1918年在东京帝大成立的新人会，把年轻人推进工人运动，而几乎同时在早稻田大学成立的建设者同盟，则把年轻人引向农民运动。这种社会意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因素造成的：基督徒强调人类尊严以及其兴趣在于社会工作；战争中“民主的胜利”导致民主盛行；先前友爱会的存在；强调工农作用的俄国革命；日本1918年的“米骚动”；主要大学修改课程使学习、思想和活动有更大自由。

新人会的奠基者之一麻生久，并不是在上大学时，而是在1911年幸德秋水大逆事件时，首次对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兴趣，当时他正在京都的第三高中（日本两个最好的高中之一，另一个是东京的第一高中）读书。<sup>[8]</sup>1914年他进入东京帝大后，邀集了第三高中和第一高中的毕业生组织了星期讨论会俱乐部，讨论的题目逐渐地越来越带有政治性，他们的态度也日益认真。战争在继续，商业逐渐繁荣，工人违犯对他们来说已是声名狼藉的1900年《治安警察法》第17条，正在组织起来和进行罢工。

就在麻生久和他的同学们毕业时，世界被俄国二月革命所震动，几个月后又因俄国十月革命而受到更强烈的震动。麻生久对这些事件感触很深，以致他以《从彼得到列宁》为题，写了

很长一篇报纸连载文章，<sup>[9]</sup> 试图驳斥那些认为俄国革命将因违反人性而短命的流行看法。他预言，由于革命造成的变化同彼得大帝的改革一样，是俄国的现实所造成的，并且和俄国的民族精神相一致，因而它们将长久存在。麻生久的讨论会俱乐部自称为“水曜会”，存在约一年。那些来参加讨论和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中，有山名和棚桥，甚至还包括了野坂参三。麻生久不精通外语，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书籍都是外文的，他必须同英语、德语和法语作斗争，或是依靠他的那些外语更好的朋友们。然而，麻生久是该组织的核心。1918年，渔村主妇们的反抗行动引起了“米骚动”，当暴动蔓延到东京后，麻生久带领他的团体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最后以在上野公园的骚乱而结束。麻生久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如果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党领导，将能够把人民对现实的愤怒转变成一场列宁那样的革命。

3个月后，麻生久同吉野教授、福田教授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建立黎明会，以唤醒日本人民和使人民为战后时代作好准备。吉野教授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浪人会的4名成员就“民主”是不是一个危险的原则而展开的激烈辩论，象一件体育新闻一样，把学生听众的情绪激发起来。当时，一个年轻的学生河野密，在辩论会后确信应献身于群众事业。<sup>[10]</sup> 有同样思想的包括著名的赤松和宫崎在内的其他学生，则去征求麻生久的意见。在吉野教授倡议下，他们和“水曜会”在1918年11月共同建立新人会。其纲领包括两点：(1)我们将使自己同当代世界文化中正在兴起的、为解放人类和促进人类进步的新运动相一致；(2)我们将参加该运动以便合理改革当代日本。<sup>[11]</sup> 这个模糊的纲领只是表达了学生们那种尽管热烈但却是天真的愿望，他们盼望参加建设似乎已在世界上露出曙光的新世纪。

用东京帝大新人会机关刊物《民主》的话说，该组织的出现就象“在晴朗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闪电”那样令人惊奇。<sup>[12]</sup>东京帝大是日本有名的最高学府，保守官僚的首脑们创建这所大学是要为其本集团培养接班人。在帝大的学生中，可以发现一些主要家族的子弟。帝大中出现激进活动可以部分归因于该校学费低而录取标准很高。这样，穷人家庭的有天才的子弟也能够去那里读书，他们常常尖锐地感觉到不公平的富有和贫穷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生们参加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自己选择的，而不是受条件所迫。他们牺牲了好的职业，在某些情况下还因献身于工人运动而被家庭驱逐，但同样是参加工人运动，对一些工人——例如，社会民众派中的一些工人——来说，则是通往显赫和权威的阶梯。<sup>[13]</sup>

30年代麻生久在日本各地旅行发表政治演说时常常指出，当他在帝大读高年级时，县警察首脑当时还只是个一年级新生，或是指出县首脑和他同在东京帝大读书时的成绩比他差。麻生久以这种方式使人理解他是放弃可以升到更高地位的显赫职业而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这能使他的听众加深印象，因为日本人非常尊敬大学和职位。毕业于同一大学的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之间的同学感很强烈。政府官员是日劳派领袖的高年级或低年级同学，这个事实意味着日劳派在战时体制中比较容易找到位置。<sup>[14]</sup>

然而，当时新人会成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学生组织。它已成为一个能够把学生、工人、激进知识分子和老的社会主义者聚集在一起的团体。实际上，“民主运动”当时是指为争取普选权，特别是为把投票权扩大到劳动阶级中而进行的鼓动。要求选举权的工人们参加新人会的群众大会，他们从

学生们的演讲中感觉到，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首先建立工会。从1919年在东京成立新人赛璐珞工会起，学生们帮助工人建立组织，提出要求和组织罢工。

工人和学生只有在新近迅速走向工业化的经济落后的国家中相遇，才能使双方都受到激励，使每一方都开创一个新世界。身穿藏青色制服的学生们公开宣称他们在强有力但却肮脏的工人中“发现了新的恋人”。<sup>[15]</sup> 他们有意模仿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学生，以“到人民中去”作为行动口号。<sup>[16]</sup> 在群众大会、工人斗争以及警察搜捕学生出版物这种环境中，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领袖诞生了。

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那些受过大学教育能够担任工会领导的年轻人，因为没有经验没有文化的工人自己不能够组织工会。建立工会意味着要提出能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要求和参加同企业主的斗争。但它也需要人们具有自我牺牲的勇气。一次同企业主的斗争或罢工常常意味着一场骚乱，因为企业主为使警察能够逮捕工人及其领袖常常雇佣恶棍或极端民族主义者行使暴力。例如，1919年麻生久在九州的日立煤矿组织工人时，他和他的助手就被逮捕并服刑关押。

同以东京帝大为中心，主要搞工人运动的新人会并行的建设者同盟，是在早稻田大学中发展起来的，它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农民运动。北泽新次郎教授和大山郁夫教授在建设者同盟中所起的作用同吉野教授和福田教授在新人会中所起的作用类似。早稻田大学虽然不是国立大学，但它是由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大隈重信建立，并且是培养出布满国会中各大政党的保守政治家们的学校。建设者同盟的纲领是，“建立一个新的更合理的社会”。它很快就成功地接管了该大学的讲演社，开始击败所有不支持社会主义的讲演俱乐部。<sup>[17]</sup> 事实上，由于该大学



公开演讲中的竞争非常激烈，那些属于建设者同盟的人被冠以“喧叫的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贬意的称呼。<sup>[18]</sup>

建设者同盟和新人会不同，它从其他大学吸收成员，其中一人是拓植大学的奇妙人物之一平野力三，它后来也从早稻田大学本身吸收新成员。平野从没有长时间地附属日劳派或社会民众派，他有时领导自己的农民政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有足够的金钱，其内部在重要问题上是按一些领导集团的愿望而不是按某个人的愿望统一立场。

在建设者同盟的那些“喧叫的社会主义者”中，一个典型人物就是浅沼稻次郎，他早年在农民运动中经常和平野在一起。<sup>[19]</sup>浅沼于1923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次年参加了日本农民协会。但是他的兴趣并不完全在佃农事务，他还自愿帮助麻生久及其同僚田所辉明在足尾铜矿领导工人斗争。虽然片山哲作为浅沼的律师竭尽了全力，但浅沼仍因参加那次矿工斗争而被判处监禁5个月。

在无产政党千变万化的分裂和合并的整个历史中，浅沼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政党管理人才出现在主要无产政党干部中。他是1925年12月夭折了的农民劳动党的总书记，从那时起他一直是无产政党的干部。而从1933年东京市议会选举开始，他又成为政府官员，当时他被选为副议长。1936年他升为帝国会议员，其后直到他去世前，除1942年的所谓东条选举外，他每次都重新当选为议员。

浅沼虽然嗓音粗哑，身躯庞大笨重，态度生硬，服装粗俗，但即使是和他对立的那些保守派领导人，对他似乎也特别有好感。他善于与人相处，因而，在党内争吵中，他多半是一个调和者，而不是支持某一方。他把制订政策和纯洁意识形态立场的工作留给其他人去做。这使他以“好好先生”而闻名（他的最

大的名声是在战后日本赢得的，特别是由于他1960年10月12日作为日本社会民主党主席发表讲话时戏剧般地意外惨死。血迹斑斑的讲台被电视摄影机记录下来并立刻传遍全世界。据认为，他在北京发表“美帝国主义”是日本和中国的共同敌人的《声明》是导致他被刺的决定因素。浅沼虽然发表了那个措词强硬的《声明》，但全面考察他35年的经历，可以看出，在社会民主运动内部，浅沼通常是采取温和立场的)。

日劳派中的农民运动活动家并不只是出自建设者同盟。杉山元治郎是日劳派中非建设者同盟出身的农民领袖的杰出代表。<sup>[20]</sup>当建设者同盟正对农民问题感兴趣时，杉山和新成立的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建立了联系，他在那里首次研究了佃农运动。在此之前，杉山一直在一个贫穷的农村地区做牙科医生。他也进行社会活动并因成功地把一块产量很低的水稻田改为果园而赢得当地农民的信任 and 尊敬，这是他所需要的，因为他也要为基督教招募信徒。杉山虽然出身于大阪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但却能够在大阪农业学校读书，后来又到大阪学院读书。

杉山在福岛的小高教会当了10年的牧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杉山来到大阪，他在大阪同大原研究所的接触使他的兴趣开始从社会福利工作转向进行社会活动。他在藤田农场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佃农斗争，1921年他和其他人一起创建日本农民协会并成为它的首任主席。这使他能够在建立试图使佃农和城市工人群众结成联盟的日本第一个“无产政党”时成为领导人。杉山并没有因1926年12月1日农民劳动党被勒令即刻解散而惧怕，他在次年3月又着手建立劳动农民党。

尽管背景完全不同，但杉山在农民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些类似铃木文治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然而，杉山虽然是基督教徒，却没有参加社会民众派，反而成为日劳派的一个最早

成员，其主要原因是在劳动农民党日益激进的过程中，他厌恶农民协会和总同盟相互吸收成员。<sup>[21]</sup> 杉山觉得专断而又有严重派系情绪的总同盟领导人似乎不欢迎“外来者”参加他们计划建立的社会民众党的领导，他还认为在日益激进的劳动农民党中他排不上号。当麻生久和总同盟的其他心怀不满的领导人在大阪秘密访问他，建议在偏左的劳动农民党和偏右的社会民众党之间建立一个新的中间派政党时，他欢迎这一建议。

日本劳动农民党成立时，该党大多数领导人已经通过努力建立无产政党的各种组织而相互了解。<sup>[22]</sup> 如已经指出的，许多领导人从大学时代就已经是朋友。参加学生运动促使他们最终献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sup>[23]</sup> 他们也因此最初都接受了从德意志魏玛共和国输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sup>[24]</sup>

日劳派长期的“精神领袖”是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高野岩三郎。他是东京帝大的教授，日劳派的一些成员事实上是他研究班的学生。他的兄弟高野房太郎在20世纪初还很年轻时就死了，生前是和片山潜一起工作的温和派工人活动家。高野教授是劳工问题专家，他本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

简短地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学生运动中的地位，将有助于理解日劳派的意识形态的特色，日劳派中有很多人还在读大学时就信仰社会主义。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在战后的德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着国家。其他原因则包括，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哲学基础，以及在日本一般认为德国人民是欧洲文化最发达、哲学水平最高的人民。同时，在那些总是渴望了解西方文明最新成果的日本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来越大。由于在大学生中有市场，杂志出版商不断恳求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权威高畠素之（他后来成为墨索里尼的崇拜者）翻译马克思的各种文章。

1924年高崑素之出版了他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第1~3卷。

新人会会员和其他学生团体也为他们的翻译作品找到了现实的市场。例如，三轮出版了他大学时翻译的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sup>[25]</sup> 对马克思本人和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的需求，在其后一二十年中甚至更为强烈，只是在1931年“满洲事变”后才开始衰退。在所有日劳派知识分子中，河野密翻译和写作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最多。他为实现28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庞大翻译计划作出了贡献。<sup>[26]</sup> 这部翻译文集中只有4卷肯定是日劳派翻译的，<sup>[27]</sup> 没有一卷是社会民众派译的，但日劳派参与翻译的有约20卷，这将在下一章中考察。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外，还出版了大量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著作，特别是列宁、布哈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李卜克内西的翻译著作。此外，日本人还写了无数的解说文章。河野翻译了海因里希·丘诺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解说》，写了《马克思国家理论札记》。<sup>[28]</sup> 但是日劳派中的大多数人太忙于实际政治活动，以至没有花很多时间翻译和写作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日劳派可以被描述为是由“知识界人士”而不是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sup>[29]</sup>

有趣的是，同社会民众派主要成员比较起来，几乎日劳派的一切特点都是从该派成员是大学毕业生这样一个事实中产生的。他们献身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的动机本质上是利他的和人道的，这与那些从工人中涌现的为本阶级战斗并在这种斗争中使其本身的社会地位上升的工人领袖不同。此外，日劳派的大学学历和他们关注国外的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从德国输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使他们比社会民众派工人领袖采取更激进和更不实际的方法。社会民众派工人领袖惧怕这些善辩的受过更好教育的外

来者的竞争。同时，工人阶级出身的领袖感到他们自己完全有能力管理工会和政党。

但是在工人队伍中，对大学毕业生的厌恶并不广泛。事实上，总同盟中有如此众多的工会会员对部分工人领袖缺乏战斗性感到不满，以致受过大学教育的大多数领袖有可能分裂总同盟，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同盟和无产政党。但是当环境变化使工会向好战的左翼转变的可能性减少时，日劳派的工会基础同社会民众派相比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固了。

没有强大的后援组织导致了日劳派领袖30年代中期主动向军方表示，双方在反对“自私”的资本家和支持国家控制经济方面有共同立场。当时政府中的官僚对军方也有类似的态度。人们如果不只注意到日劳派和官僚间这种新被发现的表面态度的相似，而且也注意到他们过去的大学学历，就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官僚们愿意在日本战时体制中的高级职位上安置许多日劳派政治家。

最后，日劳派在组织上特别依赖日本人称之为的“感情”和“私人关系”。日劳派成员后来一直靠其早年对社会基础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对可能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的“认识”这种浪漫主义团结在一起。麻生久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人能够利用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公开或暗中企图把日劳派引向支持军方，然后引向支持“新体制”。他在世时从没有完全说明过其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肯定是，他感到无产阶级运动需要政府高官的帮助。他后来明白自己有心脏病，活的时间不长了，但他宁肯在努力奋斗中耗尽他最后的生命，而不愿为延长生命而过平静的生活。这种精神似乎鼓舞了整个日劳派，日劳派因而在全日本展开一场经久不歇的宣传鼓动。社会民众派在和政府的政治联系、向公众呼吁以及争取后援组织等方面的活动范围比日劳派狭窄得

多；社会民众派尽管有更坚固的工会基础，但他们得到的农民的支持则微不足道。这样，当社会大众党发展起来时，日劳派得以控制它和决定它的最终行动。

## 注 释

[1] 吉野：《同大众在一起》，第253页。

[2] 在麻生久的《黎明》一书（东京，黎明书院，1949年）中，载有麻生久写给棚桥小虎的一封信。该信有趣地描述了这一摩擦，第180~186页。棚桥在从东京帝大毕业后成为一名实习检查官，但为了响应学生运动发出的“到人民中去”的号召，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参加了总同盟。他在那里工作几年后，决心不再忍受那些出身工人阶级的同伴因他是大学毕业生而对他表现出来的厌恶。他离开了工人运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麻生久给他写这封信是试图劝他改变主意回到工人运动中来。后来麻生久将该信收入他以自传体小说形式写的工人运动史中，并详细分析了出身工人阶级的领袖对有大学学历的领袖的厌恶情绪的发展。

[3] 麻生久同贺川的一次谈话，麻生久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描述了这次谈话，从而阐明了这一点。麻生久告诉贺川，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骗人的东西，贺川回答说，就其个人来说，他信仰基督教，即使其他人都不相信基督教，他也要继续坚持下去。《黎明》，第227~228页。

[4] 同上书，第14页。

[5] 来自笔者对河野密的采访。

[6] 加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回到该集团。然而，有一些较不重要的成员叛离了该集团而向左转。

[7] 他们在东京帝大时的老同学赤松克磨也在那里工作，他是规划局组织处的负责人。

[8] 有关麻生久的大部分材料来自他的自传体著作《黎明》和《麻生久传》。另外也来自科学思想研究会编：《探索》第1卷，第94~113页以及第2卷中的许多地方。

[9] 1917年的革命刚发生，东京《每日新闻》就刊登了连载文章《从彼得到列宁》。麻生久的书，第10页。

[10] 菊川忠雄：《学生社会运动史》（东京，海口书店，1947年），第46页。该书及下述各书详细描述了学生运动：杉山谦治：《日本学生思想运动史》（东京，日本基督教青年同盟学生运动出版部，1930年）；住谷悦治、高桑末秀和小仓襄二合著：《日本学生社会运动史》（京都，同志社大学出版部，1953年）。

[11] 菊川的书，第53页。

[12] 《民主》。该机关报的名称很快就改成为《先驱者》，因为学生们正在变得更为激进，他们已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

[13] 河野密向笔者描述了当他决定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时他是如何被逐出家门的。

[14] 前面已经提过，这一点笔者向大宅壮一核实过。

[15] 菊川的书，第68页。

[16] 石川啄—木的诗《到人民中去》重印在菊川的书中，第80~82页。青年学生们发表热情的讲话，告诉工人们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工人们问学生，“剥削”和“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

[17] 浅沼稻次郎：《早稻田的演讲社：我的美好故园的7年》，《文艺春秋》第13卷（1952年2月），第136~139页。

[18] 前面提到过，来自对大宅壮一的采访。

[19] 有关浅沼的材料得自：纪念浅沼编辑出版委员会编的浅沼传略《勇往直前：记带头人浅沼先生》（东京，社会党机关分部，1961年）；大曲直：《浅沼稻次郎：他的生平与为人》（东京，四清堂，1961年）；荒垣的书，第168~172页；以及一次私人采访。

[20]除其他权威性的资料外，有关杉山的材料主要来自前引键田书中的许多论述。

[21]在杉山看来，总同盟虽然支持劳动农民党，但实际上只是在尽力破坏该党，没有做任何带有建设性的好事。杉山元治郎：《关于劳动农民党的分裂》，《社会经济体系》第1卷(1926年12月)，第391~399页。

[22]例如，1924年6月成立了政治研究会。

[23]除杉山外，同那些通过参加学生运动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比较，河上丈太郎也是一个例外。他比学生们年长，在日俄战争时期受到当时社会主义者反战活动的强烈影响。河上在东京帝大时受到高野岩三郎的影响，后来当他在大阪、神户地区教书时，他通过高野加入了大原社会研究所，同该所其他人一起从事研究工作。河上在大阪、神户地区新创立的工人学校中讲学，实际领导了一次纺织厂工人的罢工。他逐渐越来越深入地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这个材料得自河上民雄教授。

[24]与此相关，20年代，在高等学校中，学习德语也已经十分流行。

[25]三轮寿壮，翻译家，《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东京，改造社，1930年)。德文原题是《卡尔·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斯图加特，1892年)。

[26]改造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28卷，东京，改造社，1928~1933年)。

[27]细野三千雄、菊川忠雄、河野密和三轮寿壮。

[28]《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解说》。据我所知，卡诺的书还没有被译成英文。该书的德文原题是，《论马克思关于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共2卷，柏林，1920年)。

[29]尽管不包括翻译的著作，但大多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都可以在塞西尔·H·尤哈拉的书中找到，该书题目是《日本的左翼社会运动：注释文献目录》(东京和拉特兰，查理斯·E·塔特尔公司，1959年)，特别是第4章的第2节和第3节。



## 第7章 劳农派和其他左派团体

### 初期的劳农派 后起的一些有影响的团体

同前面叙述的那些社会民主领袖相比较，本章中叙述的这些领袖并没有结合成紧密的集团。这是为什么较少使用派别、团体、集团这些精确的词来标明他们的一个原因。为了进行分析，将把那些领袖分为几类，按下列次序分别说明。<sup>[1]</sup>

1. 劳农派
2. 无产大众党领袖
3. 水谷集团
4. 新劳农党领袖
5. 人民阵线集团

本书并不把在共产党人指导下进行活动的那些领袖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其支持者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他们作为无产政党候选人，但一般并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人。因此，劳动农民党领袖在这里不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被视为退出总同盟领导集团的合法左翼。大山郁夫是劳动农民党的领导人。尽管他从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们只是在他和共产党人的路线分离后，才把他划入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在领导“新”劳农党同那些完全反共的团体合并时与共产党人

的路线决裂。但是，不能把大山郁夫及其亲密助手同劳农派相混淆，劳农派这个名称既不是从早先的劳动农民党也不是从改组的劳动农民党中产生的。

第2类到第5类在不同程度上受劳农派的影响，劳农派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比日劳派更正统，至少是比日劳派更少“修正”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当时那些领袖并不喜欢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名称太保守。他们认为自己是同国外共产党没有联系的独立的共产党派别。尽管如此，但同右翼的社会民众派以及中间派的日劳派相比较，由于他们反对当时共产党的战略和战术，使他们在1926~1932年处于公认的社会民主运动的左翼这种地位。他们的基本概念常常同共产党人相同，但是通过他们和共产党理论家围绕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互相对立而展开的长期论战，他们同共产党的理论分歧表现得十分清楚。

采取这种意识形态立场使这些领袖在整个无产政党运动中起着把工人和佃农中最激进的那一部分人引导到法律许可的活动范围中来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时有时因政府逮捕同其竞争的共产党工农领袖而得到好处。

劳农派成员由于相互间只有非正式和非组织的联系，他们倾向于采取无联系无规律的单独活动的方式。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渴望凭自己的资格成为理论家，以至他们彼此之间的争论和同其他集团的争论一样多。他们的政治结盟者是不稳定的。他们的活动使他们存在于法律许可的边缘(共产党人存在于法律之外)，他们有时在其他右翼领袖压力下，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同日劳派或社会民众派在一个“联合阵线”的党中结成联盟——尽管他们有时遭驱逐。当国家越来越卷入战争时，他们被迫越来越向右转。当他们越出轨道抗议走向战争时，他们就被投进

监狱。

劳农派不象社会民众派(产生于友爱会)那样是从一个改良的博爱的组织中产生,也不象日劳派(产生于新人会和建设者同盟)的主要成员都是从激进的学生组织中产生。更精确地说,劳农派是起源于共产党营垒。每当日本国家警察大力镇压正在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时,总有一些人脱离共产主义运动转化为这里称之为的劳农派领导集团。

同劳农派有关系的所有团体都比社会民众派和日劳派形成时间为晚,它们是在脱离劳动农民党后才形成的,而社会民众派和日劳派在1926年12月已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当劳动农民党成为日本共产党人的合法的天堂时,那些随即脱离该党的个人和团体倾向于同先前直接从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劳农派站在一起。

## 7.1 初期的劳农派

真正的劳农派是政府首次镇压非法建立的日本共产党的产物。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次镇压发生在1923年6月5日,当时共产党成立已有11个月。党的一些领导人被逮捕,经过草草的审判后,这些被关押者答应解散党并且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督促重建日本共产党,但遭到与福本和夫极“左”主义对立的山川均所领导的所谓解散派的反对。然而,解散派是在拒绝接受共产国际在《1927年7月纲领》——该纲领既批评了福本主义也批评了山川主义——中对它的批评后,才彻底同共产主义决裂。山川及其追随者最初认为该纲领同他们的立场吻合,于是开始在资产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党人和那些仍认为成立共产党是必要的党同情者。1927年11月的一天的晚上,在镰仓,

山川及其追随者聚集在大森义太郎教授的屋子里，成立了首次称为“劳农派集团”的组织。<sup>[2]</sup> 他们着手出版一份名为“工农”的杂志，<sup>[3]</sup> 开始攻击前不久被共产国际承认的共产党。他们攻击的矛头指向共产国际在日本推进革命的战略，却并不反对革命的目标或愿望。这就是初期的严格意义上的劳农派，它包括以下一些人：

表7.1.1

姓名和生卒年	教育(学生组织)	职业	附注
荒畑胜三 (笔名:荒畑寒村)1887~	小学, 其后自学	记者	初期的日本共产党的党员, 老社会主义者。
猪俣津南雄 1889~1942	早稻田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	早稻田大学讲师、作家	初期的日本共产党的党员, 写了很多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文章, 主要的理论家。
黑田寿男1899~	东京大学(新人会)	律师	佃农运动专家, 农民协会的一个领导者。
大森义太郎 (笔名:成世满尾)1898~1940	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教授	写了大量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
堺利彦 (笔名:堺枯川) 1870~1933	东京第一高中	作家	初期的日本共产党的党员, 老社会主义者。
铃木茂三郎 1893~	早稻田大学	新闻记者	可能是一个同美国共产党有关系的组织的成员。
山川均1880~ 1958	同志社大学, 但肄业离校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	作家	初期的日本共产党的党员, 劳农派中的主要人物和理论家。

随着时间流逝, 该集团扩大了, “劳农派”成为远比社会民

众派或日劳派更为不明确的一个词。下表列出了被认为是属于劳农派的人。这里省略了他们各自的生平，因为其中一些人只是间接地同无产政党有关，而其他人将在下面讨论。

表7.1.2

阿部勇	伊藤好道	笠信太郎	对马忠行
有泽广巳	河合悦三	向阪逸郎	山川菊荣
本多谦三	栉田民藏	佐佐弘雄	(山川均
稻村顺三	冈田宗司	高野岩三郎	的妻子)
石滨知行	大内兵卫	土屋乔雄	宇野弘藏

劳农派中的杰出人物无疑是山川。<sup>[4]</sup> 他没有毕业就离开同志社大学，在东京加入社会主义运动，他在那里同堺利彦、荒畑以及其他“老社会主义者”一起工作。他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拥护布尔什维主义并反对“无政府主义”，因而很自然地成为1922年7月成立的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在1922年8月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方向的改变》的文章，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现了对该文的各种解释。在那篇文章中，山川把自己看做是主要的共产党理论家。然而，在共产党第一次解散后，他却建议在群众为建党做好准备之前不要重建党，他甚至认为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广泛包括穷苦农民和城市大众的无产政党，才能使群众为建立共产党做好准备。这个理论受到很快从山川手中夺取了领导权的福本的攻击。<sup>[5]</sup> 尽管如此，当山川退出共产党阵营时，他的许多追随者仍跟随着他，帮助他建立了劳农派。

山川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一直从事写作，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不再进行政治活动，当时他和妻子菊荣定居在镰仓的一个农场，他的妻子象他一样是个很能争论的人，有“过于聪明”的声誉。警察在他房前设置了一个警亭，三个警察总

是跟踪山川夫妇，<sup>[6]</sup> 监视他们的活动。尽管经历了失败、隐退、被捕和遭到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山川夫妇从没有改变他们的意识形态(山川夫人是战后日本政府部门中的第一个妇女局长，而她的丈夫，如同在20年代所做的那样，证明是以大量写作来指导战后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他去世前一直是向战后社会民主运动中的非共产主义左翼继续提供理论的劳农派的主要代表)。

如果把劳农派和在1930年消失之前的“合法左翼”加以区分，那么可以说，它们的差别在于，一派决定同共产国际承认的共产党断绝关系，另一派则还没有完全决定是否应和非法的共产党走同一条路。脱离共产主义运动潮流的那些派别如果希望有任何独立的力量，就必须一起工作，或者，如果他们想寻求安全，避免被捕，就必须加入日劳派或社会民众派。尽管首先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的劳农派最初只是由几个知识分子所组成，但这一派在工人运动中后来至少掌握了某些后援组织。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和政府对它的镇压使更多团体脱离它，那些脱离共产主义的派别加入和组成了各地方的无产政党。这有两个原因，即那些派别能够团结的支持者有限和政府对地方政党的态度更为宽大。

## 7.2 后起的一些有影响的团体

在政府1928年3月15日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之前，劳动农民党直到同年4月被命令解散时，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合法左翼。从那以后，一群明确决定同共产党人脱离关系的合法主义者与一些劳农派成员协商，在1928年7月共同建立了无产大众党。据说，当时那些劳农派成员同日劳派领袖秘

密协商，达成一项谅解，即无产大众党将在适当时候同更大的日本劳农党合并。<sup>[7]</sup>半年后，这个传说似乎被证实了，1928年12月确实发生了这样的合并，组成了日本大众党。这是劳农派逐渐从受共产党影响的合法左翼中争取支持力量的一个例子。

包括一些初期的劳农派集团成员在内的无产大众党的重要领袖们组成了我们称之为的第2类领袖集团：

表7.2.1

姓名和生卒年	教育	职业	附注
大道宪二 1890~20世纪40年代(?)	小学	工人，工人领袖	东京市政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劳农党执行委员会成员。
叶山嘉树 1894~1945	早稻田预备学校，后来自学	小说家	从工农艺术家同盟转而参加党，出身工人阶级。
稻村顺三1900~1955	东京大学	作家、翻译家	见表7.1.2，劳农派。
小堀甚二1901~1959	中学，后来自学	小说家、翻译家	翻译过列宁《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女作家平林泰子的丈夫。
黑田寿男1899~	东京大学(新人会)	律师、农民领袖	见表7.1.1，农民运动专家和农民协会领袖。
望月昭雄1887~1962	小学	工人、工人领袖	虔诚的基督徒，后来成为一个小店主。
冈田宗司1902~	东京大学(新人会)	作家、农民领袖	见表7.1.2，劳农派，日本农民协会。
大森义太郎 1898~1940	东京大学	教授	见表7.1.1，写了大量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
铃木茂三郎 1893~	早稻田大学	新闻记者	见表7.1.1，最初靠近日本共产党。

这里列出的领袖中，铃木、大森、黑田、冈田和稻村是劳

农派集团(第1类)的创始人。退出劳动农民党后新加入该派的大道和望月带来了支持他们的工会组织,而日本农民协会的领袖稻村、黑田和冈田则带来了农民支持者。

第2类领袖集团的中心人物是政治舞台上劳农派的杰出的代表人物。铃木茂三郎的品格和其他领袖截然不同:他虽然是洋车夫的儿子,但却是大学毕业生。<sup>[8]</sup>他努力做过适宜日本贫穷学生干的各种“工作”(Arbeit)——这是学生们用的一个德文词——挣的钱正好够他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他在早稻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

铃木虽然左倾,但却支持同非人平贺和乡诚之助男爵这样的日本财界的重要人物保持联系。他在当记者专门报道金融消息时,就同乡诚之助男爵熟悉。他从这类人那里为他的关于财阀和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严肃的理论书籍获取资料,这类书籍具有典型劳农派方法论的特色。<sup>[9]</sup>1928年春季,当他因公开参与社会主义运动而被《东京日日》报解雇时,他拜访了乡诚之助男爵,告诉男爵他准备完全献身于无产政党运动。据说,男爵宣称,“我认为只有无赖才卷入那种运动,但当我听说象你这样一个严肃认真的人也决定这样做时,我不难设想日本的未来,我甚至必须为其做好准备。”<sup>[10]</sup>

劳农派的一个成员荒畑后来由于铃木在理论著作方面的衰退而批评他<sup>[11]</sup>——这一批评表现出劳农派对理论的重视。

第3类领导集团同劳农派的关系远比第2类领导集团同劳农派的关系疏远得多。第3类领导集团是在政府再次直接镇压合法左翼或正努力成为合法的左翼时形成的。1928年4月被解散的劳动农民党的一些成员,在同年12月24日,试图自己建立一个党,但是他们建立的那个党在成立当天就被政府强行解散(叙述第5类领导集团时将解释这次镇压)。该集团这时放弃建



立全国性政党的企图，发生了分裂，组成了若干个地方无产政党(如劳农派所鼓吹的那样)，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农大众党，这是在水谷长三郎领导下，于1929年1月17日在京都成立的一个地方政党。水谷是第3类领导集团中唯一的重要领袖：

表7.2.2

姓名和生卒年	教育	职业	附注
水谷长三郎 1897~1960	京都大学 (工学会)	律师、 农民领袖	以前一直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合法左翼的成员，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劳动农民党)；其后1930年(劳农大众党)、1932年(全国劳动大众党)落选，但1936年(社会大众党)、1937年(社会大众党)和1942年当选。参加大政翼赞会。

水谷1921年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他在京都帝大加入了工学会，这个组织的成员帮助劝说赤松和宫崎在东京帝大建立新人会。<sup>[12]</sup> 水谷投身于工人运动，他当时是友爱会京都帝大法律系支部负责人。1921年他在著名的河上肇教授指导下，在京都帝大开始读研究生，河上肇教授当时正在壮年，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1925年水谷是带头建立第一个无产政党(即夭折了的农民劳动党)的日本农民协会的顾问。当劳动农民党成功地建立起来时，水谷是该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京都支部的主席。1928年在该党的议员候选人中，水谷带着极大的欣喜心情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但在党因警方怀疑其内部有共产党人并进行搜捕而遭到严重打击后，水谷退出该党，如前所述，他建立了

劳农大众党。这使他同那些站在残存的劳动农民党一边、包括河上教授在内的前伙伴们的关系严重恶化。这似乎是导致1930年2月20日在京都国会议员选举中水谷努力反对他以前导师的一个原因。这使无产阶级的选票不能集中，因而双方都没有当选。<sup>[13]</sup>

水谷的追随者当时建立了以京都为基地的劳农大众党(第2类)，日本大众党中那些因难于同日劳派合作而退出或被驱逐的第1类和第2类集团的成员，很快就加入该党。1929年5~6月间已被日本大众党驱逐的那些人中，也有受劳农派影响的人，如铃木茂三郎、黑田、稻村、大道和可敬的堺利彦。这些人在同当时得到平野力三支持的麻生久争夺内部领导权失败后，建立起诸如由堺利彦、黑田和中西伊之助领导的东京无产党等地方政党。1930年3月17日，他们与水谷联合，同水谷的党共同建立无产政党战线统一全国协议会。无产政党由于在1930年2月大选中成绩甚微和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在同共产党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加强了建立联合阵线的趋势。

这种趋势是强有力的，它足以克服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农派及受其影响的(第1类与第2类集团)那些人对日劳派的派性恶感，他们现在和日劳派以及水谷(第3类集团)联合，于1930年7月20日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全国大众党。

各派联合的这种迅猛势头也吸引了残留在新劳动农民党中的那些人，这导致一年后即在1931年7月5日又进行了另一次改组，创建了一个新的甚至更难管理的政党，名为全国劳农大众党。

然而，在讨论新的集团——我们称之为第4类集团——的起源之前，讲几句关于水谷派后来的发展，就可以弄清1932年继续参加社会大众党大联合中的该派的情况。非常奇怪的是，

在社会大众党里，水谷尽管总维持一批有某种独立性和灵活性的少而忠实的追随者，却逐渐同其早年在劳动农民党中斥责过的那些人即社会民众派友好起来。在社会大众党存在的最后一段时期，他同社会民众派站在一起，在1940年斋藤隆夫事件中被驱逐的人中也有他。水谷继而参加了建立勤劳国民党的徒劳尝试，尽管如此，其后不久他仍在大政翼赞会和后来的翼赞政治会中任职。<sup>[14]</sup>

我们回过来继续叙述1931年的事情，当时社会大众党还没有成立，第4类集团的起源是什么？是残存的新劳动农民党吗？读者必然记得，最初的劳动农民党于1928年4月10日被当局命令解散。那些震怒、愤慨、决心反抗的领袖们当天举行会议，成立了新党筹建委员会。12月24日，他们宣布工人农民党成立，但是当局立即命令该党解散。大会在惊愕中成立了争取政治自由劳农同盟，呼吁所有相信应维护公民有权参与政治和反对官僚专制行为的人们支持它。

警方允许该组织存在，但是该组织内部，一个倾向于共产党的集团开始嘲弄那种以为最终成立的新党如果把自己限制在合法活动范围内就能够取得实际进展的思想。该集团论证，对政府妄自尊大的政治干涉的最有效的反抗和抵制就是壮大地下共产党的队伍。这种理论当时赢得同盟执委会的支持，但当开始按其行动时，政府以1929年4月16日的大规模逮捕对共产党再次实行镇压。同盟虽然因这次逮捕遭受损失而被大大削弱，但那些残存者，即同盟的“右翼”，仍决定建立一个合法政党。新党于1929年11月1日成立，其名仍为劳动农民党，这就是一般为与旧党相区别而称为的新劳动农民党。

第4类集团就这样由新劳动农民党的领袖们组成，该党从1929年11月1日存在到1931年7月5日。

表7.2.3

姓名和生卒年	教育	职业	附注
细迫兼光1896~	东京大学	律师	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没参加全国劳农大众党，被短期监禁，后转向爱国主义。当选为市长。
上村进1883~	早稻田大学	律师	1928、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没有参加全国劳农大众党，自由律师和法官协会书记。
河上肇1878~1946	东京大学	教授、党的杂志的编辑	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没参加全国劳农大众党，却参加了共产党，在此之前一直是新劳动农民党的意识形态领袖，该党机关刊物的编辑。
中村高一1897~	早稻田大学	律师	参加全国劳农大众党，继而参加社会大众党，后来参加东亚同盟；1930、1936、1942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1937年当选国会议员。
大山郁夫1880~1955	神戸商学校、早稻田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研究 生	早稻田大学教授、报纸专栏作家	新劳动农民党解散前一直是合法左翼(劳动农民党及其后继组织)的领袖，1928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参加全国劳农大众党。
神道宽次1896~20世纪40年代(?)	在军队中当军士时自学	律师	1928、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没参加全国劳农大众党。
山花秀雄1904~	小学	工人领袖	友爱会，评议会，参加全国劳农大众党，后参加日本无产党，因人民阵线活动而被捕。
山崎剑二1902~1956	御殿场农业学校	农民协会领袖	参加全国劳农大众党，继而参加社会大众党，1936、1937年是国会议员，参加大政翼赞会和翼赞政治会。
山崎常吉1891~1961	小学	白铁工、工会干部、拥有企业	参加全国劳农大众党，1937年参加弱小的爱国无产党，1937、1942年是国会议员，参加大政翼赞会和翼赞政治会。

新党成立不久再度发生那种给它的前身带来苦恼的两极分化。为支持共产党而解散党的建议重新出现。诸如河上肇、上村、细迫、神道和赤松五百磨(赤松克磨的弟弟)等一些领导人,因鼓吹这一主张而在1930年9~10月间被党驱逐。在留下的人中,大山郁夫是唯一的著名人物,他于1930年在著名的东京第5选区当选为国会议员。山崎剑二和中村也留在党内,他们后来在同日劳派站在一起时也当选为国会议员(在战后的日本,中村以作为一个右翼社会主义者而闻名)。山花秀雄是参加同社会民主运动其他各派的联合并重新向左转的唯一领导人,他后来在1937年同劳农派一起参加“人民阵线”。

新劳动农民党在更激进的分子退出或被驱逐后,剩下的党员决心使党保持合法地位,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消极的无影响的党。例如,1930年12月,该党在大阪通用汽车制造厂领导大罢工,但甚至在人数很少的党的队伍内部,也出现对党处理和解决劳资纠纷损害了工人的批评。<sup>[15]</sup> 当大山最终同他严厉谴责过的那些人走上同一条道路,同日劳派联合建立全国劳农大众党时,新劳动农民党似乎逐渐失去了其继续存在的理由。

被称为“我们党光辉领袖”的大山是第4类集团的代表人物,因为在“合法左翼”存在的整个期间,事实上一直是他领导着合法左翼。<sup>[16]</sup> 大山的学识渊博,他1901年从神户商学校毕业,1905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其后又去国外,在芝加哥大学和慕尼黑大学读了4年研究生。他回国后,从1915~1917年在早稻田大学教书。其后几年他为大阪《朝日新闻》写专栏,这使他养成通俗流畅的文风。1919年他同著名自由派长谷川如是闲及在德国学习过的马克思主义者栉田民藏合作,创办了一个杂志名为《我们》,他们还通过河上肇的一个学生得到劳农派的紧密合作。而后,大山又回到早稻田大学教书,直到政治活动使他再

次离开教学。他作为公众演说家有很高的声望，尽管据说他有些口吃，但他的流畅的论证“可以击碎坚石”。虽然如此，但他在新劳动农民党中却受到他最亲密的支持者的批评，党的机关刊物的主编河上教授说，“大山先生对演讲比对吃饭或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喜欢。在街头演讲，听众越多，他的兴致就越高。他不担心任何其他事情”<sup>[17]</sup>

1931年新劳动农民党同日劳派领导的党为合并进行谈判时，出现一个问题，谁将是党的领导者(即总书记)，是日劳派的核心人物麻生久还是在年龄、学识及群众威望方面更优越的大山。麻生久因他那一派的支持而赢得总书记的职位，大山被安排为顾问，但大山拒绝了，他说他在党内要象“一个普通士兵”那样工作。然而，大山在得知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企图谋害他后便决定飞往美国，他在美国通过肯尼思·科尔格罗夫教授的推荐，在西北大学得到一个研究员的职位。大山在美国一直居住到战后。<sup>[18]</sup>

作为社会民众党同完全排外的全国劳农大众党合并共同组成社会大众党的一部分代价，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亦即党主席——的职位给予了安部矶雄，但是更大的权力则落在总书记麻生久手中。社会民众派由安部、铃木文治、吉野、马场恒吾、原彪、片山哲、松冈和西尾等人代表；日劳派由麻生久、杉山、河上丈太郎，须永好、浅沼、田所辉明、三轮和河野密代表；劳农派(第1类集团和第2类集团)由铃木茂三郎和黑田寿男(前者在1936年，后者在1937年，因参加“人民战线”活动而被驱逐)代表；劳农派中的第3类集团由水谷(1940年被驱逐)代表；第4类集团由新劳动农民党的山崎和中村(当时大山已去美国，而山崎和中村在政策问题上倾向于同日劳派站在一起)代表。

然而，社会大众党尽管在1936年和1937年大选中取得很大成功，但在这“一个大党”内却没能长久保持和谐，出现了背叛和驱逐，这表明社会民主运动正面临新问题，即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实际出现的人民阵线本质上是加藤(前日劳派领袖)的追随者同杂乱的劳农派(第1类和第2类集团再加上一些新人)各种成员的大联合。劳农无产协议会在全国因2月26日政变阴谋而受到震动后五个月，于1936年7月首次公开号召成立人民阵线，这是日本第一个主张人民阵线的群众组织。代表全国水平社的独立议员松本治一郎和社会大众党外围人士全日本农民协会领导人黑田，曾徒劳地作为中间人试图劝说协议会同社会大众党在人民阵线基础上合并。在协议会改组成为日本无产党后不久，登记的党员超过7,000人，建立起一些地方支部。以此为基础，铃木茂三郎在3月当选为东京市议会议员，在4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他的票数虽然尚不够当选，但得票却相当多，而加藤当选为国会议员。然而，形势变化太快，在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能够牢固地扎下根基之前，“中国事件”的浪潮就把它冲掉了。

虽然第一次遭逮捕的人民战线事件发生在1937年12月15日，但是6周后，1938年2月1日，警方布下一个更大的网，逮捕所谓“学者集团”。在搜捕中，大约有400人被投入监狱。他们的来源，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团体，但都受劳农派思想的影响。我们把这些入称为第5类集团，表7.2.4~7列出了其中的主要人物。

政府进行逮捕的官方理由是，人民阵线正在推行一种受共产国际影响的新纲领，扩大反战宣传，并不同帝国的方针合作等。<sup>[19]</sup> 政府很难在法庭上证明它的理由。<sup>[20]</sup> 虽然，日本投降时审判程序还没有完成，但大多数被捕者都已逐渐被保释，日

表7.2.4

## 1. 来自日本无产党

姓名和生卒年	教育	职业	附注
加藤勘十1892~	日本大学	工会领袖	1932年脱离日劳派,1928(日本劳农党)、1930(日本大众党)、1932年(地方政党)国会议员候选人,1936(地方政党)、1937年(日本无产党)当选为国会议员。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3年徒刑。
小堀甚二1901~ 1959	读完早稻田 预备学校后 自学	小说家、 翻译家	见表7.2.1,开始参加无产大众党,后来参加社会大众党。1936年在选举中支持加藤而没有支持麻生久,因此被社会大众党驱逐。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2年6个月徒刑。
岛上善五郎1903~	小学	工会领袖	1926年是劳动农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2年徒刑。
铃木茂三郎1893~	早稻田大学	记者	见表7.1.1和表7.2.1集团。最初靠近共产党、劳农派团体,1928年也参加无产大众党,1937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日本无产党)。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5年徒刑。
高野实1901~	早稻田大学, 但因参加社会 主义运动肄业 离校	工会领袖	最初是共产党,通过劳农无产协议会而登上政治舞台。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3年徒刑。
高津正道1893~	因激进活动 被早稻田大学 开除 (建设者同盟)	作家	最初是共产党,劳农派,1930年是国会议员候选人(地方政党),1932年参加远东和平友好协会。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2年徒刑。
山花秀雄1904~	小学	工人领袖	见表7.2.3集团,来自新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领导人。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2年6个月徒刑。
安平鹿一1902~	小学	工人领袖	1934年是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领导人。1936年当选为东京县议会议员。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2年徒刑。



表7.2.5

## 2. 来自全国农民协会

姓名和生卒年	教育	职业	附注
稻村顺三1900~1955	东京大学	作家、翻译家、农民领袖	见表7.1.2和表7.2.1, 劳农派, 无产大众党, 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2年徒刑, 后没有执行。
黑田寿男1899~	东京大学	律师、农民领袖	见表7.1.1和表7.2.1, 劳农派, 被捕时是社会大众党党员。1936(地方政党)、1937年(社会大众党)当选为国会议员。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2年徒刑。
冈田宗司1902~	东京大学	作家、农民领袖	见表7.1.2和表7.2.1, 集团。劳农派, 无产大众党, 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2年徒刑, 后没有执行。

本投降后所有被捕者当然都被无罪释放。

在这个受劳农派影响的集团中, 最杰出的政治人物是加藤勘十, 他最初是日劳派成员之一。<sup>[21]</sup> 同日劳派的大多数拥护者一样,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但他毕业于日本大学, 因而同在东京帝大或早稻田大学读过书的大多数成员没有紧密的同学关系。加藤同铃木茂三郎一样出身贫寒。他在11岁时就为一个布商做僮仆, 17岁进入日本中学, 但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被迫退学两年, 21岁被征召入伍, 在军队服役后, 在日本大学夜校学习法律。毕业前他再次被征召服役, 被派到去西伯利亚的医疗队中。他后来自称, 在西伯利亚的经验为他攻击日本准备再次发动战争奠定了基础。其后, 他于1919年8月领导贞都报业大罢工。1920年他参加八幡钢铁厂约25,000工人举行的首次大罢工, 这次事件标志着他开始象麻生久那样积极投身于矿工斗争。他以自己的成就赢得广大工人的拥护, 例如, 1925年他在海拔1,500米

表7.2.6

## 3、来自劳农派本身

姓名和生卒年	教育	职业	附注
荒畑胜三 (笔名:寒村) 1887~	自学	记者	见表7.1.1,老社会主义者,最初是共产党。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3年徒刑。
猪俣津南雄 1889~1942	早稻田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	讲师、作家	见表7.1.1,初期是共产党,写了大量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著作,主要的理论家。其妻是一个波兰革命者。
大森义太郎 1898~1940	东京大学	教授	见表7.1.1和表7.2.1,写过大量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
向阪逸郎1897~	东京大学	教授,作家	见表7.1.2,1928年被九州大学开除后投身于劳农派,围绕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同共产党理论家战斗。因人民阵线活动判徒刑2年。
山川均1880~ 1958	同志社大学,但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肄业离校	作家	见表7.1.1,最初是共产党员,劳农派的主要人物和理论家。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5年徒刑。

的别子铜矿领导工人在风雪中罢工120天。

加藤在总同盟领导人中被认为是一个中间派,因而1925年当总同盟发生导致建立评议会的分裂时,他暂时取代右翼的松冈而成为总同盟的总书记。他在同松冈的对抗中,联合麻生久建立了日本劳农党,成为日劳派一个最早的拥护者。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后来也同麻生久对立。最初是一个误解,它导致两人在1932年2月大选中在东京第5选区互相攻击,因而分裂了无产阶级的选票,以致两人都没有能够当选。虽然如此,但加藤在工人运动中仍有坚实的基础,他在1932年前,一直留在

表7.2.7

## 4. 来自学者团体

姓名	任职教授的学校	因人民阵线活动被判徒刑(在东京)
阿部勇 (见表7.1.2)	法政大学	2年, 后没有执行
有泽广巳 (见表7.1.2)	东京大学	2年, 后没有执行
早濑利雄	横滨高等商业学校	
南谨二	法政大学	无罪
美浓部亮吉	法政大学	无罪
大内兵卫 (见表7.1.2)	东京大学	无罪
芹泽彪卫	巢鸭高等商业学校	无罪
高桥正雄	九州大学	2年, 后没有执行
宇野弘藏 (见表7.1.2)	仙台大学	
肋村义太郎	东京大学	无罪

日劳派的工会基础工会全国同盟中。

1931年11月以后, 加藤在工会全国同盟中领导了一次抗议运动, 反对他宣称的该同盟的法西斯主义倾向。1934年当麻生久赞扬军方的小册子时, 加藤同日劳派完全决裂, 他继而建立了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加藤在1935年受美国劳工联合会邀请对美国进行三个月访问时, 美国劳工联合会一些人对他决定抵制法西斯主义给予鼓励。

加藤建立人民阵线的企图, 同他当时对日本在中国的冒险明显地采取某种合作态度很难调和。例如, 1937年他刚从中国回到长崎, 就因人民阵线的活动被逮捕, 而他在中国, 却一直是作为皇军慰劳官访问军队! 加藤被关押了大约两年。他在监狱中遇到因鼓吹计划生育而被捕的石本静枝男爵夫人。加藤的妻子不久前死了, 石本男爵夫人则在1944年同其丈夫离婚后,

嫁给了加藤。当时她对加藤进一步向右转有巨大影响。<sup>[22]</sup>

更深入一些的观察有助于阐明劳农派的特点。尽管表中列出的所有那些人都可以被认为是劳农派的“拥护者”或“受劳农派影响的人”——即他们有一定的共同看法，或者说，有共同的世界观——但他们从没有建立一个所有成员都加入的单一组织。劳农派集团本身没有组织，没有干部，没有原则，没有纲领，也没有司令部。在政治舞台上，1937年它支持日本无产党，但其成员没有一人参加该党。在工会、农会、知识界，甚至一些社会大众党成员中，都有拥护它的人。相反，日劳派和社会民众派这两派却完全组织为政党，有时相互对立，有时相互联合。

劳农派影响下的团体也同另外两派相反，过分重视理论，他们之中很多人努力研究理论，写书、写文章、写小册子，论述当代各种问题。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在日本学术生活中和诸如1943年被查禁的《中央公论》、《创造》等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月刊中占有主要位置。最后，可以说劳农派代表了一种观察事务的方式，但却没有制订出独有的行动纲领。他们在组织示威、征集支持者签名、为吸引公众而施展手腕或组织暴力等方面永远落后于对手，特别是落后于共产党人。

尽管那些因同人民阵线有关联而遭逮捕的人事实上包括有工人、农民、无产政党成员和学术界人士，但他们都受劳农派理论的影响。从人民阵线是在一个目标下把不同观点的各派广泛联合在一起这种意义上说，他们并不是人民阵线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他们恰恰是整个社会民主运动中的一派。

比较这三个主要的派系或集团，我们可以说，如果社会民众派主要是由出身工人阶级的领袖组成，日劳派是由大学毕业生组成，那么劳农派就是由出身工人和有大学学历的两种领袖

混合而成，但是智囊人士显著地占有大得多的比例。

社会民众派有牢固的工会基础。日劳派领袖得到的工会的支持不太稳定，但他们有更多的农民支持者。劳农派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追随它的组织，但它很乐于向任何群众团体提供它能够发现的理论。例如，当加藤领导一部分工人脱离日劳派工会同盟时，劳农派向加藤提出建议并督促他行动。整个劳农派有许多空想的将军，但是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军士。

社会民众派的基本意识形态是从工联主义派生出来的——最初是增加了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因素。而日劳派最初是受修正的马克思主义鼓舞——后来逐渐变成为军事法西斯主义。可以说，劳农派在推行正统(非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主张加速马克思主义发展方面更为坚定。

如果日劳派和社会民众派所起的作用是，作为以前工人阶级和佃农阶级的代表在新体制中进行合作，从而最终促使日本战时政府能够形成某种表面上的全国阵线，那么劳农派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有限的合法范围内抵制这种倾向，直至合法范围缩小到如此狭窄，以致所有对抗都被扼杀。

最后，从某种更带个人色彩的角度上看，日劳派和劳农派的不同能够由麻生久和山川集中体现出来。麻生久是浪漫的冒险主义者，他要创造历史和改变社会，但是缺乏明确的理论体系，麻生久感到人民运动需要高官支持并因此去接近军方，而近卫则是从另一立场去接近军方。另一方面，山川是位冷静的理论家，对他来说，坚持思考几乎是最重要的，他的一个长处是不愿意妥协。当潮流开始急速转向反对社会主义运动时，山川变得胆怯了，但麻生久却力图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潮流，并终于成功。麻生久终于使他那一派最紧密地同努力进行战争的官方合作。结果，当战争结束时，社会民众派和劳农派的成员在

重新组成的社会民主运动中能够轻易地取得领导权，而许多日劳派却在占领军清除极端民族主义者时被清除。

## 注 释

[1]在附录图1《日本社会民主政党的变化》中，以图表方式描述了这些团体。

[2]山本、有田合著：《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史》，第117页。

[3]第1期于1927年12月出版。

[4]有关山川的材料来自私人采访以及其他一些材料。另见科学思想研究会编：《探索》第2卷，第468~492页以及其他各处。有关他妻子菊荣的一章，见荒垣著：《战后名人录》，第198~203页。

[5]福本和夫在他的以《革命是玩笑吗？》为题的自传（东京，教育书院，1952年）中，提到了他对山川的攻击，第63页。

[6]实际上，山川一家同警察的关系很好。在一次采访中，他告诉我，他们旅行时，“跟踪”他们的警察还帮助他们拿行李。

[7]年史出版会编辑部：《昭和三年史》（东京，年史出版会，1929年），第142页。

[8]材料来自荒畑的《左翼的面孔》，第5~23页、第93~100页；荒垣的书，第83~92页；另外还来自笔者的采访。

[9]见铃木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展望》（东京，白扬社，1931年），《论日本财阀》（东京，改造社，1934年），《日本垄断资本的面目》（东京，学艺社，1935年）。

[10]荒畑的书《左翼的面孔》，第11页。

[11]同上书，第14页。

[12]材料来自一般资料，包括荒垣书中有关水谷的一章（第131~134

页)，另外也来自一次私人采访。

[13]河上肇在其自传《我的自传》(共5卷，东京，岩波书店，1952年)中提到了他与水谷的关系，见第1卷第231~232页、第2卷第121~126页。该自传续集的题目是《狱中日记》(共2卷，东京，岩波书店，1952年)。

[14]在战后的政治舞台上，水谷是社会民主党右翼中的一名积极分子。在战后日本，新闻界对水谷的评论是，他性格开朗，有吸引力，但也有些粗暴，在圆桌会谈和广播演说中，语言尖刻。据说，他对解决综合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很有办法，例如，荒垣在他的书中就是这样描述的(第133页)。

[15]山本和有田的书，第178页。

[16]同大山非常熟悉的北泽新次郎、末川博和平野义太郎组成了一个委员会，集体编写了409页的大山传略，即《大山郁夫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56年)。

[17]河上：《我的自传》第2卷，第26页。

[18]无疑，大山的生命是处在危险中，但是其他许多无产阶级领袖也受到威胁——事实上，甚至保守派的政府和企业界领袖也是如此——因此，大山出走的更根本的理由似乎是他对斗争的厌倦以及当时他感到前途暗淡。

大山怎样来到西北大学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大山离开日本前，收到正在西北大学讲授宪法的肯尼思·科尔格罗夫教授的一封信，其中附有一张美元支票，索要有关当时日本的材料。大山到达艾凡斯顿后拜访了科尔格罗夫，退还了钱，并为没有寄去材料表示歉意。科尔格罗夫教授请求大山留下来，为大山在西北大学谋了一个职位。据说，大山在还来得及时，曾几次要回日本，但科尔格罗夫指出，他可能会被杀害或关进监狱，从而使他改变主意，留了下来。在西北大学，分配给大山的工作是收集关于日本宪法的材料和翻译美浓部达吉的《宪法解说》。大山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北泽等：《大山郁夫传》，第252~262页。

[19]有关官方理由的节略摘引，见细谷：《日本工人运动史》第2卷，第195页，以及内相末次会见报界谈逮捕的理由，见森正藏：《暴风雨的日子：昭和时期死难者传略》（东京，万寿书屋，1946年），第102页。关于因人民阵线活动而在东京法庭受到审判的所有那些人的名单，见南贺的书，第243～244页。

[20]政府起诉人将其对劳农派的起诉改变了两次。最初，他指责该派服从1936年访问了日本的中国共产党员郭沫若所传递的共产国际的命令。在短暂的调查后，该指控被撤销。继而，起诉人宣称，该派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建立是为了改变国体和否定私有财产制，因而违反了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起诉人的立场是，《工农》1927年第1期封面上刊登的山川写的有关出版该杂志理由的短评，就是该秘密团体的纲领，而其后的方针，以隐蔽的形式（或伊索式的语言）表现在该杂志的文章中，然而，这个指控也被撤销。于是又出现一个新的指控来替代它，即劳农派虽然不是一个秘密组织，但它的追随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因而它的长远目标是改变国体和否定私有财产制。1942年夏开始审理该案，经过几年艰苦的工作，对案件作出了判决，但他们继而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然而最高法院却在该案最后结束之前就于1945年被炸毁。这个材料来自笔者对山川均的一次采访。

[21]有关加藤的材料，见荒垣的书，第139～143页；赤阪一郎：《领导无产政党的人们：“人民阵线”是什么？》（东京，冈边书屋，1936年），第61～63页；以及科学思想研究所编：《探索》中的许多地方。

[22]战后，加藤的老朋友们批评加藤，因为他在战争仍继续进行时，用从一个军需工厂赚的钱为自己盖了一座漂亮的房子。森正藏的书，第112页。1945～1946年间，加藤和铃木重新紧密合作，但其后，加藤回到日劳派，成为右翼社会主义者，而铃木则是左翼社会主义者及后来的联合而成的社会党的领袖。





# 意识形态、战术和政策

阶级概念、战略和战术

国内政策：从民主主义的政策到极权  
主义的政策

对外政策：从反对战争到支持战争



## 第8章 阶级概念、战略和战术

阶级的概念

基本战略：合法性问题

各无产政党在国会中的竞争与合作

议会外的战术

所有社会主义派系都同样厌恶资本主义，并且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尽管那些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在日本从封建主义转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种活跃的工业经济的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但是他们论证，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方式更增加了它的毒性，因为他们看到，一小撮资本家和他们在政治上以及官僚机构中的小商人走狗与部分商人化的农村地主共同形成了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利益几乎全部被那些有产阶级攫取。

事实上，日本经济变化发生得如此迅速，使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感到极度紧张，大多数人可能都有某种资本主义不会长期存在的感觉。这和西方的情况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是逐步地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的，它带来的益处也扩展到远为大得多的中产阶级中，因而资本主义被很自然地接受，被许多人认为是几乎不可改变的。在日本，在包括贵族、地主和军人在内的许多很难称得上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中广泛存在着对资本主

义的厌恶。事实上，这种共同的对资本主义的厌恶至少是暂时地使青年军官和社会民主运动人士相互接近。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怎样做才能根除这个魔鬼时，这些都以社会主义为长远目标的人不仅同社会上的多数人分离，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产生了分裂。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分歧给共同目标投下了阴影。

最基本的分歧似乎是无产政党应具有的阶级倾向。尽管前面对这个问题已有所注意，但这里必须再次提到它，因为它是制订各种战略和战术的出发点。例如，一支军队的行动极大地取决于组成该军队的兵种和规模——是步兵师、机械化师、装甲师，还是它们的各种联队。《普选权法案》的通过和有可能在选举中争取穷人的支持使社会主义者面临着阶级倾向这个基本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停止过争吵(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争吵更加激烈)。

## 8.1 阶级的概念

吉野作造和堀江归一试图在他们那种号召参加和支持扩大普选权斗争的民主鼓动中寻求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因为他们认为，除非人民相信自己能够影响政府，否则不能指望人民会忠于政府。而只有通过参与政治，即把自己的代表选进国会，人民才会产生有能力影响政府的感觉。吉野作造和堀江归一的主要想法是，国家政策应从全体人民的立场去制订，即使这样做对富有的有产者不利。<sup>[1]</sup>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把私有财产作为魔鬼来剥夺，而是主张在制订国家政策时也应该考虑那些无产者的利益，他们论证，没有代表，群众利益将会被忽视。

虽然堀江在建立社会民众党后不久就死了，而吉野也于1933年去世，但是这样一种所有的人——无论属于什么阶

级——都具有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思想却没有从社会民众派的理论中消失。例如，没有任何主张剥夺资本家选举权的迹象。

除了象平野的日本农民党这种自称只代表农民的党外，工人组织的支持是决定所有无产政党的主要因素。但是由于农民在日本政治中的强大潜力，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农党和其他党名义上也代表农民。当1926年12月建立社会民众党时提出的党的名称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劳动党”。这是铃木文治提出的，代表总同盟和其他工会的要求。另一个是赤松克磨提出的，显然是“社会民众党”，但是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里的“民众”是指平民或人民，而不是指人民统治的政府或人民统治(这样应称为民主而不是民众)。后一个名称被选中，因为它似乎更符合日本的社会结构，日本工人不象英国工人那样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英国，社会民主党当然要称为工党。

社会民众党在建党声明中宣称代表“包括工人、农民、职员、小商贩和各种专业人员在内的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反对“贵族、家族集团、地主、资本家以及受这些特权阶级操纵的各种既存政党”，“小企业主”也包括在其中。<sup>[2]</sup>

社会民众党从最初就采用并力图推广“勤劳阶级”即“忠诚劳动的阶级”的概念来代表拿薪水的工作人员，以同倾向于仅指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者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概念相区别。安部矶雄利用这个概念，以代表所有靠自己劳动赚取收入者的“勤劳阶级”一词来修改“无产阶级”或“没有财产的阶级”一词。这个概念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无财产者的概念范围，因为它也包括许多能够拥有一定财产但尚不足以维持生活因而必须工作的人。这样，整个阶级的共同点不是必须没有财产，而是缺少生活安全保障；一个人即使有座好房子，但如果他是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活，那么他死后，他的家庭就失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

挣钱者，并会因此遭受困苦。<sup>[3]</sup> 国家能够制订一些这种人需要的社会福利政策。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社会民众党向白领阶级敞开大门。安部认为，虽然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但他们对于党非常重要，这必然产生使所有缺乏基本“生活安全”的人共同组成联合阵线的思想。安部估计，这种联合阵线在选举中能够得到95%的选票。

在左翼，劳动农民党领导人蔑视“勤劳阶级”这个词。他们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它很含混，不能清楚阐明阶级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劳动农民党领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阶级首先是资本主义本身为自己造就的掘墓人，即产业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剥夺了他们的生产工具，消除了他们工作的个人特点，把他们集中在工厂中使他们能够学会集体行动、提高阶级觉悟和加强阶级团结。虽然如马克思所宣称的，资本主义正在提高无产阶级的水平，使其适合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历史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但是如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仍旧需要领导和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这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必须建立群众政党的原因。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必须有同盟者。在日本，同在俄国一样，最主要的潜在同盟者是农民或农业工人——更具体地说，是佃农、半自耕农和小自耕农。这样，劳动农民党要成为工农联盟的代表，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劳动农民党领袖把“无财产者阶级”同“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党”区分开，而所有这三个词在英文中不很严格地都翻译为“无产阶级”。第一个词，即“无财产者阶级”，包括佃农和一般穷苦大众，而后两个词是指劳动农民党成员，即“工人阶级的先锋”。<sup>[4]</sup>

尽管如此，党却注意吸收一切同意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工作的人。党的方针显然是“敞开大门”，并因此而允许评议会和其

他三个左翼组织的成员(除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外)加入该党。党除避开共产党这个政治问题外,并不反对尽力渗入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种阶级和阶层的主张和尝试。<sup>[5]</sup> 党甚至也对资产阶级中的下层做工作。<sup>[6]</sup> 然而,党清楚地声明其兴趣主要在于无产阶级,从而,其他无产政党能够以此为根据,宣称劳动农民党的一个弱点是它没有向白领工人和知识分子敞开大门。

在20年代后期,日本劳农党的领袖们反对社会民主运动中上述两种极端的立场,他们试图扮演一种中间派的角色。他们的口号是成为一个“大众的阶级政党”,他们在1927年11月的政策声明中问道,“我们为什么必须是一个阶级政党”,<sup>[7]</sup> 他们自己的回答是,在当时条件下,资产阶级正绝望地试图巩固自己,只有代表工农联盟的党才能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在日文中,“阶级”也有同“调和”相对的“斗争”这种含义,而“调和”是日劳派给社会民众派贴上的贬意标签。日劳派宣称,他们强调阶级促使他们同社会民众派分裂。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是一个‘大众’政党?”他们声称“大众”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同工农一起并在工农联盟领导下的中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组成的日本人民的大多数(这是日本资本主义产生的特定社会结构)。进一步说,它包括以下一些阶层:小商贩、政府低级官员、职员、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及一切能够参加政治斗争共同反对富豪统治的人。“大众”的另一个意思是指那些同经过分离而辩证地筛选产生的“先锋分子”相对的一般群众。更准确地说,日劳派认为,为对抗富豪,需要组成广大的民主队伍。他们因这个观点而同劳动农民党分裂,虽然相互对立,但他们仍称劳动农民党是一个“先锋党”。



1932年当社会民众派和日劳派(及少数新劳动农民党分子)联合建立社会大众党时,他们完全以阶级的词语来说明党的观点。<sup>[8]</sup> 党的两条原则中的首要一条就是,“我们党为保卫工人、农民和一般劳苦大众的生活而战斗。”这里,党采用了社会民众党惯用的词。党在纲领中宣称,只有在工农联盟领导下才有可能进行社会改革。党没有把“无产阶级党”宣称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社会大众党只从其他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这个角度去说明它们,它认为民政党和政友会这两个既有政党都是代表资本家和地主的联盟,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当时,其他右翼政党已经存在,即国民同盟和一些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被认为是以“法西斯主义者”和代表“中小工业资产阶级及消费者中产阶级”为其特色。

麻生久甚至在1935年陆军小册子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看到军队部门中有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它能使无产阶级运动实现自己的目标比迄今所设想的更快。他指出,军方显然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他认为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结构软弱的迹象。他还相信,军方自试图独掌政权的“五·一五”事件(1932年)以来在政治上已变得成熟。他们现在变得更“民主”,并宁可以合法的方式推进。小册子已经产生影响,并将进一步震动颓废的局势。麻生久论证,这一切是可以利用的。<sup>[9]</sup> 1936年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麻生久受到尖锐质问一事显示出麻生久的观点远远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但是,外界一般认为麻生久的主张是党转向右倾和改变对日本社会政治结构评价的一个标志。其后,麻生久的一派常常被视为是“法西斯主义者”,因为他们相信不满的军方能够帮助实现社会主义。尽管如此,麻生久仍继续强调法制,而不是专制独裁。承认军方为盟友是逐步以全体人民

(包括资本家)团结一致为国家服务这种极权思想来模糊阶级概念的一部分。

但是，在1937年底社会大众党修改后的纲领中，强调阶级的词语几乎消失了，“工人”和“农民”两个词被完全抛掉，只剩下“劳苦大众”一词来描述党声称代表的那些人。新的目标是，“在国家政体基本原则上的日本国民的进步和发展”。一个新纲领的《说明》声称，“虽然直到今天我们的运动强调阶级利益，并为之努力奋斗，但阶级利益不是运动的最高目标，它只是我们希望促进全国一切劳苦大众的成长和发展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政策”，<sup>[10]</sup> 极力表白党不是在转弯或改变方向。但是，在其后的一些声明中，更清楚地表明，阶级立场已被抛弃，党不再认为自己是“社会民主”党。尽管如此，社会大众党在停止活动前，一直被视为一个阶级的运动。

## 8.2 基本战略：合法性问题

我们已经分析了1937年和1938年之前社会民主分子希望代表某些特定阶级的利益，而各派之间对哪些阶级相对来说更为重要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他们认为怎样才能促进那些阶级的利益和怎样为之奋斗呢？

从最根本上讲，分歧来源于如何看待诸如以下一些问题：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疾速革命还是逐步演变；使用暴力还是使用和平手段；采取非法方式还是采取合法方式，即是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还是仅限于使用议会手段。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共产党在上述每两种立场中都赞成前一种，而右翼明显地拥护后一种。左翼社会主义者(包括作为合法左翼分子活动的共产党人)的态度较为模棱两可。他们和共产党人同样不把那

些问题视为原则问题,而只是作为特定环境下可以选择的方法。但是他们对特定时期日本存在的特定环境的看法却和共产党人不同。共产党人认为完全不存在进行合法斗争的客观环境,而左派和中间派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则相反。

1926年社会民众党成立时采纳的纲领原则明确宣称,党“坚决同无视社会发展进程的各激进政党……断绝关系……并且建议……用合法手段……进行改革”。安部说明《党纲》时写道,“靠少数人就可以进行一场革命,但是没有多数人的支持,革命不可能长久坚持。重要的是能否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如果得到这种支持,重建社会的目的即使通过议会手段也能够完全实现。哪里有任何彻底革命的必要呢……古话说,‘你如果赶路就不要停歇!’议会道路似乎有些绕远,然而它却能够更快地到达目的地。”<sup>[11]</sup>这样,靠议会手段就可以形成一场“革命”。

但是,对安部的各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对手来说,“革命”并不是必然包含暴力。革命确实意味着完全地或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但是,也许除去1930年2~6月田中清玄担任领导时期的所谓“武装插曲”外,即使是日本共产党也不选择使用暴力。<sup>[12]</sup>共产党人决心超出资产阶级制订的压迫性的法律所实际允许的范围,更自由地采取行动。但由于日本政府靠现代法律执行机构对付非法活动,因此,非法活动要同暴力镇压对抗就不能采取和平方式。共产党人试图在非法或合法斗争中采取秘密活动的办法以避免受到暴力镇压——那通常意味着被捕(有时还伴有酷刑)。能够和平运用的唯一非法手段是类似M·甘地在非洲和印度发展起来的那种“消极抵抗”。日本无产政党中,从左翼到右翼,没有一派表现出在理论上支持这种和平主义的非法行动——这是日本社会思想中一个有趣的侧面。

除去共产党这支先锋队外,其他所有政党当然都是合法的。

共产党试图领导劳动农民党，而劳动农民党没有正式在理论上接受或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劳动农民党确实为共产党扩大影响提供了便利条件，共产党让一些选民清楚地知道，1928年选举中某些劳动农民党的候选人也是共产党员。

由于大山郁夫虽然是劳动农民党及其后继组织的领导人，但却从没有作为共产党人被逮捕过，而他的许多追随者都被逮捕，因此考察他的思想路线可能会最有益处。大山在评论劳动农民党成立之前夭折了的农民劳动党时表示，他相信，需要建立的是一个“改良党”，而不是一个“革命党”。他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以某种主义为基础，而是以他对日本现存社会结构的评价为基础。他攻击从否定议会手段中产生的那种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的思想。他没有说直接行动是错误的，只是说在人民已获得普选权的形势下，直接行动是不合逻辑的。他相信无产阶级运动如果不遭到恐怖主义的镇压，将会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sup>[13]</sup>

然而，劳动农民党却遭到恐怖主义的镇压，虽然镇压的主要目标无疑是非法的共产党人。大山对新形势的估价使他同共产党人分道扬镳。1929年4月16日的大搜捕清除了劳动农民党后继组织——争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中那些最积极的共产党分子，并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领导。许多年轻人感到同盟仅仅由于失去共产党的领导就完全停止活动将是错误的。他们建议在共产党重建之前先创建一个合法政党，大山最初反对，但很快就赞同该建议。<sup>[14]</sup> 然而残存的共产党员却主张在共产党重新正式制订战略之前什么也不做。争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在那些残存共产党人的影响下继续作为非法组织而存在，只是把名字改成为简单的工农同盟。它继而驱逐了大山、细迫兼光、河上肇博士以及其他一些人。

那些被驱逐者最终在1929年11月1日建立了新劳动农民党。但是在次年夏天，许多党员因党缺乏有效果的活动而灰心，同时受到重新活动的共产党的影响，开始要求立即解散党。特别是在1930年8月29日，大阪支部联合会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解散党的建议，其理由是，一个基本合法的政党，不能够很好地支持罢工或为大众利益进行其他活动，而且会和其他无产政党一样走向“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党实际从最初成立时起就达成一项谅解，即它最终将为给“更高水平”的“工农战斗联盟”让路而解散，如果可能，就并入真正的共产党。这被称为“为进一步发展而解散”。

但是细迫、小岩井净和其他人在8月，而河上在10月，也坚信党应立即解散。河上引用列宁的话来支持他的理论，强调“改良主义的日常斗争”是革命的障碍。<sup>[15]</sup>他认为，新劳动农民党只能领导改良主义的斗争，因此是起着反动作用，应该尽可能迅速地解散。他现在同鼓吹党员应该加入工会并在那里领导革命斗争的细迫站在一边。<sup>[16]</sup>

党的回答(这意味着大山的回答)是，河上把“革命斗争”同“改良主义”的日常斗争截然分开是曲解了列宁原意，因为，诸如1926年英国工党和共产党共同领导的大罢工这样一些特殊的斗争，既是革命斗争也是改良主义的日常斗争。党的领导坚持认为，列宁实际力图说明的是，无目的自发的工人斗争一般不会超出“经济”斗争和“改良主义”斗争的范围，但是在正确的领导下，它也能够变成“革命斗争”。新劳动农民党的作用就是引导全日本这种自发的工农斗争不断发展，防止它被“社会民主分子”(其他的无产政党)所伤害。<sup>[17]</sup>在这场争论中，大山同其对手在所要达到的目标上没有分歧。双方都要建立一个“工农战斗联盟”，只是对实现该方法看法不同。大山的对手

没有提出代替新劳动农民党的建设性方案，而新劳动农民党至少还能够继续开展群众斗争，避免群众丧失斗志。<sup>[18]</sup>

在合法与非法的问题上缺乏原则性确实导致一种混乱局面，领袖们关于在法律允许的狭窄范围内开展斗争的可能性的看法经常变化。例如，大山1929年1月谴责水谷退出争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和建立合法政党(劳农大众党)。他在有劳农派参加的日本大众党成立后一个月，攻击该党赞同合法斗争。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山及其同伴其后却又因同样原因遭到争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的谴责和驱逐。

比较上述各派关于合法斗争的基本立场，可以说，社会民众派有一个原则，即以合法手段达到目的，而“合法左翼”的领袖们则主张定期地重新评价合法斗争的尝试。对于“共产党人”，问题更简单，因为共产国际会作出决定——尽管日本共产党人会参与决策过程——而日本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地方支部将会去执行(共产国际攻击新劳动农民党的成立)。换一句话说，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众派明确地支持合法斗争。共产国际承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在该问题上遵循“上级的调子”，尽管他们支持初期的劳动农民党。而诸如大山——河上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等亲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自己去进行分析。<sup>[19]</sup>在这中间，那些同日本共产党对立并自封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即劳农派的立场是什么呢？

读者必然还记得，后来成为劳农派领袖的一些人最初曾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成员。然而，在山川1923年号召解散党以及福本和夫在反抗“山川主义”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后，分裂扩大了。争论主要集中在战略问题上。山川尽管当时仍是共产党员，但却写了那篇有名的主张“改变方向”的文章。他断言，领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先进分子是孤立的，他们应该转向群众和提高群众

的政治觉悟。为此，他们必须积极关心群众的日常要求和参加那些零散的斗争，以这种方式引导群众走向漫长的革命道路。这暗示着应采取“改良主义”的政治行动，包括在可能时建立合法政党。<sup>[20]</sup>

山川主义的另一个要素可以在他鼓吹的“单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或“联合阵线的党”中找到。山川认为，这样一个党能够把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集团——有组织或无组织的工农大众和中产阶级的最下层——团结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这将是一个合法政党，它和先锋党(即共产党)不同，不需要有最高纲领，而宁可只有一个能代表群众眼前具体要求的最低行动纲领。<sup>[21]</sup>这样一个党，在日本当时的特殊条件下，能够做到先锋党所做不到的事情。劳动农民党和新劳动农民党的支持者们当然也如此认为。然而，山川认为，成立一个先锋党的时机还不成熟，事实上成立先锋党将会给革命带来损害。因此山川主张解散(或取消)共产党。<sup>[22]</sup>大约在1926年，大多数共产党人都站到福本一边，强调在理论上需要一个建立在“先分离后统一”辩证基础上的非法的先锋党。

使劳农派在战略战术问题上同共产党人分裂的一个最重要事件似乎是所谓的《布哈林纲领》或1927年《7月纲领》的公布。在《7月纲领》中，共产国际既批评了山川主义也批评了福本主义。尽管福本承认了他的“错误”，但是山川却试图利用该文件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虽然他批判《7月纲领》的某些观点，否认从远离日本的地方有权进行领导。《7月纲领》批判福本主义是“宗派主义”，因为它倾向于建立的党只不过是一个纯洁的孤立于群众之外的意识形态集团，而攻击山川是“机会主义”，因为他已经发展到主张建立一个虽然是左翼的但却是基础广泛的“工农”政党，同时主张解散非法的先锋党。但是《7月纲领》在

某些地方写得很模糊，因而为不同解释留下了余地。双方都利用《7月纲领》来证明自己立场的正确。

在大约1927年~1932年共产党人和劳农派争论的第一阶段中——第二阶段是从1932~1936年，在第二阶段，双方关于资本主义的解释比关于政治战略和战术问题的争论更多——劳农派一边最善战的战士之一是猪俣津南雄，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任教。猪俣实际是支持合法无产政党，但表面上其立场似乎比共产党的立场更激进，因为共产党更强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有必要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猪俣主张两者同时进行。<sup>[23]</sup>

共产党人贬低日本资本主义的力量，认为它还没有成熟，远未达到其最高发展阶段。尽管如此，由于资产阶级显然已不是进步力量，无产阶级必须自己承担消灭诸如表现在地主和佃农关系中人剥削人的土地生产模式那种封建的、不民主的残余势力的任务。全部统治阶级上层建筑都建立在这种剥削的基础上，其最反动的部分是枢密院、贵族院、参谋本部，而首先是帝国官僚机器本身。

另一方面，猪俣在批判1927年纲领时认为，真正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手里，而不在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分子(包括天皇制度)手里。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促使日本资本主义进入高速发展的垄断阶段，而且也促进了普选权和政党内阁制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因素的发展。他在1927年预言，几年内，文官至上将被公开承认，独立的参谋本部将被取消，大地主阶级的权力将会相对缩小，而其本身将转化为真正的资产阶级。他确信封建残余分子在当代日本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

这是导致猪俣和劳农派采取远比共产党人更为强调群众性合法无产政党这种立场的原因。他们认为，建立一个会被警方



破坏的非法政党是十分莽撞的——当1928年3月15日和1929年4月16日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逮捕时，他们感到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开始先建立各个地方无产政党，继而逐步合并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并使其力量强大到足以对改革施加压力，这样做将会更安全。其后，这个党最终会象西方共产党那样制订一个最高纲领。

以这种基本理论为基础，一些劳农派的拥护者1928年退出劳动农民党并建立起各地方政党，其中包括1928年7月在东京成立的无产大众党，猪俣、铃木和黑田是这个党的领导人。他们努力使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但不是无条件的。当他们或其他劳农派领袖被一些较大的党驱逐时，他们再次建立起地方政党，但仍不放弃同日劳派乃至社会民众派重新联合的希望。

然而，指出一个事实是很有趣的，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从1931~1932年上半年——猪俣和其他劳农派领袖同意共产党人的大部分观点。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他们自己对被称为1931年纲领草案的文件持赞同态度。<sup>[24]</sup> 该文件同1927年纲领的结论正好相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抛在一边，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的完成实际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猪俣认为该纲领证明了劳农派立场的正确，认为共产党人现在必须同意劳农派的观点。

尽管如此，但共产党人和劳农派在应采取什么战术的问题上继续争吵。例如，劳农派相信由于农村地主已经极大地丧失了封建特色，一场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并不是如此重要，佃农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真正的敌人——垄断资本——而不是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浪费他们的精力。同样，由于天皇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他将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被清除，而不需要象共产党人所做的那样事先把天皇单独作为一个特殊的攻击

目标，在日本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行动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共产党被视为一个非法组织。总之，劳农派认为没有必要进行非法活动并决心在其本身和非法共产党之间划清界限。

修改后的1931年纲领草案，即众所周知的1932年纲领（由于它是野坂参三在共产国际总部写成的，因而被共产党人作为权威文件而接受），又使劳农派和共产党人之间的争论激烈起来。该文件又恢复过去那种无产阶级斗争的直接目标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更加强调必须摧毁天皇制和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

双方尽管强调的程度有差别，但都把在这一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看成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争论”。大约在1930年后，这场争论变得更带学术性（因而更可敬）和更带理论性（因而更抽象）。双方开始在诸如《中央公论》和《创造》等一般刊物上发表论战文章。另外，共产党人方面的立场因1932~1935年间的陆续发表的一组“讲座式”论文或长篇连载专题文章而更加突出，该组文章最初是由以前野坂在庆应大学的一个学生，才华出众的年轻经济学家野吕荣太郎编辑的。<sup>[25]</sup> 虽然野吕是一个共产党员，但连载文章的许多作者却不是共产党员，有些人还倾向于劳农派的立场。总之，这场争论也被称为“劳农派同讲座派的争论”。

劳农派理论家们坚持他们的立场，顽固地主张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发展到顶点——尽管承认其很少带有民主色彩——而垄断资本现在已把日本人民牢固地掌握在它的手中，因而必须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需要通过一个过渡阶段去努力实现民主。

劳农派的立场表面上似乎比共产党的立场更激进，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劳农派贬低天皇的重要性从而避开了同严厉的《不

敬罪法》的冲突，而共产党必须同该条法律斗争。同样，由于认为佃农的主要敌人是“垄断资本主义”，而反对地主的斗争是次要的，从而转移了注意力，因而他们不赞同农村中那种最尖锐最敏感的对抗，即佃农同地主的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各种极右翼团体有利，极右翼势力试图使全体农民反对“枯萎”的城市生活以及伴随它的“柔弱无力的享乐主义”和缺乏传统的价值观念。

争论因警方和极右派对共产党的镇压而暂时窒息。1934年野吕被警察酷刑折磨死，而其他共产党人也被逮捕。劳农派成员却安然无事，其中大多数人直到3年后当局对人民阵线成员进行逮捕时才受到猛烈攻击。<sup>[26]</sup>

在总结各无产阶级派系关于合法问题的立场时，关于日劳派还要再讲几句。非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众派)同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所有其他各派)之间在支持合法方式这个原则上有一个基本分歧。前者认为合法是一个原则，而后者认为只是一种战术。自认为是中间派集团的日劳派在宣传鼓动中似乎更偏重于把合法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作为一种原则，但却不强调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种“发展阶段”。日本劳农党3点纲领的第1点宣称，“根据我国国情”——这个词听起来同“国体”非常相似——使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得到解放。第2点要求以合法手段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分配和土地所有制度。这是暗指在日本的特定条件下最好是运用合法手段实现变革。1928年12月日本大众党在其纲领中重复了同样的词句。当所有各派共同组成社会大众党时，有关各派一致同意采取合法手段，以致合法性问题既没有写入当时的纲领，也没有写入经过修改删去“解放无产阶级”和明确提到“国体基本原则”的1937年纲领。

### 8.3 各无产政党在国会中的竞争与合作

考察每个无产政党阶级本质的各方面及其在该党决定合法存在中所起的作用后，我们可以期望找出体现在各无产政党间的竞争和合作中并使各党形成自己战术的那些思想。

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取决于人们观察问题的不同角度，而这至少在1925~1930年是使无产阶级运动分裂的最主要因素。虽然这一点在其他地方已经强调过，但这里能够从战略战术的观点再简单作些说明。这个问题在透露出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成立时首次成为中心问题。

那些已被称为“右翼”的无产阶级领袖因共产党组织的出现而被迫在理论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一位社会民众派作家樋田研一把1922年总同盟中的右翼领袖认识到共产党正在认真而具体地试图获得总同盟领导权时的印象再现出来。樋田虚晃一枪，就右翼领袖努力建立一个堡垒反对“赤色”影响问题，向那些右翼领袖问道：“你们这样做不是和现在的统治阶级站在一起了吗？”如果那些右翼领袖们被问到这种问题，他们可能会在思考一分钟后以响亮的声音回答，“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是统治阶级实行反对共产主义和镇压左翼的政策的原因是，他们试图拯救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则是在努力实现作为我们最终目标的社会民主。”<sup>(27)</sup>

正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出现，才使社会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迫在日本出现或至少是形成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而不是社会民主意识形态的盛行促使共产主义作为其对立物而产生——但在行动上其最初的表现，是右翼领袖团结起来维持在总同盟中的统治地位。右翼领袖们为此在评议会建立时甘愿牺牲

几乎一半组织，而后来当日劳派组成并退出时又甘愿牺牲另外的相当大一部分组织。这样，除阐明社会民主理论外，反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原则基本是为反对迫在眉睫的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分子控制工会同盟的实际斗争服务。

然而，反共产主义也可以被社会民众派作为一种武器用来在同不满的保守统治当局斗争中保护自己。赤松在批判1926~1927年形势下的劳动农民党时曾说，“由于共产党采取特殊、关门、专横和不切实际的战斗方针(他们控制的劳动农民党只能够)作为一个少数党而存在……实际上不可能具有群众性。此外，他们那种鲁莽地不顾客观环境的斗争策略反而给统治阶级镇压他们造成理由，因而他们可能会给尚未具有实际力量的(劳动农民)党带来毁灭”。<sup>[28]</sup> 似乎有理由假定，右翼和中间派无产政党的反共产主义由于政府对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严厉态度而加强。

共产主义问题不仅促使劳动农民党分裂并促使建立社会民众党和日本劳农党，而且促使后两者保持相互分离。整个无产阶级运动非常软弱也使这点变得十分明显，持续的分裂分散了无产阶级运动可能聚集的任何力量，而每个党都试图以呼吁无产阶级团结而在那些有可能投票支持自己人中捞取政治资本。

社会民众党人形成了如1928年党代表大会上所描述的那种“右翼大团结”的理论。当时社会民众党不考虑同日本劳农党联合，尽管后者的提议证明所有“福本分子”都已被清除。社会民众党人暗示，日本劳农党缺乏“自信心”，其建议只是自我保护的一道最后屏障。他们的论调是，单一政党原则是以“共产党搞的阴谋”，来加强自己。

倾向于共产党的劳动农民党确实是最积极呼吁成立“一个

战前日本

无产阶级联合的政党”以对抗“资本家的联合阵线”，但是福本主义鼓吹联合之前先纯洁意识形态。这种“联合前先分裂”是企图形成一种辩证的战略战术。其后，它从没有认为团结是万灵药。联合的反复重申的主要条件是，在联合中保持批判其他派系的权利。

这样，每个党都有自己的联合条件，希望在同其他无产政党比较中，显示出自己的优点和特色。劳动农民党试图表示只有自己才是最有战斗力和最勇敢。日本劳农党努力证明自己不仅有战斗力而且还很切合实际和小心谨慎。社会民众派则强调整制的效力。只是在1930年和1932年国会议员选举成绩感到极大失望和国家社会主义者背叛之后，各无产政党才勉强克制住自己，联合成为社会大众党。其后，当1936~1937年加藤和铃木建议成立人民阵线，接着为实现人民阵线而积极活动和进行谈判时，问题又重新出现。社会大众党拒绝了该建议，称其是“受共产党所鼓动”，尽管事实上劳农派规定人民阵线应将非法的共产党排除在外。

劳动农民党和日本劳农党都力图从其他政党和从属于这些政党的工农组织中赢得支持者，其办法是向这些组织的普通成员呼吁和谴责这些组织的领导。左翼用这种战术反对各组织中地位更牢固的右翼领袖。甚至也包括社会民众派在内的所有政党都指责其他政党和组织没有广泛基础或缺少群众支持，特别是指责他们只代表在他们控制下的那一小部分人讲话。

尽管各无产政党相互竞争并拒绝联合，但他们从1928年首次有代表被选进国会时起，确实在国会中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合作。

各党从最初就坚持主张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无产政党成员要服从党的意志，而不应是国会代表领导党。这显然是一般的社

会主义观点。在第一次选举后，每一个党都建立了自己的国会政策委员会，为制订国会政策召集了紧急全国代表大会，以使全体党员能够参与民主决定党在国会中的政策。

第一次全民普选刚结束，当选的4名社会民众派、1名日本劳农派、2名劳农派和1名地方无产政党代表就联合组成非正式的无产政党国会议员团。<sup>[29]</sup> 他们继而更进一步至少是在纸上制订出一个建立无产政党国会政策联合委员会的协定，该委员会将有权决定整个议员团的投票。那些勇猛但仍旧缺乏经验的无产政党议员们面临着对他们战术的第一次考验。

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投票选举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中应采取什么立场。由于两个主要的党(执政党和反对党)政友会和民政党力量几乎相等，无产政党的投票能够起决定作用。8人的议员团意见不一致。4名社会民众派决定投票支持反对党的候选人，但是其他人以两个候选人同样都是应当谴责的资本主义的代表为理由决定弃权。结果，执政党的候选人以2票的优势取胜。由于看到自己的投票所具有的决定作用，以前弃权的4个人决定同其他4人联合支持一个更能接受的副议长候选人，该候选人不是民政党成员，但却是反政友会势力的共同候选人，他一直大力鼓吹实行普选法。该候选人当选了。这样，象“正规”资产阶级政党那样，玩弄议会花招的诱惑，从最初第一次国会投票就不断增强。<sup>[30]</sup>

无产政党间的合作在3月15日(1928年)大逮捕后几乎立刻又受到考验，逮捕发生后，政府禁止了劳动农民党。虽然劳动农民党的两名代表山本和水谷仍旧是国会议员，但在4月12日无产政党国会政策联合委员会会议上，社会民众派却提议被禁止的劳动农民党的两名代表不再出席国会，委员会解散了。

尽管如此，但在国会下一次会期开始时，委员会又重新建

立起来——然而却又面临着另一次考验。其成员之一山本于1929年3月5日夜里被3名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血淋淋地杀死在他自己的住宅里。<sup>[31]</sup> 那些日子他是8人中最积极在国会会议中抗议国会1928年6月29日通过《帝国紧急法》的人，该法令要求强制实行《治安维持法》，进行颠覆者将被判处死刑。山本当时代表被解散的劳动农民党的后继组织争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他昔日的同志水谷退出该团体，建立起自己的以京都为基地的党。关于无产政党议员团中谁最适宜就山本之死在国会发表演讲，痛骂卑怯的行为并告诫国家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威胁，各方意见不一致，河上丈太郎在最后一分钟被选中，登上讲台发表了雄辩的处女演讲，该演讲在报纸上被广泛报道。

其后，无产政党少数派议员之间的合作增加了，并且成为一种习惯。他们的立法建议虽然在委员会中每次都被各大党所埋葬，但在竞选中却是很好的宣传材料。他们无论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分歧，但总是一致谴责地方警察和内务省干涉选举进程，他们也谴责那些使少数派党团居于不利地位的国会规定。

无产政党的联合在1937年大选后产生的第70届国会期间又瓦解了，当时加藤拒绝同社会大众党议员合作。而在此之前，水平社的松本治一郎尽管不是社会大众党成员，却在国会中同该党完全合作，直到1940年社会民众派因斋藤事件被驱逐。

很难评价各无产政党在国会中的战略战术有什么效果。他们的主要战术是他们称之为的“揭露”。他们的这种战术是利用国会作为一个讲坛，谴责和揭露各种资产阶级政策、丑闻和事件。通过国会斗争，他们寻求公开宣扬他们反对官方的提案，同时大力宣传自己的反提案。社会大众党只是在1937年国会议员选举后才在国会中拥有足够的席位，被承认为是一个国会谈判团体。他们因此能够派一个成员参加国会议员指导委员会，



从而能够参与领导国会,包括选举各委员会及决定质询程序等。

## 8.4 议会外的战术

劳动农民党从最初就远比其他无产政党更多地依靠在议会外为各种目标进行斗争,通常都力图将这一斗争同为实现更大更广泛的目标而进行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斗争目标集中和更为有效。例如,当田中首相宣布银行假日时,劳动农民党为诸如小商贩,小生产者,职员等小存款户组织了抗议集会。它试图以一个包括一切的口号“为政治自由而战斗”来联合所有争取言论自由的其他运动,把工人、农民以及专业人员(在教育、艺术等领域工作的人)组织在一起。大山这样表述党的思想:“要求自由本身就是要求生存;而要求生存本身也是要求自由。”<sup>[32]</sup>

无产政党议员们通常在国会中支持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案,同时自己也提出不信任案,因为这使他们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判。各无产政党不只是简单地争取选票,而且还为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促进建立党的地方支部而发起请求解散国会的运动。该运动的战术是,在街头征集人民在请愿书上签名和散发传单。尽管警方发出警告,但是仍时常在一些地方出现“请愿日”以及征集签名,进行家访,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和举行讨论会等各种活动。“警察以警棍和皮靴”对待这些活动。劳动农民党虽然最初在促进这种签名活动中最积极,但它随后认为这种办法太“天真”,很容易被警方挫败。然而其他无产政党——受警方的骚扰较少——在1937年全年,特别是对执政内阁极端不满的时期,继续大规模征集签名。

每个党都试图使支持它的那些工人组织帮助它推进所发起

的抗议运动。显然，劳动农民党极力利用日本工会评议会及其成员在工厂代表会议与工作协会中的发言机会。党也支持日本农民协会发起的反对“妨碍佃农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劳动”和“反对地主收买田间青苗谷物”的运动，党希望作为回报，在选举中能得到佃农的支持。党也没有忽视城市居民。党在发起要求政府保证小零售商、小工厂工人、职员等小额存款户利益的不很成功的存款人集会后，紧接着又领导和组织了租房户要求降低30%房租的斗争。

各无产政党除援助支持他们的工人组织开展罢工斗争外，有时自己也在城市和农村组织罢工或抵制斗争。例如，为了抗议公用事业公司征收高额使用税，他们发起了抵制使用电力或天然气，同时要求地方公用事业归市政府所有的斗争。各党宣称，公用事业归市政府所有，不仅可以降低使用税，而且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尽管向两个目标中任何一个目标的明显迈进似乎都将会损害另一个目标！）社会民众党对那些有关公用事业的斗争——作为一种没有风险的市政社会主义——特别感兴趣，领导了其中的大多数斗争。<sup>[33]</sup>

每个党都有自己的党歌和党旗，并且为吸收党员还订有“党日”。他们由于感到要形成自己的选民，因而虽然同那些大党相比其财政收入很少，但却尽量地努力进行宣传鼓动，方式有：公开演讲、组织示威、举行大会、游行、散发传单、贴标语、放映电影以及使用各种文化手段（诸如雕刻、油画、音乐和诗歌），还举行招待会和茶会，也组织专题讨论。

当国家在30年代后期的战争环境下民族主义更加强盛时，一切不符合全国团结和战争努力的活动日益受到刁难。日语本身也充满了神秘荒唐的词语。甚至工人会议也以向神道天神祈祷开始。当社会大众党最终鼓吹解散所有政党和独立的工农组

织时，他们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认为通过中央政府，所有各阶级的活动都将被“引导”到加强战争努力的轨道上来。

这种思潮可以用一种各党都有获得间接利益的议会外斗争策略，即“五·一”节示威来说明。各党成立时，“五·一”节示威已进行了6年，它一般是由工会而不是由无产政党组织。虽然如此，这却是一个各党表达支持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的时机。各无产政党于1926年成立后，日本农民协会不再单独于4月9日庆祝农民节，而是参加5月1日举行的“五·一”节示威。其后，农民的口号，甚至那些小商贩的口号，都和工人的口号混同在一起，就象各无产政党纲领中所宣称的那样。

“五·一”节的盛衰反映了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盛衰。1920年日本第一次庆祝“五·一”节，当时只在东京举行了庆祝活动，由铃木文治领导的友爱会主持了庆祝仪式。一些工会参加了庆祝活动，他们宣称参加示威的有10,000人，但内务省报告只有1,000人，铃木本人估计有5,000人。<sup>[34]</sup> 废除禁止工会活动的《治安警察法》第17条是主要目标。工人们唱着工人歌曲，摇着红旗，从上野广小路游行到万世桥，虽然游行只有半小时，但沿途还是和警察发生了若干次战斗。这为后来树立了榜样。

其后，1927年有48个地方举行了“五·一”游行，在一度衰退之后，1932年举行“五·一”游行的地方有70处。根据内务省的数字，1926年参加“五·一”游行的总人数是42,330人，一度减少后，1932年又达到41,000人。<sup>[35]</sup> 1935年参加“五·一”游行的人数开始稳定在21,600人左右，但是那一年的“五·一”节游行——第16次——是战争爆发前当局所准许的最后一次（所以，战后于1946年首次举行的“五·一”节游行被算作是第17次）。<sup>[36]</sup>

“五·一”节示威的通常方式是，举行大会，演讲人在台上

发表讲演，台背后挂着长条横幅，上面写着组织委员会选择的一些宣传口号。这些口号和其他决议案都用麦克风当众宣读，被激奋的听众“通过”。同时也高声宣读其他工会和无产政党对大会的贺词。随后举行游行，每个工会排好自己的队伍，举着自己工会的旗帜或象征工人的大红旗——红旗决不是只限于代表共产主义（在初期，也经常有人举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大标语，横幅和其他各种精巧的标语牌在游行者头上浮动。

示威者同维持秩序的那些很少考虑公民权并常常把示威者视为“反叛者”的警察之间情绪相互对立，这导致发生一些小规模战斗，总有人被逮捕。示威者本身经常发生分裂，这是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人士以及各派社会民主人士之间存在着深刻分歧的反映。1934年因受“满洲事变”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兴起的影响，一些工会开始在他们称为日本劳动节的4月3日举行示威，这一天正好是神武天皇的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口号之一是“打倒卖国的‘五·一’节！”

在工会很软弱或不能够举行传统游行的地方，“五·一”节庆祝活动则采取其他方式，如工会集会、发表演讲、举行讨论会、举办登山野游活动、进行相扑比赛、举行招待会或简单的社会集会。在一些农村，佃农们在“五·一”节聚集起来一起耕作，以向地主显示他们的团结。

考察整个这一时期中的各种“五·一”节口号，可以看出，虽然反映工人农民经济要求的口号占大多数，但是各无产政党包括秘密共产党所提出的反映工农的直接政治要求的口号也经常出现，特别是在1927年和1928年，而这一点在左翼组织的集会中比在右翼组织的集会中更明显。例如，在1927年有些很醒目的口号要求解散国会进行大选，要求政府准许工人自由参加政党和要求给海员缺席选举票。从1932~1935年，反法西斯主

义的口号占有重要位置，很多口号还要求保证在役战士家庭的生活。其后，由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政府没有再准许举行“五一”节集会，无产阶级运动因而失去其最引人注目而且恐怕也是最“灵活多变”的一个战术。

## 注 释

[1] 堀江归一：《选举机制与政治教育》，《改造》（1925年2月），第109页，转引自爱德华·G·格里芬《日本无产政党中的意识形态冲突：1926年～1932年》（硕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51年6月），第17页。

[2] 白扬社编：《日本无产党史》，第252页、第267页。

[3] 见安部矶雄：《关于新无产政党的诞生》，《中央公论》（1926年12月），第121～128页，转引自格里芬的文章，第13页。

[4] 社论：《我们主张所有工农政党共同组成一个协议会》，《无产者新闻》（1927年11月15日），前引白扬社编的书第531页录有全文。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而是先锋中的先锋）。

[5] 在评议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谷口善太郎撰写的、详细说明评议会代表劳农党进行各种活动的书《日本工会评议会史》中的许多地方，这一点表述得十分清楚。

[6] 大山郁夫：《劳动农民党对国会和大选的态度》，《中央公论》（1928年2月），第87页，转引自格里芬的文章，第16页。

[7] 《日本劳农党政策声明书》，第2部分，引自白扬社编的书，第55～58页。

[8] 社会大众党执行部：《无产阶级建设新日本大纲》（东京，社会党出版部，1933年）。

[9] 见《日本劳动年鉴》第16卷（1935年）第440～441页全文摘引的麻生

久声明。

[10] 见《社会大众新闻》(1937年12月15日)的补充声明,引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89页。该声明的英译文载于威廉·西奥多·德巴里、唐纳德·基恩和角田柳作编:《关于日本传统的材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822~832页;关于社会运动的那部分是海曼·库布林和本书作者合编的。

[11] 安部矶雄:《纲要解说》(东京,社会民众党出版部,1927年),第24~26页。

[12] 见斯韦林根和兰格的《日本的红旗》,第39~42页。

[13] 大山郁夫:《农民劳动党的解散和统治阶级的心理》,《中央公论》(1926年1月),第134~136页,转引自格里芬的文章,第26、第33页。

[14] 白扬社编的书,第639~640页。

[15] 同上,第725~726页。

[16] 见细迫兼光:《关于(新)劳动农民党解散问题的意见书》,全文载于白扬社编的书第712~713页。

[17] 党和河上都引用了列宁于1902年写的《怎么办?》;引自白扬社编的书第726~729页。

[18] 见大山郁夫:《所谓斗争解体论的暴露》,《中央公论》(1930年12月),第81页,转引自格里芬的文章,第28页。

[19] 由于新劳动农民党对共产主义明显地抱友好态度,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该党。爱德华·格里芬在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结论中总结说,关于该党,“同将它描述为是一个共产党人控制的或共产党人领导的阵线相比,称它为亲共产党人的组织似乎更为精确。在这点上,大山态度的重要性……不能够忽视。称(新)劳农党是一个共产党人领导的阵线,在惯用的术语中,这似乎是暗示该党的领导人是一个本身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受正统的共产党欺骗的人,或是一个共产党的代理人。1930年的这场关于解散的争论表明,大山不是一个受骗者,因为他即使

在那场争论之后，仍公开宣称信奉共产主义思想。他否定共产国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的解释。在那以后，他不能认为是一个正统共产党的代理人。没有根据认为大山在1930年改变了思想。似乎更有理由认为，1930年以前他(公认的劳农党的发言人)拒绝因有独立见解而明确地否定正统共产党的领导。然而，他准备在他所解释的那种真正的共产主义或列宁主义认为有必要的任何时候，抵制正统共产党的领导(他这样做了)。同上书，第59~60页。

[20]为使读者注意争论的中心；再次提到该文，并从与前不同的角度，更为详细地讨论。第3章注释[4]；同上书，第42页。

[21]见山川均：《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1924年5月)，引自小山弘健著《日本马克思主义史》(东京，青木书店，1956年)，第28页。

[22]山川从没有再主张成立一个共产党。甚至在战后日本那种改变了的环境下，他似乎仍旧认为，日本社会民主党能够比合法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更好地执行他所预想的那些任务。

[23]猪俣津南雄：《现代日本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太阳》(1927年11月)。

[24]称为《日本共产党的政治观点——草案》，这个文件现在认为是风间丈吉1930年末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返回日本后根据回忆搞的。斯韦林根和兰格的书，第44页。

[25]专题论文集的题目是《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由岩波书店出版。有关这方面的更详细的注释，见尤耶哈拉《日本左翼社会运动》，第148~152页。事实上，有关全部争论的一个很精炼的概要和文献目录可以在该书第134~162页中找到。

[26]这个时期有一个关于劳农派影响共产党的趣闻。当时，共产党领袖作为一个集团正受到公开审讯。被告一方自觉地利用审判达到宣传目的，于1931年7月向法庭递交了日本共产党历史的一个文本。该文本后

来经市川正一修改，将其作为共产党的正式历史教材，要求向日本共产党员宣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在1932年将它秘密出版；战后版于1946年出版，作者署名市川，其标题是《日本共产党斗争简史》（东京，钟光书院，1946年）。然而，由于该文本同1931年的纲领草案相一致，因而它解释日本资本主义是处在金融资本阶段，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资本主义，而不是天皇制，作为攻击的直接目标。这实际上是劳农派的立场，特别是在战后的日本，共产党人必须使他们的同伴警惕历史上的这种倾向。见小山的书，第60~61页。

[27] 见枪田：《第三个太阳》，第80~81页。

[28] 白扬社的书，第266页。

[29] 他们分别是：安部（东京），铃木文治（大阪），西尾（大阪）和龟井（福冈）；水谷（京都）和山本宣治（京都）；河上丈太郎（兵库）；以及来自九州民宪党的浅原健三（福冈）。

[30] 河野密：《日本社会主义政党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60年），第117~122页。

[31] 有关山本的遇刺以及他在国会中质询的生动说明，见市川义雄：《山本宣治在国会中是怎样战斗的？》（京都，朝日书屋，1949年），第67~146页、第177~188页。

[32] 白扬社的书，第512页。

[33] 同上书，第370页。

[34] 见铃木文治：《工人运动20年》，第226~234页；另见《日本劳动年鉴》第2卷（1921年），第30~31页。

[35] 同上书，第17卷（1936年），第289~290页。

[36] 有关研究“五·一”节的专著，见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资料部：《资料：日本的“五·一”节》，《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第3期（1936年5月）。



## 第9章 国内政策：从民主主义的政策到极权主义的政策

工人政策  
农民政策  
社会政治政策  
经济政策

在某种意义上，制订政策是少数派政党最重要的职能。他们即使近期内没有希望执掌政权，但能够靠那怕是很少几个候选人的胜利当选而在国家最高的公开论坛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战前的日本国会中，甚至内阁阁员也必须倾听和回答无产政党议员的质询。那些质询被认为体现了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策。

战前，每一个无产政党在成立时都制订了最低不多于两三条的基本纲领，借以表达他们的目标和存在的理由。劳动农民党在该党左翼势力变得强大和右翼退出之前，于1926年3月5日通过的纲领是一个典型纲领。其内容如下：(1)我们主张在符合我国国情的情况下使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获得解放；(2)我们主张以合法手段改革不合理的土地、生产和分配制度；(3)我们要取代那些只代表特权阶级利益的既存政党和彻底改革国会。<sup>[1]</sup>

由于这种基本纲要太短，每个党通常都伴随有一个四五大段的宣言，从党计划进行的改革或认为应该采取的行动这种角度，讨论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尽管党存在的整个期间基本纲

领通常保持不变，但宣言在重要关头却可以更改。对一些较特殊和重要性较小的事件，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这类党的机关发表声明。

各种具体政策——本章的中心——在每年的代表大会上制订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修改。它们为许多用更简练更醒目的语言表达的竞选口号提供了基础。党根据这些政策形成向国会提出的各种具体法案和修改现存法律的建议，或对讨论中的法案提出附加条款。它们被认为是反映了党所代表的那些有组织或没有组织的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似乎可以更精确地说，政策表达了党的领袖从其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所确认的群众利益，也体现了各后援组织的要求。这样，各党的工人政策通常是几乎一字不差地取自各党的后援工会，或者，如果党的后援工会不只一个，就在几个工会组织的要求中谋求妥协，以此构成党的工人政策。农民政策和其他政策也是如此。

任何有希望在近期获得成功的政策都应该符合特定的具体环境。这种思想在各无产政党身上表现为，不管他们之间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上有多大分歧，但他们制订的政策总的来说非常相似。当我们讨论领袖和意识形态倾向时，对于我们来说，区别对待不同的集团、派别或团体是有益的。但是在分析政策时，我们发现社会民众派、日劳派及其他无产团体相互间的不同并不很大，我们仍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使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更集中在这一时期中各党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的变化上，但要记住，由于较左的团体在较早时间就因大规模逮捕而受到打击，因而他们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映的也较少。

此外，在两种意义上，实际执行的政策几乎无例外的都是妥协的产物：(1)这些政策代表了政党内部各派的一致意见；(2)

它们是长远目标和当前现实形势需要的调和。因而，如果把相互关联的各种政策要求分别按逻辑推演出各自的最后结论，可以发现，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当这些政策用简明的词句表达出来或表现为口号时，那些矛盾很少能显露出来。所有政党都深知其政策是对当前形势的妥协，因而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改良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政党的作用是，以推动群众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而战斗这种方式，来努力减轻群众的痛苦。在这点上，所有各派，无论是社会民众派或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派系，看法完全一致。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的政策，总是那些最低的受当时形势支配的政策，而这些政策也被政治色彩不同的各种激进分子所默认，一直到他们发觉这种政策将会摧毁其实现终极目标的可能性为止。甚至1937年日本无产党的政策，除去主张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外，也和当时社会大众党的政策没有任何显著区别。

最初制订的政策是混乱的，相互间没有很多联系，就如同后面将要分析的劳动农民党的政策所显示的那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党的政策累积得越来越多，因而感到需要使它们更加系统化。社会大众党在1932年成立时，总称其各种政策为所谓的“建设纲领”，<sup>[2]</sup>这是首次试图把各种政策联合成一个关于计划经济或集权经济的主张。这种追求系统化的倾向在社会大众党的《战时革新政策大纲》中达到顶点。<sup>[3]</sup>这个大纲于1937年11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它在1940年该党解散前，一直是党的基本政策，很少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各无产政党开始是怎样作为各种激进程度不同的“阶级政党”而出现，而随着对左翼的镇压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它们又是怎样在社会大众党中组成联合阵线，但却最终

失去它们早期的那种社会民主主义特色。本章试图从实际政策的角度说明这一变化过程。

在集中讨论不同的政策范畴之前，仔细考察一种典型的无产政党的政策构成是很有趣的。它们一般分为政治、经济(经济与金融或金融)及社会三个部分。这三部分的区分有时显得很奇怪。人们从分析使用的那些术语中也可以发现一些该运动的要旨。我们以前面提到过的劳动农民党的政策构成为例，其纲领如下：

### 政治部分

1. 充分利用普选制。
2. 废除压迫无产阶级运动的法律规章。
3. 消灭社会各阶层间的不平等。
4. 削减军队和改善士兵待遇。
5. 要求政府资助因服役、伤残或战争死亡而陷于贫困的家庭和个人。
6. 根本改革税收制度，特别是取消日用消费品的关税和消费税以及规定级差高的财产累进税。
7. 确立人民外交。

虽然一个政党的任何要求几乎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是政治的，但是上面的第5条和第6条似乎更适宜于放在经济部分，而第3条似乎应该放在社会部分。总之，该政策制订者将下述内容包括在这两部分中：

### 经济部分

8. 保障组织、罢工和订立集体协定的权利。
9. 保障耕作权。
10. 制订最低工资法。
11. 禁止青少年和妇女上夜班、在井下工作和做危险工作。

12. 保证8小时工作日。
13. 修改《工厂法》、《矿工法》和《海员法》。

#### 社会部分

14. 从公法和私法上消除对妇女的歧视。
15. 宣布买卖妇女为非法。
16. 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消除对妇女的一切限制。
17. 为失业者、病人和老人制订保险制度并制订事故保险法。
18. 国家向那些被证明无罪及那些被错误拘留的人赔偿损失。
19. 义务教育和职业训练期间的一切费用由大藏省负担。
20. 保证生活居住权。<sup>[4]</sup>

对这种分类法几乎没有争论。尽管如此，但是一种与其不同，按无产政党的主要支持力量划分的政策分类却对我们的研究更适宜。我们将首先探讨那些与工人问题有关的政策，其中一些已经包括在上述各条政策中。然后我们将分析农民政策，很明显，在上述各条政策中，农民政策几乎被完全忽略了。最后我们可以探讨战前各无产政党制订的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

### 9.1 工人政策

关于工人，我们将首先探讨其组织、罢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下社会民主中的民主方面的实质。然后我们可以探讨那些更专门的仲裁、时间和工资、失业保险、工作变换、社会保险以及“中国事件”后产生的工人法的类型。如我们已经指出的，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第17条

事实上禁止成立一切工人组织和进行罢工，但是在1918年前后那种战争繁荣的条件下，该条法律已多少变得不起作用了。<sup>[5]</sup>

1924年，官方以同意一定规模的工会有权指定工人代表和顾问出席国际工人会议而默认了工会的存在。继而，在劳动农民党制订上述政策的那一年，对工会活动构成最大障碍的《治安警察法》有关条文也被废除。<sup>[6]</sup> 尽管《帝国宪法》在文字上保证日本国民有建立协会的权利，然而，作为工人政治代表的无产政党，却要求法律明确承认工会及其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

日本虽然在1897年前后就已经出现罢工，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罢工次数才在约一年内突然成倍增长，而其后则继续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罢工变得日益有组织和有纪律，停止了那些零散的导致使用暴力的非法行动。罢工不只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要求承认工会和集体谈判权。后面这项主张在1921年4月足尾铜矿工人大罢工期间引起公众广泛注意，其后则经常出现。在上面引用过的劳动农民党的政策中包括有该项主张，但是社会民众党和日本劳农党当时虽然也同劳动农民党一样要求组织权和罢工权，却把要求集体谈判权留给了在集体谈判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的各自的后援组织——总同盟和日本工会同盟。尽管如此，但日本的大多数集体谈判都是口头的，或是以习惯的自然发展为基础。签署协议的程序在战前日本也并不起重要作用。

1925年在扩大选举权的自由气氛中，内务省社会局起草了一个《工会法》，它除了其他规定外，还禁止雇主干涉和阻碍雇员参加工会或保持工会会籍。最初，温和派工会欢迎该法案，一旦政府屈服于军方和企业主的压力对这一法案进行修改后，连较右翼的工会也反对该法案。但是由于在国会中没有无产政党议员，而国会在辩论中认为，即使是这种新修改后的《工会法》

也是不需要的，该法案因而未获通过。这就是无产政党成立时的形势，这种形势一直维持到1928年大选后。

各无产政党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不顾其长远目标上的分歧，几乎都致力于要求法律承认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组织。

在无产政党议员首次进入国会时，执政的田中政府对无产政党的要求几乎全无反应，但是继任的滨口内阁却很注意无产政党议员团提出的那些要求，成立了一个社会政策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在法律上承认工会并给予工会一些保护。根据这一建议，社会事务局又重新制订了一个新的《工会法》，和前一个《工会法》不同，不仅社会民众党，而且其他无产政党的议员，也都愿意带有一定保留地接受它，同时提出了一些改进和修正。但是，政府接受的修正却是企图向企业主作出让步。该法案最后在1931年被众议院通过，但是被贵族院否决。该法案只同意“公开承认”工会，停止解雇那些积极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但是它没有提到罢工或集体谈判权。<sup>[7]</sup> 这是争取《工会法》运动的高潮。

1932年社会大众党的工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制订独立《工会法》，承认组织权和罢工权”。<sup>[8]</sup> 尽管这里没有提到集体谈判权，但是，党在1932年第63届国会上除提出“工会法法案”外，还提出了“集体谈判权法案”，其后每年都提出该法案，尽管这个法案总是在委员会中被束之高阁或被否决。<sup>[9]</sup>

1936年2月26日军队暴动后，政府修改了已在1931年通过并一直被束之高阁的《工会法》。据报道，以前的《工会法》被认为是太自由了，将在“日本精神”的基础上制订一个新的工人管理法。<sup>[10]</sup> 与此相反，工人则积极施加压力要求制订法律保护工会的独立和自治。日本无产党及其前身为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签名请愿运动，而社会大众党则于1937年

2月24日在第70届国会提出了这样一个法案。社会大众党认为，为进行劳资调解，需要这样一个法案，而当时进行劳资调解是当务之急，因为此时靠军事订货出现了繁荣，经常要求工人增加产量和发生工业事故，这些反过来又引起劳资关系的紧张。加之物价上升使局势更加不稳定。<sup>[11]</sup> 该党于1937年7月在第71届国会中最后一次提出这个法案，而修改后的政府法案从没有提交给国会。

当1937年11月15日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的形势和气氛已经发生变化。争取《工会法》的运动也遭到严重挫折。但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革新政策大纲》却没有指出这一点。该大纲后来只稍加修改，在1940年党解散前，一直是党的基本政纲。然而，该大纲中确实提出了集体谈判法，明确地把它视为是为调解劳资纠纷服务。但是，直到战争结束，没有通过任何一个这类法律。党作为鼓励企业主同工人合作的一个手段，建议成立全国和地方的劳资调解委员会。党在其后几年将这种主张同党所支持的产业报国运动融合在一起。

读者一定记得，产业报国会是以警察当局为解决和防止工人罢工而鼓励私人企业成立的调解委员会为基础，于1938年建立的。据报道，1939年有19,601个调解委员会，拥有约300万成员，<sup>[12]</sup> 1940年政府将其改组为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官方承认其为纳粹式的全国工人阵线。早期的集体谈判思想就这样完全被引入歧途。地方警察当局通过调解委员会能够强迫双方达成协定，双方不再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单独进行谈判。虽然如此，但社会大众党在积极支持产业报国运动的同时，并不是对它毫无批判。例如，1939年社会大众党号召“纠正”产业报国会中的官僚统治和资本主义影响。为此目的，党——特别是参加总同盟的那些领袖——要求使工会同盟在运动中发挥作



用而不是使运动代替工会。他们宁可看到党分裂，也不愿使总同盟并入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组织。

除《工会法》外，社会大众党(以及是其前身的大多数组织)还主张制订职员法、商店雇员法和海员法。<sup>[13]</sup> 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那些阶层同体力劳动者有很大不同，因此，他们主张对那些人要有专门的法律。他们要求所有那些法律都要包括组织权和集体行动权，要根据那些人各自不同的工作条件对其提供特殊的保护(这和战后的情况相反，占领初期通过了《工会法》，它适用于所有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人，无论是工人还是职员)。<sup>[14]</sup> 在战前的形势下，只有单个的法律才有可能获得通过。例如，1938年初通过了向商店雇员提供一些保护的《商店法》，这是政府提出的，而社会大众党带有一定保留地给予支持。<sup>[15]</sup> 该法律限制每天工作10小时，每月至少有一个休息日，此外还规定了一些合理化管理。

在这方面，指出各无产政党对调解劳资纠纷的态度的变化是很有趣的。在工人受到广泛注意的1926年，通过了一个《劳资纠纷调解法》。当时工人以怀疑眼光看待该法案。各无产政党倾向于不理睬它，因为该法案规定只对公用事业中发生的纠纷实行强制仲裁，同时也因为该法案详细规定了很多能够应用的限制条件。该法案确实有一个合理的关于代表的条款，即成立一个调解委员会由工人、企业和公众代表组成。但是，该条款1930年前只兑现过一次，其后也只使用过四五次。<sup>[16]</sup> 该法律还规定了包括警官在内的调解官的地位，那些警官在即使没成立调解委员会的地方也经常根据该法律进行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干涉劳资间的纠纷。那些警官在劳资关系方面的经验，无疑为后来在产业报国运动支持下，以努力进行战争的名义，对企业进行强制调整开辟了道路。

新劳动农民党1929年就明确主张废除劳资纠纷调解法，但是社会大众党1932年却没有在自己的主张中提出这一点。“芦沟桥事件”后，社会大众党在其《战时革新政策大纲》中公开主张扩大强制仲裁体制（法律上，该体制一直是只适用于公用事业企业）。产业报国会的发展使其他一切调解方式不再有必要存在，因为产业报国运动所采用的原则——该原则得到社会大众党的公开支持——是，企业主和工人都要服从国家努力进行“圣战”的需要。

早期的各无产政党都根据1919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劳工会议拟定的《国际劳工公约》主张8小时工作日。日本批准了8小时工作日协定，但坚持附加一个只适用于日本的条款，该条款实际使国际协定大为失效。<sup>[17]</sup> 1932年社会大众党更进一步要求7小时工作日和规定最低生活工资。他们宣称提出该主张的目的有二：第一，抵制因“满洲事变”激起的工业合理化而造成的劳动不断强化；第二，帮助降低失业率。他们辩解，在雇佣40~50或更多工人而流行9小时半工作日的工厂中约有470万名工人，如果这些工人都把工作时间减少为每天7小时，那么将能再为170万以上的人提供工作。<sup>[18]</sup> 其后，社会大众党逐步从其日益增多的要求中抽掉了减少工作时间的主张，而让工会去为之奋斗。<sup>[19]</sup> 直到1939年5月1日，一个以《全国总动员法》为基础的法令开始生效，才把工人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但该法令只适用于机械制造、钢铁、造船等工业中16岁以上的工人这种十分有限的范围。该法令的目的是防止工人因工作日不断延长而疲劳不堪，“芦沟桥事变”以来，工人们明显地疲劳不堪。<sup>[20]</sup>

如同前面以劳动农民党的政策所说明的那样，社会民主主义者完全懂得工作时间的的问题不能同工资相分离，因而各无产

政党都主张“最低工资”。但是这样一种要求几乎必须以完全改革日本的工资制度为前提，日本的工资制度如此复杂以致几乎不可能对实得工资水平作出任何精确计算。基本工资只构成全部收入的一部分，其他则由年中奖、年终奖、从家庭或其他方面得到的补助、加班费和各种附加福利组成。基本工资和附加收入都受性别、年龄、家庭义务和企业利润等非职业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更带职业性的工龄、能力和出勤等因素的影响。在决定所得收入多少的因素中，地位比实际工作情况更重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要求最低工资，可以说比在同一时期的美国更远为抽象得多。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意图显然是确立工资的最低标准，尽可能提高大量最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芦沟桥事变”后，工资冻结，继而，为抑制通货膨胀，为各种职业规定了一系列复杂的最低和最高工资。这些规定是根据《全国总动员法》于1939年颁布的。当时社会大众党鼓吹实行一种以生活费指数为基础的浮动工资，但没有被采用。其后尽管名义工资急剧上升，但被包括黑市价格因素在内的零售价格指数上涨所抵销，因而整个战争期间实际工资明显下降。<sup>[21]</sup>

所有无产政党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建立失业保险，但日本在战前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这类制度。与此相近似的是1936年制订的《退休储备基金和补助法》，因而社会大众党继续以真正建立失业保险金制度为奋斗目标。<sup>[22]</sup>

附带为工人提出的一个要求是增加公立职业介绍所的数目。1932年社会大众党要求把职业介绍所交由工会控制。公立的职业介绍所制度是1921~1922年按照法律建立的，职业介绍所不仅介绍工人就业，而且实际上提前付给工人一定的日常工资，以使工人免于因向其老板借钱——在偿还时老板要抽取一

定利息——而受老板盘剥，这种预付工资一般是每月一次或两次。职业介绍所的问题在经济危机的年代变得更加尖锐，但是在30年代后期，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些更积极的步骤。这似乎是社会大众党在1936年后没有把扩大职业介绍所包括在自己主张中的原因。那种更加依赖国家指导的趋势，逐渐使该党后来不可能提出任何关于职业介绍所由工会控制的要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社会福利领域，政府在战时环境下采纳了一些各无产政党长期主张的政策。其中之一是，1938年通过的《全国健康保险法》。最初的《健康保险法》是各无产政党成立前于1922年在国会通过的，但是由于地震，它到1926年才实行。因此，这一问题引起各无产政党的直接注意，1927年它们主张对该法律作些改进。各无产政党都承认强制保险原则是正确的，但对如何支付意见不同，左翼分子要求雇主承担一切费用。

最初的《健康保险法》规定只对在大矿山和工厂工作的人实施强制保险，但它规定，以企业主事先得到企业中半数以上工人同意参加保险为条件，也可以扩大范围，对诸如建筑、运输、机械工业部门的工人实施强制保险。该法律规定，保险社由内相强制成立或在其同意下自愿成立。而后由保险社支付保险金，国家给予10%的补助并负担其管理费。那些没有参加健康保险社的工人按理应由设置在全国的国家健康保险机关——1929年后这些机关都设在地方县政府中——负担其保险。

各无产政党希望改善医疗制度和扩大保险范围。社会民众党从最初就非常认真地关注这个问题，它要求健康保险社由工人单独管理和把给药同开方分开。日本的习惯是医生自己直接向病人卖药和医疗器具，一般认为医生为使自已得到更大利益，常常给病人开不必要的处方。<sup>[23]</sup>

政府把最初的《健康保险法》作为其工人政策的一个方面，但是社会大众党却主张将该法律扩大到职员、渔民和那些受保人的家庭。1935年政府把该法律的应用范围扩大了一些，但那时社会大众党已开始要求建立全国健康保险制度，进一步要求把没有劳动保险的农民、小商贩和小生产者也包括在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目的是减少微薄收入者的医疗费用，以这种办法稳定全国的生活水平和促进普及医疗设施。当1937年初政府在第70届国会提出它的《全国健康保险法》时，得到社会大众党的大力支持，如已经指出的，社会大众党同意该法案，在对医生和药剂师组织作出一些让步后，该法案于1938年初被通过。

侵华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政府向国会提出了若干个关于工人的法案。社会大众党在全国“改革”(或“革新”)方针的旗帜下，同其他全国性社会主义政党一起，支持通过这些法案，而反对各主要保守政党提出的修正案。这些法案除已经提到的《全国健康保险法》和《商店法》外，还包括社会大众党长期要求的经修改后的《海员法》和《职业介绍法》以及《全国总动员法》和《国家电力管理法》，后两个法案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sup>[24]</sup>最后，各无产政党从1930年政府草案首次提交国会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海员保险法》，也于1939年通过。这是首次给一些伤残和老年工人补助金，尽管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

此外，社会大众党强烈支持在1938年创建福利部，掌管以前由内务省社会局负责的那些国家保险、健康、社会福利和工人等事务。在其后两年中，该党要求把其他部握有的同工人有关的各种权力也集中归福利部掌管。推动成立福利部的真正力量是军方，军方企图把福利部作为一个控制工具，以特别保护或增加人们已经降低的体力和体重，为确保满足征兵和招工而训练和重新分配人力。

“芦沟桥事变”后，随着战争的扩大，需求不断增长，在这种形势下需要稳定经济和把工人的反抗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上述议案获得成功的原因。而社会大众党却以那些议案获得成功为理由辩解说，它在同政府为战争而努力进行合作的同时，也履行了其作为一个无产政党应尽的责任，尽管它的一些党员否认该党仍是“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党。

## 9.2 农民政策

虽然工人政策在日本无产政党的纲领中占有更优先的地位，但农民政策也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和一些工业更发达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分子不同，日本领袖不能忽视农民，因为当时全部人口中半数以上是农民。在日本虽然没有纯粹的工人政党，但读者一定记得，平野力三领导的日本农民党却几乎完全是一个农民政党。

各无产政党在努力代表有组织的佃农的利益时，把要求颁布《佃农协会法》列为头等重要的目标。《佃农协会法》的命运同《工会法》的命运类似，“芦沟桥事变”后，《佃农协会法》也被取消。尽管有组织的农民在开展活动，但战前，在日本，农民协会没有得到比工会更特殊的法律承认。农民同工人一样，要求组织权、斗争权和集体谈判权。<sup>[25]</sup>

同要求《佃农协会法》关系最密切的是要求佃农法。这里只讨论该法案的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耕作权问题。在日本公法中，历来存在着永久租佃权，这最初是对那些开垦有主生荒地的人的报答，而生荒地的所有者保有收地租的权利。然而，农民协会和无产政党更进一步要求以耕作权或种植权削弱所有权，以使佃农不能轻易地被强迫离开其正耕种的土地，同时使

佃农能因改良土地而得到报偿。他们也寻求以诸如欠收和谷物受灾等各种原因而降低地租的法律权利。由于农民要求降低地租是佃农地主纠纷中最普通的情况，因而经常要求法律规定地租限额。佃农法被宣传成是，在诸如地主为以更高地租租与其他佃农而强行收回土地，或限制佃农进入该块土地和扣留谷物的情况下，保护佃农不受损害的法律。<sup>[26]</sup>

所有无产政党都从最初起就主张制订佃农法，最后，社会大众党在1937年2月25日向国会提交了这样一个法案，象通常一样，该法案被束之高阁。甚至在“芦沟桥事变”后，虽然要求佃农法这种主张在1938年的《新建设纲领》中被删去了，但社会大众党在支持政府提出的《农业土地调整法》时，仍继续强调需要一个包括耕作权和合理地租规定的全面的佃农法。<sup>[27]</sup>

党当时也改变了对支持和发展自耕农问题的态度。1926年5月颁布支持和帮助发展自耕农规定以来，支持和帮助发展自耕农一直是政府的方针，但是所有无产政党都反对该方针，理由是，它实际不能解决佃农问题。简言之，政府的方针是，建立金融机构，以一定条件借钱给佃农，使他们能够在大约25年内成为自耕农。尽管日本农民普遍希望拥有土地，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在佃农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地租问题是最直接的问题，而改革租金制度也是佃农最紧迫的要求。他们也害怕个体所有者会形成保守的农村小资产阶级。

“芦沟桥事变”后，社会大众党认为，国家利益应高于阶级利益，转而支持上面提到的《农业土地调整法》，该法案于1938年初在国会通过。该法案的目的是，以确保佃农和地主和平相处来保证提高农业生产。<sup>[28]</sup>它在一定程度上——例如，在佃农应征入伍的情况下——保护佃农的耕作权。它也系统地以贷款和其他手段帮助佃农成为自耕农。然而，它没有规定降低地

租，也没有涉及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前建议中所涉及的佃农和地主关系中的许多方面。社会大众党虽然没有停止为制订单独的佃农法而呼吁，但它显然认为，沿着通过佃农的土地国有使佃农转为自耕农这种方向，能够有更大进展，尽管这首先增加了政府对土地和农业生产的控制。这种政策似乎更促进集体化倾向，而不是个人化倾向，因而能够防止形成保守的小资产阶级。<sup>[29]</sup>按照这种新方针，支持社会大众党的农民组织在1939年11月和其他组织合并组成改革土地制度同盟，但是该方针并不能够防止农民运动的急速衰落。

社会大众党对1924年12月生效的《佃农调解法》的态度也有某些类似的变化。《佃农调解法》比《劳资纠纷调解法》引起更多注意，因为它更经常被引用，特别常被地主引用。各无产政党反对该法的主要理由是，该法是以个人调解为基础，不承认佃农协会或集体协议。

然而，“芦沟桥事变”后，社会大众党以强调全国团结和阶级调和为中心，主张建立农村调解委员会并将重要纠纷首先提交该委员会。过去对《佃农调解法》的一个不满是，据说法庭审理纠纷时，佃农总是比地主受到更不公平的待遇。因而，社会大众党建议为佃农纠纷成立特别法庭，然而1938年的《农业土地调整法》尽管对《佃农调解法》作了一些有利于佃农的法律程序上的修改，却没有规定成立特别法庭。

各无产政党从最初就一致主张由政府分配肥料、种子和农具。<sup>[30]</sup>1932年，社会大众党鼓吹，农业生产中的作物、价格和市场由国家控制。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刺激下，肥料和农具生产大幅度增长。例如，硫酸铵化肥的生产在1941年达到顶峰。但是政府已开始根据1940年10月的稻米控制规定强迫征购谷物，<sup>[31]</sup>而1942年的《粮食管理法》更进一步规定国家垄断一切



粮食买卖并实行低于自由买卖水平的控制价格。政府已经在沿社会民主主义者鼓吹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对军需品的需求，肥料和农具不能长期大幅度增长和充分供应。

在其他许多同战前日本无产政党制订农民政策有关的事项中，似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必须单独说明，即信贷问题。各无产政党要求增加农业银行和扩大其职能，<sup>[32]</sup> 并提出，作为紧急措施，政府应延缓一切农业债务。社会大众党建议农业资本贷款放宽期限和允许佃农以其全部收成作为抵押或代替应缴纳的货币，从而继续保有其耕作权。各无产政党也要求使贫农和佃农能更自由地占有地方公有的土地。总之，他们主张“农村和城市平等”，这意味着农民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要提高到城市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改进农村教育等等。各无产政党试图促进和利用已在日本农村中出现的那种现在称之为“因希望引起的革命”。

1937~1938年逐步转向战时政策的主要趋势，使增加农业生产被置于优先地位，以便全力应付预料将出现的可能会持续许多年的“消耗战”。结果导致农业报国运动象产业报国运动一样发展起来，而社会大众党也象支持产业报国运动一样支持农业报国运动，虽然最初它试图阻止解散已存在的佃农协会。社会大众党也主张生活节俭和饲养更多家畜。一个新增加的主张是强调农民向“满洲”和后来包括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地区集体移民。总之，农民政策从最初强调为改善本身对立地主的地位而战斗的佃农的权力，转向强调以增加政府控制的方式实现阶级调和与繁荣生产。

### 9.3 社会政治政策

同工人政策和农民政策相反，这里所说的社会政治政策的划分在整体上更少协调一致，这些政策没有必要按照那些各无产政党称之为“社会的”或“政治的”标准去划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节是按下列一些政策范畴划分的：要求言论和行动自由；选举改革；宪法变化；妇女政策；教育改革和裁减军队。

关于本节中谈到的这些改革，令人惊奇的事情是，尽管其中没有一项在战前的日本实现，但它们都终于在战后盟军占领时期得到实现。其中一些甚至比无产政党所设想的更为激进。这和经济方面的那些政策（这将在下节中考察）迥然不同，经济方面的某些政策，同工人政策类似，在战争中或战争临爆发前被政府采纳，而其他那些，则直到战后仍是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

甚至右翼的社会民众党也特别强调废除《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管理执行法》以及修改《新闻出版法》。由于各群众政党成立之前许多社会民主领袖就已遭到过逮捕和监禁，因而很自然地各无产政党在其党纲中提出要求修改审判制度和要求国家对受诬告和被无理拘留者给予赔偿。各无产政党还要求对滥用职权的司法官员给予严厉惩罚。劳动农民党走的更远，公开要求废除秘密警察基金和政治警察。

社会大众党成立时就支持无产阶级很早以前提出的那些废除镇压法和惩罚不法官员的要求。该党一般主张结束“警察统治”。而在成立后的次年，更特别强调改革逮捕和审判程序，也要求废除那种婉言曰“教育”实际是官方进行“洗脑”的做法。然而，社会大众党在“芦沟桥事变”后，却逐渐发展成为将其所

有关于自由的要求降低为一点：即“尊重建设性的言论”。

发现改革选举制度的要求常常被列在竞选方针的最前列，这并不令人惊奇。自由竞选使无产政党能够成立，它们的继续生存也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对那些既存规定的公正执行。各无产政党都要求把普选权扩大到妇女。日本的左派似乎不象法国或墨西哥等天主教国家中的左派那样担心妇女投票可能会比男人更为保守。他们也没有在战前日本的努力使该主张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因而该主张在30年代中期没有引起注意。1937年社会大众党的《新建设纲领》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该纲领把以前提出的降低投票年龄的要求也抛在一边。劳动农民党主张把投票年龄从25岁降低为18岁，但是社会民众党和后来的社会大众党都只要求降低到20岁。<sup>[33]</sup> 此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从有助于少数党提高地位的实际考虑，比例代表制对社会大众党都非常有利。因而社会大众党在党纲中提出支持比例代表制和全县大选举区制。

1936年~1937年由一些担任要职的官僚鼓动的“廉洁选举运动”，使无产政党得到好处。无产政党在其政策中也以各种方式支持和鼓励该运动。此外，各无产政党有关改革选举的各种主张中共同的要求似乎有国家负担选举费用、取消候选人交纳保证金制度以及官方声明投票日是公休日。

在谈到较大的机构改革方面，指出一点是很有趣的。农民劳动党最初的为左派和右派所同意的政策草案中包括有“取消元老、贵族院、参谋本部和军令部”。<sup>[34]</sup> 但是，由于党认为这些条款将会被警方否定，因而最后的正式纲领中抽掉了这些内容，尽管这并未能使党免于被立即解散（附带提一句，10多年后，所有这些机构在盟军占领时期刚好都被取消）。

元老或政界元老，除西园寺公望还在外，其他人都去世了，

而西园寺公望在稳定政局中实际起着积极作用，因而要求废除元老制的呼声有所减弱。相反，军队的势力却日益增长，这使要求废除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变得更为“危险”。枢密院虽然没有列在上面的名单中，但在社会大众党成立前，它一直受到日劳派政党的点名攻击。然而，社会大众党成立后，由于各种压力汇集在一起，只有废除贵族制度的政策得到全党的一致支持。

该政策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贵族院显然代表特权阶级，因而自然是攻击的目标。此外，根据支持社会大众党的那些以前被称为“贱民”——现在被称为“特殊部落民”——团体的看法，不废除社会等级制中的最高一层，他们自己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因而党也把主张废除贵族制视为废除一切封建残余的组成部分。最后，党试图根据职能代表制，改革上院，因为即使上院是牢固地扎根于神圣的宪法中，但其组成仍然是能够改变的。职能代表制是“芦沟桥事变”前党在1936年的竞选方针中明确提出的，党改变方向后在建设纲领中仍旧提出了该主张。<sup>[35]</sup>这一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日劳派关于“经济代表会议”的建议，这一点将在下节经济政策中讨论。<sup>[36]</sup>

在地方一级，社会大众党在30年代中期甚至主张选举县政府官员和废除有权指定地方官员的县协议会。至于对由选举产生因而更有代表性的县议会，社会大众党要求授予其更大权力——例如，使其有权自行召集会议和审查税收与支出。社会大众党还建议成立县一级的“经济代表会议”，实行县级捐税独立和以社会福利为目的建立补助制度。<sup>[37]</sup>

现在转到妇女问题。应该指出，战前日本妇女在法律上毫无权利，这在政治方面和在社会方面同样明显。各无产政党要求废除禁止妇女参政的法律，这已纳入前面提到的那些改革选举的主张中。但是更进一步，在最初几年，各无产政党还力求

废除一切对妇女的法律歧视和社会歧视。它们特别强调要取缔“妇女买卖”。各无产政党在其工人政策中要求制订特别法律保护妇女和儿童。他们还主张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包括要求修改《家属继承法》和由法律规定男女同工同酬。经济方面，它们要求给参加工作的母亲以津贴，给寡妇和孤儿抚恤金。

正是在社会大众党存在期间出现忽视妇女问题的。1932年社会大众党支持无产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主张。它批判1929年修订的《工厂法》——该法禁止妇女在下午11点~次日凌晨5点的夜间工作——因为事实上该法只对大工厂有效力。尽管诸如著名的片山哲和安部矶雄等一些社会民主领袖继续为妇女的权利而斗争并在国会中宣传妇女的特殊利益，但是社会大众党作为一个党在妇女问题上变得沉默了，它在“芦沟桥事变”后的《新建设纲领》中也不再提及妇女问题。如同在第14章中将要说明的，事实上“满洲事变”发生后，妇女运动急速衰落。其后，社会大众党提出的妇女参政主张，战斗性越来越小，而其活动却更加广泛遵循国家主义路线。例如，党规劝人们少吃大米，翻新穿破的旧衣和修理旧家具，以促进国内的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工会中的妇女部原来是从基层向无产政党施加压力要求党在纲领中反映妇女利益的，到30年代中期，它已变得无所作为或消亡了。

战前日本的公共教育有一种固定的专制政治倾向。例如，它特别强调伦理和历史。各无产政党试图反对该倾向，主张公民教育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政治。

无产政党的基本要求是使穷人和富人有同样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据此提出了很多改革社会教育的主张。所有无产政党都坚决拥护以延长免费义务教育的年限来提高教育水平，以政府向学生家长提供补助来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sup>[38]</sup>他们要

求国库负担学生的伙食费和学习用具费，还要求为必须住宿的学生提供一些膳宿费。在农村，学生常常必须去很远的地方上学，不能每日往返，因而只能食宿在亲戚朋友或老师家。甚至一些小学生的也是这样，但更多的是初中和初中的学生。

社会民众党最初提出的改革教育的主张比其他无产政党更详细，它要求增加小学教师的薪金，准许市民团体参与编辑政府承认的标准教科书，公开支持成立职业学校和农业学校。而劳动农民党则比其他政党更强调扩大学术自由。无产阶级运动中左翼和右翼这种政策上的悬殊差别是很典型的。

社会大众党在成立时除主张国家资助学生上学外，还有一种实行半工半读制度的思想。这种把学习同工作联系起来的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概念和苏联教育发展的榜样中产生的。但是，直到1936年，党才公开提出改革教育制度的建议。<sup>[39]</sup>

尽管要求实行半工半读是从上述那种背景中产生的，但社会大众党在1938年11月的《新建设纲领》中并未删掉该主张。社会大众党在该主张中仍旧坚持教育机会平等的基本原则，但是也混杂着一种国家主义思想，即要求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的课程设置，不仅要服从于生产，而且也要服从国家需要。仍旧保留的其他那些教育政策主要是继承了各无产政党的传统主张：扩展义务教育为10年；为小学生免费提供各种学习用品和免除小学的学费；教育以培养现代市民为目标；对那些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发给某种特殊证书。该党在鼓吹培养科学精神和“社会文明”的同时，也要求从内容和结构上改革教育制度，发展义务教育。然而该党要求重新强调伦理却代表一种倒退，同为努力进行战争而开展的“精神动员运动”相一致（战后，占领时期的改革，在修改教学内容时删除国家主义因素和延长义务教

育年限两方面，都同以前社会民主主义的要求相一致)。

一个比迄今讨论过的所有问题都更敏感的问题(在战前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裁军。<sup>[40]</sup>“满洲事变”前，各无产政党在初成立时，都要求“降低军备水平”，这实际意味着削减政府年度预算中的军事支出。该主张的理论基础是，战争起源于帝国主义对市场的争夺。如果控制着国家的资产阶级拥有很大的军事力量，它们就很可能用武力进行帝国主义冒险，而那将会导致战争。无产阶级将被征召去参加战斗，但是无产阶级在战争中将一无所获。事实上，无产阶级只会受到损失。

但还没有一个无产政党再进一步主张废除一切武装。各无产政党由于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制政府不可避免地只会采取那些带有改良性质的政治方针，因而企图以要求缩短义务服役年限和改善士兵待遇来间接地使军方为难，同时维护无产者的利益。各党的这类要求略有不同。社会民众党只主张增加新兵的报酬，劳动农民党则要求“承认”士兵的“人权”，不分兵种，只服役一年和取消少数人在服役期间的特权。所有各党都要求对因其成员被征召入伍而遇到经济困难的家庭给予补偿。

1932年由刚刚经历了转向国家社会主义风暴的那些团体组成的社会大众党，在其政策纲领中继续坚持宣传限制军备的主张，尽管后来迫于警方的压力而在建设纲领中删去了涉及军方的条款。然而，党的政策不仅攻击政府引起战争的“军国主义侵略性”对外政策和关税壁垒。社会大众党议员为捍卫他们要求裁减军备的立场，在1933年国会因“满洲事变”导致讨论大规模紧急预算案时，是唯一投反对票的人。<sup>[41]</sup>

进一步论述社会大众党在“芦沟桥事变”后改变态度，停止了一切裁减军备和结束军备竞赛的言论，则几乎已经是多余了。事实上，在那以前，已经逐步发生了变化。党在1936年选举中

要求政府规定军事支出的“限额”，而在1937年2月的选举中则降低为要求政府应规定“合理”的军事支出。党在侵华战争刚爆发后召开的第71届和第72届国会中，积极带头支持增加军事预算。党在1938年的《建设纲领》中则公开声明，它“站在广义的保卫国家的立场上”，主张“建立总体防卫体制”。无产阶级的要求已退让到只提国防的计划应同保障“人民的生活”相一致。<sup>[42]</sup>

## 9.4 经济政策

税收、社会安全、信贷、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等问题似乎比许多社会政治问题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更大；然而由于这些问题带有技术性和复杂性，很难引起民众的兴趣或鼓动人民去采取行动。尽管如此，透过混乱的选举烟雾，冷静地考察党的经济政策，常常能比从诸如言论和集会自由这种空泛主张——当然不能否认这些主张的重要性——中更清楚地揭示出政策制订者的能力和思想认识。

在传统上，社会主义一直是对经济比对政治更注重。因而人们期望，从考察其经济政策中更清楚地看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本质。然而，日本社会民主分子的政策中一般都包括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纲领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实现的目标。无产政党除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张外，差不多其他所有主张都企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实行土地改革，其中包括使土地归政府所有的要求，确实实现了。但是，如同有关工人的一些改革那样，形势的嘲弄使一些经济要求是在日本社会主义者不再公开拥护社会主义的战争期间实现的。同时，似乎有理由推想，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从政府增加控制中看到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各无产政党在其工人和农民政策中，不但要求各种权利，而且也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制订出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在我们刚刚考察过的社会政治政策中，保证各种权利显得更为重要。从下面所涉及的经济政策中可以看到，在无产政党改革经济制度的要求中，手段的位置比权利更为突出。但是，大企业和富有者是攻击的目标，被认为是新的岁收的来源。这些政策的制订逐渐转向企图赢得小企业的支持。

各无产政党在我们所涉及的这段时期中改变了对国家的态度。政府最初被认为是受垄断资本控制，因而基本是同工人、农民和小企业主的利益为敌。后来，无产政党领袖随着对军方态度的改变，开始认为国家是中立的，组成国家的大部分官僚对无产阶级的利益比对大企业的利益更为关心。社会大众党开始变为以努力支持通过政府的一些议案(即使它对这些议案并不完全满意)来反对由各大政党代表的大资本的利益。社会大众党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它必须发表声明，强调它并不是特别支持近卫内阁，而只是支持官僚在其专业知识基础上根据国家利益制订的进步(革新)立法。

无产政党所有政策的主要目的用一句话表示就是：“稳定人民生活”。除此之外，在1937年前后又出现了第二个主要目标，即“发展生产力”(非常有趣的是，在战后日本，这些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口号)。

所有无产政党最初都要求“增加为工人阶级的支出”——这是社会民众党1927年提出的口号。其中一个要求是，在社会福利设施方面把支出增加10倍。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无产政党都鼓吹对其成员应征入伍的贫困家庭应给予补助，它们甚至在改善军队士兵待遇实现之后的30年代后期，仍继续坚持该主张。

战前，日本不使用“社会保障”这个词。日本只是在英国社会主义者于战争期间改造了这个概念，使其扩展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充分就业，从出生至去世都有保障”后，才承认该概念。

战前日本，可以说各无产政党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极其有限。他们要求为病人、老人、遭遇事故者和失业者制订社会保险法。最终制订的《全国健康保险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其中的前三项。然而，如前所述，社会大众党继续努力鼓吹制订失业保险。为实现该目的，它还要求政府制订生命保险法。日本无产党在1937年被解散前一直把要求改革年金和抚恤金制度列在其政策的首位，该主张涉及大量增加预算支出。

健康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要求诊疗所建立公费医疗制度。新劳动农民党1929年以主张免费医疗而超过其对手。另一个关于健康的主张是，要求对由企业或矿山等造成的损失（诸如空气污染或塌方）实行赔偿制度。“芦沟桥事变”后，当军方从应征新兵身体不合格的比例很高中痛苦地认识到人民的健康已经变得很差时，社会大众党进一步要求以集体做操和改善环境卫生来增加人民体重。

各无产政党不时要求对工人实施公共住房计划，以帮助自由工人不再依赖公司提供的宿舍和工棚。但是由于中央和市政府对此并不积极，各党因而坚持要求“留住权”。这有特殊意义。日本人民常常在租借的土地上修建自己的房屋，因为盖房子用的木料和纸张很便宜，而地皮却很贵。如果房屋烧毁了，土地的主人可以把空地用更高的租金租给其他想在那里盖房的人。各无产政党要求保证佃农重建自己房屋和以按从前的租金继续租用地皮的权利。

同那些大多数都需要大量政府开支的社会保障、健康、房

屋规划的要求形成对照，各无产政党还提出一些能够削减开支的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是裁减军备和削减军事人员。社会大众党甚至到1935年还提出各种建议，要求让财阀来负担军备费用。此外，它还要求军队在计划支出时要尽量使人民大众能从中得到最大利益，例如，军队应让失业严重的地区承包它的一些建筑工程。各无产政党从最初就要求降低政府对财阀和其他大资本家的补助和奖励。该主张一直很受大众拥护，因为每届内阁毫无例外，都在各大政党的默许下，拨出资金支持大银行和工业企业的发展。<sup>[43]</sup>

社会大众党在1935~1936年金融危机期间，另外提出了一个详细的建议，要求降低政府支出，节约金钱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它主张延期(最初为2年)偿还政府债券的本息，认为这是其他多数国家都已实行的一种紧急金融政策。<sup>[44]</sup> 社会大众党在30年代末期并没有放弃该主张，只是将其改造得更为精练。党还主张将公债强行兑换为利率更低的债券，后来又主张强令在一定时期内不许兑换债券。

社会民主分子虽然事实上无力迫使政府缩减军费和其他支出或在社会福利方面增加开支，但它们确实认真研究了捐税的结构，提出一些增加国家税收的建议。它们坚持主张实行总资产高额累进税，这种总资产税比现行的实际财产税大大进了一步，总资产将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甚至也包括公债和古董等。此外，他们主张对收入、遗产和企业利润征收更高级差的累进税，并征收利息税，而在战前，甚至中等级差累进个人所得税也免除利息税。<sup>[45]</sup> 无产政党在其一些政策纲领中要求征收利润税是其要求对“增加价值”征税这种主张的一部分，所谓“增加价值”是指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股票价值增加形成的资本，因都市化或工业化而造成土地价值的增加，在股票市场上搞投

机发的横财等等。<sup>[46]</sup> 关于土地，社会民主分子要求以诸如对不在村地主所有的土地、空地以及花园等征收特别税来“打击富人”。无产政党为帮助小商人反对其强大对手，主张对百货商店征税。

由于众所周知，富人利用各种漏洞制造假帐，而法律的执行又很宽松，因而无产政党的领袖们普遍要求严厉惩罚富人偷税。<sup>[47]</sup> 1935年，社会大众党要求对因“满洲事变”而繁荣起来的军火生产征收“超额利润”税。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该主张在道义上似乎更加难于驳倒，1940年政府全面改革税制时采纳了该主张，那次改革终于使所得税成为国家岁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但是，各无产政党作为反对党，对减轻雇佣劳动者阶级和一般低收入人民大众的负担，比对提高政府岁收的问题更为关心。因而，他们尽管坚持主张对收入、实有财产、遗产和企业利润征收更高额的累进税，但却要求把免纳这些捐税的基准线提高。例如，1932年社会大众党提出以年收入2,000日元为界限，主张收入低于该水平的人免纳一切税。社会民主分子站在正义的立场。抱怨无产阶级承担的税额不合理。他们要求废除或至少是急剧降低沉重的日常用品递减消费税和提高消费品的关税。<sup>[48]</sup>

在地方一级，他们要求废除影响千百万小企业主、小商人和职员职业活动的那些地方税(如对公共浴室和理发店征的税)和杂税(如自行车税和马车税)。此外，他们要求废除地方上的房屋税和水电税，或至少是主要由富户承担而不是象现行的那样由小私有者大众承担。<sup>[49]</sup> 最后，他们鼓吹降低由政府企业垄断经营的诸如铁路、邮电部门的收费和香烟、食盐等商品的垄断价格。简言之，社会民主分子要求政府以征税和支出为工

具，更公正地重新分配财富，因为日本在这方面即使同西方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相比，也还很落后。社会民主分子不时再打算根据总的财政条件，衡量他们的社会纲领的利害得失，决定岁收应从哪里来，<sup>[50]</sup> 但是，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力图使投票者确信他们的纲领是合理的。

社会民主分子对一些特殊阶层，即小企业主阶层或他们称之为的“中小工商业者”阶层日益重视，企图使这些阶层相信，他们的财政主张是公正灵活和现实的。<sup>[51]</sup> 然而，无产政党从最初就已对该阶层最关心的问题(同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一样)即资本利用率或资本信贷问题十分关注。他们呼吁政府积极促进建立一种最广义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金融或信贷设施系统，使借款时无须提供保证。

在日本，半官方的工业抵押银行在政府大藏省银行局的保证和资金支持下，带头(特别是在1923年后)扩大了对小工商业者的低息贷款。无产政党的政策制订者盯住了由邮政储蓄组成归银行局掌管的大量资金，邮政储蓄每年都远远超过私人储蓄银行所接受的存款。这些邮政储蓄都是人民大众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数量约相当于所有其他的银行、保险公司和信贷公司全部存款的1/5。<sup>[52]</sup> 最先是社会民众党，紧接着其他无产政党也都要求“民主”使用该项资金，例如，他们建议可以将其用来发展社会福利设施。社会民众党最早在1927年建议成立国营民众银行。社会大众党继续发展了该主张，要求建立“民众工商银行”，后来称为“全国民众银行”。在1936~1937年，无产政党将它们要求建立该类银行的法案同它们提出的要求制订工会法和佃农法的两个法案同样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统称其为“三法案”。

当时，社会大众党明显地试图争取小企业主或中产阶级的

支持，就如同他们努力争取工人和佃农的支持一样。党为此而成立了市民部，负责制订争取中产阶级的方针政策。这种趋势在“满洲事变”发生前夕已变得十分明显，其背后的理由是，中小工商业者是社会中特别容易接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阶层。党为了击退法西斯主义，决定采取争取中产阶级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以此阻止中产阶级屈从于“从下层”发展起来的带有日本特点的法西斯主义。<sup>[53]</sup>但即使在“芦沟桥事变”后，党在“革新方针”中(当时已不再提出反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提出中央银行和保险公司国有化的同时，仍鼓吹要为制造业和商业(以及农业)提供信贷。

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和整个经济日益转向战时生产，财政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小。继而，小企业主的职业变换或小企业转为军需生产的问题成为党对小企业主政策中的首要问题。社会大众党中的日劳派领袖提出一种“松银根”的主张，他们进而称之为“民众通货膨胀”。这同政府在紧缩通货的短暂试验后又恢复实行的那种3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社会主义者批评政府将大量资源用于军事生产和为支持头重脚轻的金融结构向那些因投机而陷于困境的银行和大公司提供“紧急资金”，他们批判政府推行的这种通货膨胀政策是只对财阀和资产阶级有利。

社会主义者1934年使用“民众通货膨胀”这个词指的是：(1)把投资基金用于各种福利计划，例如，发展国家对城市失业者的救济和在受到严重打击的农村地区改善人民的贫困生活；(2)提高工资水平，减少工作时间；(3)使小企业能够很容易得到信贷；(4)全面提高人民大众的购买力，稳定人民生活。他们认为，只有国家这个最大的支出者才有能力促进这种“民众通货膨胀”，这将使构成金融制度基础的广大人民得到好处，而不是

只对居于上层的财阀和资产阶级有利。

当通货膨胀政策继续被置于首位，特别是在1937年后政府实际很少反对创办信贷设施的时期，党已开始从主张民众通货膨胀政策转向鼓吹价格控制和定量分配。党在前一段时期已经要求政府强有力的控制稻米买卖。当1935年前后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农民遇到严重经济困难时，党要求政府规定蚕茧价格和给那些农民定量分配稻米。党在1937年末的战时革新方针中以及其后，终于把要求控制日用必需品价格和实行强有力的紧急定量分配制度作为最首要的主张。然而这些政策是产生于战时的紧张环境，而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原则。

同社会主义原则更为一致的是关于国有化的主张，人们期望无产政党在这方面将会提出最明确的要求，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仍然碰到大量的模糊术语。1927年无产阶级运动的右翼社会民众党主张将基础工业和金融设施“社会主义化”，而同人们所期望的相反，左翼的劳动农民党却没有提出任何可以同其相比较的主张。<sup>[54]</sup> 社会民众派提出的“社会主义化”是要求国家管理运输、电力、天然气和水利部门以及中央零售市场和中央银行。“国有”这个词只在涉及要求土地国有化时才使用，很明显，公有同国有、县有、市有意思相同。所有无产政党在成立初期都积极参加地方反对公用事业税的斗争。他们主张第一步先把私营的公用事业转到公家手里，第二步再降低税额。这将通过在地方议会中增加人民代表和开展议会外的斗争来实现。

这些词的含义仍然不十分明确。社会大众党在成立时主张“国家管理”诸如钢铁、煤炭、电力、运输、通讯等重工业和其他那些从社会进步、国防和人民生活立场看是重要的工业。后来它又主张“国家经营”重要工业，“国家管理”信贷、保险和外贸和“国家控制”重要的农业生产。而有时候这些词又被相互替

换使用。

社会民主分子在说明其政策时宣称，私有制就意味着剥削工人，而资本家相互竞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会导致生产过剩，从而产生经济危机。社会大众党一成立时就批判保守的政友会和民政党关于“控制”经济的主张，谴责这种主张促进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而它们最后将限制生产的发展。与社会大众党同年成立的由扩张主义者安达谦藏领导的一个称为国民同盟的党，因主张政府控制经济而被攻击为是“法西斯主义的党”。社会主义者当时宣称，政府控制经济的主张和保守党鼓吹的那套政策本质是一样的，而且是更有利于战争动员。<sup>[55]</sup>

但是，社会大众党在自己的纲领中终于也制订了一个为进行战争而动员工业的计划。社会大众党在(1937年11月的)战时革新方针中清楚地鼓吹“统一规划全国经济”和使日本经济同“满洲国”和中国北方的经济一体化。社会大众党继“稳定人民生活”之后又增添了“增加生产”的新目标，要求国家对经济实行更加广泛的控制。他们主张政府经营基础工业(电力、煤炭、石油和钢铁)，由国家控制进口，特别是控制稻米进口，由国家控制外汇和管理军需工业、中央银行及保险公司，并由国家监督对制造业、商业和农业发放信贷的金融机构。最后，他们还要求政府垄断经营稻米、化肥、糖、米酒、啤酒和纸张。为了领导和协调这些活动，社会大众党要求建立一个全国经济规划委员会，由各国营工业和国营银行的智囊人物以及其他一些由政府指定的成员组成。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规划发展国家的力量。它将受内阁和国会控制。

然而，上述的成立规划委员会的思想并不是新的。社会大众党从成立时起就在其政策中提出“建立全国经济会议”的主张。1933年它提出成立全国经济会议，<sup>[56]</sup>以其作为一个立法



调查机关，负责制订一切涉及经济或社会问题包括工农政策以及各种国有化计划的法案，由内阁提交给国会。社会大众党提出，该委员会应由政府、军方、工人、农民、企业组织、学术界和其他人共约300名代表组成。它主张该委员会直接提交给国会的任何法案，在被否决两次之后，第三次必须被通过。这样，它将成为一种超国会的规划局。

社会大众党同时还提出一个建议，要求成立东方经济会议，由日本、苏联、“满洲国”、中国、泰国、菲律宾和印度的代表组成。该会议将在日本领导下联合规划消除不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一切障碍，帮助不发达国家(包括其本身的成员)在国际交往中获得平等地位。该会议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首先由日劳派提出的这些建议被劳农派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被社会民众派所拒绝，理由是，这些建议将会促进法西斯主义路线的发展并违背社会民主原则。尽管如此，随着每年不断地修改术语，社会大众党终于把这些建议作为自己的政策提出来，同时公开否定社会民主的原则。

由于社会主义者很早就主张成立某种国家企划厅，因而当政府在1935年建立内阁调查局时，看起来似乎象是政府终于采纳了反对党的一个主张。1936年社会大众党在建议成立全国经济会议后面的附加语中，要求根本改组内阁调查局，使其成为内阁审议会。恰好，政府立即把调查组扩展为企划厅。当1937年10月近卫首相把规划厅同能源科合并组成企划院作为全国动员的领导总部时，社会民主分子只能作为其自己政策的落实而表示欢迎。事实上，他们要求给企划院更大的权力。<sup>[57]</sup>他们要求成立东方经济会议则成为1938年成立亚洲开发局的先兆，亚洲开发局后来帮助协调组建了“大东亚共荣圈”。

不断加强经济控制和扩大计划经济将会自动导致国有化和

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少在战前日本的条件下来看是如此。而从社会大众党支持两个最重要的加强日本战争基础的法案中可以看出，它正是以那种错误思想为依据的。社会民主分子能够宣称他们是1938年国家管理电力法案的最早倡议者。例如，社会民众党早在1931年就制订了一个电力国有化法案。<sup>[58]</sup> 其后继组织社会大众党试图以1938年的法案作为改革全国经济的第一步，认为除水利外其他一切能源在将来都应转由国家控制。党的领袖们决定无保留地支持该法案。他们在国会内外为通过该法案进行宣传鼓动。他们的努力因1938年3月3日党的领袖安部在自己家中遇刺而变得引人注目，凶手是反共报国团的4名恶棍，据说他们是被豪富集团和反对该法案的大党的成员所雇佣。

一些社会民主分子在战后最懊悔的一件事似乎是他们曾投票支持另一个确立日本战争基础的法案，即1938年3月31日的《全国总动员法》。该法案授权政府在战时只需颁布“帝国法令”就可以利用一切国家资源、企业和从业人员为战争服务。由于该法案有规定生产、分配、价格、工资、进出口、发放补助和建筑材料以及控制资本流通等等的权力，因而它使政府握有全权，而军方依靠这种全权使国家经济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该法律表面上似乎是公正的，它使政府有权平等地管理资本家和工人，但实际结果完全取决于法律是如何执行。社会大众党领袖在支持该法案时还渴望政府彻底改革从内阁系统直至地方政府的管理机构。同时他们要求在选举程序、众议院的权力、贵族院的职业议员等方面进行改革。<sup>[59]</sup> 他们警告政府在执行该法案的各项规定时不要危及人民生活，论证改善对工人的政策将确保工人在战争努力中进行合作。

该法案无疑确实成了战时对经济的控制和规划赖以建立的

构架，同样，计划经济和政府控制一般也确实是和社会主义理论相联系的。虽然如此，但社会大众党议员在同那些保守党及“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议员们一起投票支持把经济控制转到政府手中时，他们关切怎样才能使人民控制或掣肘政府计划者的办法只不过是善良的愿望而已。

回顾一下，可以看到，社会大众党在侵华战争开始后执行的许多政策在以前各无产政党的纲领中都有先例。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但是重点却从组织各阶层人民进行独立的反政府斗争，转变为依赖政府倡导的各种措施，而牺牲了人民的控制和防卫。

## 注 释

[1] 例如，引自协调会编：《近期的社会运动》，第571页。

[2] 日文是《建设大纲》，它的全文及其解释引自社会大众党执行部1933年6月出版的长达81页的《无产阶级建设新日本大纲》，该文第8页，前注所引书，第184页。

[3] 日文是《战时革新政策纲要》。关于全文，见内务省警保局《思想月报》（标有“机密”）第43期（1938年1月），第88～114页。这是党关于计划经济的最详细的建议。

[4] 协调会编：《近期的社会运动》，第571～572页。关于“居住权”的含义，见本章第243页。

[5] 在此发展过程中，美国的影响是一个因素，因为恰在此时，随着1918年创建全国战时劳工局作为处理产业关系的主要政府机构，工人有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的原则在美国得到承认。当然，从19世纪50年代一些全国性工会出现以来，美国建立工会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同英国相比，美国承认工人权利较晚，但是此时美国在日本的威望提高，因为美国作

为一个日本的盟国和世界的主要国家参加了战争。

[6]如前面提到过的，在公布《普通选举法》时，国会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尽管《治安维持法》的目标是镇压革命宣传，而不是工会运动，但它仍旧直接影响到工会，因为官方对该法的解释含混不清。另外还有一个很严厉的1926年的法律，它主要用于惩治聚众闹事和携带武器。此外，如在论及山本宣治遇刺时已提到过的，国会1929年通过的《帝国紧急敕令》使《治安维持法》变得更为严厉，对组织革命运动者判以死刑。

[7]关于这个法案要点的英文概要，见国际劳工局：《日本的产业工人》，第147页。

[8]社会大众党执行部的书，第47页。

[9]这两个法案可以在上注所引书第49~52页找到。

[10]《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484页。

[11]同时，社会大众党国会议员、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书记川村保太郎要求继续承认当时遭军方否定的官营企业雇员的组织权。他鼓吹工会将成为一个执行控制工人这个新使命的组织。然而，政府的回答是，这同军方的意图正相反，但政府正在研究变化了的形势。同上书，第19卷(1938年)，第293~294页以及第373页、第484页。

[12]末弘：《日本工会运动史》，第75页。

[13]社会大众党执行部的书，第49页。

[14]后藤清著《〈工会法〉的历史和理论》(东京，造新堂，1948年)中讨论了这一点，第13页。

[15]关于社会大众党的保留，见《日本劳动年鉴》第20卷(1939年)，第257页。

[16]末弘的书，第69页、第100页。工人不喜欢该法，特别是其中包含禁止所谓第三者(即不属于当事者工会的人)干涉或参与纠纷的那条特殊规定。违犯者将被禁闭3个月或罚款200日元。这是政府对工人在同企业主的斗争中采取联合行动或邀请外面的无产政党或其他领袖人物来援

助工会这种行为的制裁政策。同上书，第99页。

[17]这是第9条。见国际劳工局的书，第141~142页。

[18]社会大众党执行部的书，第48页。社会主义者们使用的数字来自日本银行的报告。当时在日本，只有某些产业中的妇女和青少年的工作时间被法律所规定。根据1926年修订的《工厂法》，他们的工作时间限制为11小时，而在工作超过10小时后有1小时的休息。关于夜班的一项特殊条款也适用于妇女和青少年。见国际劳工局的书，第142页。

[19]例如，1937年10月日本工会会议要求政府当局以法律规定8小时工作日，同时中间要有休息，而加班最多不能超过3小时。日本工会会议承认，在“中国事件”的紧急情况下，工人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自我牺牲。但是它认为，从工作效率和健康的角度看，政府应该制订一个关于工作时间的政策。《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183~184页。

[20]同上书，第21卷(1940年)，第36~37页。

[21]杰罗姆·B·科恩：《战时及恢复时期的日本经济》(明尼亚波利斯，国际印刷公司和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273页。

[22]然而，该党消失后，当1940年的《工人年金保险法》在1942年修订成为《福利年金保险法》时，某些失业保险也被包括进去。末弘的书，第78页。

[23]直到1957年才最终由法律规定将两者分开。

[24]在此之前，从工人要求制订保护法的观点看，工人的主要胜利只是1929年修订的《工厂法》及其附加条款和1931年的《工伤事件补助法》，后者将工伤补助申请范围扩大到包括建筑、运输和其他部门的工人，而此前申请范围仅局限于工厂和煤矿中的工人。

[25]佃农协会虽然没有象工会那样受到任何具体的法律的限制，但它们的生存却遇到巨大的困难。例如，根据引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36~237页的农林省的数字，它们的力量在1927年达到顶点，当时建立了4,582个农会，共拥有会员365,332人。

[26]“扣留谷物”的替换词是“查收全部稻谷”和“查取收获物”。所有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而且政府对其中一些作出了规定。例如，1936年社会大众党要求制定一个规章，限制地主收取佃农的收获物，使佃农能够留下够自己的家庭消费一年的稻米。该党能够宣称它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因为修改了一条规定，加入了有关限制收取收获物的内容，但留给佃农的稻米是够其家庭食用3个月，而不是一年。关于该规章，见上注所引书，第17卷(1936年)附录，第17页。

[27]同上书，第20卷(1939年)，第252页、第257页。

[28]同上书，第20卷(1939年)，第425页~427页。

[29]同上书，第21卷(1940年)，第178页。

[30]社会民众派除外，他们通常局限于只要求政府分配肥料和农具，没有提及种子。

[31]顺便说一句，该法令在战争结束后继续有效，强迫农民按规定价格，而不是按极高的公开市场的价格，将谷物卖给国家。

[32]日本政府倡导的农业信贷机构的中心是抵押银行，而该银行反过来又受大藏省的严格控制。这些农业信贷机构包括有县级工农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和合作社中央银行。“所有这些机构总共提供了农民所借贷款的四分之一……贷款的其余部分主要来自利率非常高的地方当铺、地主和商人”。威廉·W·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4年)。社会民主主义者试图以提高政府支持的那些没有附加条件的中等利率贷款的份额来拯救农民摆脱当铺、地主和商人的控制。

[33]然而，关于县级地方选举，社会大众党主张18岁即有投票权。日本在战后将全国和地方选举的投票年龄降低为20岁。

[34]协调会的书，第551页。

[35]然而，日本无产党在1937年选举中公开主张废除贵族院。

[36]战后，贵族院改革成为参议院时没有包括职务代表，但是在战

后时期通过选举产生该组织的过程中，一些观察家注意到有一种非正式的职务代表制的倾向。

[37]除经济代表会议外，在战后占领时期，那些改革程度不同地都实现了。

[38]通常要求义务教育的时间是10年，而不是后来实行的6年。在战后的教育改革中，学校按美国的“6、3、3”制重新建立起来，而前9年是义务教育。

[39]《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90页。

[40]这里又是一个在占领时期实现的改革，它走得更远，解散了军队。当美国改变政策并鼓励重新武装时，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1947年的新宪法中的第9条的问题，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

[41]《日本劳动年鉴》第15卷(1934年)，第436页。

[42]同上书，第20卷(1939年)，第251页。

[43]洛克伍德的书，第524页。

[44]社会主义者宣称，财阀在经济危机中为妥善保存他们的金钱而去购买政府债券，间接地强迫政府以发行债券而不是增税来提高岁入，从而减轻自己的税务负担。已经得出过关于大部分税收得来的钱都用于偿付债券利息的观点。那些主要承担缴纳邮政费、国营铁路费、烟草、食盐等各种消费物品税的广大人民间接地补助了那些所交税少得不合比例的财阀。因而，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大多数人民的阶级利益明显地同财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见《关于所有不付利息的二年国家债券的条款》，载于《日本劳动年鉴》第17卷(1936年)，第504页。

[45]多达40%的公司股息和红利不交纳累进税。利息只交税4~5%(从国家储蓄债券的所得除外，那是免税的)。洛克伍德的书，第524页。

[46]洛克伍德阐明，即使一个企业从其投资中获利30%，其公司利润的基本税率仅为5%，对超额利润征的附加税虽然高一些，但也不高于10%。同上书，第525页。

[47]“无论法律上税率是多少，日本企业和富有的个人所缴纳的税额在不小的程度上总是取决于个别的交纳过程，而在这里，政治影响和财政金融方面讨价还价的能力起着很大作用。”同上书，第525页。

[48]在此期间，如果将烟草和食盐的垄断利润除外，间接税继续提供全国全部岁入的40%或更多。洛克伍德描述说，“它们的重负更多地是压在城市工人和职员阶级身上”。同上书，第524页。例如，1933年单独饮料税一项所得几乎相当于全国在个人收入、企业利润和利息方面的全部税收。至于广泛的消费物品税，它们最直接地降低了城市中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同上书，第543页。

[49]关于用英文列出的各类地方税及其说明，见笔者的《明治和大正时期(1886~1925年)的日本市政管理》(硕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法和管理系，1949年)，第95~101页。该文以压缩的形式用日文发表时题为《日本市町村制度的得失及其税率》，载于《市政问题》第44卷(1953年6月)，第669~676页和(1953年7月)第833~844页。

[50]例如，见《日本劳动年鉴》第15卷(1934年)，第439页。

[51]在战后时期，该词大部分被“中小企业”这个词所代替，在日文中，“中小企业”这个词更为容易流行。

[52]洛克伍德的书，第515页。

[53]见第4章注释[24]中关于“出自下层”的法西斯主义的讨论。

[54]必须记住，当时法律对试图修改私有财产制的人处以重刑。而且，《明治宪法》虽然明确保护私有制，但它也规定，为了公众的利益，可以用法律来更改财产权。劳动农民党同较“温和”的社会民众党相比不愿意就此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其原因之一似乎是，劳动农民党认为，在如此众多的直接问题正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不值得为这样一个特殊的长远的问题而同法律发生冲突。

[55]社会大众党执行部的书，第56页。6年后，社会大众党改变到这种程度，以致它计划同国民同盟和东方会合并，但该计划由于在有关新



党的主席的问题上意见明显分歧而没有实现。

[56] 该建议全文载于《日本劳动年鉴》第15卷(1934年), 第436~438页。

[57] 企划局为搞研究而让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社会民主主义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参加进来。当1941年发现佐尔格间谍网时, 警方非常怀疑并逮捕了企划院的一些成员(这被称为企划院事件)。其中的一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日本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袖, 著名的有和田博雄、胜间田清一和佐多忠竹。警方宣称, 该集团试图运用共产党的“人民阵线”的思想渗透进合法政府, 通过规划全国经济和准备一场能够导致扩大共产主义势力的战争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被捕的一些人来自1936年11月为探索使近卫亲王的思想大众化而建立的昭和研究会。理查德·佐尔格的同犯日本人尾崎秀实是该研究会的一个成员; 日劳派的三轮寿壮也是佐尔格的同犯。这样, 30年代后期, 各种社会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甚至在政府高级人士中间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社会大众党的领袖们了解这些情况。当然, 佐尔格间谍网本身是保密的。其他人是否有任何自觉的阴谋活动是个有争论的问题。有关有利于阴谋观点的讨论, 见三田村武夫著《战争和共产主义: 昭和政治秘录》(东京, 民主制度普及会, 1950年), 第48~53页、第307~324页。关于相反的观点——即它是警方编造的——见科学思想研究会编《探索》第2卷, 第74~75页。有关昭和研究会材料, 见查默斯·约翰逊: 《叛国实例: 尾崎秀实和佐尔格间谍网》(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4年), 第114~117页以及书中其他各处。

[58] 《日本劳动年鉴》第18卷(1932年), 第473页。

[59] 《思想月报》(1938年5月), 第99页。

## 第10章 对外政策：从反对战争到支持战争

人民的外交

对不断变化的中国问题的态度

对外交往与对西方国家的态度

对苏联的政策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由于意识到他们自己在日本政治环境下的弱点，因而必然靠他们自认是属于一个正在成长壮大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来增强自己的信心。这种情况在1922年少数几个人秘密聚集在一起成立共产党时特别清楚地表现出来，如事实所显示的，当时这几个人宣称要推翻“天皇制”。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怎么能在以这样小的力量开始发展工人运动时就具有这样的雄心呢？

甚至在那些以英国工党和其他更温和的社会民主运动为榜样的右翼无产政党领袖的思想中，当时的世界形势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一般似乎越是左翼的领袖或组织越注意发表对外政策声明。非法的共产党人显然把“捍卫社会主义者的祖国”即苏联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至于工会方面，考察其每年的政策揭示出，同一直存在到1940年受社会民众派领导的日本工人总同盟相比较，在1925~1928年受共产党领导的日本工会评议会和1937年前加藤勘十的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用了相当大的力量关注对外政策问题。左翼无产政党严厉批评日本在“满洲

事变”中的政策，而1937年加藤和铃木领导的日本无产党则将人民阵线运动主要看作为是一场帮助防止世界战争爆发的斗争。

更右翼的无产政党——事实上社会大众党也是如此——强调在能够期望有“人民的”对外政策之前，必须先进行内部改革。虽然如此，但人民对政府处理外交问题的不满却为攻击政府提供了很好的弹药，因而甚至中间派和右翼的无产政党领袖也对当时政府的对外政策持批判态度。

可以论证，任何政党在任何特定时期的各种对外政策同其对内政策有着必然的“横向”的联系。例如，当一个日本无产政党决定应当“保护”日本在中国的利益时，它将强化对英美的态度，也会更支持军事预算。然而，还可以进一步论证，多数同时存在的政策都显示出和过去的政策有着“纵向”的联系。无产政党在制订政策时尽力维护前后一贯，坚持自己的传统。例如，当社会大众党改变其对华政策时，它必须根据以前的立场去解释这种变化，使用同样的术语说明不同的事情，甚至否认政策有很大改变。本章如同在最后一章中那样，将尝试把各种政策相互区分，探明其随着时间推移是如何变化的。

各无产政党对外政策态度的试金石同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试金石一样，是中国问题。例如，对英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对日本扩大其商品在中国的市场采取什么政策。因此，本章的重点是中国问题及其变化的两个里程碑，即“满洲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华政策也影响到各党的对内政策以及其主张的本质和他们事实上能否存在下去。其后，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无产政党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对西方移民和殖民主义的看法以及对苏联的政策。但是，在实际考察对华政策前，将先探讨无产政党对外政策的一般思想，

以表明在1926年所有4个全国性无产政党的对外政策思想是多么的相似。

## 10.1 人民的外交

各无产政党一致主张实行“人民的(或民众的)外交”。他们的“人民的外交”是指执行由日本人民制订的全球政策。它应该是一种致力于提高全球生活水准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真正有利于人民——不管是日本人民或是其他国家人民。因此，它将支持弱小者反对强权，支持世界有色人种反对白人，支持“受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穷国”反对“富国”。但是人民的外交也意味着一种阶级(或反资本主义)倾向，同被指责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官方政策相对立，即它反对日本资本主义代替英国和美国统治亚洲。无产政党为确保日本不实行“侵略”或“资产阶级”政策，强调必须首先在日本进行改革。

人民的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对秘密外交，这是外交中一个由人民做主并为了人民的固有概念。该主张和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公开地达成公开协定”的论述相似。所有左翼和中间派无产政党在“满洲事变”前都支持该主张，尽管不是将其作为中心题目。

社会大众党成立后不久，就将其称之为“革新(或进步)的人民外交”视为一种以“人类意志”为基础的“圣战”，宣称它将给地球上的黑暗地方带来光明——即给那些忍受着剥削的软弱的人民带来平等。该党认为，革新的人民的外交应成为日本的一项基本的合乎道义的政策，就象英法的“同盟外交”、美国的“拒绝战争”和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政策那样。革新的人民的外交政策在攻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也包含了

对日本的含蓄批判。该党明确声明，这一政策并不赞同日本人民“衰落”。它通过促进绝大多数人的阶级利益，为日本人民“继续生存”而承担全部责任。它断言，从长远看，日本将被资本主义毁灭，而由于同样原因，日本只有靠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新生。<sup>[1]</sup>

社会大众党在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试图证明其支持战争并不是“改变方向”，它引用了党以前关于对日本人民的生存负有全部责任的声明。靠曲解基本原则来否认实际改变了政策，这清楚地表明，革新的人民的外交已经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它这时被规定为是一个“在远东可能因‘芦沟桥事变’而形成新的和平结构的曙光中提高民族意识的计划。”<sup>[2]</sup>革新的人民的外交在“芦沟桥事变”前有反政府的含义，而在“芦沟桥事变”后则变成为意味着为进一步进行战争而实施改革。

1926年各无产政党不断公开宣布反对“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战争。<sup>[3]</sup>这意味着，随着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的每一次推进，将会提出日本的行动是“帝国主义”行动还是“防卫”行动的问题。后面将讨论各无产政党如何对待这一问题。这里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即社会大众党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世界和平。该目标在1937年后几乎无需改变，因为日本军队很快就在建立“远东和平”的名义下横行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

各无产政党在1926年首次制订对外政策时并没有把种族平等的原则阐述得很清楚，只是提出一些含混的主张。例如，劳动农民党要求消除对殖民地的歧视，社会民众党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和移居自由。“满洲事变”后，社会大众党要求世界承认日本同其他国家平等，它有同其他国家平等的、自由获取并利用世界自然资源和参与重新分配世界资源的权利。社会大众党对其以前组织所鼓吹的“解放被压迫人民”的主张作了一个

重要补充：“援助”亚洲人民。这是又一个同最终出现的“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相适应的原则，因而不必抛弃它，只是对其作了一些小的修改。例如，党最初在要求获取原料和进行自由贸易时，抗议其他国家建立各种经济封锁线，企图闭关自守，阻止日本商品进入。但是当日本在“满洲”和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圈时，社会大众党又支持在经济圈实行统一关税，其基本理论是日本正在帮助其邻居摆脱落后状态——即日本现在正积极帮助“解放被压迫民族”。

1937年前各无产政党攻击日本的“双重外交”，它们既谴责设于霞关的外务省的“软弱”政策，同时也反对设于三宅坂的军队参谋本部的“强硬”路线。社会大众党直到1936年还攻击军方的“大陆政策”是“愚蠢的适者生存哲学”。<sup>[4]</sup> 但社会大众党同时也指责外务省的传统政策只是简单追随欧美，认为这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所应有的政策。因此，他们并不主张以三宅坂的政策替代霞关的政策，甚至也不是要使二者相互调和，而是要建立一种以人民意志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它将由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协调一致去执行。他们鼓吹以“和平手段”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但是，由于他们把已经衰落的外务省和正在上升的军方同样作为直接的攻击目标，因而不能不使人怀疑社会民主分子实际是在为军方谋利益。

在这种环境下，日本各无产政党力图表示其所坚持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尽管实际上内容和意义都改变了。这就是产生下述各项具体政策的背景。

## 10.2 对不断变化的中国问题的态度

尽管战前日本无产政党在其对外政策思想中总是把中国问

题置于很优先的地位，但其对华政策仍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华政策日益成为有关生死的重要问题。各无产政党在1927~1928年为首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选举而要求制订对华政策时，他们所面临的局势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正在大陆兴起，刚刚分裂成为国民党阵营和共产党阵营。各无产政党毫无困难地攻击日本政府在这种局势中所采取的政策是好战的和愚蠢的。在第二阶段，日本政府在“满洲事变”中的意图促使社会民主分子痛苦地重新估价其对华政策。最后，1937年完全支持侵华战争标志着第三个发展阶段的开始。

在这三个阶段中，社会民主分子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在第一阶段，中国发生的事件使各无产政党对一致支持国民党出现分歧。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大众党转变成成为批判中国国民党对日本在华“合法权益”缺乏理解。当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于1936年12月似乎又转为同共产党合作时，对国民党的批评增强了。这为1939年谴责国民党和接受南京汪精卫政权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大众党的态度逐渐近似于政府的态度。正是在第一阶段，无产政党对官方政策的批判最尖锐，也最关心中国革命。

由于“中国事件”在报纸上是头条新闻，而批判政府的政策又是竞选中很好的宣传材料，因此各无产政党在首次参加竞选的1927年和1928年中，大部分对外政策声明都是讲的中国问题。

国共两党联合组成的中国革命军借着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空前强烈的反对洋人的浪潮开始进行北伐。北伐军从1926年7月开始，3个月内成功地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4省。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把国民革命政府从广东移到武汉。但是许多右派分子和他们的荣升的年轻领袖蒋介石正在前线忙于战斗，没有出席会议。据说他们反对该决定。

尽管如此，双方很快达成妥协，决定把由中间派和左派统治的政府机关迁到汉口，而军队总司令部则设在南昌。北伐继续进行，1927年3月占领南京，在南京发生了反对洋人的行动，这引起外国的干涉。行动可能是左翼分子企图为困扰蒋介石而鼓动的。

继而，3月23日蒋介石和他的部队逼进上海市郊。几乎在同时，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分子在上海市内发动武装起义，在3月24日蒋的军队进入上海前占领了警察局和市政府指挥机关，第二天，即3月24日蒋的军队进入上海。这时国共联盟内部开始出现分裂。蒋介石在4月12日发动政变，残酷屠杀工人和他们的共产党领袖，整个上海除去外国使馆区外都处于蒋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可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订有秘密协定，虽然如此，但各国仍然加强了在上海的军队。

蒋于6天后，即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向左派和中间派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挑战——武汉政府很快就投降——并要求各国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它。至1927年底，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完全处于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在孙逸仙博士制订的纲领中，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征服割据着中国北方的各派军阀，这是“军事巩固”阶段。其后，随之还有一个“训政”阶段，以使人民受到“民主”训练。

就在这时，即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将军的政友会内阁取代了宪政会内阁，它宣称将推行一种比前任外相币原的政策“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5月27日宣布的第一个具体决定是派日本军队去山东。该行动和一些中国内部的困难使蒋介石确信应放弃立即向北继续挺进。事实上，在币原执政时期，日本的军事行动并不象币原的演说那样调和软弱，而在田中领导下，军事行动也不象他鲁莽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果敢。总之，田中



率直生硬的做法激起宪政会甚至还包括新兴无产政党的反对。

社会民众党领袖们同中国的革命有紧密的联系。其中的宫崎龙介认识孙逸仙博士本人，并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社会民众党领袖们同情国民党的反帝立场，他们根据自己在日本的经验，支持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对蒋介石同左派进行斗争抱同情态度。社会民众党甚至在田中内阁成立之前，于1927年3月3日就已抗议面对国民党的挺进而加强在上海的日本军队。他们要求不干涉中国的内部斗争，于4月2日把该决定通知了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各保守党。他们全力支持蒋在上海的政变，决定派宫崎和松冈驹吉于5月初去上海。这两个人在上海受到工会和当地国民党的热情欢迎，他们随后去南京，在那里会见了蒋介石和当时受尊敬的革命家胡汉民，达成社会民众党和国民党加强国际团结的协定。社会民众党在这两人于6月回国后发表了长篇声明，攻击田中决定派军队去山东，认为阻碍蒋介石北伐的行动只会增加反日情绪，造成对日货的抵制，而这将直接威胁日本工人的生活。<sup>[5]</sup>虽然日本军队直到9月才撤退，但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当时，即在1927年夏季，田中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讨论大陆政策问题，因而形成所谓的《田中奏折》。尽管该文件在1929年才被中国人“揭露”，但很明显，（如“奏折”中所叙述的）日本政府已认为其在“满洲”和蒙古有“特殊权益”。社会民众党批判该主张，鼓吹日本带头放弃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权”。同时，蒋介石因受到一些军事挫折而辞去在南京政府中的职务，于1927年8月隐退到日本，直到1928年1月又被召回担任军队总司令。当时蒋在日本没有公布任何他同社会民众党领袖可能订有的条约。他在回到中国后，立刻开始继续北伐，遇到的唯一对抗是日本军队调到济南，并从日本国内得到新的援兵。当

1928年5月3日日本军队以武力驱逐新到达的中国军队时，发生了暴力事件。

社会民众党对“济南事件”表示遗憾，谴责它是田中政府“反动”的对华政策所造成的。然而，在国民党军队到达北京之前出逃的张作霖元帅在6月3日遭到暗杀，使田中政府陷于困境，这个在3月15日大逮捕中严厉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劳动农民党的田中内阁终于在7月2日垮台。这使残存的各无产政党和反对党民政党感到欢欣鼓舞。

1926年，当劳动农民党变得更为左倾时，它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也进一步增长。它主张，站在东方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最前线的日本无产阶级，应该更尊敬和同情正在努力反抗殖民国家和帝国主义“走狗”军阀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它要求立刻承认汉口政府和日本政府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继而，当国民党在1927年3月继续北进逼近上海时，劳动农民党和日本劳农党一起，于1927年4月28日，为响应国民党东京支部向各无产政党发出的争取支持的呼吁，建立了反对干涉中国同盟，该团体随即攻击田中的对华政策。<sup>[6]</sup>

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刚刚镇压了共产党。但是，由于秋季之前汉口还存在着一个中间派和左派的政府，因而形势仍很混乱。其后，汉口虽然也在继续清洗共产党，但共产党也于那年发动了几次武装起义。形势最后终于明朗化，中国红军尚无力重新占领国民党控制的部分地区。劳动农民党在4月以后虽然对支持国民党的兴趣迅速减弱，但它仍继续为反对日本干涉中国而进行宣传鼓动。例如，7月，劳动农民党和反对干涉中国同盟合作，决定为帮助中国独立而派观察家去中国。其选派对象是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在日朝鲜人和水平社成员。野田律太和另外两位党和工人领袖在东京受训，学习如何进行鼓

动宣传。所有这些人在实际离开日本之前都被逮捕。他们宣传中提出的口号有，“不要干涉中国”、“撤回我们的军队”等。

劳动农民党的后继组织继续强烈要求不干涉中国。筹建新党委员会在“济南事件”刚发生后就向其他各无产政党发出呼吁书，要求共同开展“抗议周”(1928年5月19~25日)活动，不仅抗议派军队去中国，而且也抗议《治安维持法》中的死刑条款。然而，社会民众党和日本劳农党没有同意在大规模逮捕后不久就同该筹委会建立联系。筹建新党委员会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成功地争取众多人民的支持。<sup>[7]</sup>但是新劳动农民党仍把“不干涉中国”列入其基本纲领。

日本劳农党于1926年底成立后不久就全力支持国民党革命政府。它也强烈反对干涉中国和派军队去中国。但是，当国民党在1927年4月分裂时，它既不支持汉口的左派，也不支持南京的右派，如同它在无产阶级阵线中持“中间派”态度一样。

汉口政府垮台后，蒋介石在南京的势力上升，并血腥镇压左派在广东的起义，日本劳农党领袖因而逐渐转为反对整个国民党。他们开始批判社会民众党要求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主张。他们宣称，国民党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正在极力野蛮镇压中国无产阶级运动。他们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名字，但是他们暗示，应该支持各种反对国民党的左派集团。然而，同尽力援助中国任何特定的集团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批判日本的行动。<sup>[8]</sup>党后来实际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尽管其在中国问题上的观点不断有所变化。

各无产政党，无论其对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现实如何评价，都公开主张从中国撤退军队，理由是，日本在软弱的中国派驻军队能够引起中国对日本的愤恨；而引起中国任何形式的反抗，无论是抵制日货或是同日本战斗，都会反过来影响日本人

民大众的生活水平。

无产政党的这些警告在“济南事件”后的几年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一些激进的日本军人却从同样的形势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抵抗只证明了必须乘为时还不太晚进一步干涉中国。由于这些激进军人决心带头侵略中国，日本军队不久后就蹂躏了整个“满洲”。

已经叙述过(在第4章)“满洲事变”的爆发在无产政党队伍中引起多么巨大的损伤。前面也已经指出，社会民众党比其竞争者全国劳农大众党更容易解释为何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同时还指出，新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使国家社会主义者同这两个党分裂。进一步考察这两个党的对外政策态度，将为理解它们的后继组织社会大众党在政策上改变的程度奠定基础。

读者一定记得，当时社会民众党中右翼的立场是由不久就退出该党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赤松明确表述的。赤松在他留在社会民众党时曾论证说，“应当允许我们在中国大陆或美洲自由发展。那些阻碍我们这样做的人欲以‘正义’的名义惩罚我们，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们必须以绝对生存权来为日本的行为辩护。”同时，他以一种虽然模糊但却很强有力的词句鼓吹一种“目的在于使资产阶级控制‘满洲’和蒙古并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sup>[9]</sup>

即使是社会民众党内的多数派，也支持日本有权得到殖民地。例如，西尾在1932年4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16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就表示了这种看法。他说，“出席本届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是代表各欧洲国家的白种人。白人国家的领土起初只占全世界的1/14，而现在它们所取得的领土已超过全球的3/5，所统治的人民已超过世界人口的1/3。白人国家缔结的保证其领土占有和在此条件下的持久和平的反战条约，非常不利于有色人

种。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联盟准备推行一种让步政策承认这种不合理的国家关系和这种不公平的现状吗？”<sup>[10]</sup>他显然是点名地批判国联派去调查日本在“满洲”行动的李顿调查团。此外，他是在暗示，日本要求同欧洲“优等种族”在获取殖民地方面有同等机会。

社会民众党派遣由片山哲、岛中雄三和小池四郎组成的代表团去“满洲”调查，在代表团提出报告的基础上，赤松和党内的多数派能够达成协议把日本在“满洲”的行动说成是正当的。其表现形式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在1931年11月22日的会议上通过《关于满洲和蒙古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否定了下述的“自由派”立场：(1)夺取“满洲”拯救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策”；(2)从“满洲”撤退的“共产党”的立场；(3)鼓吹向国际联盟“让步”。该决议同时阐明党自己的立场：(1)中国方面同日本一样对局势负有责任；(2)为保护日本人民的生存权利，日本的缔约权必须保护；(3)必须制止资产阶级控制“满洲”和蒙古，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将为中日经济的联合奠定基础。但是他们寻求实现该对外政策目标的唯一道路却是首先在日本努力推翻资本主义。<sup>[11]</sup>

另一方面，新改组的全国劳农大众党则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尽管前面已经提到过，但这里我们仍要指出，党是在何种程度上保持了它刚成立时的那些原则，其中包括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党在1931年9月29日一次中央常委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下述声明：“我们坚决反对政府和军方对我们的邻邦中国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它孕育着引起世界战争的危险。我们要求政府撤退军队和停止干涉中国内部政治事务，我们将为反对军方势力在政府中占支配地位而战斗到底”。<sup>[12]</sup>该声明的前半部分是非常正确的预见！结尾则令人啼笑皆非！党于侵华战争爆发后10天在党内成立了一个由大山领导的从中国撤军战斗委员

会。该委员会在改组后——名称改为反战斗争委员会，主席改由粗暴的堺担任——通过了一个长篇政策声明(该声明虽然发表了，但却被警方禁止)。<sup>[13]</sup>

该政策声明把“满洲事变”描绘为是“日本帝国主义”变“满洲”和蒙古为自己殖民地的一次尝试。它把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称为只不过是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进行“掠夺”。该声明虽然回避任何关于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的讨论，但它却嘲笑社会民众派旨在把“满洲”社会主义化并转而由无产大众所控制的“天真”口号。它认为这些口号把工人弄糊涂了，从而帮助了日本军国主义者。该声明认为，虽然似乎是军方挑起了“满洲事变”，但最后获利的只是那些为数不多的“金融资本”集团。

读者一定记得，该方针遭到松谷与次郎的挑战，他是党在国会中的代表，也是党的顾问。松谷在“满洲事变”发生大约一个月后的1931年10月16日，随一个国会议员代表团离开东京去“满洲”和上海进行了3周考察访问。他在回国后发表的报告中主张支持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利益，鼓吹那些利益是取自资本家而转交到工人和农民手中的。由于这同党领袖们的立场相矛盾，该报告在党员队伍中引起一场轰动。党的领袖们论证说，如果压力能够迫使日本政府放弃在“满洲”的特权，日本资本主义将因此而被削弱，而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将会快得多。松谷(以及其社会民众党中间的诸如赤松这样的同情者)反对这种立场，称其为“共产主义者的观点”，论证说，放弃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只会加强中国的资本主义，使日本被斥为三流国家，日本群众也没有希望提高其生活水平。<sup>[14]</sup>松谷进一步论证说，由于以军方为一边，而以财阀金融资本(再次以币原外相为代表)为另一边，双方有摩擦，因而能够劝说军方把金融资本排

除在“满洲”之外，从而可以使“满洲”成为一个在反资本主义军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党内多数人都不同意这种观点，松谷被宣告开除出党。

1931年12月党召开代表大会期间，全国的形势已经如此紧张，以致到会的警察在代表大会尚未开完时就命令会议解散，以阻止党正式表达它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然而，麻生久已经开始同民间法西斯主义者和年轻军官建立联系，这导致他在1934年支持军方小册子。

社会大众党成立后，它尽管没有反对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但也没有采取积极支持的立场。党在“满洲国”成立而且于1932年9月被日本正式承认后，要求让“满洲国”自治和独立，并要求日本政府把当地日本人的一切治外法权转交给“满洲国”。这样，党继承了社会民众派的思想，即认为除非日本和“满洲国”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否则它们的经济不可能完全融合在一起。党也反对认为日本和“满洲国”能够单独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圈的看法，它认为一个“联合经济圈”应该在自愿的基础上把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包括进去。<sup>[15]</sup>

社会大众党在进一步阐述其立场时，反对把“满洲”归还中国的所谓在“满洲”问题上的“自由派”主张，因为这种主张错误地暗示“满洲国”只不过是个傀儡国家。党也反对认为“满洲国”应该成为殖民地附属国的所谓“财阀”看法。党的立场是，“满洲国”应该在自决原则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属于“满洲人民”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满洲国”的政府官员不应该是日本国民而应该是“满洲”血统的不受日本控制的当地人。日本人的权力应该归还“满洲”，日本和“满洲国”应该发展一种新的友好关系。<sup>[16]</sup>

“满洲”关东军的行动和声明似乎证明了党的主张正确。特别是在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军队的宣传机构利用人民的

反资本主义情绪攻击所谓“财阀统治的政党政府”。“满洲事变”的风波刚刚开始平息，军方就宣称，新的“满洲国”将实行计划经济，在那里不允许企业家自由管理，而财阀也将被从统治地位排除。1933年3月，“满洲国”政府公布了一个强调国家规划的经济建设纲领。军方也着手在“满洲”的蒙古人、“满洲人”和定居那里的汉人中培养一种特殊的“满洲的”国家感，但同时，为阻止反日情绪表露出来，不只对“满洲国”中上述三个“种族”，而且对日本人、朝鲜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进行监视。最重要的政府职位都正式的由“满洲人”或“满洲”汉人担任，尽管每个重要官员身旁都安插有一个日本“顾问”。这样，在计划经济和“满洲”民族主义方面，社会大众党显然同军方协调一致。

然而，社会大众党在一个基本的方面和军方的态度不同，但在公开的文件中，这方面很少表露出来。分歧产生于对战争必要性的看法。对军队领袖来说，夺取“满洲”只构成日本帝国向外扩张的第一步。他们接受这样一种前景，即它在一定时候将会导致同苏联，最终似乎也会同英国和美国发生战争。我们刚刚已经指出，在社会大众党成立之前，警方怎样为阻止全国劳农大众党正式表达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而解散了该党的代表大会。那些经常去国外的社会民众党领袖当时同样反对扩大战争。麻生久后来在鼓吹同军方合作时，至少开始是为了重建内部，而不是默认有必要进行战争。

尽管如此，即使在其他方面，社会大众党也试图促进“社会主义的”“满洲”摆脱财阀控制。从财政上支持“满洲”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公开手段。1934年党的国会议员在第65届国会上批判政府的预算，反对任何以削减日本国内的救济措施为代价增加军事支出的做法。尽管他们支持为重建“满洲”和蒙古提供特别援助，建议为从财政上给予支持而发放低息公债。他们还



鼓吹从苏联购买中国东方铁路，将其并入南满铁路系统，以提高“满洲国”在经济上的自立能力。1933年5月，苏联同日本当局商谈关于铁路的交易，但由于在条件上争论不休，谈判直到1935年才完成。

党在“满洲”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包括两个方面：(1)反对使“满洲国”退回到资本主义的政策；(2)使“满洲国”真正独立。<sup>[17]</sup>1936年，党因一个明显标志着军方修改排除财阀——至少是新财阀——政策的事件而感到惊异，因为那一年，军方邀请一位财阀代表鲇川义介访问“满洲”，视察那里的经济开发取得的进步，以诱劝私人企业增加对“满洲”的资本投资。<sup>[18]</sup>党为使“满洲国”能够独立而继续鼓吹把日本的所有权力都移交给“满洲国”政府，尽管党同时也鼓吹为促进“满洲”和日本双方的“经济建设”，“满洲国”应同日本建立强有力的经济联系。

党以其所主张的这两方面的政策构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它是以日本既是海洋国家也是大陆国家这种现实主义分析为基础。<sup>[19]</sup>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的行动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它夺取山东、侵犯上海，仅仅在文化上的着眼点区别于英国在香港和上海的行为，或者区别于中国资本主义集团正在江浙的作为。党论证，这样发展下去只会导致失败，因为日本的经济实际比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都软弱。

作为大陆国家，日本正向中国扩展其军事势力。在这里，冲突的本质不同。日本实际是在同共产主义战斗，而不是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竞争。苏联利用中国的“共产主义团体”来反对日本，必须清除他们。党承认，困难在于中国红军实际比军阀向农民提供了更好的地方政府。日本军队必须在地方政府、经济机会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使农民能得到更大的好处。为在中国大陆取得成功，日本的政策必须是进步的和社会主义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军方通常只不过是同那些“反动的”军阀合作，共同与共产党游击队战斗。另一方面，外务省是同蒋介石政府合作，而蒋介石政府虽然部分地被苏联利用，但也得到基本上是反日的英国资本的支持。党的两个方面的政策都是错误的。日本要推行一种“统一的进步的”对华政策必须伴之或首先推行“社会主义的革新的”国内政策。

顺便提一句，社会民众派以前对国民党的乐观看法在30年代中期逐渐改变。该党多数人现在认为，虽然国民党在推翻各地军阀对平民大众的残酷剥削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但代之而起的是国民党对人民更系统的“合法剥削”，这种情况更坏。

可以看到，社会大众党已经为其对外政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承认有必要在列强相互争夺的中国同共产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英国的间接影响战斗。另外，还因为它认为日本军方有可能推行一种“进步的”对华政策，虽然军方的某些行动应该受到批判。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社会大众党立即表示支持政府对中国进行“圣战”。党修改了其纲领，主张“全国团结”，并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慰劳前线的士兵。<sup>[20]</sup> 党断言，战争的直接起因是中国国民党政府近来的反日政策。但是此外，党还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企图“赤化”中国，而英国和美国资本则企图把中国殖民地化。为使那些企图不能得逞，中国应当自治和独立，忠实于其本身的历史和国民性格。<sup>[21]</sup>

社会大众党鼓吹在远东建立以日本、“满洲国”和中国三国轴心为基础的新的和平体制。这应该是“圣战”的积极目标，日本人民为该目标而献身，希望他们的牺牲能够有利于人类文明，但日本为能够完成这一最高任务，必须进行内部改革。党以该理论为基础就可以将最大注意力集中于在其国内改革纲领中提

出具体建议。

社会大众党由于同其他国家的工人有联系，感到它能够以促使国际舆论站在日本一边来为“圣战”出力。当时任党的顾问的铃木文治立即自愿担任“人民的使节”，去美国对美国工人和人民解释日本的观点。他将不仅代表社会大众党，而且代表日本工会代表会议，后者对其使命来说更为重要。政府也希望有一个非官方的工人代表团去美国。

铃木文治在1937年10月27日出发之前发表了下述声明：“同美国工人组织最亲密友好的我们，对美国工人决定抵制日货感到非常遗憾。我相信，这是过于相信中国单方面的宣传和缺乏公平判断的机会所导致。我们应当说明，我们所进行的实际是一场捍卫日本生存的战争，我们不再支持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我们要阻止反日运动的扩大。我们决心在这场圣战中战斗到底，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够铲除东方不稳定的根源。”<sup>[22]</sup>大约在同时，党还派遣阿部茂夫作为“观察家”去美国，帮助执行向美国政府内外解释“芦沟桥事变”“真实含义”的任务。

社会大众党主席安部矶雄同政府合作，对美国发表无线电广播讲话，再次从日本官方立场解释“芦沟桥事变”。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行动，同他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与反战运动合作(尽管很不紧密)，大不相同。此外，党不仅致力于影响美国舆论和在较小的程度上影响欧洲舆论，而且也试图在日本国内战胜被它宣称是曲解了战争意义的所谓蒋介石政府的“恶毒宣传”。<sup>[23]</sup>

和社会大众党相反，日本无产党同诸如全评等支持它的工会组织对“芦沟桥事变”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是他们没有发展到组织群众进行任何反战或反军国主义示威，他们宁可集中

精力去救济那些被称作有色人种的家庭。<sup>[24]</sup> 加藤作为国会议员，也随同国会代表团去上海访问，慰劳皇军战士。他在这次访问归国时，于1937年12月被逮捕，其后，日本无产阶级被解散。

随着侵华战争的拖延，社会大众党逐步制订了一个新的大陆政策。其目标是重建亚洲人领导下的亚洲。作为第一步，党鼓吹建立一个“新中国”和建立一个由日本、“满洲国”和中国三国组成的“互利的经济合作组织”。对于中国，党特别主张：(1)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政府；(2)有一个发展华北地区的五年计划；(3)有一个发展华中和华南地区的五年计划；(4)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同日本建立牢固的友好和睦关系；(5)有计划地复兴农村；(6)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党。此外，党主张日本应同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紧密团结，把中国也纳入日本同“满洲国”的合作圈，即日本应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着手发展中国的原料和天然资源，开发中国和“满洲”的边境地区。<sup>[25]</sup> 这就涉及建立第9章中所叙述的那种东亚经济会议。在这里，社会大众党将其成立时就有的那种思想进一步发展。它助长了在1943年11月召开“大东亚共荣圈”成员国会议时发展到了顶峰的那种倾向。

为了推动中国同日本联合，社会大众党要求在中国的北平(京)、南京和冀东地区建立各种地方的傀儡政府。蒋介石的长期竞争对手汪精卫在劝说蒋介石利用“近卫声明”，以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失败后，于1938年12月背叛了自由中国。他企图实施一个计划使重庆和东京睦邻友好或者使国民党的大部分随其去南京推行同日本和平的政策。虽然汪精卫在1938年底被重庆国民党政府驱逐，但日本政府却不愿全力支持他。社会大众党在汪精卫于1940年3月30日最终在南京正式建立其政权之前，在1939年全年和1940年初鼓吹支持汪精卫的各种势力。党继而

主张日本立即承认南京汪精卫政府是拥有全部主权的独立政府。<sup>[26]</sup> 然而，日本政府当时显然对以承认南京政府来威胁，使重庆政府改变对日态度抱有一线希望，因而直到1940年11月30日才承认南京政府。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社会大众党和日本其他正式政党已解散4个月。

社会大众党在其存在的最后时期把更多注意力转向“共荣圈”的军事方面。党在1940年6月24日鼓吹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实行“互助合作防卫”，但是它再次认为，只有各国内部保持团结，才能够实现该计划。对于日本，这意味着以一个单一政党“作为整体战体制中国家的政治支柱”。<sup>[27]</sup>

1926年后的14年中，社会大众党中的社会民众派和日劳派领袖，从反对政府在中国的行动变为试图就日本在大陆的使命提出比政府更激进的意见，经历了180度的大转弯，尽管他们是以“革新”的名义实现这个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革命最初被看成是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到逐渐被视为完全是大国的政治斗争，而其中日本是最“真诚”的参与者。

### 10.3 对外交往与对西方国家的态度

无产政党的各种对外政策方针尽管都程度不同地要受其支持还是反对日本政府官方对华路线的影响，但对不同的问题却要求制订单独的政策。对美国、西欧和殖民地亚洲的政策是根据对国际移民、贸易和殖民主义等重要问题的认识而形成的。同时，各党倾向于认为，苏联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方面的原因，应该单独对待。在和国际组织交往以及同其保持何种关系方面，各政党确实能够形成自己的外交方针。

同欧洲社会民主分子相比，日本社会民主分子的对外联络并不很广泛，几乎完全限于只和外国工人组织有联系。大多数非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政党都附属于第二国际，因此，日本社会民主分子早期面临的问题是，应如何看待第二国际这个组织。

1922年后被称为第二国际的组织其正式名称是工人和社会主义国际，1926年以前总部设在伦敦，其后迁往苏黎世，1935年又迁往布鲁塞尔，1940年解散前一直设在那里。社会民众派完全赞同第二国际的纲领并可能受到其对外政策观点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日本政府对非官方的国外交往持怀疑态度以及日本国内对第二国际的误解，因而没有同它建立正式联系。<sup>[28]</sup>然而，该派中的两名领袖决定把英国工党主席阿瑟·汉德逊在第二国际1928年8月5~11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讨论对外政策问题的长篇报告全部译成日文出版。<sup>[29]</sup>那次主要针对殖民地问题，决定要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以防止这个问题由共产主义者包办。

劳动农民党及其后继组织，基于和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的同样理由，谴责第二国际，并成功地使第二国际在许多知识分子和整个日本工人运动队伍中获得恶名。第二国际被斥责为丧失了新思想并成为以伪装面目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表。

日劳派最初也批判第二国际，只是词句稍微温和一些，日劳派认为，第二国际过于依赖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成果，他们断定，特别是在日本的环境下，这显然是个错误。但是，日劳派后来对第二国际的态度变得较为缓和。1931年全国大众党为和外国特别是和第二国际交换情报并收集消息而成立了一个半自治的国际问题研究会。<sup>[30]</sup>随着“满洲事变”的爆发，日本无产阶级领袖越来越孤立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外。<sup>[31]</sup>社会大众

党反对有很多欧洲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国际统一战线运动，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孤立。

根据各党对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的态度，大致可以把它们划分为左、中、右三类。社会民众党从最初就十分鲜明地对第三国际持完全反对的态度，而日劳派一直到“满洲事变”发生后仍避免谴责第三国际。

劳动农民党的党员暗中——有时也公开地(例如，在街头演讲时)——支持共产国际。劳动农民党中那些秘密的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是共产国际日本支部的成员。这种联系已有文件证明。<sup>[32]</sup>但是，党本身同外国组织却没有这种隶属联系。党的主要后援工会——评议会，正式隶属于设在上海的受共产党支持的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1927年5月评议会的两名成员出席了汉口的一次会议，并在中国停留一段时间，试图以日本工人运动的经验为基础帮助推进中国的工人运动。<sup>[33]</sup>评议会在其于1928年解散之前，也同其他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和平和反殖民主义国际组织有联系。

无产政党及其后援组织同其他外国组织发展关系比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发展关系更少带有政治性。各无产政党宁可退回到无产政党成立前的那种做法，只在工会事务上同外国组织保持紧密联系。日本政府指定工人代表出席国际劳工组织会议使日本工人首次有机会在政府同意下参加大型国际活动。铃木文治作为日本代表团的“顾问”出席了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大会，但是他认为日本政府怠慢他，因而很不满意，他对日本政府选择以后参加历届国际工人组织会议的“工人”代表的专横方式也日益感到愤怒。因此，总同盟在政府于1924年召开国际工人组织第6届会议之前作出让步时，一直抵制政府的安排。结果，铃木文治本人成为日本出席国际工人会议的第一个真正

的工会代表，伴随他的是西尾。这部分归因于国际压力所致。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日本政府首次在法律上默认了日本工会的存在。

社会民众派坚定地支持国际劳工组织，这不仅由于它认为政府的默认很重要，而且也由于它认为，各国官方对日本政府的压力会产生一些效果，使日本政府遵守国际劳工组织会议随后作出的有利于日本工人的决定。

国际劳工组织也对日本工人运动——间接地也对各无产政党——施加了一定影响。例如，国际劳工组织总书记艾伯特·托马斯1928年12月访问日本，为右翼工会显示大团结创造了机会。尽管托马斯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官员试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公众广泛认为他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右翼领袖。他的到来提高了社会民众派领袖的威望，因为社会民众派同他最为亲密。社会民众派为欢迎他举行了几次大规模庆祝集会。<sup>[34]</sup>

日劳派对国际劳工组织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尽管党在其纲领中强烈批判了国际劳工组织，但是日劳派工会却并不完全敌视它，这表现在它们参加了选派出席第10次(1927年)和第13次(1929年)代表大会工人代表的选举，虽然它们没有参加选派出席其他几届大会的代表选举。他们最初反对选举代表的方法，因为他们认为，该选举方法将使右翼工会能垄断代表席位。然而，1932年日本工人俱乐部成立后，那些日劳派工会把“团结”放在首位，在选举中同其他派系工会联合提出候选人。

诸如日本工会评议会等支持劳动农民党的左翼工会，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反对国际劳工组织。持这种态度的不只是评议会的两个主要后继组织，而且也包括加藤的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尽管全评后来调子有某种软化，但它在1937年议员大选中仍把国际劳工组织描绘成是一个鼓吹劳资“妥协”的机构，认为它只



是帮助资方以一些虚伪的让步来蒙蔽工人。

但是，社会民众派却仍然坚持支持国际劳工组织，尽管该组织的其他成员在国际上加强了对日本的批判。在1938年于布拉格召开的一次国际劳工组织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大多数国家的工会代表都谴责日本侵略中国。愤怒的日本政府立即表示它准备退出该组织，如同它已在1933年退出国联那样。但是，总同盟和其他隶属日本工会会议的工会要求日本继续留在国际劳工组织中，他们论证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正确阐明日本的立场。<sup>[35]</sup> 他们在申明反对退出国际劳工组织时指出，日本已经深深地卷入该组织的工作中。日本是该组织的创始国之一，1919年以来23次派代表出席该组织的大会，批准了14个公约，采纳了17个劝告性建议。尽管如此，他们的请求并不足以阻止政府采取在当时的国际气氛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行动。

社会大众党早先曾反对日本退出国联，这种态度实际是对日本军方的间接批判。<sup>[36]</sup> 关东军的军官们被明确控告日本侵略“满洲”的《李顿报告书》激怒。外相内田派松冈洋右代表日本出席国联讨论《李顿报告书》的委员会。松冈洋右受命陈述日本的立场，但不准备走得太远，以致使日本退出国联，因为那可能导致日本在国际上被孤立。尽管如此，但由于军方不断施加压力，在1933年2月中旬，政府决定退出国联已经是很明显了。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匆忙开会，发表了强硬的抗议声明。<sup>[37]</sup> 他们认为退出国联的行动违反各无产政党从最初就一直拥护的“人民的外交”原则。

无产政党尽管无力影响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政策，但他们确实试图在远东就地区性的劳工和经济问题做一些具体事情。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日本工会评议会支持并隶属于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为了同这个共产主义团体相对抗，总同盟领导

人铃木文治在1925年和国际劳工组织中印度的工人代表S·M·乔西商讨成立亚洲工会会议。成立该组织是为了使亚洲各国温和派劳工组织能够就共同利益相互研讨。但是其后，直至1928年，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努力，在1928年，日本当时驻日内瓦的工人代表米洼满亮和印度代表R·R·贝克黑尔讨论了下一年举行一次会议的可能性，但是该会议被推迟了，因为不能就中国代表是否参加取得一致意见。<sup>[38]</sup>

亚洲工会会议直到1934年5月10日才召开第1次会议。印度、斯里兰卡和日本的代表聚集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旨在促进亚洲工人的“共同利益”。他们特别要求国际劳工组织反映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利益，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也应用国际劳工标准。他们还许诺和国际工会同盟合作。第2次会议在令人失望地一度延期后于1937年5月17日在东京召开，但只有印度和日本的代表出席，斯里兰卡、菲律宾和中国没有派代表参加。第3次会议计划于1939年召开，但是没能实现。亚洲工会会议最后在1940年7月19日同其主要靠山日本工会会议一起解散。<sup>[39]</sup>社会大众党始终全力支持亚洲工会会议，但是，尽管作了很多努力并制订了详细的计划，亚洲其他国家的工会组织对日本仍然疑惧很深。

在更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社会大众党在其1933年第3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主张成立前面提到的东方经济会议。<sup>[40]</sup> 此前不久，1933年6月12日~7月20日于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以失败告终。那次会议试图以制止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趋势，新的货币和税收政策、降低贸易壁垒和关税，使国际资本更自由的流动，重新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以及国际控制原料运输等加强国际合作，来克服世界经济危机。虽然英国捍卫其帝国特权和美国提高关税严重危害了会议的成功，但

日本也因坚持要求承认其在东亚的特殊利益而为会议制造了困难。<sup>[41]</sup>

1933年10月陆相荒木代表日本军方提出一个建议，主张在亚洲有特殊利益的所有国家召开一次远东经济会议，制订能够维持和平的共存原则。他要求为承认“满洲国”和修改华盛顿、伦敦《海军协定》进行初步谈判，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逐步贯彻《巴黎协定》和《九国条约》，对印度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和解决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但是，该建议因遭到外务省的反对而被广田首相否决。

一般的说，党的建议和军方的建议没有很大不同，只是范围更狭窄。美国和西方殖民国家没有被提议作为参加者——这限制了修改国际条约和协定的可能性。党建议，邀请苏联、“满洲国”、中国、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参加，并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东方经济联合会，以便继续攻击诸如关税、贸易、投资和原料等问题。东方经济会议被认为可以为亚洲后进国家提供一个通过与日本的合作而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的机会，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除了其他问题外，党的建议还要求考虑国际移民和菲律宾与印度的独立问题。

在社会大众党内部，似乎是日劳派基于第9章中提到的那种全国经济会议的思想首先提出该建议。他们的建议遭到劳农派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到社会民众派的一些抵制。那些反对者宣称，这些建议是被称为“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日劳派为建立“远东国际”的老主张的翻版。他们认为，这个新建议蕴藏着反社会民主原则，可能鼓励法西斯主义倾向。但是，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对建立一个地区经济会议很有兴趣，支持该建议。

日本政府当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促进这方面的发展，党于是把经济会议的思想写入其1937年的《新建设纲领》，党这

次使用了最新术语，要求建立一个东亚经济会议。<sup>[42]</sup> 不仅不邀请殖民国家参加，而且经济会议和远东和平新体制的目标之一是从亚洲排除欧美“资本主义”，特别是“解放”菲律宾和印度。

无产政党领袖关于国际移民和殖民主义思想中的主要原则是“种族平等”。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使该原则得到国际承认。例如，日本代表团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试图在国际联盟公约中写入种族平等的条款，但是，由于英帝国自治领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反对，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没有成功。种族平等问题对日本大部分人民来说是个很敏感的问题，西方主要国家不接受种族平等原则引起日本人民广泛愤怒。

20年代，日本所有无产政党都要求结束种族歧视和积极鼓吹“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他们有意使“解放”的含义模糊不清。左翼中的共产党人无疑把殖民地的解放解释为包括朝鲜和台湾的独立。社会民众党在其成立时提出的口号中包括有“解放被压迫民族”和“实现全世界移居自由”。日本劳农党于1927年特别要求把普选权扩大到日本的“殖民地”桦太、台湾和朝鲜。<sup>[43]</sup>

“满洲事变”后，社会大众党以比较温和的词句鼓吹同殖民地朝鲜和台湾的人民“友好合作”。党要求废除当地人在政治、社会、法律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使他们和日本人享有同等权利。<sup>[44]</sup> 此外，党主张“解放亚洲人民”。<sup>[45]</sup>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该思想后来发展成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首的大经济圈，认为使亚洲其他国家获得“独立”和“解放”是日本的使命。

所有无产政党初成立时在其纲领中都突出地主张国际移居自由。仅仅两年前，日本全国曾愤怒抗议美国通过1924年的《普通移民法》，该法案规定，除青少年外，美国拒绝不合格的公民侨居美国。这样，所有的日本人和蒙古人移居美国都受到阻碍。日本人感到，这是暗示日本人太“不文明”，以致不适于居

住在美国，因而认为这是对日本的真正侮辱。日本人可以不在乎那怕是最底的移居限额，但对应用于他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歧视条款不能不感到愤怒。尽管日本同若干个国家发展关系时都遇到国际移居这个问题，但日本无产政党只挑选出美国和巴西，要求日本政府采取特别措施保护这两国中日本工农移居者的权利。<sup>[46]</sup>

1929年美国修改移民限额，美国当时根据《移民法》对日本移民也加以限制，规定日本人移居美国不得超过185人。这样少的人数不可能危及美国，而美国当时如果废除限额制度将能洗去对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侮辱。<sup>[47]</sup> 因此，美国重新兴起一个运动，它开始集中力量要求修改《移民法》。就在该目标已接近实现时，“满洲事变”却使任何修改《移民法》的希望都化为泡影。

在美国拒绝日本移民过程中，使日本工人和无产政党的大多数领袖感到懊丧的事实是，美国劳工组织即使不是领导也是参与了反日宣传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反日宣传运动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其矛头更多是指向勤劳的日本农民而不是日本工人。但是，这种反日宣传刺激了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恶化了两国的官方关系。铃木文治1915年作为友爱会负责人首次访问美国时，同日本移民以及包括一年前到美国的片山潜等在美访问的日本人，讨论了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方的日本工人组织的问题及其面临的各种歧视。铃木文治和片山潜虽然倾向不同，但都要求减少美日两国的摩擦。片山当时是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同样受剥削的美国工人阶级和日本工人阶级在反对战争和歧视的斗争中有共同利益。铃木则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温和的，但不是“黄色”的或“公司雇佣”的工会运动的领袖，他关心的是，促使美国劳工组织在日本工人问题上持同情态度，并学习更先进的美国工人运动的经验。<sup>[48]</sup>

铃木在使他的美国主人获得好印象方面极为成功。他在这次访问中和美国工会同盟加利福尼亚支部负责人保罗·沙伦伯格以及该同盟的全国领导人塞缪尔·冈珀斯建立了友谊并终生保持。铃木1916年再次访问美国期间，用英语对一些工人团体发表了演说，试图消除各种形式的对日本人的歧视并促进日美和睦。在日本，铃木同其他友爱会领袖以及后来总同盟的领导人都利用美国歧视日本工人的事实作为论据，试图劝说日本政府和资方改善日本工人的劳动条件。

然而，从长远看，日本工人领袖尽管同美国工人领袖保持着个人友谊，但美国工人运动主流采取的各种立场使这种个人友谊很难对整个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产生影响。美国工会同盟不仅如此长期地反对东方侨民，而且还严厉谴责社会主义。美国也不存在类似的佃农运动。例如，1929年，铃木邀请保罗·沙伦伯格访问日本，并在总同盟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但他关于美国对日本人的歧视纯粹是经济方面的而不是种族方面的论证并没有成功。日本人非常熟悉其他各类美国工人领袖关于警惕“日本威胁”和“黄祸”的声明。

在日本人看来，只是在30年代中期，特别是随着工业组织代表大会的建立，美国工人运动的主流才变得比以前“进步”了。随着重新注意组织那些无组织的许多是外国出生的劳工，以及希特勒主义在欧洲兴起，美国工人领袖越来越认识到反对种族歧视的重要性。他们除了其他具体措施外，还采取步骤揭露美国一些无根据的反对日本工人的宣传。1935年他们邀请全评领导人加藤勘十访问美国，向美国人和美籍日本人听众发表关于日本工人的平等要求以及如何解决工人中的种族歧视问题的演说，美国工会同盟反主流派承担了加藤访问的费用，加藤这次旅行共历时81天，访问了西雅图、芝加哥、纽约、华盛顿、洛

杉矶、旧金山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城市。<sup>[49]</sup>

这种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而遭到挫折，但更坏的事情还在后面。“珍珠港事件”后，从西岸的加利福尼亚到华盛顿，受多年反日宣传——这种宣传常常阴险地把种族血统和政治行为混在一起——影响的大多数美国人可耻地无视人权，赞同要求定居在西海岸的日本人和美籍日本人离开。

随着30年代的消逝，日本无产阶级领袖发现，除种族歧视外，日本还面临着其他国家为反对日货而设立的关税歧视，在这里，他们再次以试图用有利于日本工人的方式解释形势。社会大众党在1937年的《新建设纲领》中，除写入人类平等和移居自由的主张外，还写入自由贸易和在获取国家所需资源方面各国权利平等要求。各国日益限制从日本进口。但实际上英国被认为是最坏的罪犯。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替自己的行为辩护，谴责日本搞“社会倾销”，榨取工人血汗以低于成本价格出售货物，企图靠这种不公正的手段在国际市场上得到立足点。特别是1932~1934年，英国棉纺织品和纤维织品的市场因受日本竞争而令人惊慌地迅速缩小。社会倾销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它成为1934年国际劳工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在日本工会会议上讨论了日本代表团将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大众党的态度。利用这场讨论，可以揭示出日本社会民主分子关于对外事务和内部改革关系的思想。

日本工会会议攻击了那些认为改善工人条件将使日本的出口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阻碍日本扩展海外贸易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把改善工人条件比做是采取自杀行动。工人领袖们认为，日本贸易正如此迅速地扩展，已成为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在这种条件下，改善日本工人条件将能减少日本产业工人的不满，提高效率和改善劳资关系。这样，工人将同企业

主和平相处。那时，日本在国际论坛上就能够真正证明日本扩大出口不是剥削工人的结果，外国工人和学术组织也不能不承认日本扩展贸易不是靠不公平的手段。因此，出席该会议的工人领袖们建议以下列步骤提高日本工人水平来解决倾销问题：(1)控制出口和在出口工业中规定最低工资限额；(2)制订承认集体谈判权的工会法；(3)立即批准有关工时和禁止妇女、儿童上夜班并规定了休息日的《华盛顿公约》。<sup>[50]</sup>

尽管如此，面对英国不断增加贸易限制——例如，英国1934年规定了限额制度——社会大众党对英国的态度开始变得日益严厉。它因此更心安理得地提出“推翻英美资本主义在印度和菲律宾的统治”这个口号。<sup>[51]</sup> 1939年初夏，英国和日本的士兵在天津发生冲突后，社会大众党支持推进不断高涨的反英浪潮，支持日本政府采取军事手段。<sup>[52]</sup>

回顾无产政党在移民、殖民主义和国际贸易方面的政策，可以再次看出，各无产政党始终主张的那些“原则”，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其含义也变得完全不同。

#### 10.4 对苏联的政策

1925年1月，日本承认了苏联。一年后，正式成立的各无产政党并没有因这种情况而感到为难，虽然这是前一时期中大多数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不是指受共产党人影响的那些人——团体一直强烈要求实现的一个主张。其后，维持友好关系和避免战争成为各无产政党在苏联问题上最持久的要求。

劳动农民党及其后继组织新劳动农民党鼓吹把苏联作为“工农的国家”来捍卫，但是，其他无产政党却认为，没有特殊



义务要采取亲苏立场。另一方面，右翼的社会民众党无论是怎样谴责日本共产党，但对苏联却并未采取十分敌视的态度。

1924年发生的一件事揭示出总同盟的一些领袖甚至在日本承认苏联之前就已经同苏联代表进行合作。1923年9月大地震后，苏联驻北京代表利奥·卡拉卡恩表示，苏联愿意考虑准许日本工人组织去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沿岸伐木和捕鱼，以此帮助和救济在地震中受到灾害的工人。在总同盟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援助地震中受灾害工人的组织，制订了一个利用苏联人给予的权力去捕鱼和伐木，用所赚取的资金救济地震受灾者的计划。松冈驹吉代表该组织去北京和卡拉卡恩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其后不久，日本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担心该计划会被认为是苏联干涉日本内部事务，苏联和日本工人领袖同意取消该计划。<sup>[53]</sup>

其后，日苏关系的发展在1931年关东军征服“满洲”之前没有遇到很大问题。苏联作为应付日本侵略“满洲”的措施之一，于1931年12月提议日本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政府虽然没有直接拒绝该建议，但却抱冷淡态度，因为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军方，在这一问题上都存在意见分歧。1932年9月，正当日本准备承认“满洲国”时，当时已成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卡拉卡恩再次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出卖中国中东铁路的问题。社会大众党立即主张日本政府接受这两项建议。

社会大众党认为，同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只会促进远东和平，因此它将有助于消除已开始的战争宣传在日本群众中引起的紧张情绪。在主观方面，社会大众党论证说，由于它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党，而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有义务反对一切可能同苏联发生的战争。党在其后几个月中发起了要求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运动。党除其他措施外，还派以

安部矶雄为首的一个代表团拜访了斋藤首相、荒木陆相和内田外相，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新成立的“满洲国”同日本和苏联一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主张该条约在“满洲国”和苏联之间规定一个非军事区，以防止敌对行动的爆发。<sup>[54]</sup>

然而，党把该条约设想为只是太平洋地区一个更广泛得多的安全体系的一部分。首先，该条约将消除“满洲”边境沿线的紧张状态，使“满洲国”能够把主要力量用于进行重建和发展，而不是用于国防，从而将减少日本和“满洲国”军事支出的负担。社会大众党沿着该方向还作了更多的努力，它表示支持1932年2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普遍裁军会议。裁军会议上的那些讨论绝大部分都令人沮丧地拖了几年之久，只偶尔显露出一些希望的火花。社会大众党为促进实现会议目标，建议缔结一个《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条约》，<sup>[55]</sup>然而这并不涉及彻底裁军。1935年1月，社会大众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伴随当时全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谴责国际上对日本海军规定的比例。海军比例最初是由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所确定，继而在1930年又重新谈判，1935年12月将再次讨论。然而，社会大众党确定主张在确保国家安全的条件下裁减军备，并警告要阻止海军竞赛。

促使军方反对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是，1936年11月25日签署了《日德反共产国际条约》，缔约双方在该条约中同意，交换关于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并协商和合作采取必要的反措施。社会大众党立即谴责该条约是无效的，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是危险的，并详细列举出以下一些理由，即站在法西斯一边反对共产主义将导致强行恶化同其他大国的关系；阻止共产主义的唯一方式是进行民主改革；群众转向共产主义的原因，是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够使其未来得到发展——因此，日本的对外政策必须是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

共产主义。党还认为，该条约将阻碍日本为缔结更多贸易协定而作出的必要努力以及该条约的范围太狭窄。此外，实行集体安全要求的日本不只和德国，而且要和苏联、美国及中国签订双边条约。社会大众党虽然完全赞同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但它感到该条约“玷污了国体”，并暴露出广田内阁的软弱无能。<sup>[56]</sup>

党在1937年4月国会议员选举中继续鼓吹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其后，它的政策逐渐改变。1939年党不仅转为支持《反共产国际条约》，而且实际上主张将其强化。同年8月5日，社会大众党鼓吹把《反共产国际条约》转变为日德意军事同盟。<sup>[57]</sup>仅仅几周后，在8月23日，《苏德友好中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布，震惊了世界。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标志缔约双方的政策发生了完全的根本的变化。几乎在该条约的潜在含义能够被理解之前，纳粹坦克于9月1日越过了波兰国境。两天后，英国和法国为履行其保卫盟国的义务而对纳粹德国宣战。整一年后，1940年9月27日——当时社会大众党在其主张被第2届近卫内阁实现前已被解散——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条约，日本成为轴心国正式成员。

如事实所显示的，日本——至少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并不是同苏联进行战争。这种情况所以可能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1941年4月13日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事实上，外相松冈要求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俄国的要价太高。以前支持德、意、日和苏联签订四国协定——这正是社会民主分子所鼓吹的，也是松冈宁可选择的方式——的纳粹德国，这时尽力阻拦松冈，但松冈却以强调苏日要真诚相待而使世界震惊。松冈显然希望加强日本在同美国面对面谈判时的地位，并为向南方推进而确保北方的安全。

希特勒这时对签订四国协定如此冷淡的原因是，他正在秘密计划进攻苏联。他于1941年6月22日发动进攻，完全无视1939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使日本不得不决定，是追随德国立即进攻苏联，还是延缓进攻西伯利亚直至关东军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日本选择了后者，但从没有能够完成其准备，因为已作出导致进攻珍珠港的首先向南方推进的决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由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督促斯大林废弃《苏日中立条约》，在对德作战胜利后3个月内进攻日本。1945年8月8日苏联这样做了，根据日本的时间计算，那天正好是原子弹毁灭广岛市后两天和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并无条件投降之前六天。

就社会民主分子的对外政策而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最终转变成为支持战争，但这场战争却以失败告终，其结果对社会民主运动和反军国主义提供了较大的推动力，假若日本统治者保持足够的谨慎，不象他们所做的那样相信全国——包括无产阶级代表——都支持他们，从而去冒过大的风险，在那种情况下，社会民主运动和反军国主义运动反而不会有进展。

## 注 释

[1] 社会大众党：《危机中的国际局势》（东京，社会党出版部，1936年），第2～10页；内务省警保局：《从出版物看有关革新日本的思想的当前形势》，第309～310页；《日本劳动年鉴》第15卷（1934年），第444～445页。

[2] 见《社会大众新闻》（1937年11月30日），第2页，题为《对外政策》。

[3] 各无产政党似乎并不惧怕苏联将会发动战争，但是，追随第二国际路线的右翼社会民主分子却谴责共产党人并不是真正反对战争，而是

力图利用战争传播共产主义。例如，见龟井贯一郎和吉川末次郎著《论社会主义外交政策》(东京，仓罗社，1930年)，第一章和第二章。

[4]《危机中的国际局势》，第5页。

[5]该声明引自白扬社编《日本无产政党史》，第288~289页。同时该党成立了一个中国问题协议会，党外的一些重要学者和国际法专家也参加了该会。其中有战后(1956年12月~1957年2月)成为保守派首相的石桥湛山和吉野作造教授，其他成员包括高桥龟吉、水野广德、长野朗、原彪、川原次吉郎、平野永一郎和铃木秀三郎。

[6]同上书，第496~498页。

[7]这是他们自己所承认的。同上书，第572页。

[8]然而，劳农派的成员甚至在1928年他们参加的党已成为日本大众党之后，仍继续尖锐地批判国民党。见内务省警保局：《警方关于出版物的报告》(1929年3月)，第21~23页。

[9]《日本民主新闻》(1931年10月15日)。

[10]《劳动》(1932年7月)，第6页。

[11]声明全文发表于《日本民主新闻》(1931年12月15日)。该文还重新刊载于《日本劳动年鉴》第13卷(1932年)，第475~476页。

[12]部分引文可见南贺的《先驱者的经历》第167页。

[13]全国劳农大众党反战斗争委员会编：《满蒙问题与无产阶级》(东京，全国劳农党出版部，1932年)。根据国会图书馆所存一本内务省没收来的该书上的手写标记，它是被警方查禁的。

[14]赤松克彦：《新国民运动的基础》，第86~93页。

[15]见《当前国际政策要纲》，1932年10月1日通过。该文引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4卷(1933年)，第478~479页。

[16]同上书，第15卷(1934年)，第445~446页。由于存在的真正“满洲人”的后裔如此之少，如果按字面的含义，这意味着“满洲国”将被极为少数的一些人所统治。如果“满洲人”简单地指出生在“满洲”的人，那么

这将是一种谨慎的承认汉人占大多数的说法。

[17] 社会大众党直到1936年初的所有主要对外政策的节录都可以在《思想月报》第23卷(1936年5月)中找到。

[18] F·C·琼斯：《1931年后的“满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147~148页。

[19] 这一点及下面的材料是来自该党1935年派往中国的一个以龟井贯一郎为团长的5人代表团的有趣的报告，《危机中的国际局势》，第34页(在前面本章注释[1]中引用过该书)。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阿部茂夫、平野学、渡边潜和松永义雄。他们所写的报告不是只涉及他们的直接经历，而是部分地以他们在中国的考察为基础，批判地评价了全世界的形势。党在1936年春举行的下一次大选中以该报告来解释党的对外政策。

[20] 见《社会大众新闻》(1937年11月30日)，第2页。

[21] 《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92页。

[22] 同上书，第19卷(1938年)，第190页。

[23] 同上书，第20卷(1939年)，第246页。

[24] 同上书，第19卷(1938年)，第218页。

[25] 同上书，第20卷(1939年)，第249页。

[26] 日本政府实际上通过宪政会在1939年12月同汪精卫达成一项秘密条约草案，该草案规定汪所建立的代表中国的政府将是一个傀儡政府。根据一位专家的意见，“日本实际妥协了，建立起一个汪精卫领导下的独立政府，蒋介石或许会停止抵抗，从而全部日本军队可以腾出手来，以便进攻俄国”。约翰逊：《叛国实例》，第153页。

[27] 《劳动年鉴》(1940年)，第261页、第263页。该书由东京协调会编辑，与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日本劳动年鉴》不同。

[28] 然而，在1929年有一个传闻，即社会民众派的总同盟将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一个工会组织)。这在日本工人运动中引起很大波动，但当时该传闻并没有成为现实。然而，在同年，日本海员协会加入了国际

运输工人同盟从而成为日本第一个建立起这种国际联系的工会。渡边道太郎：《日本的工会》（东京，1932年）。然而，在1931年，总同盟是附属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由6个右翼组织组成的促进工人法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见赤松克磨：《日本社会运动史》，第310页。

[29] 这是在本章注释[3]中提到过的龟井和吉川写的小册子。

[30] 当时该党的国际部分为中国班、美国班和苏联班，它们向党提供对世界一些最重要地区的看法。该党的三位代表（浅原、木村和田原）在“满洲事变”爆发前不久，即从1931年4~9月去美国旅行建立联系。《日本劳动年鉴》第13卷（1932年），第500页。

[31] 全国劳农大众党具体地否定了第二国际，又是由于第二国际太信赖议会主义。同上书，第14卷（1933年），第464页。

[32] 例如，见斯韦林根和兰格著《日本的红旗》，特别是第六章和第七章。

[33] 见《近期的社会运动》，第315页。其后该组织的会议，1928年是在广州召开的，1929年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召开的。

[34] 同上书，第259页、第262页。

[35] 《日本劳动年鉴》第20卷（1939年），第171页。

[36] 同上书，第17卷（1936年），第502页。

[37] 同上书，第15卷（1934年），第456页。

[38] 《近期的社会运动》，第316页。

[39] 《劳动年鉴》（1940年），第242页。

[40] 见前面第9章，第249~250页。关于“东方经济会议”的主张全文刊载于《日本劳动年鉴》第15卷（1934年），第438~439页。

[41] 见矢永：《佩里以来的日本》，第565~567页。

[42] 《日本劳动年鉴》第20卷（1939年），第250页。

[43] 白扬社的书，第32页。

[44] 《日本劳动年鉴》第15卷（1934年），第447页。

[45]关于社会大众党对殖民地态度的说明，笔者在前面提到过的一本社会大众党出版的《危机中的国际局势》的衬页上找到一则有趣的手写的评论，该书最初是得自日本内务省，而笔者是从国会图书馆借来的。那则评论如下：“字下的线是东京警察总部(岩中)所划，通电全国(警察)。取消第1页、第2页和第8页[“下次印刷修订”被划掉]。理由：“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群众”可能(翻译成是)包括了日本的殖民地。下面划线的字包括，主张“满洲”成为“民族独立国家”句中的“民族”一词和短语“解放东方的被压迫群众并同其合作”。

[46]白扬社的书，第480页。

[47]矢永的书，第446页。

[48]片山和铃木没有友好相处。片山这时谴责铃木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谴责友爱会是一个“纸糊的工会”，一个“只有名人的聚集体”。

[49]《日本劳动年鉴》第17卷(1936年)。

[50]同上书，第16卷(1935年)。

[51]《危机中的国际局势》，第2页；《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92页。

[52]同上书，第21卷(1940年)，第187页。

[53]《近期的社会运动》，第312~3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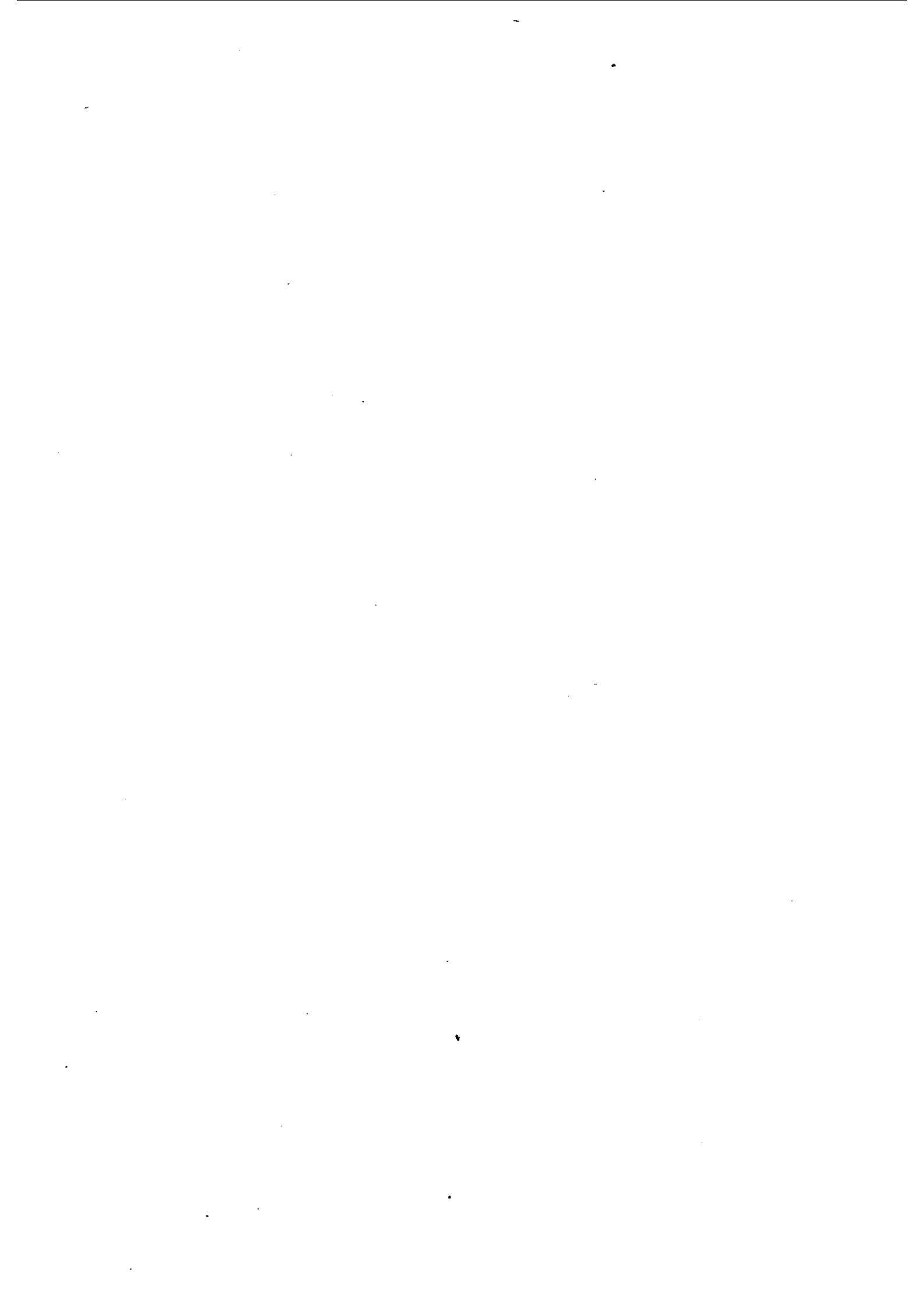
[54]《日本劳动年鉴》第14卷(1933年)，第455页、第479页和第481页。

[55]《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见《日本劳动年鉴》第16卷(1935年)，第444~445页；第17卷(1936年)，第502页。

[56]见东京《朝日新闻》(1936年11月28日)。关于龟井贯一郎所阐述的该党的详细见解，见龟井的文章《〈日德反共产国际条约〉和我们的态度》，《明日》(1937年1月)，引自内务省警保局：《出版物资料》(1937年2月)，第44~47页。

[57]《日本劳动年鉴》第21卷(1940年)，第157页、第187页。





# 选举和后援组织

选举中的后援力量

工人组织

佃农组织

妇女组织和少数民团体



## 第11章 选举中的后援力量

男子普选权展示的前景  
1928~1942年间6次选举的结果  
各无产政党力量的分配  
党组织同其工农支持者的联系

衡量一个政治运动力量的最明显的标志是该政党得到多少选票。但是，对日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在1925年普选权扩大到包括一切年龄在25岁以上的男子之前，它们在选举中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例如，最畅销的社会主义小说《火柱》的声名卓著的作者，也是夭折的1901年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木下尚江，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参加了1905年5月的大选，但是，他在大约16,000张选票中只得到32票。虽然他所得选票之少部分归因于警方的干涉，但木下的情况也说明一个事实，即在日本，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对选民必须拥有一定财产的限制使社会主义运动很难迅速发展。

本章将讨论扩大选举权后每个社会民主集团和派系在选举中能够争取到的后援支持的质量和数量。下面几章将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其他支持组织进行更详细的考察。

## 11.1 男子普选权展示的前景

人民甚至在1890年首届国会召开之前就要求男子普选权，1901年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也要求男子普选权，1902年在国会中首次提出男子普选权问题。其后，国会几乎每年都提出有关该问题的法案，但直到1911年它才终于被下院通过，然而却被上院否决。1911年的幸德大逆审判和歇斯底里镇压不仅导致社会主义运动被扼杀，而且也使扩大选举权的宣传鼓动被迫停止。

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普选权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特别是在1918年大规模的“米骚动”之后，又重新复苏。保守派采取主动行动，在1919年稍微修改了《选举法》，把选举资格税降低为3日元，但同时却建立起小选举区制。降低选举资格税仅使选民从100万人扩大到将近300万人，而小选举区制却增加了政府干预选举的能力，更有利于执政党。对这种修改的不满进一步促进了扩大选举权的运动，1920年在国会似乎即将通过一个选举法案时，原敬首相为反对该法案，突然解散了下院，从而使任何很快产生新选举法的希望化为泡影。

男子普选权法在以后5年中年年提出。护宪运动因许诺将扩大普选权，声势越来越大，护宪三派终于战胜清浦内阁，在选举中获胜，建立起三派联合政府，这是以前任何政党或联合阵线从没有做到过的。1925年在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首相领导下，通过了《男子普选权法》，实现了当初的承诺。

这次选民增加了将近5倍，达到1,400万人左右。虽然选举区扩大为“中区”(3~5名代表)，但是仍有许多障碍限制民主自由的发展。例如，25周岁才有选举权，妇女完全没有选举权，以及在当地报有户口一年的规定使许多家庭户口仍留在农村的

工厂工人和城市居民得不到选举权。<sup>[1]</sup>同时还必须记住同年通过的《治安维持法》对政治运动的威胁。尽管如此，该法案显然为社会民主运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扩大选举权后，日本在1945年投降前共举行过6次大选，其时间如下：(1)1928年2月20日；(2)1930年2月20日；(3)1932年2月20日；(4)1936年2月20日；(5)1937年4月30日；(6)1942年4月30日。

根据普选权法新增加的选民包括大批社会民主分子称之为的“无产者”。我们从关于社会民主分子的阶级概念的讨论中知道，他们所谓的“无产者”并不是指诸如“自己没有生产资料，除劳动力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卖的工厂工人”这样一个同类人的集团。他们将其所认为的“无产者”即整个“无财产阶级”视为他们的潜在支持者。1929年，《朝日新闻》的一位社论撰写人关口泰精确地描述了社会民主分子所想要代表的阶级。他说，“如果我们要问一般被称为无产者的人在总人口中占多大比例，如果我们把无产者视为所挣的钱还不够偿付所得税的那些人，那么答案就是，无产者在当时人口中占97%，或在家庭总数中占87%。那些偿付所得税的人中，83%的人每年收入少于3,000日元(约750美元——按4日元相当于1美元计算)，不能被认为是富裕阶级。总之，总人口中至少近90%的人没有工作就不能生活或即使有工作也不能够生活得很好。”<sup>[2]</sup>

很难想象一个试图代表无财产阶级的政党靠向本阶级发出号召就能够得到占全国如此高比例的人口的支持。“无财产阶级”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广，其中的许多阶层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无产者。例如，专职人员、白领工人、自耕农和小商人一般都认为自己属于定义含混的中产阶级。另外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日本社会是由许多单个小家族组成的，这些家族中的每个

成员无论其经济成分和阶级地位如何，在诸如选举投票这类事情中，即使不是一贯的也是经常的受到个人义务的制约。在分析日本各阶级的行为时，必须记住这个事实。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新成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受共产党影响的合法左翼政党首先致力于争取工人和佃农的支持。但是在工人和佃农中，只有年龄超过25岁的男人才有投票权，而这样的人数目并不多，1928年(当年举行了实行男子普选法后的首次国会议员选举)估计只有350万人左右。1937年其人数尽管又增加50万人，但仍不到全部合格选民的30%。<sup>[3]</sup>事实上，无产政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吸引全部的工人和佃农支持它们。他们的希望主要是寄托在有组织的工人和佃农中，而这些人总数，1928年估计实际只有661,803人，或占全部合格选民的5.3%，1937年则降低到625,113人，或占全部选民的4.3%。有组织工人的人数增加了10余万，但是佃农会员减少的人数却更多。<sup>[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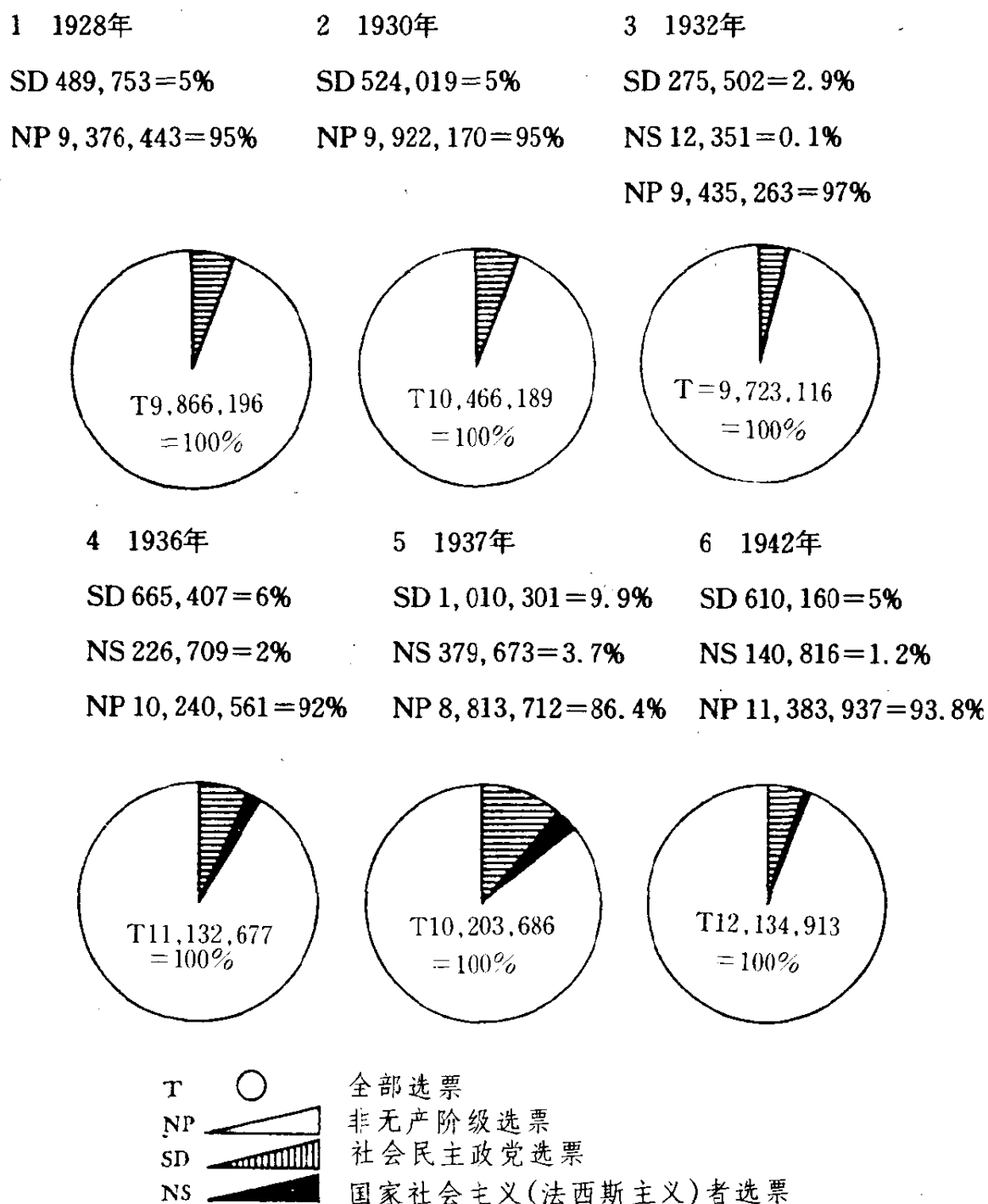
显然，社会民主政党如果要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他们除争取有组织的工人和佃农的支持外，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他们必须促进工农组织有更大的发展，要同当时已开始争取工农选票的大党竞争，还要赢得渔民和诸如知识分子、白领工人甚至小商人等其他阶层的支持。考察选举的结果将能够显示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 11.2 1928~1942年间6次选举的结果

图11.2.1中列出的是对无产政党以有组织工人和佃农的支持为基础取得的实际成绩所作的概略估计。各社会民主政党所得选票的多少以及各工农组织政治上隶属于谁将在后面详细讨

论，但首先是将各无产政党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所得到的选票进行分析。

图11.2.1 无产政党在历次国会议员选举中所得选票\*



\* 图11.2.1的统计数字取自下列资料：无产政党所得选票及其在国会



的席位取自《日本劳动年鉴》有关各卷；所有政党的全部得票取自内閣统计局《日本帝国统计年鉴》(东京)的有关各卷，但1942年的数字除外，该数字取自时事图书社《时事年鉴》(东京，时事图书社出版局，1942年)，第95页。代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黑色区域，在正式的数字中，是同无产政党所得选票列在一起。百分比是笔者计算的。1942年选举中，所有无产政党都已不存在，该年的数字代表的是，前社会民主分子和前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所得到的选票。这些数字是以东京《朝日新闻》(1942年5月3日)上登载的得到承认的名单和使用的数字为基础计算出来的。

1928年选举的结果表明，无产政党在东京、大阪、京都这些大城市及其近郊得到的选票最多。他们所得选票的一半以上，即51%是来自工业和文化发达地区。其次，12%的选票是来自建有煤矿和钢铁厂的福冈县。在农村地区，社会民主政党只在新潟和贺川两个县赢得较大规模的支持，他们所得选票的90%是来自这两个县。在北海道这个建有煤矿的农业地区，大约11,000张选票分别支持4个候选人，结果没有人当选。在所得全部489,753张选票中，超过30万的选票是在47个县中的9个县中得到的：即东京、大阪、京都、神奈川、兵库、新潟、香川、福冈和北海道。总的说来，得到的支持来自大城市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农村地区，除上面提到的两个县外，所得到的支持较小。

1930年，社会民主政党所得全部选票略有增加，但是从各地区所得选票的百分比仍和1928年相同。然而，1932年无产政党所得选票空前减少。初看起来，影响日本工农业发展的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似乎应该大规模增加无产政党的力量。

但是，实际上，广泛蔓延的贫困使无产政党得到的捐款减少，因而他们不能够提出许多候选人进行竞选，也不能够象以

前那样开展有效的竞选活动。经济危机确实使人民产生很多不满，但是，“满洲事变”很快就在两个方面改变了形势。首先，它使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舞台转向对外事务，其次，由于军方订货的迅速增加降低了失业和略微提高了工资，引起了通货膨胀。尽管生活费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工资的增加，但显然有一种繁荣的趋势。由于希望军事消费能够促进该趋势，许多以前的支持者抛开了其领袖在支持还是谴责日本侵略“满洲”问题上含糊其词的无产政党。民族主义者非难社会民主分子没有清楚地表示支持战争，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派则批判社会民主分子没有抵制战争，社会民主分子当时失去了支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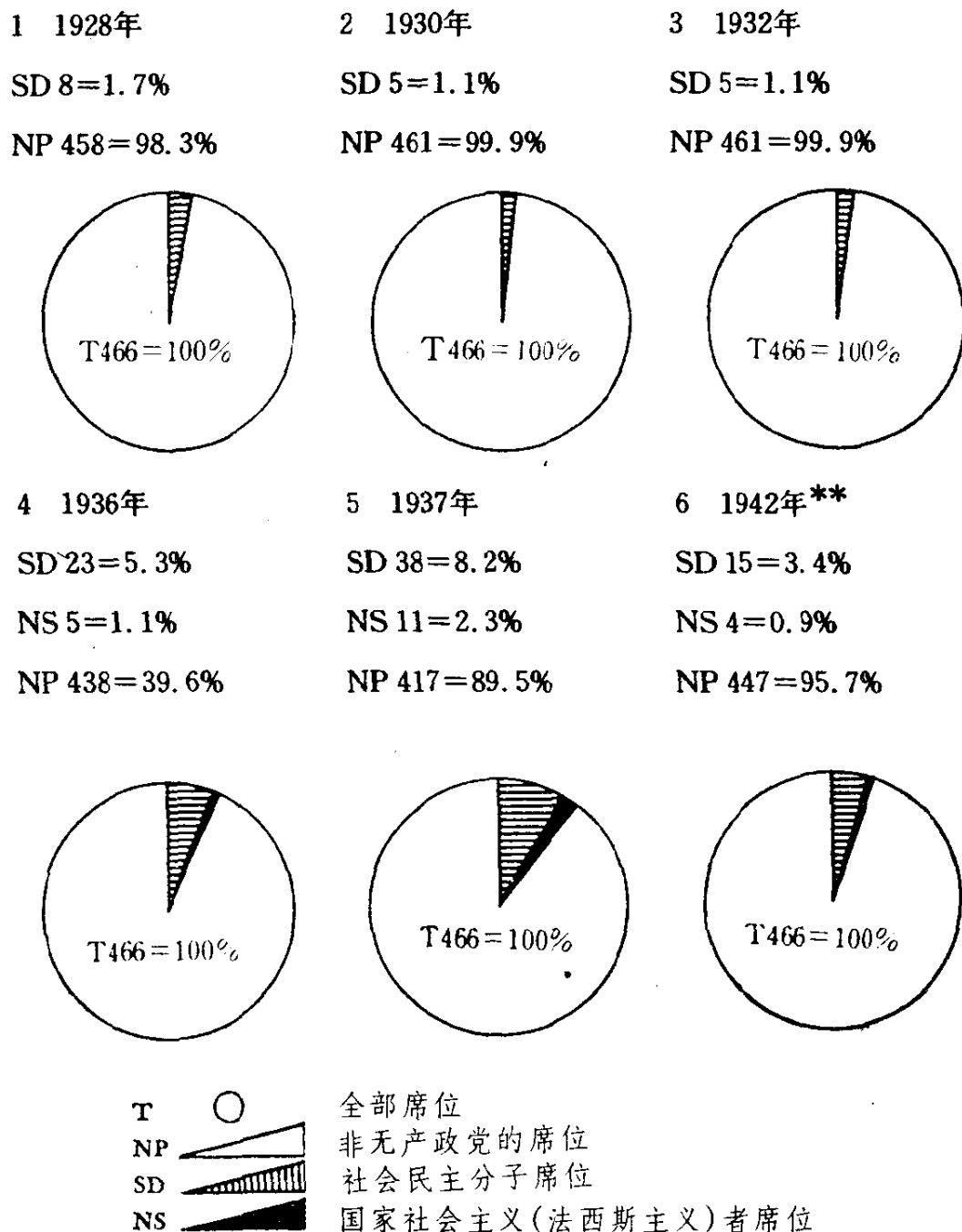
然而，1936年无产政党重新获得了1932年失去的支持，而1937年他们得到了超过100万张的选票。战争刺激起来的繁荣并没有能够长期维持就业和增加工资。许多人因不断揭露出来的丑闻而对各大政党丧失信心。实现公民自由仍旧十分遥远，而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却在增长。社会民主政党所得选票的增加似乎代表对这些倾向的一种反抗。

图11.2.2显示出当时实行的选举制度不利于无产政党的程度，他们在帝国议会中所占的议席的数目并未完全反映他们所得选票的比例。图11.2.1和图11.2.2的数字也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在日本的统计中，国家社会主义者被包括在无产政党中，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中大多数人最初都出自各社会民主团体。

在1937年和1942年选举中，尽管当时由于社会民主分子的纲领不断右倾，其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纲领已没有重大区别，但当选为议员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分子相比，却相对较少。社会民主分子已开始“会见选民”——使选民熟悉候选人而不是竞选纲领——的基础上当选。1942年选举中社会民

主分子和国家社会主义分子都失去了大批支持者。但是，前社会民主分子的当选人数仍不低于他们1928年首次参加竞选时的当选人数。

图11.2.2 无产政党在国会中的席位\*



\* 资料来源和图11.2.1相同。

\*\* 1942年选举时所有政党都已不存在，这里所表示的无产政党的席位

实际是前社会民主分子和前国家社会主义者赢得的席位。

比较县级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同全国选举相比，社会民主政党在县级选举中所得选票的百分比更稳定，也更低。<sup>[5]</sup>他们在县级选举中所得选票从1927年占全部选票的3.9%开始，以1939年战前最后一次正式县级选举中得票3.2%结束，两者之间没有很大变化。相反，读者从图11.2.1中可以看到，在全国议员选举中，社会民主政党所得选票在最初的1928年是5%，其后降低到1932年的近乎2.9%，以后又上升到1937年的将近10%。如果把因1923年大地震而没有按期举行的8个县的选举结果也包括在全部县级选举数字中，县级选举中所得选票的百分比会有所提高，因为这8个县中有4个县，即东京以及同其邻近的神奈川、千叶和埼玉，是无产政党获得选票的据点。尽管如此，地方选举中所得选票的百分比比较低，部分是由于社会民主分子对全国性问题的地方性问题更有兴趣所导致。至于为什么全国选举比地方选举得票的百分比的波动要大得多，这似乎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找到答案，即国会选举要求远为更多的经费和更有组织的竞选活动以及大选是发生在解散国会后因而更突然也更频繁。

对地方和全国选举中所得选票类型的分析显示出，无产政党的选票有从乡村转向城市地区的趋势。由于这一点后面将会更详细地谈到，因而这里仅指出以下事实就足够了，该趋势在1927年和1931年的两次县级选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根据大原社会研究所的统计，1931年无产政党从城市地区得到的选票是39,046张，多于1927年，而从重要农村地区所得的选票是34,834张，少于1927年，增加的票数和减少的票数几乎相互抵消。<sup>[6]</sup>尽管无产政党所得选票的总数增加20,072张，但是全国所有政党所得选票的总数却增加706,040张。事实上，无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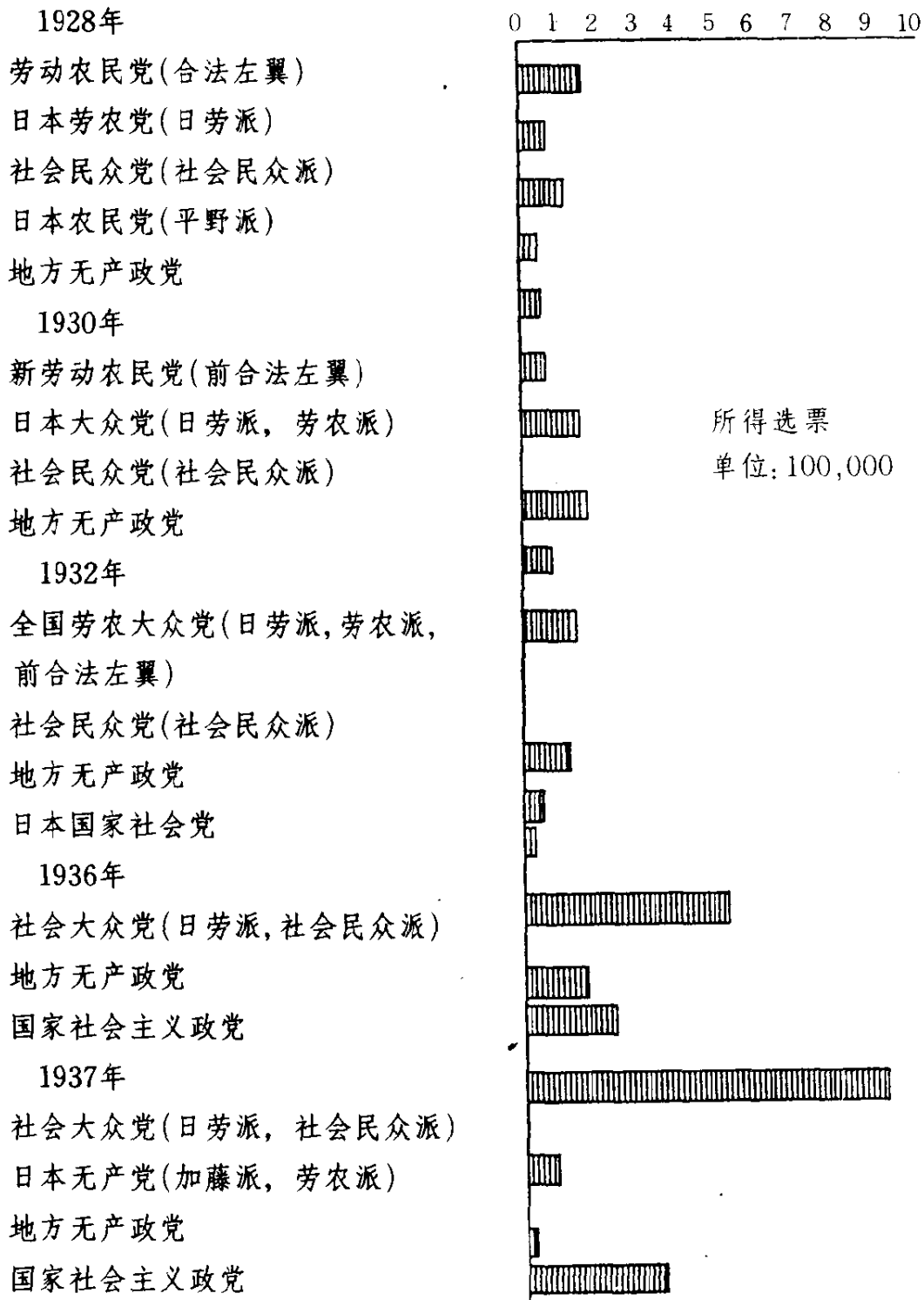
政党所得选票的百分比几乎仍旧没变。在这两次选举中，值得注意的是，当无产政党在农村中所得选票急速减少时，它在城市中所得的选票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上升。其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农村地区有最大量支持者的劳动农民党1928年被强迫解散。尽管速度较慢，但在全国议员选举中这种倾向继续在发展——1937年大选除外，当时从非城市地区所得选票的比例重又上升了大约40%。但即使那时，无产政党在1928年劳动农民党曾得到大量选票的6个主要农业县也没有得到选票。在1937年选举中——当时农民协会作出特殊努力为社会大众党争取选票——整个社会民主运动尽管从工人、知识界和其他城市中产阶级中得到的选票增加了，但从佃农中得到的选票仍然落在后面。

### 11.3 各无产政党力量的分配

为了展示社会民主运动内部的各种倾向，还必须考察每个社会民主政党各得多少选票和有多少支持者。各党在选举中分别得到的选票以图解的方式表现在图11.3.1中。其后那些关于每次国会议员选举的表格，在得票数及其所占的百分比方面作了更详细的类别划分。图中标明了领导每个党的派系集团及其以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数目为代表的实力。图中还说明了按当选人数和支持者以及按得票百分比所显示的相对力量来衡量的选举成果。为了进行比较，图中也列出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情况。

笔者还试图估计社会民主政党在选举中得到哪些人的支持以及它们在全国哪些地区的力量最大。不幸的是，这方面没有人们所希望的那种完整的十分可靠的统计材料。例如，各党宣布的1928年在各县拥有的党员人数只能有保留地接受。各党在6次国会议员选举中所得选票的数目则远为更精确。然而，这

图11.3.1 各无产政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所得选票情况比较(括号中指出了领导各党的派系集团)



些统计材料若同所得选票来自什么地区的材料相结合, 就能够

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社会民主政党所得到的选票的种类。

1928年国会议员选举中劳动农民党所得选票占无产政党所得选票的39.4%。这几乎相当于它在社会民主运动中的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总和。在上年的县级选举中差距甚至更大，劳动农民党得到的选票占无产政党所得选票的45.6%，赢得13个县议会席位。同其相比，社会民众党和日本劳农党所得选票仅各占无产政党全部选票的15.1%和各赢得3个县议会席位。而日本农民党的选票只占15%，赢得4个县议会席位。<sup>[7]</sup> 从最

表11.3.1 各无产政党在1928年2月国会议员选举中的成果比较\*

党或团体 (派别或集团)	提出的候选人	当选的候选人	得票	所占百分比
社会民众党 (社会民众派)	17	4	120,039	24.5
日本劳农党 (日劳派)	13	1	85,698	17.5
劳动农民党 (合法左翼)	40	2	193,047	39.4
日本农民党 (平野派)	12	0	44,203	9
地方无产政党	6	1	46,766	9.5
合计	88	8	489,753	100

\* 统计资料来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80~281页。一些略有不同的数字——似乎由于选举刚结束很难仔细核查——是来自该书第10卷(1929年)第320页。其他一些数字来自该书(1928年3月)第4~5页。

初两次选举看，如果没有日本政府1928年3月15日的大规模逮捕和宣布劳动农民党为非法，劳动农民党似乎比同它竞争的对手更有希望在未来取得成功。

考虑到甚至1927年和1928年的两次竞选运动也因警方横加干涉而受到阻碍，劳动农民党得到的选票就更加引人注目。在竞选演说中总是到场的警官，打断其认为是太激进的演讲，向演讲人提出警告，逮捕那些不顾警告继续以同样调子演讲的发言人。竞选运动的工作人员常常被警方以诸如在选举中挨户游说“宣传暴力”的嫌疑罪名拘押，还常常发生候选人到地方竞选总部去只见空无一人，因为所有那里的人都被警察赶开了。<sup>[8]</sup> 当另一个县的演说者来本县支持某候选人时，警察便将他们逐出，似乎本县仍是一块封建领地。著名新闻记者长谷川如是闲描述了发生在1928年大选前夕的一件事，当时他正在为社会民众党竞选。他对在所到之处发表演讲每次都中途被要求停止感到厌倦，因而他在演讲一开始就说，这次演讲和大学中的演讲没有不同，但警察立即命令他停止演讲。长谷川的结论是，擂鼓比试图发表竞选演说更好。<sup>[9]</sup> 显然，这种镇压更多是针对劳动农民党，而不是它的竞争者。

劳动农民党不只是所得选票几乎相当于其最接近的两个竞争对手的总和，而且在所有无产政党中，它的选票来自的地区也最广泛最均衡。它全部选票的30%来自大都市区：东京—神奈川、大阪—兵庫、京都。在农村地区，它仅在香川和新潟两县就得到28,466张选票，占它全部选票的14.7%。它得票超过10,000张的其他地区是北海道和福冈，这两个县都是煤矿中心。

1928年的选举结果显示，社会民众党的力量有大约75%是集中在两个大工商业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东京及其附近的神奈川县；大阪及兵庫县的神户。<sup>[10]</sup> 居第二位的大量选票来自建有煤矿和钢铁工业中心的福冈县。社会民众党所得选票的90%是来自上述3个地区。党在这3个地区之外的力量微不足道，



这可能是由于支持党的农民组织十分软弱。有迹象表明，党的大量积极支持者是来自城市和产业工人，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政治冷淡，并不参加投票。因此，党自然把希望寄托在知识界、白领工人、小商人和其他中产阶级身上，依靠他们的支持来增加选票。

相比之下，日本劳农党所得选票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更为广泛的地区。事实上，它所得选票的大约62%也是集中在东京和大阪—兵库地区，但其所得选票有16%是来自山形和栃木两县，19%来自农村地区的群马、新潟、岛根和香川县。日本劳农党得到相当数量的农民选票，但是绝大多数选票仍是来自工业地区。此外，党所得选票中也有一些是来自于中产阶级——党对中产阶级的宣传鼓动的内容比社会民众党更为激进——但是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统计，对这类选票数量的任何估计都是非常不可靠的。

1928年全国性无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政党，即日本农民党，所得选票还不到劳动农民党所得选票的1/5。尽管它宣称自己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在大多数县中拥有党员，但是选举结果表明，似乎在无产政党中，它虚报的党员人数最多。<sup>〔11〕</sup>然而，尽管它得到的选票很少，但是从它提出的候选人人数及其所得选票来自一些分布很广却又相互独立的地区来看，它确实具备全国性政党的素质。但另一方面，从它在任何县的得票都没有超过10,000张以及它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提出的候选人没有人当选来看，它又具有地方政党的特点。

对1928年国会议员选举中各无产政党选举成果的这种分类，为在以后的几次国会议员选举中，分析这些无产政党或它们的后继组织在得票方面的相应变化奠定了基础。

两年后，无产政党再次得到机会参加国会议员选举，他

们再次号召选民支持自己。他们所得选票的总数几乎没变，只增加34,266票(从1928年的489,753票增加到1930年的524,019票)。显著的不同首先表现在各党所得选票的比例上，其次表现在各党所得选票来自的地区的变化上。<sup>[12]</sup>

劳动农民党在1928年大选后不久就被取缔。劳动农民党的消失引起各无产政党所得选票的比例发生十分显著的变化(表11.3.2)。劳动农民党的后继组织新劳动农民党清除了其大部分共产党员领导人，不只是缺乏战斗力，而且在组织上也很软弱。因而1930年大选中它所得选票还不到劳动农民党1928年得票的一半。把无产政党1930年从各县所得选票同1928年相比较，可以看出，在诸如青森、福井和神奈川等地区，1928年劳动农民党总共得到大约10万票，但1930年这些选票不是由新劳动农民党得到，而是由其他政党得到。例如，日本大众党在秋田得到大约5,000票，而其前驱组织1928年在秋田没得到一张选票，1928年劳动农民党在秋田得到近9,000票。因而，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在秋田，过去劳动农民党的选票是被日本大众党吸走了。尽管如此，但似乎在东京和京都这两个地区，劳动农民党所得到的选票显然由新劳动农民党继续得到。在东京，新劳动农民党得到21,267票，实际上超过劳动农民党所得选票约7,000张，但是在京都，它只得到了17,108票，比劳动农民党大约少6,000票，这主要是由于水谷的背叛和对抗。

选票方面的另一个变化，是因全国民众党的出现而引起的。全国民众党是由从社会民众党分裂出来的大矢省三领导的团体在大选前不久建立的。它尽管有全国性政党的名称和企图，但它只有大阪一个据点，它在大阪获得了明显成功，从追随它的组织中赢得了14,000多票。其结果是使社会民众

表11.3.2 各无产政党在1930年2月国会议员选举中的成果比较\*

党或团体 (派别或集团)	提出的候选人	当选的候选人	得票	所占百分比
社会民众党 (社会民众派)	33	2	176,334	33.6
日本大众党 (日劳派)	23	2	166,147	31.7
新劳动农民党 (前合法左翼)	14	1	82,678	15.8
全国民众党 (前社会民众派)	4	0	19,695	3.8
地方无产政党	24	0	79,165	15.1
总合	98	5	524,019	100

\* 统计资料来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80~281页。根据该书第12卷(1931年),第373~378页所列表格,对候选人的数目加以略微更正。

党在大阪得到的选票还不到1928年的一半。<sup>[13]</sup>

另外,社会民众党在1930年大选中所得选票比1928年增加约50,000票,总数达到176,334票。在增加的选票中,相当可观的8,000票是得自福冈县,社会民众党在福冈县总共得到25,253票。然而,社会民众党由于提出的候选人太多,没有集中力量,因而它的国会议员反而从4人减少为2人。关于选票得自的地区,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得自农村县的选票更多了。

日本大众党(日本劳农党的后继组织,因而也是由日劳派所领导)所得选票几乎比其前身日本劳农党多一倍。日本大众党总共得到166,147票。其选票得自的地区也更广泛,更多是得自农村地区。日本大众党在福冈取得显著成功,即得到其前驱组织从未得到过的18,726票。其结果是,日本大众党的国会议员从1人增加到2人。

1931年9~10月的各县级选举也显示出和1930年国会议员选举同样的明显倾向。在组织方面，不同的是，当时除社会民众党外，所有重要派别都合并组成了全国劳农大众党，他们赢得13个县议会席位，相比之下，社会民众党只赢得3个席位。<sup>[14]</sup>

国家社会主义分子首次露面的1932年国会议员选举是“满洲事变”后的首次大选(见表11.3.3)。参加这次选举的仅有的两个全国性无产政党即全国劳农大众党和社会民众党。这两个党虽然总共赢得5个议席，但是在所得到的选票方面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尽管每个候选人所得的平均票数增加了，候选人当选的百分比也提高了，但是无产政党所得选票的总数比1930年大选减少了将近一半。然而，社会民众党仅失去34,072票，相比之下，全国劳农大众党所得选票比其前驱组织在1930年大选中所得选票却减少134,156票。得票减少反映出内部的宗派主义和因“满洲事变”而造成的政治上的普遍混乱。全国劳农大众党的一些领导人相信，他们反对侵略“满洲”也使他们在争取选票方面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大阪，社会民众党从1930年得到的15,526票减少到6,522票。而全国劳农大众党却得到35,319票，其前驱组织在1930年只得到22,140票。在兵庫，社会民众党没有得到任何选票，但是全国劳农大众党却赢得13,564票，尽管这比其前驱组织在1930年所得选票仍减少近7,000票。城市中选票最多的显然是东京，但全国劳农大众党在那里只得到39,564票，而现在已并入全国劳农大众党的前新劳动农民党和日本大众党1930年在东京却得到71,302票。另一方面，社会民众党在东京得票有少量增加，从38,823票提高到43,655票。

然而，正是在农村地区，无产政党遭受到最大损失。<sup>[15]</sup>

表11.3.3 各无产政党在1932年2月国会议员选举中的成果比较\*

党或团体 (派别或集团)	提出的候选人	当选的候选人	得票	所占百分比
社会民众党 (社会民众派)	15	3	122,262	42.5
全国劳农大众 党(日劳派、劳 农派及其他一 些同类的团体)	13	2	134,364	46.7
国家社会党筹 建委员会(前社 会民众派分子, 前日劳派分子 和其他国家社 会主义分子)	2	0	12,351	4.3
地方无产政党	5	0	18,876	6.5
总合	35	5	287,853	100

\* 统计资料来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80—281页。

例如,社会民众党所得选票的86%,全国劳农大众党所得选票的87%,都是得自非农业地区的福冈、东京和大阪。在京都,这两个党得票都减少了,它们的选票主要得自激进的知识界,而不是农民和工人。选举成绩很不理想,加上各类全国的和地方的领袖及其支持者纷纷转向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事实,使许多社会民主分子确信,需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由于政府镇压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激进左翼,残存的力量软弱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合并建立起一个更温和的党。此外,选举结果还揭示出,对社会民主分子来说,各派所得选票大体相等。这使合并谈判更容易进行。大选后4个月,社会大众党诞生了,它一劳永逸地取代了社会民众党和全国劳农大众党。

1936年2月的大选是以1935年9~10月的县级选举为先导。

由于几乎所有社会民主领袖现在都共同参加了同一个政党，他们之间没有爆发公开的斗争。然而，他们在县级选举中得票却减少54,778票(从以前的270,376票减至215,598票)，这些失去的选票大部分都被新的竞争者——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所得。尽管如此，但由于选举战略运用较好，其结果是，社会大众党有32名候选人当选，如果把6名当选的地方政党和工会候选人也包括在内，社会民主分子在县议会中所占议席则从17席增加至38席。<sup>[16]</sup>

相比之下，1936年全国议员选举显示(表11.3.4)，无产政党所得选票引人注目地大量增加——得389,905票，或者说，几乎超过1932年得票2.5倍——虽然由于全国总票数的增加，无产政党所得选票占全国总票数的百分比只提高2倍，无产政党赢得的议席几乎是以前的5倍。在23个当选的国会议员中，有12人是其选区中的最高得票者。当时，在“满洲”的负担增大，军方的势力增长，人民的实际工资降低，政府进一步地压制公

表11.3.4 各无产政党在1936年2月国会议员选举中的成果比较\*

党或团体 (派别或集团)	提出的候选人	当选的候选人	得票	所占百分比
社会大众党 (社会民众派 和日劳派)	30	18	518,844	58.2
其他一切团体 (包括劳农派 和加藤派)	11	5	146,563	16.4
各国家社会 主义政党	29	5	226,302	25.4
总合	70	28	891,709	100

\* 统计资料来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80~281页。根据《劳动年鉴》(1936年)第82~90页对一些数字加以略微更正。

民自由，以及保守政党腐败无能，所有这些条件可能都促进了无产政党得票的大量增加。

1936年大选结果，在选票得自的地区以及同其相关的所得到的农民支持的程度方面，没有显示出同1932年有任何明显变化。社会民主分子所得全部选票中，67%来自东京和大阪，另外还有12%来自福冈，这意味着只有21%的选票是得自重要农业地区。<sup>[17]</sup>

各社会民主派系的联合注定不能长久。读者必然记得，加藤尽管最初是日劳派，但他在1936年却作为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和社会大众党的候选人麻生久在同一个选区竞选。次年，分裂更加扩大，加藤为推进人民阵线主张，积极领导创建日本无产党。

社会民主力量虽然再次分裂，但他们在1937年4月国会议员选举中仍得到近150万张选票(见表11.3.5)。1936年那种得票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无产政党总共又多得344,894票——增长3倍，占总票数的50%，国会议席从23席增加至38席。在当选的38人中，有19人是他们自己选区中的最高得票者。

除前面提到的那些有助于无产政党在1936年和1937年选举中得到大量选票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内相后藤文夫领导的一个官僚集团内部的“自由派”阶层，被选举中出现的丑闻所震惊，因而发起了一个“纯洁选举运动”。该运动有利于各无产政党，而不利于各大保守政党。冈田首相1936年1月解散国会，考验了这个新的运动。军人首相林銑十郎将军在执政仅一年后为了使各政党尽力竞选而相互分裂，于1937年3月31日解散了国会。但其结果是，否定了首相，加强了各政党。

表11.3.5 各无产政党在1937年4月国会议员选举中的成果比较\*

党或团体 (派别或集团)	提出的候选人	当选的候选人	得票	所占百分比
社会大众党 (社会民众派 和日劳派)	66	37	928,934	66.8
日本无产党 (加藤堪十派 和劳农派)	5	1	75,820	5.5
地方无产政党	1	0	5,547	0.4
国家社会主义者	64	11	379,673	27.3
总合	136	49	1,389,974	100

\* 统计资料来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9卷(1938年),第280~281页。一些略微不同的数字是来自《劳动年鉴》(1938年),第169页。

1937年选举的一个结果是,社会大众党成为国会第三大党。在这次选举中,社会大众党所得选票只有59%是来自东京、大阪和福冈县等城市和工业中心,显示出得自农村的选票增加。<sup>[18]</sup> 过去有时是单独提出候选人进行竞选的全国农民协会,在1937年选举中充分有效地支持了社会大众党。

无产政党运动在1937年4月国会议员选举后不得不随即适应或屈服于7月侵华战争开始后的困境,在12月和次年1月逮捕人民阵线分子,扫除了日本无产党。

1939年的县级选举反映出了上述这些事件。社会大众党所得选票虽然从1935年的173,791张增加到1939年的218,482张,但其所得议席却仍然是32席。独立的无产阶级候选人的得票下降了,他们所得的席位从6席减少为2席。然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议席却从12席一跃而为29席。<sup>[19]</sup>

次年,一切政党都被解散,起而代之的是,近卫政府创



建的大政翼赞会，它公开将全国一切力量集中于一个目标，即向外扩张。

日本战败前仅再举行过一次选举。1942年全国议员选举被东条政府当做一次公民投票，以便肯定它的战争政策。当时，为使人民确信投票支持政府“推荐”的候选人和努力支持战争是每个人的爱国义务，所有极权组织都被动员起来。国会有466个议席，而政府总共推荐了471名候选人，对每人都给予了特殊的财政支持。<sup>[20]</sup>其结果是，政府推荐的候选人中有381人当选，而不是政府推荐的613名候选人中只有85人当选。

在这次选举中，一些前无产政党领导人作为独立的候选人参加了竞选。根据笔者的统计(见表11.4.1)，52名前无产政党成员候选人中，只有10人是被政府推荐的候选人。除这10人外，还有8名不是政府推荐的候选人也当选，总共当选18人，还不到1937年选举中当选总人数的一半。他们所得选票的分类揭示出，他们的总得票数也大规模减少，还不到1937年选举中总得票数的一半。<sup>[21]</sup>这次得票的意义是难于估计的，因为其中只有一半选票可以绝对认为是对东条政府的反抗，甚至非政府推荐的候选人，也公开地全力支持进行战争。

#### 11.4 党组织同其工农支持者的联系

除最后一次选举外，在其他各次选举中，有组织的无产政党是为各候选人争取选票的核心力量。在讨论党的工农后援组织之前，自然应先了解各党是如何为自己一派争取选票的。

假定党员首先应该投票支持他所在的党，那么党员人数应是决定党的力量的重要因素。不幸的是，党所宣称拥有的党员人数经过事实证明几乎是完全不可信的。例如，日本农民党在

表11.4.1 1942年4月国会议员选举中前社会民主分子的成果\*

以前所属各派	提出的候选人	当选的候选人	得票	所占百分比
社会民众派： 被推荐	1	1	26,401	
未被推荐	14	1	134,929	
			<u>161,330</u>	21.5
日劳派： 被推荐	3	3	84,410	
未被推荐	10	3	107,818	
			<u>192,228</u>	26.5
其他前社会民 主分子 被推荐	4	4	79,257	
未被推荐	28	3	177,345	
			<u>256,602</u>	34.2
国家社会主义 分子 被推荐	0	0		
未被推荐	15	4	140,816	
				18.8
总合	75	19	750,976	100

\* 统计数字是作者根据东京《朝日新闻》(1942年5月3日)上的表格和数字所计算。

1928年宣称拥有党员70,138人,但它在那年的大选中总共只得到37,897票。<sup>[22]</sup>与此相比较,宣称只有党员15,374人的劳动农民党却得到193,027票。在整个30年代,社会大众党宣称拥有的党员人数有时竟然是其实际党员人数的将近10倍。<sup>[23]</sup>各党本身对其党员人数也常常没有准确的统计,因为地方党负责人为确保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更多的席位,常常按虚报的党员人数缴纳党费。党由于金库中钱总不多,因而对这种做法常常有意视而不见。况且对地方党的弄虚作假也是很难发现的。

从理论上说，几乎所有政党的最高机构都是通常一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一般认为，中央委员会大约每月开一次会，但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开会次数更多一些，而在一般情况下开会次数则要少一些。代表大会还选举人数更少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央执委会每周开会一次或一次以上。代表大会通常在党的总部召开，党总部有一个永久性的办公机关和可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会议厅。办事员帮助管理党的文件和宣传品。代表大会选举的最重要的干部是，党的正式首脑即中央执委会主席和常常是“幕后操纵者”的总书记以及司库。

所有无产政党都是这种结构。各党的不同之处更多表现在其各自的实际活动中，而不是表现在其结构上。令人惊奇的是，社会民众党和劳动农民党沿袭共产党人所采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为了加强纪律，又都定有关于开除党员的规定。

在党的结构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似乎是社会大众党，因为它是总结了无产政党活动的8年经验。社会大众党同它的许多前驱组织一样，是几派合并而成的，标志党的成立的各派联合声明概括了各派一致同意的党的结构和特点。<sup>[24]</sup>

从理论上说，社会大众党的基本职责是代表工人、农民和一般无财产大众。党在组织上的特点是实行动员主义。“动员主义”是一个军事术语，意思是号召战士从和平时期的散漫状态进入战时状态。这个词应用于政党，意思是团结人民进行政治斗争。因而，社会大众党并不象诸如非法的共产党那样十分强调持久的组织工作，而只是较简单地以竞选运动为中心。

党的分部的建立是以地理因素为基础，任何有2~40个分部的地方即可以建立一个地区同盟，它一般设于该地区的一

个大城市或首府县中。每个分部下可以设立各种按职业划分的班：(1)工厂班；(2)企业班——这里的“企业”一般是指小商业、百货店或小制造业作坊；(3)村社班——指小村庄，特别是农业、半农业或渔业村庄；(4)市民班。只有工厂班中设有各小组委员会，那些小组委员会是为便于以同类问题把工人团结起来而按工业生产线组织的。

在后援工会和农会方面仍然遇到难题。一般认为会员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党，但实际上，如果一个工会的高级领导人参加了党，也就意味着该工会“集体入党”，工会的钱和组织就可以被用于实现各种政治目标。根据党章(第5条)，如果一个组织支持党的纲领或其执委会中半数以上的成员是党员，那么该组织就可以隶属于党。那些会员超过1,000人的组织将直接归党总部领导，而那些会员少于1,000人的组织则归地区同盟或分部领导。党同其后援组织的关系实际很不正规，很随便。党一直企图使其同各后援组织的关系进一步“合理化”和严密化。但在大选中，个人因素的作用如此强大，以致组织间关系的作用不大。工会领袖利用其工会中的下属为他们跑腿。党似乎更象是把各种要人联结在一起的一张网，而这些要人则通过他们在其所属基层组织——也许是一个工会、一个农会、一个文化组织或一个杂志报纸出版团体——中的地位，运用其权力促进党的利益。

正如能够预料的，在财政方面又遇到问题，尝试描述以收入“自动”节制支出的过程十分困难。党相当大一部分政治活动经费一直对公众保密，甚至对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干部也保密，只有最一般的日常例行收入和支出才履行党内手续。尽管如此，在平时，特别是在选举期间，却是以全党的名义为寻求捐款而同赞助者打交道。

研究1932~1940年社会大众党公布的财政帐目揭示出，“后援组织的捐助”少得令人惊奇，<sup>〔25〕</sup>从1934年占总收入的2.8%逐步下降至1938年的0.2%。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那些有自己财源的党的干部的交纳。1933~1934年向党的干部征收的款额约占全部收入的24%，1939年占6.3%。减少的那部分由向党的日益增多的国会议员征收的款额所弥补，党期望国会议员能够将其作为议员所得的部分薪金和活动经费交纳给党。1933年党从这个来源得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0.9%，1937年提高到占44.9%，这意味着日本政府间接地负担了处于反对党地位的主要无产政党活动经费的将近一半！此外，党总部的权益收入每年平均约占总收入的15%左右。整个这一时期在标以“贷款”的条目下提供的款额约占总收入的30%，而1936年那一年则上升至50%。这些贷款可能是个人和组织的捐款，虽然在有些年捐款是列在综合项目下。到1938年党拥有了自己的房屋才开始惯常地以出租党总部设施来赚取收入。党公开发表的总预算，从1933年（公布预算的第一年）的大约6,500日元稳步上升至1939年（最后一年）的25,000多日元。

从公布的党的支出帐目中能够得到的东西更少，因为竞选经费并没有包括在内。最大的单项支出项目总是工作人员的薪金，这些工作人员主要是在党总部工作的年轻男秘书。他们的薪金占每年总支出的30~42%。

党的官方政策总是鼓励提名那些“新鲜血液”作为党的干部，但这同那些正在掌权的人想继续掌权的愿望相冲突（一方面由于战前政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由于领导层中存在派系集团，选拔适宜的领导人成为社会民主分子在战后日本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党的制度规定，干部要有绝对多数票才能当选。在代表大

会上，选票是以每个地区分部缴纳党费的党员人数为基础，按比例分配给各分部。党的固定编制人员得到的薪金不仅很少，而且常常延期支付，甚至完全不支付。

党的结构通常因合并而出现一些异常现象。一次合并后，部分的巩固常常需要半年或更长的时间，即使在那时，特别是较低级的组织，也不是被各级党领导人所控制，而是当地各派为形成均势而达成妥协。同整个日本社会中的其他组织一样，党的立场常常并不反映其实际领导人的立场。

事实上，权力常常是根源于党外那些党的工农后援组织。不考察那些成为党力量源泉的后援组织，就不能充分理解各无产政党及其内部各派的相对的力量。此外，党还建立或接纳青年团体、妇女同盟、少数民组织、职员团体、<sup>[26]</sup> 城市承租人团体、社会主义者律师协会以及任何同情党或有潜在活动能力的团体。然而，在其中，遥居第一重要地位的是工会。

## 注 释

[1] 加藤内阁估计，贵族院所坚持的要求居住一年的这一项限制，就将使其他方面都符合条件的选民的人数减少大约20万人。见约翰·江逊·林《大正时期日本的人民运动》(博士论文，宾夕法尼亚大学，1960年)，第234页；关于导致那些限制的妥协的细节，见第218~235页。

[2] 关口泰：《工人问题探讨》，《朝日专题论文集》第5卷(东京，朝日出版社，1929年)，第296页。

[3] 这些是笔者的估计，可以在笔者写的《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分析战前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背景、领袖和后援组织》(博士论文，耶鲁大学，1954年，公布号码第11212号，大学微缩胶卷，安·阿伯，密执安)第6章

表1中找到，第173页。下面将该文简称为《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

[4]同上书，表2，第174页。

[5]关于无产政党在县级选举中成绩的表格，见作者的《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181~188页。

[6]《日本劳动年鉴》第13卷(1932年)，第465页。

[7]关于1928年县级选举中的那些数字，见作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189页。

[8]见白扬社编《日本无产政党史》，第552~553页。

[9]白扬社的书，第550~551页。

[10]关于1928年国会议员选举中无产政党在各县得票的详细情况，见作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192~193页。

[11]它宣称拥有党员超过70,000人，与其相比，劳动农民党宣称有党员约15,000人，日本劳农党宣称有党员17,000人，而社会民众党宣称有党员27,000人。关于各党宣称其1928年在各县拥有的党员人数，见作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186~188页。

[12]关于1930年国会议员选举中无产政党在各县得票的详细情况，见作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196~198页。

[13]根据《日本劳动年鉴》第12卷(1931年)第367页的材料，除了恰在选举前发生分裂外，社会民众党的“极端保守主义”是它在选举中未能获得更好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14]关于1931年县级选举的那些数字，见作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199页。

[15]关于1932年国会议员选举中无产政党在各县得票的详细情况，见上书，第202~203页。

[16]关于1935年县级选举的那些数字，见上书，第205页。

[17]关于1936年国会议员选举中无产政党在各县得票的详细情况，见上书，第206~207页。在国会议员选举后不久举行的东京府议会选举中，

社会大众党的23个候选人中有18人当选，而加藤的劳农无产协议会提出了6名候选人，其中4人竞选成功。同时，在神奈川县议会选举中，社会大众党的7名候选人中有6名当选。

[18]关于1937年国会议员选举中无产政党在各县得票的详细情况，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09~210页。

[19]关于1939年县级选举的那些数字，见上书，第210页。

[20]财政援助从2,000日元至10,000日元不等，它是由紧急军事基金提供的。见白木正之：《日本政党史：昭和年代》（东京，中央公论社，1949年），第317~319页。

[21]关于1942年国会议员选举中前社会民主分子在各县得票的详细情况，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13~214页。然而，必须指出，所选用的那些统计材料是笔者重新估价和修订的。关于候选人和集团的名称，见后面附录。

[22]关于党宣称其在1928年拥有的党员人数，见上书，第186~187页。

[23]材料来自1953年6月2日采访河野密。

[24]见评议会关于无产政党——社会民众党和全国劳农大众党——合并的《声明》，发表于《日本民主新闻》（1932年6月15日）。由于该声明除其他事情外还勾画出党组织所期望实现的目标，因而以它作为随后讨论的基础。

[25]下面关于社会大众党（1932~1939年）年收入和支出的两个表是以《日本劳动年鉴》（1933~1940年）刊载的数字为基础；百分比是笔者计算的。没有报道1935年或1940年的任何数字；而1932年没有支出的数字，只有1988.95日元（其中68%来自捐赠，而32%来自贷款）的收入数字。



表11. [25].1 社会大众党年预算收入(%)

	1933年	1934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上年结余	—	0.7	0.6	—	0.3	0.4
总部缴款	14.2★	18.9★	9.8	12.8	15.4	18
从后援组织所得	2.1	2.8	1.3	0.6	0.2	0.5
每年的国会议员交款	10.9	11.8	19.8	44.9	34.1	38.7
干部交款	23.8	32.1‡	11.3	6.9	6.4	6.3▲
各项活动所得	1.1‡	—	3	—	—	—
代表大会的代表费	—	2.2	2.1	—	—	—
捐赠	—	❖	—	❖	❖	❖
每年从各种职业赚得的款额	—	—	—	—	3	1.4
从总部大楼得到的利润	—	—	—	—	2	1.1
贷款	41.7	28.8❖	50.1	30.6	30.7	24.7
杂项	6.2	2.7	2	4.2❖●	7.9❖	8.9❖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总数(日元)	6,525.44	5,919.39	11,164.40	20,206.51	22,037.57	25,224.10

❖：各类综合 ★：党费 ❖：包括特殊收入(预算的8.1%) ▲：个人交款 ‡：出售党的机关报 ●：包括特殊的年收入(预算的0.8%)

表11. [25]. 2 社会大众党年预算支出(%)

	1933年	1934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筹集资金的费用	2	4.9	0.3	—	❖	—
党报费用	13.1	11.7	7.1	9.7	17.6	17.1
特殊活动费用	4.8	6.6	5.6	—	—	—
办公室的租金和使用费	5.4	5.4 <sup>■</sup>	7.6	—	9.9 <sup>■□</sup>	6.6 <sup>■</sup>
交通费	14.8 <sup>◇</sup>	13.1 <sup>□</sup>	3.4 <sup>■</sup>	3.1	4.9	—
雇员薪金	38.4	31.4	41.9	30.5	32.8	41.4
偿付的款项和利息	2.8	5.4	12	35.5 <sup>⊕</sup>	21.3	—
紧急事件费用	—	—	—	8.8	❖❖	32.2
代表大会费用	0.7 <sup>△</sup>	10.1 <sup>△</sup>	—	—	4.2 <sup>△</sup>	2.7
印刷	2.5	2	—	—	❖	—
旅行	5.3	2.8	—	—	❖	—
杂项	5.8	2.8	2.3	—	4.8 <sup>❖❖</sup>	—
其他支出	4.4 <sup>◎</sup>	3.8 <sup>◎</sup>	19.8	12.4	4.5 <sup>◎❖</sup>	—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总数(日元)	6,525.44	5,919.39	11,164.40	20,206.51	22,037.57	25,224.10

❖和❖❖: 各类综合    ■: 包括固定装置    ■□: 包括总部大楼的维修    ◇:

包括5.7%的电话费 回：包括5.2%的电话费 ☎：只是电话费 中：偿付前一年的贷款占13.7%，偿付本年的贷款占21.8%。 △：包括会议厅租金 ◎：包括办公室的供应

[26]“职员”是指大都市的官僚机构中那些拿固定薪金的白领工人。见埃兹拉·F·沃格尔：《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职员及其家庭》（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4~5页以及其他各处。

## 第12章 工人组织

### 1928年大选中各工会同无产政党的结盟 其后各工会同无产政党的结盟

有组织的工人团体间的斗争、竞争与合作，对无产政党有重大影响。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共产党阵营和社会民主阵营不正是首先具体表现在总同盟的内部斗争中吗？总同盟内部的分裂导致1925年5月成立了与总同盟竞争的日本工会评议会。这次分裂毁灭了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团结，其直接影响是，促使政府于1925年12月1日第一个无产政党成立的当天，就很快决定命令该党解散。其后，工人运动内部一切的权力斗争和相互敌视，都在无产政党中体现出来，而当各无产政党凭自己的地位指导工会的活动时，各党之间的竞争又反过来影响着工人组织。

我们所说的工人组织对一个无产政党的支持是指，从工会金库中拿出钱来捐献给党，动员工会会员以一切日本的传统手段和从外国学来的手段去完成各种任务。例如，举着标语牌参加示威游行，分发党的出版物，劝说有资格投票的人投票支持党等。此外，所谓工人组织的支持也是指，党及其工人后援组织间存在的仅在这里才能够触及的一种复杂的关系结构。例如，党的口号受到工会主张的影响，而工会的主张也受党口号的影

响。党帮助隶属于它的工会，把其一般要求带给群众。当爆发大规模工人罢工时，那些也是党的干部的工会干部要求党把有关工人罢工的问题提到县议会或全国议会，以便争取舆论和促使警方或更高政府机关不得不加以考虑。无产政党都尽力按工会的要求去做。事实上，在一次大规模罢工中，如果发生暴力并引起报界注意，甚至那些因一些政治理由——如共产党人问题——而反对该工会领导人的无产政党也会以公开声明的方式主动支持罢工。他们有时甚至还为工会罢工基金会捐款，希望以此引起对党的注意和赢得其全体工人在将来同情该党及党所属的工会。尽管法律上工会并不是政党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党与工会紧密合作以及双方领导人相互交错，因而实际上党同隶属于它的工会已经形成一个整体，党与农民及其他后援团体也保持着类似关系。

根据对这种相互影响的认识，在前面对无产政党所得全部选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本章试图更详细地探讨总票数中工人后援组织提供的这一部分选票。在考察1928年大选中各工人组织如何同各社会民主政党结盟后，接着论述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的各工会和各无产政党重新结合所导致的一系列变化。附录中的图2《日本工会的变化》，可以作为本章的参考，它阐明了日本工会的各种变化及其派系关系。

## 12.1 1928年大选中各工会同无产政党的结盟

1928年大选中，各无产政党反映出有组织工人的各种分裂及其相对力量。日本劳动总同盟是社会民众党的主要支持者，和总同盟对立的日本工会同盟支持日本劳农党，因总同盟首次

大分裂而形成的日本工会评议会为促进劳动农民党而全力工作。党不只是在竞选中依靠工人组织提供大量人力和资金，而且实际上党的大多数领袖也就是工会的干部。附录中工人组织和党的关系的比较图显示出任何特定时间内党所属的工会同盟，并标出了哪些工会同盟是同党领导集团中的哪一派结盟。这些图表并不是很完善，它只描绘出各工会组织同党的最主要的直接联系。例如，在1928年国会议员选举中，一些小工会组织在政治上也标榜隶属于社会民众党。但是它们的组织太小以致毫无重要意义。然而，有4个独立的工会组织在政治上同总同盟保持一致并且联系十分紧密。它们将被认为是隶属于社会民众派的工会。

从组织上说，总同盟是由两个地区性同盟，即关东劳动同盟会和关西劳动同盟会组成，而这两个劳动同盟会又分别由按地区划分的各个联合会组成。这些联合会领导下的工会是按产业、行业或企业单位组织的。在东京工会联合会中，最大的单个工会由以妇女为多数的大约6,000名纺织工人组成。镀锌和其他电镀公司的3,000电镀工人组成了第二个最大的集团，再其次是拥有1,000多成员的邮电工人工会。此外，还有马车夫、皮革工人、清洁工人和印刷工人工会。神奈川工会联合会比较小，它属下最大的1,000人以上的工会是各种产业中的机器制造工人工会，其次是水泥、电力和煤油工人工会。酱油厂工人，丝绸纺织工人和钢铁厂工人也分别有自己的工会。关西劳动同盟会下属的大量工会联合会也是由类似的工会组成，只是总人数少。1928年总同盟自称总共拥有会员39,315人，这可能有很大夸张。<sup>[1]</sup>

总同盟的主席是铃木文治，总书记松冈和西尾分别是关东劳动同盟会和关西劳动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这些总同盟领导

人构成了社会民众派的核心。当时大矢省三还是强大的大阪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但是他很快就被总同盟和社会民众党驱逐。由于多次分裂，总同盟失去了它最有战斗性的领导人和最积极的普通会员。

总同盟的保守态度因其队伍中女工占很大比例而更加强烈。1928年有组织的女工总共有11,848人，只占有组织工人的3.9%。其中6,884人，或全部有组织女工的58.1%——她们大多数是在纺织工业中工作——属于总同盟，大约占总同盟成员总数的1/4。<sup>[2]</sup> 女工构成了总同盟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以致总同盟专门出版了一份名为《劳动妇女》的报纸。这些女工仍旧认为自己只是暂时离开家参加工作（即前面第1章注释<sup>[6]</sup>中所描述的那种“出稼”类型的工人），对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和经济斗争无兴趣。她们中间大多数人受雇于纺织工业并受到严格等级控制这个事实，只是促使她们对工会活动更加抱冷淡态度。这类女工为那些常常倾向于只为自己和资方谋利益的工头控制工会创造了有利条件。许多这类的工会实际上得到雇主的鼓励，因为雇主感到，使工人加入保守派领导的工会是控制工人和防止激进主义的有效方式。

有4个大工会和总同盟紧密合作，在政治上同总同盟保持一致，它们是：<sup>[3]</sup>

1. 拥有42,896名会员的海军工人同盟，它由海军直接管理的军工厂中的各类工人组成。尽管它拥有大量成员，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公司联合会”，在4个大工会中最为保守。

2. 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拥有会员14,042人，主要由军工厂、钢厂、烟草垄断公司和其他官营企业中的工会组成。

3. 日本海员联合会，拥有会员81,534人，是由海员组成的工会。它在战前日本各工会中会员最多，其内部控制很严，

但它的福利活动很广泛。它是日本所有工会中最接近西方类型的工会。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它作为国际运输工人工会同盟的成员，也隶属于阿姆斯特丹国际。

4. 日本海洋官员协会，拥有会员11,124人，是由海船官员组成的工会，和日本海员联合会关系紧密。

这些工会是由陆军工厂、海军工厂、海上贸易和官营企业中的工人组成，是象军队那样按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其中大多数工会都是建立在工会会员占全体工人比例比较高的一些工业中，并且推行排外政策。例如，在交通运输部门，1931年29.8%的工人是工会会员，这在当时日本各类工人中，会员比例最高。其中，大约73%是日本海员联合会的会员。<sup>[4]</sup>

排外工会的建立与其说是为了强迫雇主接受工会要求（特别在雇主是政府时），不如说是保证了雇主有稳定的劳动力。这通常是通过劳资协定实现的。雇主在协定中同意企业只雇佣该工会的会员。雇主用这种保证，既可以防止工会的左倾，又可以得到工人不罢工的报偿。<sup>[5]</sup> 尽管如此，在那些工会中的工人的工作条件比那些小民用工厂中工人的工作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好一些。民用工业常常受商业周期上升和下降的影响，但是军工工业通常受这些影响较小。被巨大的三井、三菱和其他几个有关财团垄断的远洋贸易也相对稳定。

这些工业中的工人，在日本劳动队伍中地位较为优越，他们的政治态度也趋向于比较保守和稳定。他们的工会通常和日本劳动总同盟保持着紧密联系。尽管社会民众派的大多数领导人是来自总同盟，但是剩下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来自上述4个工会联合会。例如，米洼——我们曾把他列在社会民众派的“鼓动家”那类人中——和堀内长荣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两人都既是党的领导人，也是海员联合会的领导人。另一位党的活动家



川村保太郎是劳动总同盟在官营企业中的主要负责人，他同堀内和米洼一样，是社会民众党中央执委会委员，他在1936年和1937年作为社会大众党的代表被选入国会。

就在这同一时期，即1927~1928年，主要工会中支持日劳派的力量来自日本工会同盟，他们同时在1926年12月建立日本劳农党。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日本工会同盟是由总同盟内部对总同盟的保守主义不满的那些工会领导人的追随者所组成。

日本工会同盟所属工会，由于一般比总同盟所属工会更激进，他们并不同雇主订立排外协定。这些工会同资方的关系很不稳定。他们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常常失败，这些工会常常被摧毁，或是屈服于强迫其退出该同盟的压力。因此，日本工会同盟对日劳派的支持比总同盟向社会民众派提供的支持要弱，而且也比较不可靠。1928年，日本工会同盟宣称其会员仅有24,420人。<sup>[6]</sup>

日本工会同盟和总同盟相比，其所属工人在职业上的差别更为有限。日本工会同盟所属的工会，大约有一半是建立在东京地区，而在那里，占压倒多数的会员是纺织工人(主要是妇女)，其次是钢铁、机器制造、化肥、制糖、家具和印染工人；在神户，其会员包括造船、造纸和钮扣工人；在九州，会员有钢铁、木材、煤矿和造船工人。除各地的纺织工业和设在东京的制糖、印染、化肥工业中的工会外，每个工会只有200~500名会员。不只是它的单个工会比总同盟所属的单个工会小，而且在地域分布上也比总同盟集中。日本工会同盟与总同盟一样，会员中妇女占很高的比例，这些妇女的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大多数会员的更富于战斗性的态度。

日本工会同盟的主席是棚桥小虎，他作为东京帝大的一个学者，也是新人会的成员。他很早以前就同这时日本工会同盟

的其他领导人麻生久、安艺盛、藤冈文六、细谷松太、今村等、加藤勘十和望月源治有联系，这些人都是日劳派的早期成员。

同总同盟一样，日本工会同盟也和当时支持日本劳农党的其他工会保持着紧密联系。其中重要的工会有3个：<sup>[7]</sup>

1. 日本工会总联盟，拥有会员14,155人，最初信奉无政府工团主义，它在关键的1922年秋季鼓吹建立一个松散的总同盟，反对总同盟的集权主义。甚至在1928年，属于该总联盟的各工会还以诸如《黑色青年》这类无政府主义的名称出版报纸。我们已经指出，总联盟的主要负责人阪本孝三郎是最早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人领袖之一。

2. 日本服务人员同盟，拥有会员5,600人，由船运服务人员组成，比海员联合会更为激进，其主要力量在关西地区，总部设在京都。

3. 日本矿工工会，拥有会员910人，其力量主要集中在九州。在所有产业工人中，矿工似乎受压迫最深，在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也最落后。该工会是由于石本男爵的慈善行为而早在20年代初就已建立起来的。<sup>[8]</sup> 麻生久很快就成为该工会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但是，当该工会在1930年会员增加到1,805人并减少了对日劳派的支持时，加藤在同麻生久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加藤部分地利用了他在日本矿工工会的力量才能够在1937年建立起日本无产党。

日本工会评议会是1928年大选中劳动农民党的主要依靠力量，它当时宣称拥有会员36,000人。<sup>[9]</sup> 评议会是按地区和行业这两个原则组织起来的。它是一个在广泛地区建有地方支部的全国性工会同盟。尽管它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关东和关西地区，但它甚至在其他工会同盟从没有能成功地建立起支部的北海道、西北和东北地区也建有支部。同总同盟相比，它的会员中，

妇女的比例很小。它包括了几个较小的纺织工会，但是其绝大部分会员是集中在更“现代的”机器制造、炼钢、电力、炼铁、造纸、化工和印刷工业中。

评议会的大多数领导人是来自工人阶级。尤其是，他们受过技术训练并有经验。中央委员会主席野田律太和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渡边政之辅、谷口善太郎、国领伍一郎、杉浦启一、中村义明、太田博以及青柿善一郎，都是这样的人。<sup>[10]</sup>在这方面，他们象是社会民主派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是处于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实际是非法的共产党的党员。

1928年5月几乎同时镇压了评议会和劳动农民党，这是对无产政党运动中共产党势力的有力一击。尽管评议会还有一些工会保存下来，但那些工会却分裂为两派，一派转入了地下，另一派使自己符合合法活动的要求。前一派的活动和无产政党运动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后一派却组成了一些我们将在下面叙述的合法工会。

## 12.2 其后各工会同无产政党的结盟

上面简单阐述了1928年国会选举中工会对各无产政党的支持，这为下面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准点，下面将只阐述其后的那些最重要的变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把1928年后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进行阐述：(1)1928~1930年，再到1932年国会选举为第一阶段；(2)1932~1936年和1937年国会选举为第二阶段；(3)从1937年国会选举到有组织工人运动的解体为第三阶段。

从支持无产政党的工会的立场来看，在第一阶段(1930~1932年)中有两个重要的事件：(1)评议会被解散；(2)总同盟因日

本工会同盟的竞争而力量削弱。尽管(或者,也许是由于)评议会在1928年大选中获得成功,它却在1928年4月10日,即其大多数领导人在3月15日对共产党进行的大搜捕中被捕还不到一个月,被命令解散。尽管评议会属下的那些残存的工会最初溃散了,但它们很快又集结成为两个新的组织,即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以及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

全协于1928年12月成立,有5,600名会员,但是它的活动很快就因警察的干涉而受到严重阻碍,在1929年4月16日对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分子的大规模搜捕中,它的很多成员被捕。由于受到这种严格限制,同时也由于事实上它是处于非法的日本共产党的控制下,因而全协试图以转入地下来得到更大的行动自由。全协的地下活动可能一直延续到1937年,但是在1934年,它已经丧失了它的绝大部分影响。由于它已经远离社会民主运动,这里就没有必要进一步阐述它。<sup>[11]</sup>

当新劳动农民党于1929年11月1日——距1930年2月20日国会选举前不到4个月——成立时,那些曾经属于强大的评议会但却没有参加全协的工会,仍旧处于溃散状态。在大选期间,全协和在1928年大选中支持劳动农民党的大多数小工会都拒绝支持新劳动农民党,从而使该党的力量比预计的远为软弱,它所得到的选票还不到劳动农民党所得选票的一半。但是,主要设于东京、京都、大阪及其周围地区的那些以前属于评议会的工会却支持了新劳动农民党。其中最主要的,在东京有东京运输工人工会和东京市政工人工会,在京都有印染者联合会和陶瓷工人联合会,在大阪有大阪钢铁工人工会,全大阪木材厂工会和关西电力工人联合会。

由于1930年2月国会选举中的成绩很不理想,新劳动农民党决定,必须扩大力量,为此要加强其在工人和农民运动中的

基础。因而，第4次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总评的决定。总评于1931年4月18日正式建立。从总评的成立宣言可以看出，它主张发扬以前评议会那种精神，它是合法工会同盟中一个最“左”的工会组织。<sup>[12]</sup>

这样，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即总评和全协的关系如何？总评批评全协那种把当时日本所处环境下的一切合法工会都视为“黄色”工会的主张，总评宣称自己虽然不是“红色”的，但也绝对不是“黄色”的。总评呼吁全协驱逐它的极“左”分子并同总评一起努力建立一个广泛的左翼战线，反对力量日益增长的右翼社会民主工会，但是这些呼吁毫无作用。<sup>[13]</sup>

1932年总评宣称共有会员11,400人，<sup>[14]</sup> 它实际上只是前评议会一个很小的残存部分。总评仅由3个地区协会组成，而原来的评议会却是由11个地区协会组成。钢铁工人工会是总评中最大的单一工会组织，但是，最有趣的是，中部地区的近千名建筑工人也加入总评，因为他们大多数是朝鲜人(关于在日朝鲜人的重要性将在第14章中讨论)。总评的主席木村锭吉和诸如其他重要领袖田部并健次，山崎常吉、山花秀雄——前面把他们列在第4类领导集团中——等重要领导人同时也是新劳动农民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更激进的河上肇和细迫教授离开党后建立了总评。

总评虽然比以前的评议会战斗力弱，但当新劳动农民党同日农派和劳农派的组织合并，于1931年7月5日共同建立全国劳农大众党时，在总评内部，左派的不满日益增强。因此，在1932年2月国会选举中，总评只支持该党那些以前是新劳动农民党党员的候选人。当这个已经臃肿和不纯的党于7月同社会民众派合并时，总评拒绝给予由合并而成立的社会大众党任何支持。<sup>[15]</sup>

在1930年和1932年国会选举期间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从支持社会民众党的总同盟中分裂出日本工会同盟，它支持日劳派领导的各政党。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促使总同盟中的工人组织，特别是在大阪—兵库地区的那些工会，对总同盟的高级干部推行的保守主义路线更加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关西同盟春季代表大会上爆发出来，当时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对抗东京中央领导的意志，使保守派领导人西尾落选，而使大矢当选。东京的中央领导不是以修改保守主义政策来缓和局势，而是采取措施进行镇压，大规模驱逐反叛者。大阪工会联合会中的绝大多数工会及其包括大矢在内的领导人都被驱逐。被驱逐的领导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工会在1929年9月建立工会全国同盟。其后几个月中，在兵库、京都、中国、甚至包括北海道等其他地区的工会中也出现了同类情况，那些新被驱逐的领导人也参加了大矢领导的新的全国同盟。

上述一系列事件，构成了总同盟的第三次大分裂，总同盟因此又失去了一批最富有战斗性的成员。1930年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众派在大阪和兵库县所得选票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次分裂所造成的。1930年总同盟约有会员39,000人。尽管如此，但如果把所有对政治较为冷淡的“右翼”工会和工会同盟与总同盟归在一类，那么他们仍占全国工会的大多数——1932年在全部工会中，右翼工会约占70%左右。

1930年大选后4个月，全国同盟和(日劳派领导的)日本工会同盟在6月1日合并，建立起存在了6年之久的全国劳动组合同盟。它被称为“全劳”，一直活动到1936年1月(见附录图2)。

新建立的全劳宣称有会员约45,000人，它的大多数会员集中于大阪—兵库地区，其余则集中在东京地区，在那里，它大约有一万会员。它属下的较小的工会散布在北海道、栃木、京

都、高知和九州地区。全劳不只在会员人数上，而且在会员的工种上，也显示出其前身自1927年以来在组织工人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全劳在最“现代的”钢铁工人中发展的会员最多。“落后”的女工在全劳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5%，而总同盟分裂前女工却占25%。<sup>[16]</sup> 全劳的主席是大矢，总书记是上条爱一，而藤冈则可能是全劳中第三个最有权力的人。

总同盟的分裂和全劳的成立，削弱了社会民众党在1932年大选中的力量。那次大选社会民主党在兵库没有得到选票，在大阪也只得到6,552张选票。而它的竞争者全国劳农大众党，在全劳的帮助下，在兵库却赢得13,043张选票，在大阪也得到35,319张选票。社会民众派力量的削弱和日劳派在“满州事变”后逐渐右倾，可能是使社会民众派和日劳派在1932年大选后4个月共同建立社会大众党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两派所属的工会同盟却直到4年后才开始联合起来。事实上，两派工人组织联合的最初迹象在1931年6月25日已经显示出来，当时两派工会的领导人在东京建立了包括有9个中间和右翼工会的日本工人俱乐部，两派的领导人企图以此促进双方的合作，寻求适当的时机实现大联合。

在第二阶段中——从1932年大选后至1937年战前最后一次正常选举止——温和派工会和右翼工会在国家社会主义者同社会民主主义者分裂后实现了联合，但它也使加藤的左派工会和要求在更左的基础上实现联合的其他工会加强了团结。

首次表现为创建日本工人俱乐部的那种两派工会联合的趋势在社会大众党建立后进一步发展，并于1932年9月25日建立起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其名称也改为日本工会会议。我们已经指出，日本工会会议的成立声明受社会民众派的影响，它鼓吹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时支持

工联主义。日本工会会议试图成为一个联络机构，协调国会中日劳派和社会民众派议员的行动，在诸如为要求制订工人法律或规章而向政府请愿等政治上与工人有关的事务方面制订共同的方针。日本工会会议初成立时由11个组织组成，当然也包括总同盟和全劳在内，它宣称总共有会员近28万人。<sup>[17]</sup>

但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社会民众党和全国劳农大众党的左翼和右翼中，对日本工会会议的前身日本工人俱乐部的不满进一步发展。右翼认为，该组织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三反”纲领对国家社会主义来说是不够的，他们主张以解散社会民众党和全国劳农大众党，共同建立一个致力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党来代替它。赤松和大矢在他们关于成立新党的建议遭到否决后，两人及其追随者分别退出了各自所在的党，并在1932年5月29日一起建立了日本国家社会党。第二天，他们把支持他们的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了日本国家社会劳动同盟，该组织在11月20日改名为日本劳动同盟。只有大约3,000会员(赤松领导的邮政人员兄弟会和制冰者联合会)离开总同盟参加了该组织，但是却有13,000多名会员(九州工会联合会，关东混合工会的大部分和大阪工会联合会的一部分)离开全劳参加了该组织。这是工人运动中首次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拥护国家社会主义，他们甚至连“社会民主”这块招牌也不要了。

全劳和总同盟的力量都不够强大，这使它们感到实现联合对双方都有利，两派工会在1936年1月终于实现了大联合，当时距离预期将在2月20日举行的国会选举只有一个月。两派联合成立的新组织称为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它在成立时共有会员85,308人——其中16,894人(20%弱)是妇女。<sup>[18]</sup> 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在组织形式上实际完全继承了前总同盟的那一套。<sup>[19]</sup> 它的高级领导分别由社会民众派和日劳派担任。其中，社会民



主派的松冈是主席，西尾是两位副主席之一，原虎一是副书记；而日劳派的河野密是另一位副主席，菊川忠雄是书记。

在社会民众派和日劳派合并建立社会大众党之后四年，支持社会大众党的工会也终于实现了大联合，这显然对社会大众党争取选票有相当大的帮助。但是，支持社会大众党的各工会实现联合不久，其中一些工会就在军方的攻击下崩溃了。9月10日，陆军省宣布一项政策，禁止兵工厂工人参加工会。大阪、名古屋和小仓地区兵工厂的负责人被命令让其工厂中是工会会员的工人签署声明，宣布他们退出工会。这对建立20年之久的官营企业工人总同盟是一个严厉打击。社会大众党声明反对陆军省和内务省的决定，号召举行抗议集会并宣称，如果军工工人——他们是以纳税支持军方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剥夺自主权和以前得到承认的组织结社权，那么所谓实现“全民国防”则将毫无意义。由于社会大众党抗议军方压制工会，因此各工会在1937年大选中各大党空前混乱的情况下，都更加愿意支持无产政党的候选人。

但是，工人运动显然还远没有彻底实现大联合，因为除非法左翼分子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人认为社会大众党没有坚决反对军国主义，他们在1937年大选中投票支持日本无产党。该工人派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1年11月1日，当时属于全劳但是反对全劳在决定加入日本工人俱乐部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法西斯主义”倾向的22个工会，决定成立全劳反对俱乐部斗争同盟，简称“反同”。

尽管全劳在11月27日正式驱逐了反同的4个主要工会，但是反同仍旧认为自己是全劳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同的政策逐渐变得更带有建设性，它在1933年3月决定改名为全劳统一全国会议。同时它寻求和其他左翼工会保持紧密联系。在左翼工会

和右翼工会1933年就分别召开“五一”集会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全劳统一全国会议为实现左翼工会的联合带头采取步骤，建立了一个地区性协商组织，即关东工会会议，它代表下列工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东京运输工人联合会、东京市政工人联合会、全国工会自由联盟以及全劳统一全国会议本身。

通过该地区性协商组织进行一年的合作后，全劳统一全国会议成功地劝说总评和其他12个工会在1934年11月20日同它合并共同组成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简称“全评”。同其前身关东工会会议相比，全评人员更少，立场更左倾。它的主要口号是反对日本工会会议(日本工人俱乐部的后继组织)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加藤，它的总书记是山花。这两人都从那时起明确地同日劳派断绝了关系。全评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1)各类工人及其成员中占很大比例——大约占三分之一；(2)其成员相对较少，它宣称有会员12,053人。<sup>[20]</sup>

尽管全评作出明确努力企图把其所有成员按产业组织成各种工会，但是它的成员中各类小厂工人占很大比例，使它的努力很难成功。它的成员中，有些是那种平均只雇佣5人的小工厂中的工人。他们人数太少，也太分散，很难按行业组织成工会。这些小工厂中的工人通常处在雇主家长式的强有力影响下，一般对工会和政治事务抱冷淡态度。其中一些人受那些富有战斗性的工人——这些工人被大公司解雇并被列入黑名单，因而被迫在更落后的小企业中寻找工作——的影响而组织起来并加入了全评。那些富有战斗性的工人在小工厂中影响着周围工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

全评由于成员较少，在1937年大选中不能够给日本无产阶级以很有效的支持。日本无产阶级提出的5个候选人中，只有全评中央委员会主席加藤当选。最初，当社会大众党拒绝日本无产

党建立人民阵线的提议时，全评和其他工会的关系变得较前紧张了。随后，全评企图通过同其他工会的基层组织进行合作来争取这些工会支持它的目标，但也没有成功。

尽管没有再举行1937年那种有各无产政党参加的大选，但是简单回顾一下那些支持社会民主运动的工会组织后来的发展将是有益的：(1)1937年12月全评和日本无产党一起解散；(2)日劳派领导的工会1937年7月退出全日本劳动总同盟，转而支持产业报国运动；(3)1940年总同盟支持社会民众派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无产政党；(4)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完全消失。

1937年国会选举后仅仅几个月爆发的“芦沟桥事变”——它使日本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长期战争——使仍然独立的工人运动很快被窒息。日本无产党及其支持者全评在1937年12月22日被强令解散前勉强维持活动，他们仅限于帮助那些父亲和儿子被征召服役并派往国外的工人阶级家庭。

尽管政府不断号召各工会停止一切同直接帮助推进战争无关的活动(诸如政治活动)，但是支持社会大众党的大部分工人组织在1939年7月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分裂前，继续隶属于全日本劳动总同盟。1939年全日本劳动总同盟领导集团内部社会民众派和日劳派的紧张关系发展到破裂，从而使该同盟发生分裂。分裂的直接起因是，如何同产业报国运动合作，即作为一个独立工会继续活动，以此为基础同产业报国运动合作，还是解散工会完全合并到产业报国运动中去。在1939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两派分别根据自己的立场发表了相互对立的声明，松冈代表社会民众党，而河野密、菊川和永江一夫共同代表劳日派。<sup>[21]</sup> 这个行动分裂了全日本劳动总同盟。次日，社会民众派声明，该组织恢复以前的名字日本劳动总同盟，它将致力于进行各种真正的爱国活动。但是，该组织虽然恢复了

以前的名字，却没有恢复以前那些活动。而日劳派领导人则在明治天皇诞辰纪念日的11月3日建立起产业报国俱乐部，并面对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发出神圣的宗教般的誓言，决心把天皇的仁慈统治传播到全世界。<sup>[22]</sup>

社会民众派保持着对总同盟所属绝大多数工会的控制，从这方面看，日劳派在后援工会方面力量比社会民众派弱。但是，在社会大众党的党组织中，日劳派却比社会民众派力量强。当两派在党内的摩擦激化时，日劳派成功地在1940年3月驱逐了社会民众派领导人。当社会民众派决定筹建新党并于4月26日成立勤劳国民党筹备会时，总同盟退出了社会大众党，转而全力支持筹建中的新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一个行动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因为筹建中的勤劳国民党在正式成立之前5天，即5月7日被政府禁止。

1940年6月东京县议会选举中，总同盟在没有得到任何政党支持的情况下，提出了自己的15名候选人，但是他们都落选了。这是对社会民众派的最后一击，支持社会民众派的工会丧失了它们的强大影响力。7月8日总同盟自动解散，并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它的前成员将各以自己的名义继续支持新的极权体制。<sup>[23]</sup> 随着总同盟的解散，日本工会会议失去了它成员中的一个最强大的工会组织。因此，日本工会会议也于1940年7月19日解散。这样，战前日本所有重要的独立工会都停止了活动。

回顾1925~1940年这一整个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无产政党的命运和支持它们的工会组织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农民党在1927年和1928年大选中取得的非凡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日本工会评议会卓有成效的组织活动，而日本工会评议会是受那些证明是坚韧能干的处于秘密状态和半秘密状态的

共产党领导人所激励和鼓动的。随着共产党人被逮捕和评议会——共产党势力最大的一个工会——瓦解。劳动农民党的后继组织日益困难，只剩下极少一部分残存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妥协了，或是完全改变了立场，在1932年社会大众党成立时，他们都加入了该党。

相比之下，主要以稳定的总同盟为基础的社会民众派却能够使他们的党经受住政治暴风雨的冲击。他们的党在1927～1932年一直生存着，比当时任何其他无产政党（多次重建的共产党除外）生存的时间都长。他们在同其他各派联合组成社会大众党后的8年中继续维持着本派的团结。事实上，在各派已经联合建立社会大众党而支持它们的工会组织尚未实现联合之前的4年中，社会民众派因其在总同盟中的强大力量而信心十足。1937年7月总同盟分裂，当时日劳派（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力量较弱）退出了总同盟。总同盟的分裂引起社会大众党在1940年3月分裂，这次是社会民众派（他们在党组织中力量较弱）被驱逐。

日劳派尽管在党的政治活动中日益取得成功，但他们既没有赢得激进工会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保守主义工会的拥护。1925年他们没有同评议会站在一起，但他们却利用对总同盟领导人保守主义的不满分裂了总同盟，并建立了一个以他们为基础的（当时的）“中间”政党。但他们又转而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分子分裂的牺牲品。

在20年代的日本，可以说，没有工会的支持，各无产政党就不能够存在，但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有组织工人运动发展的有限规模也就限制了党的成长壮大，使党好象一棵因根基不深而长不高的病树。

## 注 释

[1] 关于总同盟中会员按行业组织成工会的详细情况的表格，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17～218页。

[2] 《日本劳动年鉴》第10卷(1929年)，第285页。

[3] 末弘在其《日本工会运动史》第66～68页指出了那些工会的特点及其名称，但由于末弘没有列出所用数字的可靠来源(没有任何日期)，因而我所用的成员数字是取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0卷(1929年)第285～306页，该年鉴提供的是1928年的数字。

[4] 具体地说，在运输和交通部门全部506,611名工人中，有151,064人参加了工会，而运输部门中有大约110,000工人是海员工会的会员。末弘的书，第81页。

[5] 见笔者的《20年代日本产业关系中的新事物：集体谈判和工人协会》，载于R·P·多尔编《现代日本的社会变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

[6] 关于1927年日本工会同盟中会员按行业组织成工会的详细情况的表格，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24页。

[7] 前面注释 [3] 在这里也适用。

[8] 石本惠吉男爵的妻子静枝在她的自传《面对两种道路：我的生活经历》(伦敦，卡斯尔公司，1935年)中描述了她同石本在九州煤矿的婚后生活及石本的激进活动。战争期间，她在石本不再是煤矿工会的领袖时，同石本离婚，嫁给了加藤勘十。战后，她是日本社会民主党一位活跃的领导者。

[9] 关于1928年日本工会评议会中会员按行业组织成工会的详细情况的表格，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28～230页。

[10] 关于一张表现了评议会领导人学习掌握了什么技巧的表格，见岸本英太郎：《日本工人运动史》，第180～181页。

[11] 关于对该组织的同情态度以及详细历史，见渡部彻：《日本工会运动史：重点在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东京，青木书店，1954年）。

[12] 该声明引自《日本劳动年鉴》第13卷（1932年），第282～283页。

[13] 关于该立场的一个补充说明，见白扬社编：《日本无产政党史》，第701～704页。

[14] 关于1932年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中会员按行业组织成工会的详细情况的表格，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34～235页。

[15] 总评议会是一个左翼工会同盟，因而它抗议构成了向右转的合并。然而，指出一点非常有趣，即总评议会本身并不是没有受到极右翼那种诱惑的影响。当赤松和大矢为促进形成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而分别退出社会民众派和日劳派时，在总评议会内部出现了右翼分子的支持者。这些人大约在同时被驱逐。《日本劳动年鉴》第14卷（1933年），第308页。

[16] 关于1930年全国劳动组合同盟中会员按行业组织成工会的详细情况，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37～239页。

[17] 关于所属工会及其会员的表格，见《日本劳动年鉴》第14卷（1933年），第276页。

[18] 虽然多数材料中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成立日期是1936年1月15日，但另外也有一个很精确的材料提出该组织的成立日期是1935年11月17日：渡部义通和盐田庄兵卫：《日本社会运动史年表》，《国民文库》第434卷（东京，大月书店，1956年），第139页。

[19] 关于该同盟的详细情况，见《日本劳动年鉴》第18卷（1937年），第251～258页。

[20] 关于1934年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中会员按行业组织成工会的详细情况，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46～247页。

[21] 那些声明可以在《劳动年鉴》（1940年）第177页找到。

[22] 该誓言重新刊载于《劳动年鉴》(1940年)第178页。渡边和盐田指出该俱乐部的成立日期是1939年8月19日。渡边和盐田的书,第153页。

[23] 关于该声明,见《劳动年鉴》(1941年),第246~247页。



## 第13章 佃农组织

### 1928年大选中农民对各无产政党的支持 其后各农会同无产政党的结盟

战前日本经济中的非农业经济部门规模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作为一个主要政党运动要取得成功，除了其他事情外，还必须争取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但是，它在这方面的努力未能成功。由于无产政党在其历史中有过两次显示出能得到农民支持的体验，因而它的失败就显得更加突出。首先，无产政党是在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建立的。这表明农民领袖能够和无产政党一起开展政治活动。其次，社会大众党在1937年大选中从农村地区得到了大量选票，这说明农民有可能扩大他们对无产政党的支持。关于这两点，将在后面适当地方进一步说明。但是，我们将首先分析一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农民在支持无产政党方面所起的政治作用。其后，我们将集中分析关键的1928年国会选举。对以后的几次大选，我们将重点指出农民运动在组织和政治倾向方面的变化。

我们已经论证过工业化是农民运动兴起的间接原因。<sup>[1]</sup>事实表明，明治时期强迫进行资本积累在农村造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佃农阶级。最初，佃农同地主的关系仍以日本明治维新

后传统的封建行为模式为基础。它包括在歉收年调整地租额。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农产品市场越来越商业化、复杂化，农产品价格对产地、气候和农业技术的直接依赖越来越小，而受工业生产波动甚至受外国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行为模式逐渐地被证明已不能够适应新形势。

大的城市中心吸收了周围农村的产品，同时也把工业品和新的“现代化”行为模式一起送到农村。佃农向以前参加过工人运动的那些领袖学习到工会的战术。对工人斗争和农民斗争发展状况的考察揭示出，无论是工人斗争还是农民斗争，都是在工业发达地区发展最快，而在边远的农村县则发展缓慢。<sup>[2]</sup>

最初，佃农花费了一些时间向他们的工人兄弟学习。随着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工人罢工次数迅速增加，1919年达到顶峰，工人罢工497次，约为1914年的10倍。而佃农斗争直到1923年才首次出现大发展，当时发生佃农斗争1,917次，约为1917年的23倍。<sup>[3]</sup> 佃农建立自己的组织也是在工人之后。1912年只是作为互助会而建立的友爱会在1919年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会同盟，而佃农只是在1918年的“米骚动”后才试图大规模组织起来，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们最终在1922年4月9日建立了有重要意义的日本农民协会(简称为日农。关于本章所提到的农会名称，笔者建议读者参考附录图3《日本农会的变化》的有关部分)。

大约有66人出席了在神户基督教青年会馆召开的日本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他们主要是来自关西地区的农民代表。诸如总同盟的铃木等一些工人宣读了给大会的贺信。日本农民协会以地方支部为基础，由各支部的联合会组成。它在1926年分裂之前，宣称拥有缴纳会费的会员近68,000人。尽管日本农民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在经济方面要求降低佃农地租，同时还把很多精

力用于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但它也致力于政治斗争，包括为争取更有利的农民法而进行宣传鼓动。

随着普选法的实施，日本农民协会的领袖杉山和行政向拥有会员1,000人以上的28个全国性工会提出共同建立一个联合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正是这一行动导致了1925年12月1日农民劳动党的建立。由于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以及总同盟和日本工会评议会的竞争，因而只有靠农民领袖采取主动行动。尽管那两个相互竞争的工会在最后一分钟退出了农民劳动党，但党仍立即被解散。农民协会再次采取了主动行动，这次得到总同盟单方面的支持，并于1926年3月5日成功地建立起劳动农民党。

最初日本农民协会内的各派都支持劳动农民党。在1928年国会选举中，日本农民协会虽然仍主要是支持该党，但它内部很快出现的政治争吵分散了它的力量，并使它内部的一些派别转而支持其他政党。显然，农民领袖同工人领袖一样，深深卷入到政治活动中。无产阶级各派的力量无不因佃农组织对其拥护的程度而受到影响。

读者一定记得，在总同盟因劳动农民党决定向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一切左翼分子打开大门而退出该党的风浪中，日本农民协会发生了首次分裂。平野借这个机会退出了农民协会。山梨和福冈县农民联合会中有一部分人追随他。平野及其追随者建立了全日本农会同盟，平野把该组织作为他建立日本农民党的基础。

日本农民协会的第二次分裂显然是因成立日本劳农党而引起的。当总同盟的左翼领导人和日本农民协会的右翼领导人共同努力建立日本劳农党时，日本农民协会的中间派领导人认为应采取一种策略，削弱总同盟对新成立的社会民众党的支持，

集中力量支持最终将和劳动农民党合并的日本劳农党。根据这种想法，日本农民协会的领导人正式保证同日本劳农党合作，这特别涉及到驱逐6个反对成立该党的农会领导人。然而，当日本劳农党领导人进一步要求农民协会驱逐另外15人时，农民协会的中间派领袖认定日本劳农党并不打算最终同劳动农民党合并，它事实上是企图确保使农民协会完全支持它。因此，农民协会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1927年2月4日驱逐了那些积极支持成立日本劳农党的领导人，他们是，浅沼、须永好、三宅、川俣、三轮(他们此后都被认为是日劳派成员)和其他7个人。<sup>[4]</sup>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一些追随者后来在3月1日建立了全日本农民协会，该组织立即保证支持日本劳农党。

日本农民协会虽然发生分裂，但其中仍没有任何一派支持社会民众党，社会民众党唯一的选择就是建立它自己的农会组织。社会民众党利用总同盟所属工会中的关东酿造工会实现了这一目的。关东酿造工会由千叶县野田酱油酿造厂的季节工组成，这些人半农半工，在工厂当季节工时加入了工会。由于他们在当工人时已经被组织起来过，当他们回到农村时，把他们再组织起来就不十分困难，因而这些人就成为建立农会同盟的核心。这样，于1927年3月7日正式建立起一个农会同盟，称为日本农会总同盟，这个名称同其实力并不相符。日本农会总同盟由日本劳动总同盟(社会民众派)的领袖担任领导，这些领导只熟悉城市，同农村联系很少。日本农会总同盟只有三四百个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分散在整个关东地区。<sup>[5]</sup>这种可怜的成果充分显示出日本农民协会及其分支在农民运动中所居的统治地位以及它们的支持对无产政党是何等重要。

尽管初看似乎日本农民协会对社会民众党的成立没有起任何作用，但是必须记住，总同盟右翼和日本农民协会领导层之

间在劳动农民党实行开门政策问题上发生的剧烈对抗是导致总同盟退出和建立社会民众党的关键因素。

### 13.1 1928年大选中农民对各无产政党的支持

上述那些争执和分裂决定了各农会在1928年国会选举中对各派无产政党的态度，具体如下：

表13.1.1

政党(领袖)	后援农会
1. 劳动农民党 (大山及合法左翼)	日本农民协会
2. 日本农民党 (平野)	全日本农会同盟
3. 日本劳农党 (日劳派)	全日本农民协会
4. 社会民众党 (社会民众派)	日本农会总同盟

农会对各无产政党的支持，无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都极不平衡，因而对各党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日本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遥居第一，而且其会员活动也最积极，因而在它的帮助下，劳动农民党得到的选票比其他任何无产政党都多。劳动农民党所得的大多数选票是来自农村地区。因此，我们将首先并且最全面地讨论日本农民协会。

日本农民协会驱逐日本劳农党的支持者之后，在第6次代表大会(1927年3月)上明确声明全力支持劳动农民党。日农中央委员会当时决定采取以下一些具体措施：(1)督促日本农民协会会员和尚未参加农会的农民参加劳动农民党；(2)批判“伪无产政党”，但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同其追随者合作；(3)使农民协会成为“村一级的富有战斗力的部队”。尤其是，农民协会

要求其会员购买和阅读劳动农民党的机关刊物《无产者报》，理解并支持党的方针，在财政方面都帮助党，需要时则参加党的活动，日农还决定选派积极分子参加党，帮助党建立支部。<sup>[6]</sup>农民协会对劳动农民党的这种支持在1928年大选中显出了效果，读者一定记得，当时劳动农民党赢得近20万张选票，其中只有30%是得自都市和工业区。

尽管日本农民协会在促成建立无产政党和向无产政党提供农会支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绝不能认为农民本身是无产政党运动发展的动力。日本工会评议会的积极分子，即那些有罢工经验的工人，通常是如俗话所说的那样“手把手”地教导佃农，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正是那些其本身是最激进工会的会员的工人，向佃农提供了前进所需的动力，教会佃农如何沿着一条漫长的道路前进，这个事实说明了为什么日本农民协会是如此激进。促使农民协会趋向激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主要是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大的一些因参加学生运动而成为左翼分子的大学毕业生，抱着无私地献身于佃农“解放”事业的理想，实际毫无报酬地在农民协会的支部中担任秘书工作。<sup>[7]</sup>但是，工人和学生只是佃农从倾向保守转为暂时倾向激进的催化剂。

日本农民的特点包括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即所谓“日本农民的二重性”。<sup>[8]</sup>农民一般被认为是政府当局和特权阶级的封建附属品，他们信仰宗教，十分迷信，一心恪守传统认可的行为。但是农民也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政治表现，他们愤怒，激烈反抗，有时发出刺耳的音调——在德川幕府时期，他们遵奉宗教异端，在古老的自由主义运动中他们要求人的权利，而在20年代，他们争取阶级解放。农民政治态度上的这种二重性，又转而来自他们所处社会地位的二重性，即有资本的农民

(被迫承担企业家那样的风险)和农业无产者(因为地主靠征收很高的地租攫取了他们所得利润的大部分)。日本佃农不改变状况就不能真正保障稳定,这个事实意味着佃农的基本态度是反对整个租佃制。正因为如此,农民中的佃农这一阶层的政治态度或是趋向于消极,或是趋向于“反抗”。这特别有助于说明佃农为什么一方面广泛支持激进的劳动农民党和激进的极右团体,同时在战后占领军倡导进行土地改革之前,一直对温和改良主义政党抱比较冷淡的态度。

但是,由于佃农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很少移动,对较现代的集体行动方式没有经验,因而必须受到外界的推动,它本身的各种激进倾向才能表现出来。日本农民协会需要从评议会学习斗争艺术,使自己充满激情并增强自信。意识到佃农的落后,这推动农民协会的领袖们为给工农合作提供基础而建立了第一个无产政党,主动靠近工人团体。如果说工人能够提供领导,那么佃农能够提供人员。在1928年大选时,日本农民协会拥有会员超过62,000人,而评议会只有会员36,000人。劳动农民党则在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之间起着政治桥梁和联络站的作用,使工人和农民相互协调斗争的策略和战术。

日本农民协会在各农会组织中不只是会员人数最多,而且其会员在日本全国分布也最广泛。日本农民协会在36个县拥有支部,最大的一个支部拥有会员12,263人(在香川)。<sup>[9]</sup>把上述这种情况同前面讲的县级选举结果相比较,可以看出,劳动农民党所得选票和日本农民协会在各县的会员人数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例如,劳动农民党从非都市区得票最多(16,827票)的是香川县,而日本农民协会在全国以香川县的会员人数最多。再如,如果把地处农村的北海道县除外——那里的情况特殊,党从该县的矿工中得到很多选票——劳动农民党在农村所得选

票居下一位(11,629票)的是新潟,而日本农民协会在那里有它的第二大支部(6,891人)。如果福冈由于同样原因而被除外,那么再下一个得票最多的农村县则是冈山(9,616票),而日本农民协会在那里有大约4,500名会员。奈良和其他地区也显示出类似的关系。<sup>[10]</sup>如果农民协会不分裂,劳动农民党所得票数会更多,得票地区也会更广泛。例如,导致建立日本劳农党的第一次分裂,显然使劳动农民党失去了约38,000张选票。

日本农民党是唯一完全依靠农民选票的无产政党。支持日本农民党的农民组织全日本农会同盟宣称有会员25,902人,<sup>[11]</sup>这显然有夸张。读者一定记得,日本农民党的党员人数也有夸张。例如,全日本农会同盟宣称它在较大的农业县新潟有会员多达13,514人,但是日本农民党在新潟只得到9,562张选票;而日本农民协会宣称在该县只有会员6,891人,但它所支持的劳动农民党却在那里得到11,639张选票。由于全日本农会同盟的保守政策及其与政友会的联系,<sup>[12]</sup>因而可以推测,存在着地主为使佃农不追随日本农民协会去进行“阶级斗争”而支持该同盟的有力的因素。

同上述两个党相反,对日本劳农党和社会民众党来说,农民选票在它们所得选票中并不占主要部分。尽管如此,日本劳农党和社会民众党之间仍有所不同。日本劳农党的成员中有一些是农民运动的重要领袖,该党在农民运动中有一批追随者,而社会民众党在农民运动中几乎毫无影响。例如,将两党党员的分布区域及两党在1928年大选中的成绩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日本劳农党在大选中从群馬、新潟、岛根、香川和山形县得到了选票,这主要应归功于全日本农民协会的支持。<sup>[13]</sup>社会民众党在上述各农业县没有得到任何选票。只有在秋田——全日本农民协会宣称在该县拥有大批会员,但是它在该县的会员并



没有建立全县的联合会——全日本农民协会对日本劳农党的竞选没有明显的帮助。由于全日本农民协会的会员主要集中在大阪和兵庫，而这两地是日本劳农党位居第二和第三的两个主要得票地区，其得票额仅次于工业县神奈川，因而可以正确地认为，在工农业混杂的中心地区，全日本农民协会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社会民众党领导建立了日本农会总同盟，但是支持该党的农民力量仍然微不足道。<sup>[14]</sup> 1927年9月全国举行县级选举时，臼井治郎领导的一个约有1,200人的团体确实是退出了山梨县农会联合会(该联合会隶属于平野的全日本农会同盟)并加入了日本农会总同盟。臼井治郎继而在山梨县议会为社会民众党赢得了—一个席位。但社会民众党似乎不打算进一步去碰一碰运气，1928年大选中它没有在山梨县提出自己的议员候选人(臼井是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但是，可能部分归之于臼井的成功，大鷹贵佑及其支持者继续退出平野的全日本农会同盟并加入了日本农会总同盟，使该总同盟的山梨县同盟会又增加大约2,000人，成为该县最大的农会同盟；但即使这样，仍不能认为社会民众党得到了农民的大规模支持。

### 13.2 其后各农会同无产政党的结盟

指出1928年后历次大选中农民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在组织和隶属方面的变化，就能够概括说明那几次大选中农民对各无产政党的支持。显然，1930年国会选举前组织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在1928年国会选举的翌月，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分子，这使日本农民协会失去了它的部分领导人，并且事实上使它的一些支部被摧毁。政府命令劳动农民党及其工人

同盟者日本工会评议会解散，但是却没有命令支持该党的农民组织日本农民协会解散。

分裂的农民协会似乎由于政府进行了逮捕，为保护自己而努力重新联合起来。实际上，早在1928年大选后——那次大选中，农民选票分散在4个无产政党之间——日本农民协会就加倍努力使所有农会重新联合组成一个组织，以使农民的力量能够更集中和更有效。日本农民协会主动靠近平野的同盟、社会民众派领导的日本农会总同盟以及最重要的由日劳派领导的全日本农民协会。最初，那3个农会回答说，只要日本农民协会驱逐某些激进的“福本分子”（即共产党人），就同意实现联合。大逮捕替代了驱逐，去掉了主要的障碍。但是，平野又进一步要求，任何新的组织只能支持纯粹的农民政党，然而除日本农会总同盟外，他没有得到其他组织的支持，于是他退出了谈判。全日本农民协会对警方搬掉了阻碍联合的唯一重要障碍感到满足，因而能够和日本农民协会达成协议。日本农民协会和全日本农民协会在1928年5月27日正式合并，建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一般简称为“全农”（见附录图3）。

尽管组织上实现了联合，但各派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立场。事实上，在支持哪个政党的问题上，全农内部意见分歧，各派领导人以个人或派别的名义继续支持他们以前支持的那些政党。虽然如此，全农的正式立场却是在各党间保持中立。由于一些影响最大的日本农民协会领导人遭逮捕，新组织的领导方针一般由杉山和浅沼这些前全日本农民协会（即日农派）的领袖们所制订。他们奠定了全农的基调，同时使日本农民协会原来高度协调的组织系统变得松散。由于这些前全日本农民协会领袖同时也是日本大众党的领袖，他们自然试图使全农在1930年国会选举中支持日本大众党，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前日本农民协会成员在政治上虽然不愿同日劳派领袖合作，但他们自己内部也还分成几派。一批人开始反抗全农的日益保守或向右倾，他们在全农1929年3月第2届年会后成立了农民斗争社，在全农内部形成一派。尽管它的大约30名领导人在1929年4月16日遭逮捕，同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深化的冲击，但他们还能聚集力量于10月重新组成全农刷新派（全农革新派）。这批人虽然共同反对右倾趋势，其中一些人支持11月1日成立的新劳动农民党，而别的人却谴责成立该党，认为任何合法政党，都不值得支持，即主张只支持非法的共产党。

部分原因是由于前日本农民协会成员在支持哪个政党方面处于分裂，但最主要是由于警方加紧干涉各地农会及其活动，因而1930年国会选举中，新劳动农民党虽然在千叶、神奈川、新潟和福井，象前劳动农民党一样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但其所得选票却少得多；同时，它在北海道、岩手、秋田、山梨、长野、静冈、爱知、三重、奈良、鸟取、冈山、香川、爱媛、福冈、鹿儿岛和冲绳，没能赢得任何选票，而上述各县曾经是前劳动农民党的主要得票地区。特别是从1928年3月15日后，警方严厉镇压日本农民协会的活动，袭击并完全摧毁了日本农民协会在香川和爱媛的支部，而这两个支部以前曾帮助劳动农民党分别得到16,827张选票和8,430张选票。<sup>[15]</sup>一年后，由于4月16日大搜捕及其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全农在许多县的联合会不是被永远摧毁就是被迫暂时停止活动，这些县包括：大阪、福井、山形、秋田、青森、宫崎、千叶、栃木、长野、冈山、新潟、福岛、三重和京都。<sup>[16]</sup>这样，按比例来说，新劳动农民党因农民运动的分裂，农会的重新结盟及其一些组织被摧毁，而丢失的选票似乎比因日本工会评议会的解散而丢失的选票更多。读者一定记得，1930年大选中新劳动农民党所得全部选票还不

到1928年大选中前劳动农民党所得选票的一半。

相反，由于全农(即全国农民协会)中日劳派占统治地位，因而全农的成立给日本大众党确实带来了好处。身为日劳派成员的那些前日本农民协会的领袖，尽管无力确保使整个全农组织正式支持日本大众党，但他们确实为日本大众党赢得了以前支持旧劳动农民党的大部分选票，从而使日本大众党在青森、秋田、千叶、爱知、鸟取、鹿儿岛，可能还包括北海道的部分地区所得到的选票大量增加。结果，日本大众党所得的选票比其前身日本劳农党多一倍。

社会民众党所得的农民选票虽然也有增加，但这很难归功于日本农会总同盟的支持，因为日本农会总同盟没有进行任何特别出色的活动，其力量也没有增长。社会民众党所得农民选票的增长可能是由于得到了自耕农和一些受到1929年经济危机打击的小地主的支持，这些小地主通过支持较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来发泄他们的不满。这些人并不是有组织农民运动的组成部分，因而他们的选票可以被认为是流动的。这种假设得到下述事实的支持，即在下一一次大选中，社会民众党没有能继续得到小地主的支持，当时小地主从“满洲事变”后对工农业产品的需求一度上升中得到了好处。

1930年大选时，日本农民党已不再自命为是一个全国性政党，而改称为山梨农民劳动党，由平野领导，该党是1930年大选中得票最少的党。支持该党的农民组织于1928年7月5日从其名称中删去了“同盟”一词，而改称为全日本农民协会，碰巧，(正如在附录图3中可以看到)这正是日劳派领导的农会在1928年5月27日和日本农民协会重新联合并成立全农时放弃的名字。当时，平野是山梨农民劳动党和全日本农民协会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平野以前曾参加过日本大众党，但是他在被谴责

卷入一件丑闻后，认为最好还是退出该党。<sup>[17]</sup>平野为了能够继续进行政治活动，被迫建立自己的政党，但是他的山梨农民劳动党在1930年大选中得票还不到10,000张，只相当于其前身组织所得选票的大约1/4。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1930年国会选举中各农会对无产政党的支持，现再扼要概述如下：

表13.2.1

政党(领导)	后援农会
1. 新劳动农民党 (大山及前合法左翼)	全国农民协会的下述分子： (1)那些并没有追随共产党的路线 抵制选举的全国农民协会革新派。 (2)其他的前日本农民协会会员。
2. 日本大众党 (日劳派)	全农中的前全日本农民协会会员
3. 社会民众派党 (社会民众派)	日本农会总同盟
4. 山梨农民劳动党 (平野)	新的全日本农民协会

在1932年举行的下一次国会议员选举中，由于只有力量相近的两个无产政党参加了选举，因而情况要简单得多。新成立的全国劳农大众党合并了除社会民众派以外的所有各派(日劳派、劳农派和前新劳动农民党分子)，社会民众派继续保持独立，单独组成社会民众党。

对全国劳农大众党来说(同以前的各无产政党相比)，1932年的国会选举是一次严重的失败，它的最大失败是在农民选票方面，尽管它所得的农民选票对它赢得一个新的国会议席起了关键作用(松谷在东京地区再次当选，他是另外仅有的一个当选了的党提出的候选人)。虽然一些新劳动农民党的领袖参加了新建立的全国劳农大众党，但他们显然无力使该党在青森、

千叶、福井和佐贺重新赢得以前新劳动农民党所赢得的那些选票。全国劳农大众党仅在新潟和岩手两个农业县中占有优势，并敢于在那里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全农并没有正式支持全国劳农大众党，但全农主流派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该党的领袖。全国劳农大众党提出的12名候选人中，4名是全农的领导人。这些人中，只有全农中央委员会主席杉山当选。<sup>[18]</sup> 他在大阪竞选，得到1,850张选票。大阪虽然是一个城市区，但该区的选民中也包括有许多佃农。党在大阪还有一位候选人大矢，他是劳工领袖，主要得到工人的支持，但他竞选失败，由此可见，农民选票对于杉山的当选起了关键作用。

全农中的左翼认为全国劳农大众党太右倾。全农中的左翼自1930年大选以来又经历了两次转变(见附录图3)。他们最初称为农民斗争社，后来称为全农革新派，继而改为全农战斗化协会，1931年7月7日他们又改称为全农全国会议派(简称为全会派)。这一派以长野为基地，当时他们同共产党的分歧很小，几乎难以区分，因而他们应该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左派内部在是否支持新劳动农民党或是否抵制1930年国会议员选举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全会派在1932年议员大选中显然除新潟县的一个地方政党外，没有从政治上支持任何其他政党。新潟县的那个地方政党提出上村进作为候选人，他因为参加成立新劳动农民党而受到共产党人的攻击。上村进虽然未能当选，但他得到——大部分是依靠全会派的支持——2,437张选票，比许多当选者所得的农民选票还多。<sup>[19]</sup> 全会派同全农间的关系已经很脆弱，很难继续维持一年以上。全会派经常受到警察骚扰，日益转入地下。它在1934年3月实际已不存在了，当时它在大阪和奈良的地方

支部回到了全农。

在农民运动右翼中，出现了一次不成功的合并，企图使社会民众党在1932年议员大选中所得选票增加。合并不成功，因为它没有带来选票，而且在选举后不久就破裂了。平野的全日本农民协会在1931年1月26日同日本农会总同盟合并，共同建立了新的日本农民协会——它“窃取”了农民运动中最杰出的组织的名称。<sup>[20]</sup>但是，尽管如此，社会民众党在被认为是平野的基地的山梨县却没有得到选票，事实上它在诸如宫城、栃木、群馬、富山、三重、奈良、山口和高知等以前至少能得到一些流动票的农业县中也丧失了优势。

1932年国会议员选举中有组织的农民对各无产政党的支持可以概括如下：

表13.2.2

政党(领导)	后援农会
1. 全国劳农大众党 (日劳派、劳农派和一些前新劳动农民党分子)	全国农民协会中的下列部分： (1)全农中的前全日本农民协会分子； (2)前日本农民协会中直到最后仍支持新劳动农民党的分子。
2. 社会民众党 (社会民众派)	组成新的日本农民协会的： (1)平野领导的全日本农民协会的前成员； (2)前日本农民协会总同盟的成员。
3. 新潟的一个地方政党 (该党将新劳动农民党的一位创始人上村进提名为候选人)	全农全国会议派。

在1936年大选中，由于社会大众党没有全国性的无产政党作为其竞争对手，因而情况比1932年大选更为简单。社会大众党几乎没有得到重要农会组织的支持。相反，一些农会提出了

自己的候选人。然而，在1937年议员大选中，尽管出现了新成立的，号召建立广泛工农联合阵线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日本无产党，但大多数农会却投票支持社会大众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可以从全农性质的改变中找到。

1932年大选以来，全农的力量极大削弱。“满洲事变”后全国团结的趋势以影响工人运动的同样方式影响着农民运动。首先，从农民运动中分裂出新兴起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或法西斯主义运动；继而，农民组织本身的活动也越来越少。全农右翼在吉田贤一（最初是日劳派的日本农民协会的一个领导人）的领导下试图改变全农的方向，以在农村中推动“皇道”精神，结束佃农和地主间的纠纷，并鼓励他们相互合作，来帮助进行战争。全农右翼领导人由于没有能够使全农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向右转，便率领全农在兵库、大阪、和歌山和奈良的大批会员退出全农，并于1933年12月1日建立了皇国农民同盟。

全农因恐怖和迟钝而没有能够利用农民斗争的发展来壮大自己，这也削弱了全农。“满洲事变”后，农民运动除受到警察镇压外，还受到那些被广泛蔓延的法西斯暴力所鼓舞的极端爱国主义组织的恐吓。例如，乡荣会和自治农民协会各支部就对农民进行恐吓。<sup>[21]</sup> 这种倾向的背景是，全国逐渐转向战时经济，它使佃农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因而，虽然“满洲事变”后最初一年佃农同地主发生纠纷的次数没有增加，但是其后很快就开始上升，直到1936年达到了顶峰。然而，全农很少领导和组织这些斗争。全农的活动主要仍限于在法庭审判中代表佃农利益提出辩护。大多数纠纷都是由农民个人或地方农民团体同地主直接进行谈判，或是为使政府裁决而向官方申辩。因而，1936年全农会员减少到只有大约32,000人，约相当于1928年日本农民协会人数的一半。



农民斗争的发展对1936年大选产生了两个明显的结果。一个结果是，全农的一部分人主张实行一种比社会大众党所推行的更为积极的农民政策。全农的一些地方支部要求在政治活动中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实际上，全农的一些人在1935年县级选举和之后的1936年国会议员选举中以全农的名义进行了竞选。

另一个结果是，社会大众党尽管消极被动，但在1936年已开始得到相当大一部分无组织农民的支持。这不能解释为是由于日本农会总同盟（它继续支持社会大众党中的社会民众派领导人）的支持，因为在1932~1936年间，日本农会总同盟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活动，其力量也没有增长。然而，1936年距上一次国会议员选举已有4年，离通过《普选法》则已有11年。流逝的时间本身帮助农民熟悉了那种作为工农联盟的“无产政党”的思想。例如，1936年社会大众党在农业县福岛得到了选票，而它的前身在那里却没有得到任何选票。社会大众党在秋田、栃木、群馬、新潟、静岡、兵庫、高知和熊本也得到了选票。但是，同无产政党在最初两次国会议员选举中——当时佃农对竞选的热情更高，而激进的极右翼农民组织也还没有如此众多——得到的农民支持相比，社会大众党只在不多的几个农业地区得到了选票。

现在回到1936年国会议员选举，社会大众党在那次大选中得票总数超过50万张，这是史无前例的。从而全农内部各类分子和其他农民组织都确信，社会大众党有可能成为反对日本国内明显的战争和极权主义趋势的有效力量。社会大众党不由自主地采取了一种类似人民阵线的组织形式，当它在1937年4月国会议员选举中以这种形式出现时，它从全国47个县中的32个县得到了选票，得票总数将近100万张。

在1937年大选中，主张人民阵线的日本无产党所得选票虽然比预期少得多，但它确实赢得了一些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日

本无产党是从劳农无产协议会产生出来的，而劳农无产协议会在1936年国会议员选举中是支持加藤的。日本无产党成立后得到北日本农会的正式支持，该农会是日本最大的一个地方农民协会，有3,000会员。北日本农会由小山长三郎领导，该农会的战斗历史可以追溯到1925年，自那时以来，它几经曲折，多次重新结盟。在1932年国会议员选举中，它作为全会派影响下的很大的新潟县联合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支持了上村进，但是它在1934年重新恢复了它的最初名称北日本农会。次年，它在新潟县级选举中提出玉井润次作为候选人，玉井润次竞选成功。然而在1937年，当玉井润次以日本无产党的名义竞选国会议员时，他失败了，部分是由于他比较不为大众所知。日本无产党除从新潟得到9,000张选票外，没有从其他主要农业地区得到选票。

在分析以前几次选举时，曾提到过平野的名称多变的农会。然而在1933年，平野转向极端民族主义，并和几个陆军将领一起组织了一个政党即皇道会，在皇道会的支持下，他终于在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是平野仍继续得到日本农民协会的支持。

农民组织在1936年和1937年国会议员选举中对各无产政党的支持可以概括如下：

表13.2.3

政党(领导)	后援农会
1936年国会议员选举	
1. 社会大众党 (日劳派和社会民众派)	(1) 全国农民协会中支持日劳派领导人的那一部分 (2) 日本农民协会总同盟
1937年国会议员选举	
1. 社会大众党 (日劳派和社会民众派)	(1) 全民中有比1936年更为众多的部分支持社会大众党 (2) 日本农民协会总同盟
2. 日本无产党 (加藤和劳农派)	(1) 全农中受劳农派影响的部分 (2) 北日本农民协会

1937年大选后3个月，日本军队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在农民运动内部，就象在工人运动和社会大众党内部一样，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少数人随着“满洲事变”后形势的发展而迅速向右转，他们向右转得太快，以致大多数人并不追随他们。大批的农民组织仍支持社会大众党，它们甚至比以前更为团结，但是这毫无意义，因为社会大众党只有一个非常含混的农民计划，它同政府已经准备实行的计划类似；同时也由于党本身在另一次国会议员选举举行之前就解散了。

在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两周，农民运动内部首次对这一事变作出了反应。两个极右翼农会，平野的日本农民协会和吉田贤一的皇国农民同盟，共同建立了爱国农民团体协议会，但同时它们仍旧保持着各自的组织。两个组织都已经支持皇道会。它们建立爱国农民团体协议会是希望其他农民组织能够参加，并且也支持皇道会。尽管这一目的没有达到，但他们却在农民运动中树立了一个转而支持“圣战”和保证停止内部斗争尽力促进国内农业生产的榜样。他们在改变会名，在农会名称上添加“爱国”“皇国”或“大日本”等字样方面也起了带头作用。但是没有其他一个农会参加该团体，而该团体在次年，即1938年11月便解散了。

1937年12月5日开始大规模逮捕支持人民阵线主张的人，被捕者中包括北日本农会的玉井润次，但是并没有命令北日本农会本身解散。然而，北日本农会却由于惧怕可能会被解散，急剧地改变了其纲领，保证在兵农利益一致原则的基础上，促进和鼓励农民支持国家。<sup>[22]</sup>

被捕者中也包括全农领导人黑田寿男和大西十寸男，他们作为社会大众党成员试图劝说该党同日本无产党合并。他们被捕后，社会大众党立即把他们驱逐，以显示该党希望同人民阵

线主张完全割断关系。继而，全农这个唯一的全国性农民组织也在黑田寿男和大西十寸男被捕几天后的1937年12月29日，感到必须修改它的指导原则，从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战斗的组织变成一个促进农业生产的组织。<sup>[23]</sup> 它首次正式支持社会大众党，并保证同工会、农会这些半官方组织合作。然而，实际上，全农已经开始瓦解。

由于对全农保证支持社会大众党和对日劳派领袖准备同日本农会总同盟合并不满，稻村隆一领导下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残存的前全会派左翼分子，于1938年2月13日退出全农，他们建立了日本农民联盟，并保证支持中野正刚的东方会。<sup>[24]</sup> 稻村在最后一次大选中实际上支持日本农民联盟。日本农民联盟的领导人是一个老政治家，他不久前利用马克思主义为他的极端国家主义立场辩护，同时他强烈反对谴责法西斯主义。稻村很赞同他的思想，日本农民联盟宣称有成员71,900人，但实际上可能不到5,000人。<sup>[25]</sup>

留在全农的大多数领导人认为，不仅需要改变原则，而且需要在其他方面也作些改变。他们在经过谈判使全农同日本农会总同盟的工作关系更为紧密后，在1938年2月6日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称为大日本农民协会。该会得到山形县农民协会、富山县农会联合会和兵库县农民协会的支持。大日本农民协会的顾问是社会民众派的铃木文治、贺川丰彦和安部矶雄。它的其他领导人也是来自社会大众党的各派集团：例如，杉山、麻生久（他是第4位正式顾问）、三宅正一、三轮寿壮、野沟胜、细野三千雄和川俣清音是来自日劳派，而山崎剑二，中村高一和前川正一，最初都是新劳动农民党的成员。尽管大日本农民协会宣称在23个县拥有70,000会员，但它可能只有15,000会员。虽然如此，它仍被认为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农民协会。<sup>[26]</sup>

但是，这次改组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极权主义倾向。大日本农民协会本身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次年夏季，大日本农民协会开始同日本农会总同盟的片山哲和松永义雄以及仍领导着日本农民协会的平野进行谈判。他们最后使这三个组织合并，在1939年11月29日建立了农地制度改革同盟。三个组织都主张使所有农民以继承制为基础转变为自耕农，它们在这一点上团结起来。农地制度改革同盟保证全力支持进行战争。尽管农地制度改革同盟没有正式支持任何政党，但它的大多数领导人是来自社会大众党的各派领导集团。此外，平野仍旧是皇道会的成员，而稻村的团体则继续支持东方会。然而，支持哪个党的问题，在那些党于1940年解散后，已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

任何农民组织，不论它是怎样一个右倾或极权主义的组织，都不可能作为独立组织在试图统一一切日本战时体制中生存下去。日本农民联盟在1940年7月被解散。然而，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却在所有政党都被解散和所有工会都被迫合并入产业报国会后，继续存在了两年。农地制度改革同盟最后在1942年被东条内阁强令解散，从而，日本有组织农民运动在日本“因战败而获得解放”前的最后一点活动也归于消灭。

## 注 释

[1] 见前面第2章，第30页～37页。

[2] 关于笔者同安积仰也合搞的一项统计研究，见笔者的《工农斗争……》，第187～212页，特别是第208～211页。

[3] 关于卷入工农斗争的人数与参加的次数和工会、农会的数目及其

拥有的会员人数的统计表，见笔者《工农斗争……》，第202～203页。笔者还可以补充提供一张油印的内容包括1920～1924年的《纠纷增长速度表》。

[4]其他7位领导人中包括行政长藏(他在神户川崎造船厂同贺川一起工作)和细野三千雄(他被列入日劳派的名单)。

[5]这种缺乏成功大部分应归因于1927～1928年野田酱油厂罢工——战前日本最长和最重要的罢工之一——的失败。见笔者《战前日本的工人反抗:1927～1928年的野田大罢工》，(提交给亚洲研究协会的论文，1961年3月27日)。

[6]这些措施引自青木的《日本农民运动史》，第202页。

[7]该材料及其他性质类似的材料得自1953年6月采访东京教育大学政治学教授木下半治。他有一批很令人惊奇的关于社会运动中从极左翼到极右翼各种人的材料和趣闻。关于这点，见他的《现代国家主义辞典》，该辞典包含有那些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社会民主分子的传记。

[8]诺曼:《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出现》，第156页。

[9]关于1927年12月日本农民协会中各类组织的成员的详细情况，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64～265页。据报道，共有30个分会，1,095个支部，62,020名会员，另外还有6个其支部直接隶属于总部的地区。据报道，会员超过1,000人的有以下各县:北海道、京都、大阪、兵庫、新潟、奈良、冈山、山口、香川、三重、秋田、鸟取、爱媛和福冈。农民协会那些最重要的干部同时也是劳动农民党领导人，即稻村隆一(作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长尾有(地下共产党的党员，1928年劳动农民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山上竹尾(基督徒，农民协会创始人)、前川正一和河合秀夫。

[10]1928年国会议员选举中无产政党在各县得票可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192～193页。

[11]关于1927年12月全日本农会同盟中各类组织的成员的详细情况，

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67页。据报道，该同盟仅在以下各县拥有会员，按其重要性排列，即新潟、山梨、福冈、岐阜、群马、北海道和静冈。它唯一的重要领袖是平野力三。

[12] 须贝快天是1927年9月选举中日本农民党在新潟当选的4名候选人之一，他是平野与全日本农会同盟同政友会的主要联系人。顺便提一句，该同盟的另一位干部中泽辨次郎，他也是日本劳动总同盟的顾问，因而他作为同社会民众派的联系人而活动。

[13] 关于1927年12月全日本农民协会中各类组织的成员的详细情况，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68页。杉山和浅沼以及仅在农民运动中又继续活动了一年左右的宗道太共同组成该农会的领导班子。

[14] 关于1928年12月日本农会总同盟中各类组织的成员的详细情况，见笔者《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270页。该总同盟的高级领导人实际不是农民运动领袖，他们包括铃木文治、片山哲、赤松克磨和宫崎龙介。除山梨县外，在德岛只有大约500会员，而在神奈川、埼玉和茨城，只有不到200会员。

[15] 青木的书，第256页。

[16] 黑田和池田著《农民协会运动史》，第126~127页。

[17] 日劳派谴责平野同麻生久一起从田中首相那里接受了11,000日元。该事件的结果是，党的主要负责人麻生久策划驱逐了那些批评者，而平野却发现他最好还是退出。白扬社编：《日本无产政党史》，第122~131页。

[18] 其他3人是水谷长三郎，泉国三郎和三宅正一。

[19] 《劳动年鉴》(1933年)，第155页。在渡边和盐田的书第118页指出，该会议没有“派”的附加词的正式创立是在(1931年)8月15日。

[20] 平野在1926年4月11日成立全日本农会同盟时，虽然宣称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开端，但他已经几乎逐字逐句地接过了前日本农民协会的纲领。见庄原达《日本农民协会的真正难题》，《社会问题论文集，增补卷》，

大宅壮一编(东京,新中社,1926年),第18页。读者一定记得,平野在其组织合并后不久就改变它的名称,于1928年7月5日又接过全日本农民协会这个名称!

[21]这两个组织都是卷入1932年5月15日谋杀案的桔孝三郎在1930年和1932年间建立的。见斯托尔里:《双重爱国者》,第99~100页。

[22]见《日本劳动年鉴》第20卷(1939年),第229~230页。

[23]该声明可以在《日本劳动年鉴》第20卷(1939年)第220页找到。

[24]这种隶属关系使稻村和其他那些以前是全农左翼的人在战后占领时期被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清除。因而,农民协会在战后重新组织起来时,那些前左翼分子不能采取主动行动。

[25]见《日本劳动年鉴》第20卷(1939年),第220~221页。

[26]同上注。



## 第14章 妇女组织和少数民团体

无公民权的妇女

特殊部落民：社会少数民

在日朝鲜人：少数民族

事实证明，妇女、被歧视的特殊部落民以及在日朝鲜人团体的政治支持，在不同程度上对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具有重要意义。这3个集团尽管都是由工人，农民和其他一些社会阶层中的人士组成，但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本质上是支持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些前部落民或“不可接触者”——在日本称为“特殊部落民”——成为积极的活动家。甚至那些多疑的在日朝鲜人也被无产阶级运动所吸引。妇女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尽管日本在战败前一直不存在使这种潜在因素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条件。

### 14.1 无公民权的妇女

妇女不能在政治中发挥任何重要作用，这不仅是由于她们传统上被置于一种低下的社会地位，而且也由于各种法律规定对她们的特别限制。1889年公布的《明治宪法》允许设立由符

合一定条件的男子选举产生的国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禁止妇女拥有任何政治权利。<sup>[1]</sup> 妇女甚至不许出席讨论政治事务的会议。这项严格的限制在1922年只是稍微有所放松，当时对这条法律作了些修改，准许妇女参加和召开政治会议，但是日本在战败前一直禁止妇女参加或建立政党。

在社会主义运动本身还只是刚刚开始发展的19世纪90年代，一些妇女就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并因此而成为妇女运动中最积极的分子，她们为了废除对妇女参与政治的限制，首先要求社会平等。<sup>[2]</sup> 第一个重要的妇女组织是1911年建立的青鞞社，它由那些在新的女子学院受过较高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组成。该社包括诸如后来嫁给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伊藤野枝等一些当时最激进的妇女。<sup>[3]</sup>

妇女社会主义者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相一致，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工人运动。<sup>[4]</sup> 一些人在1916年帮助友爱会建立了妇女部，推动贫苦的日本女工关心世界事务。<sup>[5]</sup> 例如，在1919年，该妇女部发起举办了一个有约上千名男女纺织工人参加的大会，通过了一个向国际劳工组织描述日本女工境况的声明。在1921年，妇女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赤澜会，试图在日本庆祝国际妇女节。<sup>[6]</sup>

但是，妇女社会主义者的最直接目标是争取选举权。她们为实现该目标于1919年成立了新妇女协会。她们在1922年3月取得一些成功，当时政友会拥有多数席位的国会放宽了对妇女参政的限制，允许妇女出席和举办政治会议。这次成功激励妇女社会主义者在1923年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妇女同盟，该组织不仅是为使妇女拥有选举权，而且是为使妇女拥有参加政党和其他一些公民自由权利而进行宣传鼓动。<sup>[7]</sup> 该团体在几次组织变化之后，最后定名为争取妇女参政权促进同盟会。<sup>[8]</sup> 1930

年它成为团结妇女运动的核心力量。然而，在1924年，尽管将妇女也包括进有关普选权的悬而未决的法案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妇女社会主义者却把注意力转向其真实目的在于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研究会。结果导致在该研究会中建立了一个妇女部。<sup>[9]</sup>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中各派的矛盾，该研究会很快就分裂了，分裂也影响到妇女部。

妇女社会主义者虽然由于1925年的《普选法》没有把投票权扩大到妇女而感到痛苦和失望，但她们仍然决定在该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参加无产政党运动。由于不允许妇女参加政党，因而她们只能建立一个从属性的组织来支持无产政党。妇女社会主义者虽然几次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都没能成功，但她们终于在1927年7月2日成立了关东妇女同盟，该组织很快就宣布支持劳动农民党，尽管劳动农民党的一些领导人认为成立妇女组织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可能产生宗派问题。这是第一个隶属于一个政党的妇女组织，同其他妇女组织相比，它更强大，也更有战斗力。它包括日本农民协会和日本工会评议会的妇女部以及党的领袖们的亲朋中的年轻知识分子。<sup>[10]</sup> 关东妇女同盟虽然有战斗力，但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在1928年3月15日的大规模逮捕后，它同劳动农民党一起被解散。<sup>[11]</sup>

1927年11月建立的社会民主妇女同盟，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是支持社会民众党的。它主要由社会民众党领袖们的妻子和亲朋们组成，但也包括总同盟的妇女部。<sup>[12]</sup> 它更倾向于搞社会福利工作而不是搞政治，它的活动越来越少，最后完全终止。另一个妇女组织是1927年10月2日成立的全国妇女同盟，它支持日本劳农党。它由日本工会同盟妇女部中的女工组成，也包括日本劳农党领袖的家庭成员和一些护士与教师。<sup>[13]</sup> 它在第二年日本劳农党改组时，将名称改为无产妇女同盟，但因

其后该党处于分裂，它也很快就停止了活动。<sup>[14]</sup>

隶属于无产政党的各妇女组织宣称其最多时分别拥有400~1,000名会员，虽然没有适宜的精确统计，但可以认为，它们实际拥有的人数要少得多。<sup>[15]</sup> 那些妇女组织不仅处于分裂状态——这是社会民主运动中各派不和的反映——而且都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她们虽然确实鼓动起一些妇女去帮助党进行宣传工作和在大选时支持党的候选人，但这些活动却使她们脱离了工会的组织工作，而在那里，她们也许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妇女改善自己的命运。她们还必须同无产政党领袖本身对妇女问题的缺乏了解进行斗争，这也大大降低了她们活动的效力。

妇女社会主义者在对1928年国会议员选举感到失望后，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前面提到的争取妇女参政权促进同盟会。这导致该同盟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便施加压力使国会中的民政党、政友会和各无产政党议员承认并支持妇女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这样，倾向资产阶级的和倾向无产阶级的妇女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合作，她们在1930年国会议员选举后，甚至建立了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联合阵线。她们举行群众大会，散发宣传品，但是正当她们在聚集力量时，“满洲事变”爆发了，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日本出现了极权主义战时体制。“芦沟桥事变”后，争取妇女参政权促进同盟会参加了政府发起组织的妇女团体联盟，该联盟吸收了所有的妇女团体，使它们转变成为在妇女中鼓动战争精神而工作。

石本男爵夫人领导的计划生育运动也成为鼓动战争精神的牺牲品。石本男爵夫人早在1922年前就一直为宣传计划生育而奔走，她在1922年3月同其他人一起勇敢地到船上去欢迎来日本访问的玛格丽特·桑格。当时，日本内务省几乎拒绝准许这位著名的美国人来日本宣传计划生育。石本男爵夫人的兄弟鹤

见佑辅写过一些要求妇女平等的文章。在无产阶级阵营中，安部矶雄和片山哲多年来一直支持计划生育。石本男爵夫人在政治上属于最温和的社会民主派。但是，计划生育思想受到军方的强烈谴责。因此，石本男爵夫人的高贵门第家庭也没能够使她避免在1937年12月的大搜捕中捕，虽然那次搜捕主要是针对人民阵线领导人的。石本男爵夫人是同贵族结婚。她的前夫的父亲是第2届西园寺内阁的陆军大臣，她的兄弟当时是民政党国会议员。她的被捕显示出即使是妇女运动也受到非常广泛的镇压。<sup>[16]</sup>

## 14.2 特殊部落民：社会少数民

特殊部落民参加社会民主运动比妇女参加社会民主运动有更重要的意义。虽然许多社会人士认为特殊部落民是因其外表和行为方式而受到歧视，但特殊部落民却并不是一个宗教的、种族的或激进派的少数民团体。<sup>[17]</sup> 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少数民阶层，被以一种四指的手势侮辱为是“类似动物”。那些怀有偏见的人甚至回避和他们同桌吃饭，更极少有人愿和他们通婚。他们由于是德川幕府时期“贱民”阶层的后代，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中，是最受歧视的一个少数民阶层。在德川时期，他们一般被称为“秽多”，意思是“非常污秽”。<sup>[18]</sup> 这个词是那些讲英语的日本问题专家们在其圈子中最先使用，但是正如从其意思中可以猜想到的，这是一个侮辱性词语，对于该少数民阶层来说，这个词是不能接受的，就象美国黑人不能同意称其为“黑鬼”一样。“秽多”仅是社会上对该少数民阶层的许多贬意称呼之一。<sup>[19]</sup> 今天，对于那些没有偏见的人，也包括该少数民阶层本身在内，一个可以接受的称呼是“特殊部

落民”，或更进一步简称为“部落民”。<sup>[20]</sup>

对特殊部落民的偏见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虽然有若干种关于部落民起源的理论，但是其中只有一种理论在战前日本学术界被普遍承认，即喜田贞吉教授提出的关于部落民是起源于前平安朝时期的“贱民”或捕食者的理论。<sup>[21]</sup>部落民的祖先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曾经居于高位，但是到了德川幕府时代，部落民已被认为是最低下的社会阶层，甚至比一些被称为“非人”的移民阶层的地位还要低。他们被规定只能在一些没人愿意干的社会经济部门工作，例如，他们只能当清洁工，卖肉，屠宰牲畜，鞣制皮革，加工皮革，当刽子手或去埋死人和看守坟地。佛教禁止杀生和食肉也加深了人民对部落民的偏见。在德川政权接近末期时，由于经济环境恶化，社会对部落民的歧视进一步加深。

1871年，由于明治维新后平等思想的第一次广泛传播，政府正式解放了部落民，宣布部落民是“平民”的一部分。<sup>[22]</sup>然而由于并没有采取经济措施去具体实现这种解放，因而大多数“新平民”——这是对部落民的带有讽刺性的称呼——处于一种比以前更坏的境地。只有少数有足够金钱或能够设法迁居的部落民离开了部落民居住区，和其他阶层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但是绝大多数部落民都无力离开特殊的部落民居住区。部落民失去了诸如对皮革和其他某些工作的垄断等在封建社会曾经拥有的一些特殊权利，而他们获得解放太晚又使他们不能在重新分配土地中得到合理的一份。半数以上的家庭继续耕种贫瘠的小块土地。一些人，特别是靠近大城市的那些人，继续当屠夫或做鞣制皮革的工作，而其他人则去干那些没有任何人愿意干的工作。那些试图“通过”社会等级阶梯向上爬的部落民经常害怕其身世被人发现。因而很自然，部落民为改善自己的命运

最终将会采取集体行动。

直接推动特殊部落民在1922年3月建立全国水平社的那些因素也就是促进社会民主运动发展的因素。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分析所有那些因素，仅指出其中的两点就足够了。其一是以1918年“米骚动”为标志的战后经济的混乱。据估计，在因“米骚动”而被捕的6,000人中，近80%是特殊部落民。<sup>[23]</sup>第二个因素是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与流行。在自我解放运动成立大会上散发的由早稻田大学的共产党员教授佐野学撰写的一篇文章表现出这种社会主义思想。该文解释了没有理由歧视特殊部落民，论证只有通过社会革命，部落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该文并且提出两个基本原则：(1)特殊部落民的解放必须从其本身要求废除那些非正义的歧视开始；(2)以此为开端的部落民解放运动必须同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相一致。<sup>[24]</sup>诸如三浦三玄洞<sup>[25]</sup>和赤松照懂<sup>[26]</sup>等一些信奉佛教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分子也鼓吹同样思想，而赤松照懂还具体地帮助部落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尽管事实上佛教徒们按传统在下层人民中进行慈善工作，但那些力图自己站立起来的前“贱民”却开始拒绝寺庙的施舍，转而通过政治手段寻求解放。

部落民们根据以前的经验认识到他们能够发挥政治影响。早在1890年，部落民的支持曾帮助最民主的老“自由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当选为国会议员。<sup>[27]</sup>后来，部落民甚至成功地把部落民的成员选为国会议员。然而，部落民的贫困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尽管他们宣称在日本全国大约有6,000个特殊部落，包括近300万居民，但是只要对投票人在经济方面的规定使大多数部落民被剥夺了投票权这种情况不改变，部落民就不能发挥出其全部力量。虽然没有可靠的资料，但一般认为，特殊部落民人数约为150万，即使这样，部落民也仍是一支不

小的政治力量。<sup>[28]</sup>

水平社试图提高特殊部落民的生活水准，它首先致力于要求个人或集团为公开的歧视行为而陪礼道歉。这种争取得到陪礼和道歉的斗争有时反而使社会上大多数人更公开地反对部落民，甚至发生了一些流血事件。<sup>[29]</sup>事件后进行的逮捕和审判揭示出法庭非常歧视特殊部落民。对水平社的成员来说，似乎提高部落民社会地位的唯一方法就是降低高居等级制度顶端的那些贵族(华族、贵族和皇族)的地位。他们决定从要求德川家达亲王放弃爵位开始，因为在他们看来，该亲王的祖先在德川时代应对镇压“贱民”负主要责任。<sup>[30]</sup>该尝试失败了，这促使水平社成员确信，部落民需要和工农组织及无产阶级政党团结起来。由于“布尔什维克派”(这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术语)垄断了为采取政治行动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因而它在水平社的整个组织中居优势地位。“布尔什维克派”(亲共产党)受到无政府主义派和保守派的反对。无政府主义派强烈反对采取政治行动，而保守派对采取政治行动毫无兴趣。<sup>[31]</sup>

为帮助建立第一个无产政党，布尔什维克派的成员于1925年10月独自成立了全国水平社无产者同盟，并于同年12月1日参加建立夭折的农民劳动党。右翼组织总同盟认为，全国水平社无产者同盟中共产党人占统治地位，因而在1926年3月成立劳动农民党时，要求把无产者同盟和左翼的评议会及其他团体一起排除在外。劳动农民党在7月召开的中央执委会会议上肯定了这种做法。但是左翼分子继续战斗。日本农民协会因其会员中有很多人是水平社的社员或是其他的特殊部落民，因而受到全国水平社无产者同盟的极大影响，它继续为反对驱逐左翼组织而斗争。

8月，无产者同盟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要求劳动农民党



实行开门政策。其后不久，劳动农民党终于采取了开门的方针，其第一步就是邀请水平社参加该党。然而，劳动农民党的大多数后援组织拒绝支持这种做法。当时总同盟和其他组织退出了劳动农民党，这使劳动农民党受到严重打击，只有日本农民协会和相对不重要的陶瓷同盟仍表示继续支持该党。在发生大分裂的两天前，即10月22日，无产者同盟正式建立了全国水平社支持劳动农民党联盟，以此作为对劳动农民党实行开门政策的回答。稍后，劳动农民党让该联盟的4位领导人参加了党的中央执委会，并同意把反对“封建偏见和歧视”作为党的纲领。在1928年国会议员选举中，劳动农民党的候选人中有3位是水平社成员，但是他们都没有当选。<sup>[32]</sup>

上述候选人中的一位，即松本治一郎，可以视为水平社成员参加无产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最杰出代表。松本治一郎从1925年直到战后时期一直担任水平社中央委员会主席。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水平社的创建者，虽然他由于公开表示反对歧视行为而被学校开除，因而只受过中等教育。<sup>[33]</sup> 1926年他在九州的福冈团中领导了反对歧视的戏剧性的运动。<sup>[34]</sup> 该运动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煤矿工会、日本农民协会和劳动农民党的其他后援组织。这种合作巩固了劳动农民党和水平社的关系。然而，对于该运动的领导人来说，不幸的是，警方制造了一个反对他们的借口，控告他们在军队中阴谋暴动。这个案件在法庭上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拖了3年之久，最后交由最高法院处理。最后的裁决是判处9个人3年徒刑，其中的6人死在监狱中。松本是活下来的一个人。在审判期间，又有数百名水平社成员在1928年3月15日和1929年4月16日的大规模逮捕中被捕。

劳动农民党解散后，水平社追随大矢一派，支持建立新劳

动农民党，宁可选择有限的议会主义手段，而拒绝采取共产党所主张的非法行动。当新劳动农民党向右转时，水平社内部在组织问题和战略问题上发生争吵。较激进的一派建议，完全解散水平社，鼓励其成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工会和农会。他们论证，只有通过解放全体工人阶级，特殊部落民才能得到解放。较保守的一派则坚持，水平社继续独立存在。两派最后达成妥协，水平社将继续作为一个全国组织而存在，但它将主要以部落委员会为单位进行活动，而部落委员会则将参加一切能够提高特殊部落民生活水准的运动。<sup>[35]</sup>

新的组织形式和战略在1933年的一场群众运动中受到考验并被证明是成功的，它显示水平社已恢复力量将成为所有社会民主派系于1932年联合成立的新的社会大众党的一笔政治资产。该运动的目标是推翻香川县高松地方法庭的一个歧视性判决，该判决实际是发现一个男部落民在向非部落民女子求婚时隐瞒其部落民身分而认为该男子有罪。由于该判决否定了1871年的解放法令，因此推翻该判决的运动一举而得到特殊部落居民的占压倒多数的支持。

1933年10月，水平社组织起一支队伍，从九州向北方的东京徒步进军，他们访问了沿途所有重要的特殊部落居民点，发表演说和在请愿书上征集签名。这支由松本领导的50人的队伍尽管经常受到警察的干涉，沿途却受到近20万人的欢迎。他们在47个地方发表了演说，听众总共有大约163,000人。在东京，他们会见了各级政府官员。社会大众党为他们举行了两次盛大的欢迎会，各类工会和消费者联合会也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这场运动几乎是即刻就获得了成功，因为下一个月遭到指控的那个人就被释放，而审判被撤销，原告也撤回了他的申诉。<sup>[36]</sup>

其后，水平社和社会大众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在1936年和

1937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松本尽管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竞选并当选为议员，但他常常同社会大众党紧密合作。<sup>[37]</sup> 另外一个部落民出身的人田原春次，在1937年国会议员选举中，作为社会大众党的候选人，也当选为议员。他虽然是一个后来者，但由于他是党的活动家，我们把他也包括在日劳派成员的名单中。同松本相比，他受过远为良好的教育，他不仅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而且还在美国学习过。他象许多水平社成员那样，在日本农民协会和其他的农民团体中开展活动。诸如松本和田原这样一些出身于特殊部落民的人，成为了社会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并且还进入了国会。

水平社是战争期间仅存的一个开展“社会运动”的组织。全国水平社在战争开始后，甚至在中野正刚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东方会解散后，仍旧继续存在。松本被召到内务省被警告说，他如果不能解散水平社，在1942年国会议员选举中将不会被推荐为候选人，但是松本拒绝解散水平社。<sup>[38]</sup> 政府由于认识到无论怎样做松本都会当选，因而在“东条选举”中仍旧推荐了他，松本顺利当选<sup>[39]</sup>（日本投降后，水平社是发起建立新的日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之一）。

全国水平社——代表日本受压迫最深的少数部落民——虽然作为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中的一分子一直保持着左的倾向，但其领袖却能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使该组织免遭毁灭。这是能够在其中发现进步的佛教影响的唯一组织，这个事实使人联想起宗教对于美国黑人以及对于全世界犹太人的重要意义。贫穷的特殊部落民被激进的社会运动所吸引，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工人组织或农民组织才能够改善其生活水准，避免日益孤立和受到歧视。

### 14.3 在日朝鲜人：少数民族

在日本的朝鲜人同特殊部落民一样，构成了一个受压迫的少数人阶层。朝鲜人尽管在外表上同日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却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因此，可以把在日朝鲜人视为一个少数民族。<sup>[40]</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初10年中——当时社会民主运动获得很大发展——约有40万朝鲜人移居日本，但他们在日本社会中处处受到歧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是来自农村，毫无技术，专门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他们居住在贫民窟中，其生活条件比大多数收入最低的日本工人还要差。他们不仅工资最低，而且当经济条件恶化时，还是第一批被解雇的人。他们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期间发生的、近代历史上最恐怖之一的一次大屠杀中，还有成千的人被残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也有几千名朝鲜人在日本高等院校读书，其中大多数人生活贫困，对现状不满，未来没有保证。朝鲜人中的商人都是小商人或小摊贩。初看起来，朝鲜人似乎同特殊部落民一样，会自然而然地参加社会民主运动。

然而，朝鲜人却和特殊部落民不同，他们不享有日本公民的那些合法权利。日本虽然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但朝鲜人只得到日本国籍，却不被承认是日本公民。日本政府只是在1919年朝鲜爆发民族起义后才宣布日本人和朝鲜人相互“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并不包括选举权利的平等。1925年日本通过《男子选举权法》，当时日本有14万朝鲜族人 有资格获得投票权，从而能够正式参加选举。虽然如此，但由于该法案规定投票者需提出在日本至少居住了一年的证明和不依赖政府的救济或类

似援助而生活的证明，因而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朝鲜人都没能从《男子选举权法》中得到好处。<sup>[41]</sup> 在30年代中期以后，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在日朝鲜人完全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朝鲜人由于没有通过行使公民权利表达自己愿望的机会，他们对严重依赖议会手段进行改革的社会民主运动也不感兴趣。

朝鲜人尽管没有参加选举和投票的权利，但他们仍然有充分机会通过参加工会运动来支持社会民主运动，然而在这方面，他们也不能够取得很多进展。朝鲜人参加了工人运动，但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却是支持共产党人。朝鲜人没有技术，常常在政府的救济计划中工作，大部分人不识字，带有浓厚的外国口音，还常常迁移，因而朝鲜人很难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尽管如此，一部分反日朝鲜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仍然在1925年建立了朝鲜工人总同盟。<sup>[42]</sup> 朝鲜人在5个最大城市的每个城市里都建立了一个朝鲜工人联合会，而朝鲜工人总同盟则成为这5个朝鲜人工会的联络站。该总同盟的领导人也参加了日本工会会议，尽力为朝鲜人争取同情者。该组织虽然称为朝鲜工人总同盟，但却积极支持亲共产党的评议会以及后来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

在日本的大多数朝鲜人，最初在朝鲜家乡时都是干农活的，但他们到日本后，既得不到土地，又当不成农业工人。因此，他们感到在日本农民运动中没有自己的地位。

朝鲜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只是在无产阶级运动最极端的一翼中扮演着各种角色。日本镇压1919年3月1日朝鲜全国发生的、据认为是非暴力的民族主义示威后，对朝鲜人来说，成为一个民族主义活动家也就意味着成为一个革命家，因为用非暴力手段似乎已不可能使朝鲜获得独立。在这些革命者中间，存在着三种派别，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

主义者。中产阶级革命家流亡国外，建立了一个由李长满领导的流亡政府。无政府主义者致力于搞个人暗杀活动，而共产党人则努力开展地下活动。最轰动社会的也是最为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是，1923年朝鲜人朴烈试图暗杀王储裕仁。<sup>[43]</sup> 大多数支持日本无产阶级组织的在日朝鲜人都在1928年3月15日和1929年4月16日的两次大搜捕中被逮捕。<sup>[44]</sup>

在地理上，朝鲜位于苏联和日本之间，那些既去苏联也去日本的朝鲜左派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国际和那些认为最有可能建立日本共产党的日本人之间的中间人。同这些朝鲜左派有联系的人有大杉荣，堺利彦和山川均，<sup>[45]</sup> 但是随着30年代的到来，这种中间人已不可能再存在。<sup>[46]</sup>

本章中所讨论的妇女、特殊部落民和在日朝鲜人都共同受到社会 and 法律的歧视。对特殊部落民的法律歧视废除较早，但是社会歧视一直存在，因而特殊部落民在3个阶层中参加政治活动最积极，组织也最好。执政的各保守政党一直顽固坚持对妇女的法律歧视，尽管20年代也曾闪过一些妇女有可能获得解放的迹象。对在日朝鲜人的歧视是随着日本对朝鲜以及其他殖民地和占领区的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随着日本向国外扩张的每一次新的浪潮，在日朝鲜人则陷于更深的绝望或更加趋向于极端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人人平等的主张促使无产政党要求改善上述3种人中每种人的处境。如我们在第9章中已经看到的，所有政党最初都支持妇女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法律和经济上享有平等地位，此外还要求在上夜班和干繁重体力劳动方面对女工和童工规定一些特殊保护。社会大众党成立后，虽然社会民众派的安部和片山继续就妇女问题发表演说，但党却在其纲领中“删除”了妇女问题。妇女由于其在法律上的无权地位同

其在“家庭中”的地位的传统概念相一致，因而她们中大多数人并不感到那种无权是非正义的。显然，只有极少数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并拥护某种意识形态的妇女才以平等为理由来表示她们的不满，并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与此相反，特殊部落民和在日朝鲜人却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所处地位的不合理。然而，虽然特殊部落民除去寻求平等和一体化外别无其他选择，但是朝鲜人，除少数人外，却宁肯分离，即寻求解放朝鲜。如我们在第10章中已经看到的，各无产政党在20年代确实曾主张“解放殖民地”，但当时除共产党人外，没有任何人特别提出朝鲜和台湾的问题。逐渐地，“殖民地解放”这个口号的内容也变得完全不同了，它变成为以日本军事力量去解放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这种趋势只能使朝鲜人同无产政党更加疏远。

社会主义的“解放”的概念除意味着平等外，还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从经济上摆脱贫困的束缚。由于妇女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该思想仅对工人和农民阶层中的妇女以及一些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妇女有号召力。正因为如此，对妇女来说，改善经济条件的主张一般经常同政治上的平等要求联系在一起。这样，各种意识形态的流派也蔓延进妇女组织并使之分裂，它不仅显示出妇女各不相同的社会地位，而且削弱了妇女组织的影响。

最后，由于社会歧视将特殊部落民推向经济上的更低下地位，因而他们有双重理由支持无产阶级运动。但是，由于法律上并没有特别针对部落民的歧视性条文（例如，象美国那类针对南部黑人的歧视性法律），因而一个根据个别的县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候选人的行为来决定“谁是朋友应予支持和谁是敌人应予反对”的政治运动将不会有很大效果。部落民采取的办

法是，在选举中支持松本和其他少数有部落民背景的军方候选人，这些人成为帝国议会的议员能使特殊部落民因“我们的一个孩子是议员”而感到满足，同时这些人也以其态度、服装和同工农支持的无产政党合作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层阶级挑战。

## 注 释

〔1〕这是1889年10月颁布的《集会政社法》。在几次修订之后，严格禁止妇女参加政治活动的规定具体表现在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第5条中。其后，妇女进行宣传鼓动的直接目标就是废除该条款。高群逸枝：《日本妇女社会史》（大阪，新日本社，1943年），第227页。

〔2〕景山英子（福田）是最早的妇女社会主义者之一，她在自由运动中同诸如大井宪太郎等领导人一起活动。其他妇女社会主义者包括堺为子、西川之子、远藤清子、今井歌子和管野须贺子。管野在1911年的大逆审判中同幸德秋水一起被处死。关于该时期妇女社会主义者活动的描述，见井上清：《日本妇女史》（东京，三日书屋，1949年），第285～298页。

〔3〕伊藤野枝当时仍是辻润的妻子。该会除伊藤野枝外还吸引了诸如平冢明子（雷鸟）、中野初子、管野须贺子和女诗人与谢野晶子等知名妇女。该会是受到18世纪50年代英国的蓝袜社的启发而建立的，这显示出日本妇女感到她们远远落后于她们的英国姐妹们。在中川一男的《日本妇女史论》（东京，日本图书社，1925年）中有关于该会（它一直延续到1915年）的进一步的论述。

〔4〕在工人运动中，她们发现男工人不仅以日本的传统方式看不起妇女，而且还惧怕妇女会不断进步，从而担负起迄今为止一直是男人干的那些工作。这显然是任何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都会碰到的现象。



关于日本的例子，见高群的书第247页。

[5] 她们在1916年7月开始出版一份名为《友爱妇女》的杂志，但由于获得的支持不多，该杂志只出到1917年3月。

[6] 赤澜会虽然很快受到镇压，但在次年，即1922年，它又作为三八会复活了，并准备庆祝3月8日国际妇女节。它的领袖包括山川菊荣(山川均的妻子)，堺真柄、久津见房子和仲曾根贞代。井上的书，第326页。

[7] 关于拒绝给予妇女的那些重要的公民权利(有离婚、职业、财产所有等)以及妇女为此而进行宣传鼓动的讨论，见高群的书，第213~223页。

[8] 争取妇女参政权促进同盟主要由中产阶级妇女组成，它包括诸如平冢明子(雷鸟)，奥梅生和市川房枝等一些在战后日本重又积极活动的人。关于妇女在战后的活动以及战前的妇女运动，见安部：《现代日本名人论》第243~252页。

[9] 政治研究会妇女部包括诸如奥梅生、山川菊荣和新妻伊都子等人。它的大部分成员居住在东京，也有一些人住在大阪和神户。她们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妇女或女职员，没有一个人是工人或农民。高菊的书，第247页。

[10] 关东妇女同盟的领导人包括野坂龙(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妻子)，田岛秀子，山内美奈和柳鹤，后三人也是工会领袖。协调会：《近期的社会运动》第651页。

[11] 在这次和1929年4月16日的大规模逮捕中，大约3,000人被捕，其中825人受到审判。那些受到审判的人中，有18人是妇女。井上的书，第344页。

[12] 社会民主妇女同盟的领导人包括赤松明子(赤松克彦的妻子)、赤松常子(他的姐姐，工会领袖)和山田安子。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团体，即1927年7月10日建立的劳动妇女联盟，但是其成员很快就将她们很少

做的政治方面的工作转交给了社会民主妇女同盟。《近期的社会运动》第651页。

[13] 全国妇女同盟的领袖包括菊川静子、织本贞代和岩内富江。《近期的社会运动》，第652页。

[14] 无产妇女联盟与全国妇女同盟合并后采用了无产者妇女同盟的名字。由劳农派的堺真柄和平林泰子领导的无产者妇女联盟隶属于无产大众党。当该党在1928年12月同日本劳农党合并建立日本大众党后，无产者妇女联盟也就自然地同全国妇女同盟合并。当两党合并证明并不成功而于1929年6月分裂时，妇女组织再次分裂，很快就停止了活动。

[15] 协调会估计，只有上万名妇女参加了要求改革的各组织。而在同一时期(1929年)，有大约400万妇女参加了那类倾向于使妇女维持其传统地位的组织。《近期的社会运动》，第655页、717页。

[16] 我们在前面指出过，石本男爵夫人的被捕使她最终同加藤勘十结婚并在战后成为社会民主党中最杰出和最有权力的妇女。关于她的被捕及其在战后进行的各种斗争的有趣叙述，见玛丽·比尔德：《日本历史中妇女的力量》(华盛顿，公共事务出版社，1953年)，第167~178页。

[17] 贺川丰彦在其早期的著作中令人十分惊奇地描述了社会上流行的对特殊部落民的歧视态度以及关于其起源的错误见解。他写道：“没有人能够否认在日本帝国中特殊部落民是一个应受谴责的种族……一个有各种各样起源的堕落的或应作牛马的或已十分衰弱的土著种族”。他认为他在一些部落民和朝鲜人的讲话中发现一些有别于其他人的中国词的残迹。他从其肤色推断，他们有些人是高加索人的后裔，有些人是黑人的后裔。见他的《贫民心理研究》(东京，庆政社，1916年)，第98~101页，以及他的《精神运动和社会运动》(东京，庆政社，1919年)中的许多地方。我感谢我妻博先生，因为他作了那些引证。事实上，客观的研究发现，特殊部落民在种族方面同其他日本人(他们显然有一个共同的许多种族混合发展而形成的祖先)没有什么不同。

[18] 该译文见于巴兹尔·H·张伯伦的《日本情况》(修订第6版,伦敦, K·保罗, 特伦奇和特拉博纳公司, 1939年), 第150页。该书首次出版于1899年。

[19] 二官茂明以按使用地点排列并尽量附上译文的方式编制了一张这类贬意名称的表格, 见他的《关于日本社会阶级史中“秽多”的起源、发展和当前状况的探索》, 《日本亚洲社会学报》第2辑第10期(1933年12月), 第137~139页。另见休·H·斯迈思: 《秽多: 一个处于边缘的日本社会等级》, 《美国社会学杂志》第58卷(1952年9月), 第194~196页。

[20] 关于部落民的内容最多的著作是乔治·德沃斯和我妻博编的《无形的种族: 日本贱民传统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6年)。笔者同我妻博合写的第4章中提供了从明治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殊部落民”政治运动的详细历史。

[21] 喜田贞吉: 《特殊部落研究》, 《民族和历史》第2卷(1919年)。

[22] 《秽多解放令》是国会1871年8月28日发布的第61号公告。关于其译文, 见二官的书, 第109页。

[23] 二官的脚注为这一陈述提出了4个来源。同上书, 第127页。

[24] 这篇文章第一次出现在1921年7月那一期的《解放》杂志上, 标题是《论特殊部落的解放》。奈良县3个有类似的思想主张(受前面提到过的社会主义者佛教徒三浦的影响)的特殊部落民青年, 在读了该文章后, 决定设法创立一个全国性的特殊部落民组织。他们立刻去东京拜访了当时是早稻田大学教授的佐野, 征得他的同意将该文修改后作为新组织——它就是全国水平社——的发起书, 并将标题改成为《为了更美好的那一天》。《近期的社会运动》第471页。

[25] 三浦是对社会主义有兴趣的一个佛教僧侣小团体中的一员。见笔者《佛教和社会主义……》第298页。

[26] 赤松照懂是赤松克磨的父亲。他的女儿常子同他一起在一个特殊部落中居住过一段时期。比尔德的书, 第186页。

[27] 新日本历史学会编：《新日本历史：近代社会》（东京，福村书店，1953年），第134页。有关中江政治倾向的论述，见池的书《日本政治民主的开端》第124～129页。

[28] 关于该数字的讨论，见二官的书，第113页。福利部在1935年公布的那些数字直至1948年仍被认为是最适宜应用的数字。见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编：《部落解放斗争30年》（东京，近代思想社，1948年），第224～225页。最近政府的数字表明，特殊部落总共有4,133个，部落民总共有1,220,157人，分布在全国29个县中。青少年问题中央协议会编：《青少年白皮书》（东京，1962年），但是德沃斯和我妻博相信那些数字是过分低估了。

[29] 这类性质的著名事件是，1923年3月国粹会和水平社之间的战斗，与1925年1月世良田大屠杀。在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的书第48～62页有详细的描述。

[30] 有关该决定及其后患的描述，同上书，第63～77页。

[31] 由于那些派系反对政治活动以及它们并没有卷入到社会民主运动中，因而这里不讨论它们。但是关于它们的观点，可参阅协调会的书《近期的社会运动》第471～482页。

[32] 3位候选人是松本治一郎（福冈）、三木静次郎（冈山）和化名西光万吉的清原一隆（奈良）。在那些没有水平社候选人的地方，特殊部落民被号召支持诸如水谷长三郎和山本宣治等其他的劳动农民党候选人。同上书，第484～485页。

[33] 据说，水平社所筹集的资金很多是来自松本自己的腰包。见赤坂：《领导无产政党的人们：“人民阵线”是什么？》第56～61页。关于松本生平的论述，见井上缝三郎：《现代政治家传略》（东京，金目书屋，1953年），第168～174页。

[34] 水平社在这场斗争中强调，它在军队中的成员及其他支持者正在为维护所有陆军士兵和水兵的“人权”而战斗，军队自从是一支“阶

级”的军队以来，它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劳动人民。在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的书第77~100页中描述了这场斗争，并附有相应的文件。另见部落问题研究所编：《部落的历史与解放运动》（京都，部落问题研究所，1955年），第251~252页。

[35] 这场争论的过程以及解散建议的全文刊载于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的书第124~142页。

[36] 在小山荆冠的书《请愿大军如何作战？》（滨松，全国水平社静冈联合会，1934年）中描述了这次审判和这场斗争的全部过程。

[37] 河野密报道，松本在1937年选举后参加了社会大众党。见河野：《日本社会政党史》第143页。然而，特别高等警察却宣称，松本虽然是社会大众党国会议员团的一个成员，并且在1940年同卷入斋藤事件的那些党员一起被该议员团驱逐，但他从没有成为一名正式的党员。见内务省维持治安局出的机密杂志《特高月报》（1940年4月）第35页。

[38] 关于松本的谈话的报道，见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的书，第204~207页。

[39] 由于这些特殊情况，松本最初在占领当局清除1942年选举中受东条政府推荐的所有国会议员时并没有被清除，但是吉田首相却在1949年将他清除，按照推测，这应该是由于他在战前曾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然而，人们广泛相信，这实际上是由于他在战后进行了各种带左倾倾向的政治活动。见井上清和北原泰作：《部落的历史》（东京，理论社，1964年）第127~139页。

[40] 爱德华·W·瓦格纳的《日本的朝鲜族少数民，1904~1950年》（纽约，太平洋国家关系研究所，1951年）是一本论述该主题的内容广泛的书。非常有趣的是，佐野学和其他人最初也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来看，特殊部落民是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

[41] 瓦格纳：《日本的朝鲜族少数民，1904~1950年》，第20页。一些对无产阶级运动感兴趣而且政治态度较温和的朝鲜人确实曾尝试从

投票权中得到好处，但显然很少成功。协调会：《近期的社会运动》，第195页。

[42] 同上书，第195页、第233页。

[43] 有时拼写为朴烈(这两个字是按朝鲜字的顺序排列)，他的名字在日文中读作 Laizi Boku，他的化名是难波大助。他同一个日本人金子文子结婚。他因其行为，1924~1945年被监禁在日本，其后，他选择了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44] 旅日朝鲜知识分子的民族抱负怎样同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在下述各书中有生动的描述：山本胜之助：《日本惨遭毁灭：军事专政的创建及其毁灭过程》（东京，钟光书院，1949年）；扬希尔·坎：《草屋顶》（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1931年）；金桑和尼姆·韦尔斯：《阿里兰之歌》（纽约，约翰日出版社，1941年）。

[45] 例如，近藤荣藏在1921年春季因一些同安排创建日本共产党有关的事情而从日本去上海时，遇到一个由12位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小组，小组长朴金顺和其他大多数人都是懂日文并且很熟悉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朝鲜人。他们也懂俄语并了解苏联的局势。见近藤荣藏：《共产国际的密使：创建日本共产党秘闻》（东京，文化评论社，1949年），第128页。

[46]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共产党却在其出版的上溯至本世纪20年代的共产党活动记录中夸耀几个旅日朝鲜人高级党员，即金天海、朴恩哲和伊藤宪一。日本共产党领袖在朝鲜战争期间转入地下时，旅日朝鲜人也对他们有很多帮助。



# 结 论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特征





## 第15章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特征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特点与共性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构成  
意识形态的作用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从产生之日起，就是日本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既有日本的特征也有国外社会民主运动的共同性。对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找出影响日本社会民主运动发展的那些国内的和国际上的主要社会政治力量。

### 15.1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特点与共性

许多外国人听说日本战前也存在着社会民主运动都感到十分惊奇，他们立即倾向于把它视为一些西方的或“非日本”的运动的“模仿品”。但从其构成这个角度看，该运动完全是一个日本的运动。它的所有领袖和全部支持者都是日本人。虽然这初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现象，然而读者必须记住，例如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主要是由外国出生的人所组成。<sup>〔1〕</sup>在19世纪，美国的很多社会主义著作是用德文写的，这确实是导致禁止在美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之一。<sup>〔2〕</sup>甚至今天，

美国的左翼运动仍然受从欧洲移居美国不过一代或两代的那些人的传统的影响。相反，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领袖却不象许多美国社会主义者那样因带有外国口音的演说或属于其他国家的文化修养而受苦。

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虽然成员都是日本人，但其思想确实是从外国输入的。事实上，日本工人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90年，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的日本人在旧金山建立了工人义友会。当这些组织者回到日本并建立起第一个工会时，他们带来了在美国学到的外国思想以及建立组织的方法和经验。大约在同时期建立的那些社会主义研究团体似乎也是受新输入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和自由思想所鼓舞，他们研究和翻译的诸如拉萨尔、蒲鲁东、马克思以及其他人的著作，都是外国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创造新的词汇，以使外国的词汇和概念能被日本人所理解。

然而，除旧金山的那个存在时间很短的工人义友会外，日本工人运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在外国的土地上毫无进展。例如，它从没有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国社会民主运动或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那样，由一个严密的流亡国外的机构所领导。这也许是其后日本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运动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因为社会主义者在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后便很容易相信实现其目的的唯一希望是，进行革命推翻本国政府。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在很窄小的有限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运动，但这有限的一点自由已使社会主义者没有必要流亡国外或完全转入地下，并使社会主义者相信通过非暴力手段仍然有可能实现变革。

日本人在何种程度上把输入的思想变为己有，或那些新皈依的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性和论争性著作中真正体现了多少

西方的概念，这不是本书研究的主题。本书所注意的是，日本社会主义者无论受外国思想的多大影响，他们毕竟创立了一个目的在于着手改变日本社会的运动。

认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民主运动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并不要求我们必须指出它们在哪些具体行动上精确模仿了外国的模式。但它确实要求我们了解这些日本人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和其他国家人民类似的或同样的方式进行活动。这将使我们能够继而进一步分析日本社会民主运动在何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国家而具有自己的特色。这种方法将能纠正那种认为日本社会民主运动只是西方民主运动在日本的翻版的错误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性质，首先考察它的较一般的性质(一般社会民主运动都具有的性质)，其次再考察它所具有的(日本)独特性质，我们主要从它是一个阶级组成的群众性社会运动和它所运用的本质上是改良的策略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尽管参加的人数相对较少，但不可否认，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仍是一个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它试图利用群众压力来确保实现其目的。它组织群众进行示威和游行(诸如在“五·一”节)，为实现某种具体目标而举行群众大会，征集群众在请愿书上签名，鼓动群众在竞选中支持政党候选人。政党运动因得到工农群众组织领袖的支持并能使用其资金和设施而充满活力。事实上，每个无产政党能否建立都取决于这些群众组织的领袖是否保证给予支持。诸如政友会和民政党等日本既有大保守政党在这一意义上并不是群众运动的中心。保守党在选举中确实团结了大量支持者，其人数一般为支持无产政党人数的许多倍，它们在一些危机期间也确实鼓动群众进行示威，但却不是为了从下面

施加压力以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社会秩序。保守政党所号召的是，投票支持某些当政的或不当政的日本政客或政治家，这些政客或政治家基本上是主张维持现状，只是希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改变政策或从一些权力机关撵走他们的竞争者。

某些相类似的现代化条件使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也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运动一样具有群众性，这些条件是，工业化和与其相伴随的各种教育的普及，传播媒介的大众化和各种设施的集中化。产业工人阶级的出现以及他们为反对失业和在恶劣条件下工作，同时也为改善自己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是产生社会民主运动的绝对必需的条件，尽管这些条件并不必然产生社会民主政党。

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虽然似乎并不比其他亚洲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规模小，但同欧洲国家相比，其力量却弱得多，这是它在日本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一个特点。在本书探讨过的所有不利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日本大的农业村庄既是工人的来源地又是失业者的后方和庇护所。有很长一段时期，工人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是临时离家去做工的妇女，她们不很愿意参加好斗的工会组织。至于男工人，他们在没有工作和失去工资收入时，能够回到农村的故乡去生活一段时间，因而他们不象其他一些农业发展处在另外阶段的国家中的工人那样，感到工会事务对自己生死攸关。由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散布在农村，因而工人的工资一直很低，工会也很容易被破坏。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影响到许多方面：(1)工人队伍中很大一部分人不能经常保持住自己的工作，这使工人极力寻求永久地依附于一个企业；(2)工人和前工业化的农村联系紧密；(3)家长制。在大工厂中，家长制促使工人中形成一种准军事的等级制。在纺织厂中，家长制约束着女工们从早到晚的生活。在小作坊中，

由于受家长制影响，雇主与雇员之间以及师傅与学徒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家庭式的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形成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特色。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同一般的社会民主运动一样，也是一个阶级的运动。但是关于阶级运动的含义，世界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解释各不相同，而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又如此广泛，因此这里很难提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一个几乎普遍存在的事实是，同阶级概念有关的理论问题——诸如阶级斗争和阶级调和的问题，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问题，阶级的构成问题以及哪些阶级是天然同盟者等等问题——常常是社会民主运动中左翼同右翼发生争论的根源。尽管如此，本书的一个结论仍然是：日本社会民主运动是一个阶级的运动。构成其主要核心力量的是工人组织，农民的支持是其能够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它力图代表无财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就这些概念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利益。各国社会民主运动尽管构成各不相同（特别是在农民的参与方面），但它们一般都是同样意义上的一个阶级的运动，并且也同样由于在运动组成中应突出哪个阶级的问题上发生内部冲突而四分五裂。

将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中存在着的阶级基础的论争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同类论争进行比较分析，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些独特性质。就其最主要的意义而言，关于阶级基础的论争是指一个社会民主政党应成为一个阶级的党还是应成为一个民族的党。那些主张应成为一个阶级党的人，把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党视为无产阶级或持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立场的那些阶级的政治机关。他们相信国家的真实利益在于从资本主义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经济，他们论证，唯一有能力领导实现这种转变的阶级是现代产业工人阶级。因此，

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只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并使党员中以产业工人占大多数，它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目的。一般说，这就是世界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左翼的立场。<sup>[3]</sup>

同这种立场相对立，其他社会民主主义者则相信，党的阶级性并不重要，因为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将会给全民族带来共同的好处。因此他们主张，一个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党应强调其民族性，它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

右翼由于一般反对党突出其阶级性，因而对出身于任何阶级的领导者都表示欢迎，只要他们支持党的目标。这种倾向在英国、法国和瑞典的较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中居统治地位。<sup>[4]</sup>然而，主张党应强调其阶级性的左翼却在关于非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能否忠实维护党的阶级目的问题上发生分裂。

在国际范围内，这两种类型的左派都可以找到。例如，在1917年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是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而与其相对的右翼，其领导人则主要是工会运动中涌现的工人阶级分子。(中产阶级出身的)左翼领导人经常试图突出党的阶级性，但右翼(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则强调党的民族性。英国工党中的左翼和右翼似乎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工党的右翼主要依靠各类工人组织的支持，左翼则依靠党在全国的各地方支部的支持，而那些地方支部是由各种人组成，其中许多人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英国的左翼倾向于不信任非工人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他们还怀疑那些虽然出身于工人阶级但却因居于一定权力地位并享有一些特权从而可能成为工人贵族的领导人将不再能为工人的利益而战斗，他们认为拉姆齐·麦克唐纳在1931年就背叛了工人的利益。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前左翼领导人安奈林·贝文

曾特别警告不要使党的领导权落入那些不能真正“代表大众”和“为大众利益讲话”的“骗子”手中。<sup>[5]</sup>

在战前的日本，强调阶级性的无产政党领导人中既有劳动农民党(及其后继组织新劳动农民党)的亲共产党分子，也有虽属左翼但却反对共产党人的劳农派成员，还有中间派的日劳派(直到“满洲事变”后不久)的成员。尽管如此，但考察那些领导人的背景，可以看出，其中大多数人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且他们受到的大学教育使他们同普通工人大不相同，而这些普通工人是他们所领导的工会中的普通成员，也是他们在政治运动中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因而，他们不能够鼓吹只有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才能担任领导职务。

另一方面，右翼的社会民众派领导人事实上大多出身于工人阶级，他们则很少强调在其领导下的那些无产政党的阶级性。他们也为他们之中的那些老资格的中产阶级领导人的声望而感到自豪，但他们却不信任和他们同时代的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和出身于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总结战前日本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中对无产政党阶级基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左翼和右翼的构成情况，可以看出，那些坚持强调党的阶级性的左翼领导人并不进一步要求领导者必须出身于党所代表的那个阶级，这不只由于他们本身是来自一些相对较有特权的家庭——这使他们能够受到较高的教育，而且也由于其中一些完全出身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积极抵制不妥协的进行阶级斗争的原则。但是，社会民主运动的中间派和右翼由于并不强调其使命的阶级性，因而容易受到民族主义和支持本国向外扩张的号召的诱惑。

除了是一个由阶级构成的群众性社会运动外，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另一个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运动也具有的一般特点



是，它所运用的基本是一种改良的策略。它所追求的要根本改变社会秩序的长远目标只能通过缓慢的改良过程来实现。更具体地说，它主张以议会手段实现改革。它在这方面同苏联共产主义出现后的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相一致。

这种鼓吹改良手段和抵制非议会的方法必然使社会民主运动附带地具有抵制共产主义的性质。现代社会民主运动同共产主义运动有同样传统，要争取同一个阶级的支持，许多较次要的战术也相同，因而它只有通过同共产党人竞争才能够生存。可以在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右翼中找到一些极端反共的领导人，但由于社会民主运动是以内部的多样化而著称，因而也有一些左翼处于共产党人强烈影响下的例子（例如，战后一段时期内意大利南尼领导的社会党或日本战前实行“开门”政策后的劳动农民党）。由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右翼的力量一般远比左翼强大，因而反共一直是社会民主运动中的一个主导倾向。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也具有各国社会民主运动普遍具有的上述特点。日本政府如果象镇压共产党那样镇压社会民主运动，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作为一个改良运动，其存在的基础将大大削弱，它的大多数支持者无疑将转而拥护那些主张革命的领导人。政府虽然在通过《男子普选法》的同时也通过了一个应用范围十分广泛的镇压性质的法律，但是没有用它来对付社会民主运动，而是用来对付不断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该法律——反对任何人试图改变国体或拒不承认私有财产制——能够用来对付一切社会主义者。但是日本政府认为，社会民主运动的存在对政府有利，因为它能使一些不满团体不致变成为决不妥协的反政府分子。这是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首要作用，因为诸如国会权力十分有限及逐渐兴起的极权主义潮流等现实环境阻碍着日本社会民主运动在立法方面真正实现任何改革。日本社会民主

运动在共产主义运动消失后放弃了对社会民主的许多信念，本质上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

然而，在这方面必须提到，日本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本质上是拥护改良主义方式——总是拒绝采取暴力方法。在日本，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并没有发生诸如在德国发生过的那种有组织的暴力冲突。在德国，希特勒上台前，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共产党人曾在街头发生战斗。在日本，甚至那些自称信仰法西斯主义的人，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也比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要温和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找到，即当时德国和意大利的政府十分软弱，而日本政府无论同左翼还是同右翼群众运动相比，任何时候都总是十分强大。读者可以回顾一下，甚至1926年2月那次企图推翻政府的真正的军队暴动结果也只是一次悲惨的无效尝试。

日本社会民主主义者拒绝采取暴力——那种极端民族主义右派反对当权者和左派所广泛使用的暗杀这类最显著的暴力方法和较一般的人身袭击办法。日本遭暗杀的重要政治家的名单中还应加上大杉荣(无政府主义者)和山本宣治(亲共产党的劳动农民党国会议员)等左派政治家。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遭到右翼暴徒的袭击。虽然最经常遭袭击的是诸如大山等左翼领导人，<sup>[6]</sup>但诸如安部和吉野这样的右翼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也遭到袭击。除此之外，社会民主主义者还受到警察和宪兵的袭击与拷问。当然，工人在斗争中经常同警察和受雇佣的罢工破坏者发生冲突，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领袖，特别是右翼领袖，却在鼓吹非暴力方式(甚至消极抵抗)并试图把罢工减少到最低数目。

为了避免给人以日本社会民主主义者似乎是在同一般大众

对立的情况下坚持鼓吹非暴力方法的印象，必须指出，日本公众舆论是强烈反对暴力的，除非是更高的价值观念诸如爱国或忠君受到挑战。在日本，政治暗杀者常常很轻易地就自己投案，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以爱国动机为借口，就能够减轻所受到的任何惩罚。而对鼓吹通过议会手段来根本改变社会秩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却很少有减刑的可能。

## 15.2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构成

我们在评论社会民主运动的诸如群众性、阶级性和改良的本质等一般特点时，也指出了日本社会民主运动更具有特色的差异性。下面通过更详细地探讨从分析后援组织中得出的一些结论，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日本社会民主运动所具有的一些一般性质以及其独特之处。

概括说，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构成经历了4个阶段的变化：(1)从诞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它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2)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6年无产政党成立，它突然发展成为一个有工农组织参加的群众运动，其领导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同其追随者紧密合作以建立工会和农会，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社会民主运动必须从工会和农会的普通会员中选拔出自己的一些领导人；(3)从无产政党建立到30年代初期“满洲事变”发生，社会民主运动的构成迅速变化，无产政党居于工会和农会之上，社会民主运动开始以新的无产政党为中心时，它必须在城市中心争取大部分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学生、专业人员、所有领取薪金的雇员、小零售商和手工业者等各种较大的团体。这一时期，担任领导的人也扩大到包括出身于工农运动的政治领袖、大学的学者和新闻、法律界

人士；(4)从30年代初期到40年代，社会民主运动不断扩大并在1936年国会议员选举中赢得大量选票。特别是在1937年国会议员选举中，社会大众党所得选票超过100万张。这一时期，后援组织支持的重要性比以前相对降低。主要的农会受党的影响比以前小。社会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也比以前减少参与工人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他们更专心于进行政治活动。领导人同其追随者之间的裂痕扩大了。领导人最后大部分加入了政府发起创建的组织，而一般成员也被迫全部加入其中。

虽然最简单概括的这4个阶段——其重心分别是(1)知识分子；(2)工会；(3)会员和选民；(4)后援组织外的更为广泛的选民——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阶段有些类似，但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工会的支持比较软弱。在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是建立在已存在几十年并富有经验的工会运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日本无产政党却是在工会首次成为群众性组织后不久就诞生了。显然，日本工会发展较迅速，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在较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但因而也就较不稳固。例如，日本的年轻的工会运动，并不能象英国的工会为工党所做的那样，向无产政党提供稳定的大量的一般成员和领导人员以及财政支持。在日本，社会民众派尽管一直控制着总同盟，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形成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工会基础。

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中一个不同的因素是佃农。在西方国家中，社会民主运动得到农民的强大支持，例如，在加拿大，农民受到了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他们自己拥有土地，他们支持社会主义是由于他们反对垄断和控制农产品与农机生产必需品的运输和市场。<sup>(7)</sup>然而在日本，租佃土地的问题——我们对此已作过一些分析——给日本社会民主运动增加了一个在其他工业化社会中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所不常见到的复杂因素。

在日本，社会民主运动必须争取农民的支持，因为没有农村选民投票支持，要想在议会中成为多数党的希望显然不可能实现。佃农人数众多并因处境所迫时时进行暴动，对社会民主运动来说，这是一支潜在的有战斗力的支持力量，从1918年大规模的“米骚动”中可以看出佃农的力量。日本农民协会从最初起就积极参与建立“工农”无产政党。佃农和贫穷的自耕农被认为是广大无财产者或无产者中的一部分，因此，党当时称为“无产”政党，“无产”与其说是指“工人”，不如说是指“无财产者”。<sup>[8]</sup>

然而，这种农民后援组织的支持在本质上甚至比工人对无产政党的支持还不稳定。农民组织倾向于支持好战的激进派，例如，1928年农民支持了亲共产党的劳动农民党，或者倾向于极端保守主义并带有一些反对工人的性质，例如，平野领导的农民支持组织以及其早期曾打算建立的纯粹的农民政党就是这样。在日本，由于急需进行的土地改革长期拖延——同当时中国的形势有些类似——因而当时的农民组织“情绪激烈，不服从无产政党指挥”。象社会民众派这样坚决只承认“温和派”组织为自己后援力量的社会民主运动的右翼很难使农民组织按其所希望的那样行动。绝大多数农民仍旧拒绝接受社会民主运动或是敌视它。这虽然能够主要归因于贵族地主积极努力排除“不稳定”因素，但它也反映了农民对工业化的抵制，而这似乎是造成农民本身不幸的一个根本原因。

少数受歧视阶层的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情况也大不相同。然而，很奇怪的是，在这方面，各国社会民主政党所具有的突出特点显然普遍相同。全世界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都支持维护少数受歧视者的利益，特别是左翼分子最为积极。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人在法庭上为犹太人辩护，尽

管犹太人在德国主要是属于中产阶级。遭受歧视的最主要是那些经济或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的阶层。印度就是这样。在印度，社会党总有一个进一步解放不可接触者的经济纲领。南非联邦也是这样，工党为有色人种、印第安人和黑人(或班图人)的权利而战斗，虽然黑人在数量上很难被认为是少数。在比利时和荷兰，教育少数受歧视者的问题，对社会党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但是就人数而言，受歧视者团体的潜力不大，他们的作用似乎并不重要。例如，瑞典和澳大利亚就是这种情况。瑞典的拉普人对瑞典社会民主党和澳大利亚的丛林居民对澳大利亚工党的影响微乎其微。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明显具有上述所有那些一般特点。仍旧居住在未开垦的日本北部，人数日益减少的阿伊努土著“原始”居民，一直处于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之外。在日朝鲜人也对自己在日本帝国中的未来感到失望。日本政府没有努力去促使在日朝鲜人对实现机会平等抱有希望，因此，在日朝鲜人感到没有理由要去支持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另一方面，以前被称为“贱民”的特殊部落民确实组成了一支重要和持久的支持社会民主运动的力量，特别是特殊部落民的水平社吸引它的共产党和亲共产党团体首次遭镇压后更是如此。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同样既显示出各国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所具有的一般特点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如果是从整体而不是从各派系集团来看，可以认为，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领袖是由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这同社会民主运动的一般情况相一致。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比例各国不同。另外，在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中(就象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情况那样)，也没有完全以农民为背景的杰出领导人。

佃农最初是在工人领袖的鼓励和引导下才形成一个有组织的运动。这再次显示出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同工业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对该问题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可能会揭示出，一个国家工业化越迅速，它的社会民主运动越依赖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如果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缓慢，那么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似乎足以使知识分子和工人间的差别较不明显。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看到，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工人阶级领袖(这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在他们上升为领导人时要求具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那些领导人所具有的大量知识和技能。事实上，一些工会为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未来领导人特别在1921年建立了大阪工人学校。<sup>[9]</sup> 当社会民主领袖当选为国会议员时，那些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和没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在态度、工作、演讲能力和一般知识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情况在欧洲国家中似乎非常普遍，然而英国可能是例外，在英国，阶级的差别在讲话和音调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很难克服。

假如从“政治上的同代人”这个角度分析日本社会民主领袖，他们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领袖的不同之处就会又十分明显的显露出来。如果政治上的同代人是“由‘年龄相差不大并具有同类政治经验的人’<sup>[10]</sup>组成，那么，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领袖就可以从政治上分为两代人：(1)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参加社会民主运动的那些人；(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5年内才参加社会民主运动的那些人。<sup>[11]</sup> 本书中，称第一种人为“老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都共同具有以下一些经历：最早把外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介绍进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进行过反战宣传；许多人因其“煽动”或“制造混乱”的著作而被判刑并被短期监禁；大多数人都经历了1911年幸德审判后的被迫“冬眠”时期。然而，具有同样经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采

取同样的行动。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有些人后来成为共产党人，有些人是社会民众派，甚至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但大多数人最后都加入了劳农派。他们虽然互相论争，但从他们所有人都曾帮助介绍外国社会主义思想并一起促进它在日本的传播这种意义上说，这些人所使用的概念基本相同。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经历了同样的“事件”，并一起研究了日本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他们都能够宣称自己是继承了早在1901年成立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同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传统相比，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传统较弱，历史也较短。

然而，这个微弱的传统被年轻一代——他们主要由1918~1923年期间毕业的大学生组成——所继承。那些年轻人最初是从国外一些事件中得到鼓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发生的革命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发生了兴趣，其后他们发现在自己的国家中也存在着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同时，他们看到工人运动在零乱地发展，感到他们能够通过实施领导和进行组织来促进运动的发展。他们年轻，又缺乏经验，但他们感到他们通过书本很容易学习到其他国家的经验使他们能够在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麻生久、河野、加藤和大多数后来成为日劳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加入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过程。

俄国革命象是催化剂，它促使年老的和年轻的这两代政治修养不同的社会民主领袖团结起来。他们被俄国革命的报道所激动，要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由于日本已有的社会主义书籍都是“老社会民主主义者”写作或翻译的，年轻人因读社会主义书籍而得知这些人并私下拜访了他们。现在，年轻人受到那些老活动家的影响，从专心于理论转向实际参加工农运动。俄国



革命是日本1921~1924年出现“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原因，它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当然，也是由于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才在1922年7月成立了日本共产党。老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些属于第二代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共产党。

日本许多较晚参加社会民主运动的领袖参加创建了早期的日本共产党，这个事实显示出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道路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在其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共产党通常是由已存在的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所建立，它一般是一个很小的分裂运动。但在日本，那些参加创建早期共产党的却是诸如堺、荒畑、山川这样最著名的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和诸如赤松，猪俣也许还有浅沼这样最有希望的年轻人。然而，在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后，参加了共产党的老社会主义者又逐渐退出并转而攻击共产党。其后，共产党主要从那些新参加社会民主运动的人们中吸收成员。这后一种倾向似乎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趋势较为接近，因为其他国家中的许多前共产党领袖最后也成为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政治领袖其成员主要是以新人会、建设者同盟和其他学生团体为中心的学生运动骨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一直没有出现接替他们的另一代政治领袖。1926—1927年各派系集团固定形成后，没有新鲜血液涌入领导层，因为重要位置大都被占满，而运动又没有充分扩展，不需要设立很多新的领导岗位。在运动发展不大的情况下，只能选拔很少一些新人担任领导，而这似乎也必须同继续折磨着社会民主运动的宗派主义进行大量斗争。

很难把宗派主义视为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一种特点，这一方面由于宗派主义是全世界左派运动的一种特殊标志，另一方面也由于在日本从极右翼到极左翼的一切政治活动中都存在着

宗派主义。<sup>[12]</sup> 随便选择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从其政党发展变化说明图中都可以看出，左翼政党最为分裂。在为显示社会民主政党内部分系而画的这类图表中，分裂的情况甚至更为明显。

在这方面，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也不例外。如果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则可以清楚看出，在特定时期成立的各国的社会民主政党中，日本的政党分裂最为严重。考虑到分裂的程度，可以肯定地说，由于一般左翼运动都共有的宗派主义倾向是在日本社会已存在的分裂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宗派斗争最为激烈。

日本既存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党中也明显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宗派主义。例如，警察多次为防止政友会两派在东京党总部各层楼上相互用暴力进行封锁而不得不出面干涉。<sup>[13]</sup> 宗派主义渗透进军队、官僚阶层、贵族和政党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事实上，战前一位日本问题分析家曾断言，“每个‘集团’都形成一个自己的宗派，以致任何单一运动都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控制日本的事务”。<sup>[14]</sup>

人们经常注意到，皇道这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国家内部冲突的逆向表现。只有最突出地强调团结才能够克服在战争时期削弱国家力量的内部分裂。同样，在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也经常听到号召团结。任何人阅读有关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书籍都会对其热烈号召“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留下深刻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是，由于每个“集团”都提出一些“条件”，这种团结只有通过民族主义的兴起才能实现，这就要剥夺全体工人的独立性和使社会民主运动丧失社会民主的性质。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解体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它在能为实现其目标而进行有效战斗的时期，没有能力团结自身的力量。

折磨着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宗派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宗派集团具有非常强的继承性和聚合力。尽管有人加入，也有人退出，但社会民众派和日劳派的核心从1926年直至战后时期一直完整保持着。正是由于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裂似乎远比一般国家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裂更为严重，其宗派内部人员维持不变的能力似乎也同样明显地大于其他国家。这又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独特性质所造成的。在日本，宗派是由领袖及其追随者或先生和学生构成。麻生久被公开称为是日劳派的“领袖”，而安部则被称为是社会民众派的“先生”。然而，由于在日本这种关系并不要求“领袖”或“先生”象德国的“元首”那样具有超人的魅力，因而即使在那两人死后，他们的派系仍继续存在。派别成员靠对集团的忠诚精神抱在一起，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日本近期的封建主义。派系的成员很尊重“个人”同本派的“关系”，这意味着成员个人为了集团的共同利益能够经常克制自己的不同看法。<sup>[15]</sup>

令人惊奇的是，日本社会民主领袖尽管在理论上赞成民主，但在组织方面却常常表现出非常缺乏民主。显然，这部分是由于忠诚于集团的封建因素在起作用，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他们赖以获得权力的那类后援组织所造成的。

许多右翼社会民主领袖，特别是社会民众派工人领袖，其管辖下包括了有组织女工的最大部分。那些顺从的女工一般是在大纺织厂中被组织起来，但这样建立起来的工会，成了女工和雇主间进行交涉的唯一媒介，而且不是民主管理的。在别的情况下，工会领袖是受工厂老板雇佣来作管理职工的人。工会头目能够从工厂解雇任何抵制工会政策的工人。总同盟中工头式控制最严重，民主最少，就象它在驱逐各种敢于对抗中央委员会命令的工会时所表现出的那样。因而，例如在社会民众党

中，权威人士领导人能够大谈民主的价值，以反对专政，而诸如西尾、松冈和土井等一些工人阶级领袖却常常以不民主和专政的方式控制总同盟以维持他们的地位。

### 15.3 意识形态的作用

前面的探讨显示出社会民主运动对民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所起的一些重要作用。在理论上，我们有理由期望，社会民主运动将能够对日本民主的发展起最强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社会民主运动的社会基础的构成是民主在战前日本能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早期自由运动最终没有能使民主在日本获得胜利，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较现代的日本中产阶级分子十分软弱，即城市工商业者只占很小比例，而反对土地改革的地主占绝大多数。其后，当工商业者人数增多时，他们从租佃制度中间接地得到好处，因此，他们在对那些要求议会真正掌握权力并使之对进一步改革和得到更多自由的选民负责的斗争中，行动软弱无力。

在这种形势下，诸如安部和吉野等对西方民主有深刻印象的日本知识分子，试图依靠那些没有财产的无产大众，而不是生活较舒适的中产阶级，在日本为实现民主而进行斗争。然而，佃农问题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城市工人阶级为建立组织和有效活动而进行的努力遇到严重障碍。这样，民主运动的发展甚至在极端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就已经受到限制。

在实行男子普选法和建立无产政党的那个时期，日本的议会制度似乎正在变得日益民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10年，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预示日本有可能出现政党责任制政府(即政党控制的内阁)，就象前一个世纪中的英国那样。在这样一

种背景下，日本新出现的无产政党象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甚至共产党那样，代表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政党代表过的那些社会阶层，它要求改革，维护少数受歧视者的权利，为实现民主化的政党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如此，恰恰在无产政党议员出现在国会中的那个时期，日本政治结构中的一个危机已经在深化。似乎是在按“一般情况”发展的议会主义同军方所拥护的皇道这种古老的正统意识形态发生冲突。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日本日益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发展也更为迅速。

新当选的社会民主主义议员必须决定如何对待作为日本政治中一种新兴力量的军方。他们是维护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支持军方？官僚是朋友，还是敌人？当然，问题不是这样明白和清楚，而社会民主人士也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但日劳派却明显地转为支持军方，越来越反对各资产阶级政党，他们论证，在日本，军队是真正的改革力量。日劳派最终决定社会大众党应在政党自行解散中起带头作用，以便为建立极权主义战时体制让路。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虽然在促进民主的发展方面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它却是阻止共产主义发展的一支力量。日本共产党成立后，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社会民主运动事实上成为一支主要是反对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成立前，社会主义运动中各派的目标各不相同，杂乱无章。在目标明确、注重行动并同国际组织保持联系的共产党出现后，社会主义运动中其他各派逐渐变得更加自觉明确地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甚至那些曾帮助建立了共产党的老社会主义者也在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退出了共产党，极力阻止它发展，从而促

使它很早就解散了(尽管不是永久地解散), 年轻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同共产党分裂。老一代中一个例外的人是河上博士。

社会民主运动逐渐不再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而转为强调社会主义, 这可能对加速政府控制日本经济这种趋势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社会民众派曾就是否支持军队1931年侵略“满洲”的问题论证, 如果它能形成对“满洲”经济的“社会主义控制”, 在那里排除财阀的统治, 那么就应该支持军队。随着这个开端, 日本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在对军队的态度上仍有矛盾, 但就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 从整体上看, 逐渐变得越来越同军队要求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和规划相一致, 这种趋势最终导致在1937年(部分是受苏联榜样的鼓舞)建立了规划局。1937年底,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已经非常近似。

日本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或“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从下层发展起来的。尽管最早一些知识分子小团体曾拥护国家社会主义, 但是, 只是在1932年那些控制着工人支持组织的社会民主分子转而信奉法西斯主义后, 法西斯运动才首次赢得群众的支持, 就象较早时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运动中所见到的那样。然而, 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软弱使它们不能够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提供大量的追随者。

但是, 所谓的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却又不象意大利或德国那种方式从下层发展起来。日本不象欧洲, 从群众性的反抗运动中不能够产生出政权。在欧洲, 个人主义已经使整个社会分裂, 许多人希望“逃避自由”。而日本政府倡导的群众运动则使日本走向重新一体化掀起了新的潮流。日本虽然现代化进程十分顺利, 但其社会是分割的, 尽管还不是已破碎的。由于日本社会中集团和派系林立, 必须使它们团结起来, 才能进行现

代战争。但是这种团结却主要是从上面靠军方占据关键位置，通过统制和平衡统治阶级各种势力来实现的。全国民众团结在世袭天皇的旗帜下，中央政府的控制通过各级官僚机构扩展到基层居民区和各种组织中。

在德国和意大利，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部分，是从采取民主方法转为采取国家主义方法去完成“社会主义”的。法西斯运动得到成功，因为官僚分子、巨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和军方，面对要求变革的压力及行动感到恐惧，支持了从社会主义运动中大规模分裂出来的这个似乎能够建立起秩序而又不必根本变革国家经济结构的派别，即法西斯主义运动。

然而同意大利和德国相比，日本的政府、大企业家和军方却从没有在左翼运动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这不仅由于他们拥有警察手段，而且也由于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因素阻碍左翼运动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军方确实帮助过日本的法西斯力量，但那只是为了有限的目的而利用它们，最后还是对之实行镇压。指出下面事实是十分有趣的，即在1942年由东条内阁操纵的大选中，许多法西斯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带有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在选举中并没有得到政府推荐。日本的激进右翼为实现其目标依靠的是军队中的一些基层连队和由进行恐怖活动的狂热分子组成的小团体，而不是依靠工人和其他组织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大规模群众行动。由于日本的“军事法西斯主义”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因而它从没有象意大利和德国那样，成为一种极权的或“现代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战前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受到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限制，但它所作的尝试和遭受的磨难却形成了在日本战败后更为自由的环境下重新出现的社会民主运动的特征，这些特征仍然可以从远为成熟的，虽然仍是遭受挫折的当前是反对

党的社会主义者中找到。

## 注 释

[1]“那些隶属于它的讲外语的集团形成美国社会党中最可靠和人数方面最为稳定的部分之一。”见唐纳德·德鲁·埃格伯特和斯托·珀森斯：《社会主义和美国人的生活》(共2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1卷，第554页。

[2]例如，见W·F·坎曼：《美国人的德文著作中的社会主义》(费城，1917年)和美国政府战略服务局编的《美国的外籍集团》(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

[3]关于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该问题，见山川均《工人阶级的政党》(东京，工人文化社，1949年)以及他的《取消阶级斗争》(东京，改造社，1949年)。

[4]这种倾向体现在下述著作中：G·D·H·科尔：《1914年以来的工人党历史》(伦敦，劳特莱杰和基根·保罗公司，1948年)；弗兰科斯·戈古尔：《第三共和国的党派政治》(巴黎，初级读物出版社，1948年)；赫伯特·廷斯坦：《瑞典社会民主思想的发展》(共2卷，斯德哥尔摩，蒂登斯·福尔拉哥公司，1941年)。

[5]安奈林·贝文：《在恐怖的地方》(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52年)，第15页。

[6]教科书中提到大杉和山本遭到暗杀。这里可以指出两个企图暗杀大山的例子：(1)在大杉遭杀害的1923年东京大地震后，大山被那些计划杀害他的军官们拘捕，但由于邻居和新闻记者们引起一场骚乱，他们放弃了该企图——见日本近代史研究会编《近代日本人物政治史》(共2卷，东京，东洋刑政出版社，1956年)，第2卷，第107~108页；(2)大山逃往



美国时，一个想要刺杀他的青年和他上了同一条船，但在旅途中，被大山的为人深深感动，自己坦白了——见北泽等著《大山郁夫传》，第252～253页。

[7]例如，见利普塞特关于萨克其万的农民支持加拿大共和国联邦的书《农民的社会主义》（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0年）。

[8]战后，在日本已逐渐不用“无产”一词修饰左翼政党，而是改用“革新”这个词。“革新”可以译作“更新”、“改革”或“社会主义”。

[9]关于该校创建及其活动的情况，见大阪工人学校10年史编辑委员会编《大阪工人学校10年史：1921～1931年》（大阪，大阪工人学校出版部，1931年）。从其个人经历了解教育对工人领袖有何等重要意义的西尾未广是该校最热情的初始倡议者之一。同上书，第8页。贺川在财政资助和从大原研究所聘请教师方面帮助了该校。（战后，在日本，几乎不再需要这种工人学校，因为参加工会运动的很多人很快就能够自由地在一般公立学校中学习。）

[10]希伯勒：《社会运动》，第119～120页。

[11]笔者在《关于日本社会主义领袖的问题》，《太平洋事务》第28卷，1955年6月，一文中初次公布了关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同代人”的见解。该文被译成日文，以《关于日本社会党领袖的诸问题》为题，刊于《美国史料》第1卷（1955年11月），第1～10页。

[12]派系活动是右翼和左翼，而且事实上也是整个日本社会的特点，这是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升味准之辅合著的《当代日本的政党和政治》（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一书中的结论之一，第57～59页、第99～100页以及第149页。关于进一步的推论，见笔者和河上民雄合写《派系活动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太平洋事务》第38卷（1965年冬季～1966年）。

[13]例如，查尔斯·B·法斯在其《日本的政府：最近它在职权范围和活动方面的发展趋势》（纽约，太平洋国家关系研究所，1940年）一书第

80页的注释中就提到这点。

[14]该观察家是罗伯特·卡尔·赖肖尔，引自他的《日本，政府—政治》(纽约，索斯·纳尔逊和桑思公司，1939年)，第191页。

[15]在采访日劳派的河野密时，他向笔者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 跋\*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日本近现代史中的地位，时至今日很难说已有足够的评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理解“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时，一直是在狭隘的意义上把它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或者把它同改良主义政党及右派工会等同起来。事实并非如此。在促进近代化的政治过程中，民主主义同社会化是处于同一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它的目标，它所追求的是今天的民主主义的现实。

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在1901年的宣言中明确地表明了“以社会主义为经”，以“民主主义为纬”的立场，后来产生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以这一宣言为据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宣言成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出发点。

陶慕廉教授的《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是由于他既从同欧洲有着广泛联系的横的角度，同时，又从作为构成日本近代史的一种社会潮流的纵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民主主义。另外，他还著有《战后日本社会党》。作者在这两部著作中都指出，当前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潮流，这种潮流正在成为日本近现代史的基础和主流。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并不是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改良主义运动上，也不是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革新派组织所开展的

---

\*：本文原为日文，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李玉同志翻译。

部分运动上。

日本的保守势力纪念了明治维新100周年和内阁制度建立100周年。不久，他们一定还要纪念议会制度创立100周年。确实，在东亚唯一确立了议会制度的日本是值得自豪的。可是，给予这个议会制度以政党政治实体，并一直起着积极作用的是2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社会民主主义各政党。

事实上，帝国议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然定期开会，在战时体制下的帝国议会中，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议员的活动也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47年，依据旧宪法和帝国议会建立的政治体制仍继续存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派开展的各种运动获得成功，它已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自主地制定新宪法和确立了政治体制即战后民主主义体制。正因为如此，新宪法体制下的首届内阁则是以社会党为首组成的内阁。

社会民主主义势力一直是战后民主主义体制和新宪法的支撑者。而保守势力则一直主张对战后民主主义体制进行总清算和修改新宪法。解开战后民主主义体制中长期由保守势力单独执政之谜的关键之一，或是保守势力采用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或是以福利国家作为施改的基本方针。然而，这些政策本来是战后民主主义的社会化政策，内容上看，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日本的保守势力在这点上则有很大的矛盾。

资本主义各国由各自的政府维护其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其经验是，日本在政府中保持30%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而在西欧则有70%。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的潮流正在成为现代史的主流。这说明在稳定的保守政权下的日本，社会民主主义的潮流作为执行政策的基础则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前面提到的对社会民主主义的

偏见在日本仍然顽固存在，这种偏见正是对战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特别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研究迟迟未能展开的原因所在。

陶慕廉教授的《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出版后，日本的研究者也陆续撰写了一些著作。如《无产政党的研究》(增岛宏编,1969年,法政大学出版社)和《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高桥彦博著,1977年,法政大学出版社)。可是,这些著作,或者以分析中间派为主,或是对个别问题进行研究,还不是全面阐述战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活动的著作。对日本近现代史有兴趣者,进而对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重要性有兴趣者,其研究工作首先应从阅读陶慕廉教授的《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一书开始。

日本法政大学社会学部教授

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高桥 彦博



# 附录

图1 日本社会民主政党的变化

图2 日本工会的变化

图3 日本农会的变化

各无产政党代表大会的日期

各次国会议员选举中的各无产政

党候选人及当选者

日本人名译名对照表

(汉字——罗马拼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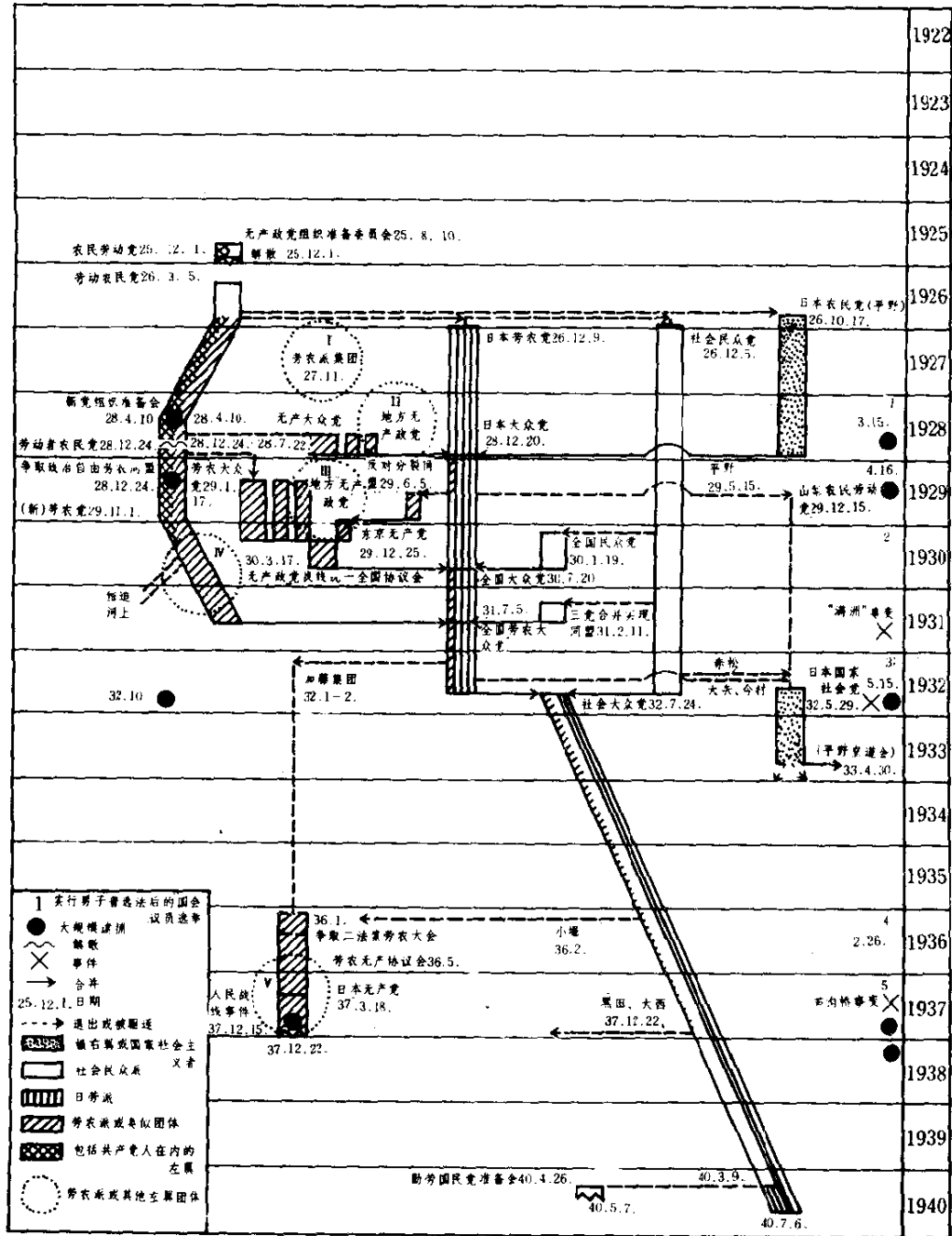


## 图表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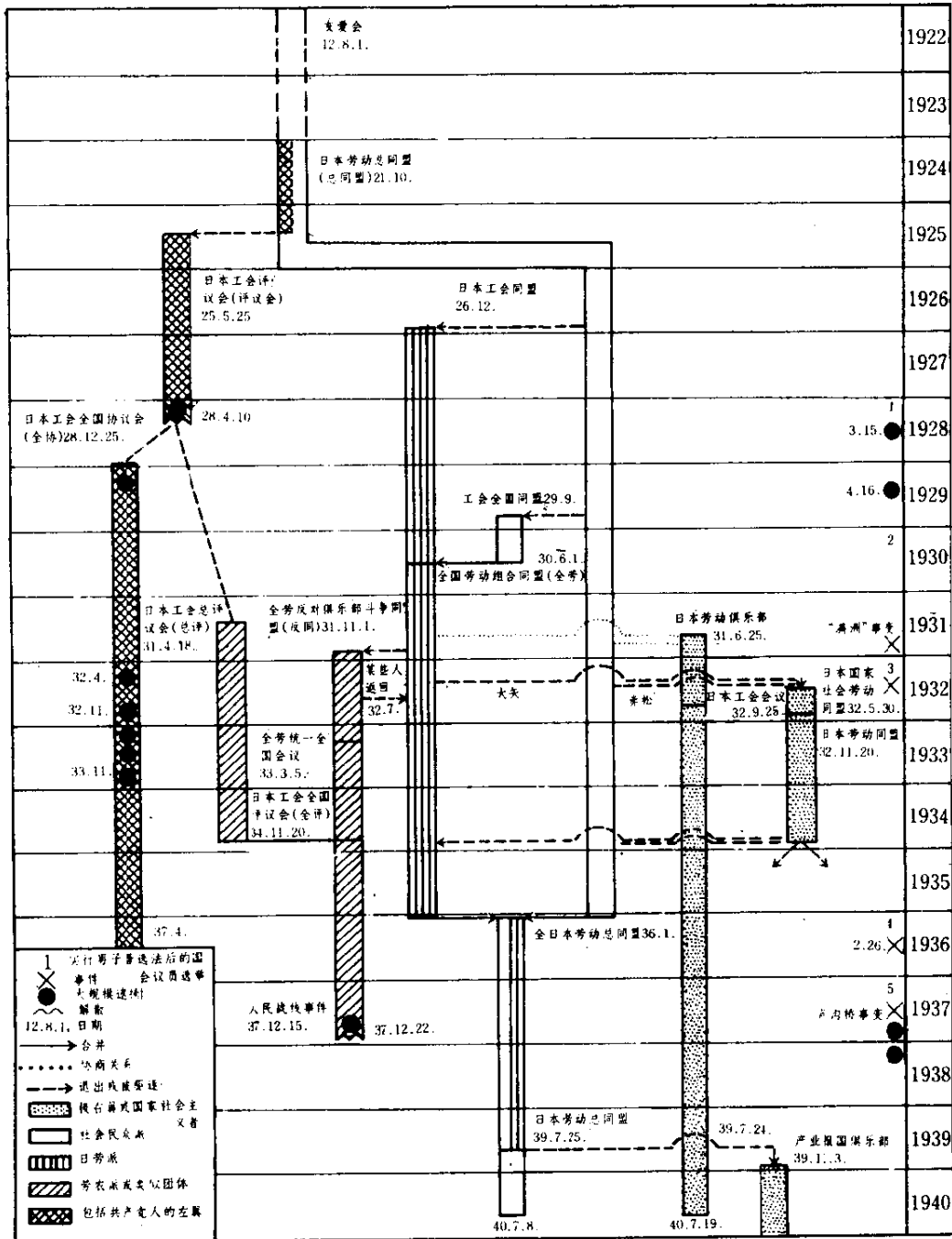
笔者试图以这些图表给读者一个精确的年表，同时以图解的方式描绘出贯穿于各种组织变化中的领导集团或派系的连续性。在下述著作中，笔者从研究前5本著作中的图表得到启发，继而同第6本著作中的年表进行了核对。

1. 青木惠一郎：《日本农民运动史》，东京，民主评论社，1947年。
2. 红泉义长：《政治50年史》，东京，时事图书社，1951年。
3. 社会经济劳动研究所：《现代日本工人运动史》，新潟，白林社，1947年。
4. 铃木茂三郎：《爱与斗争》，劳动文化社，1949年。
5. 梁田光龟：《日本社会党》，东京，法文社，1956年。
6. 渡边义道和盐田庄兵卫：《日本社会运动史年表》，国民文库，第434卷，东京，大月书店，195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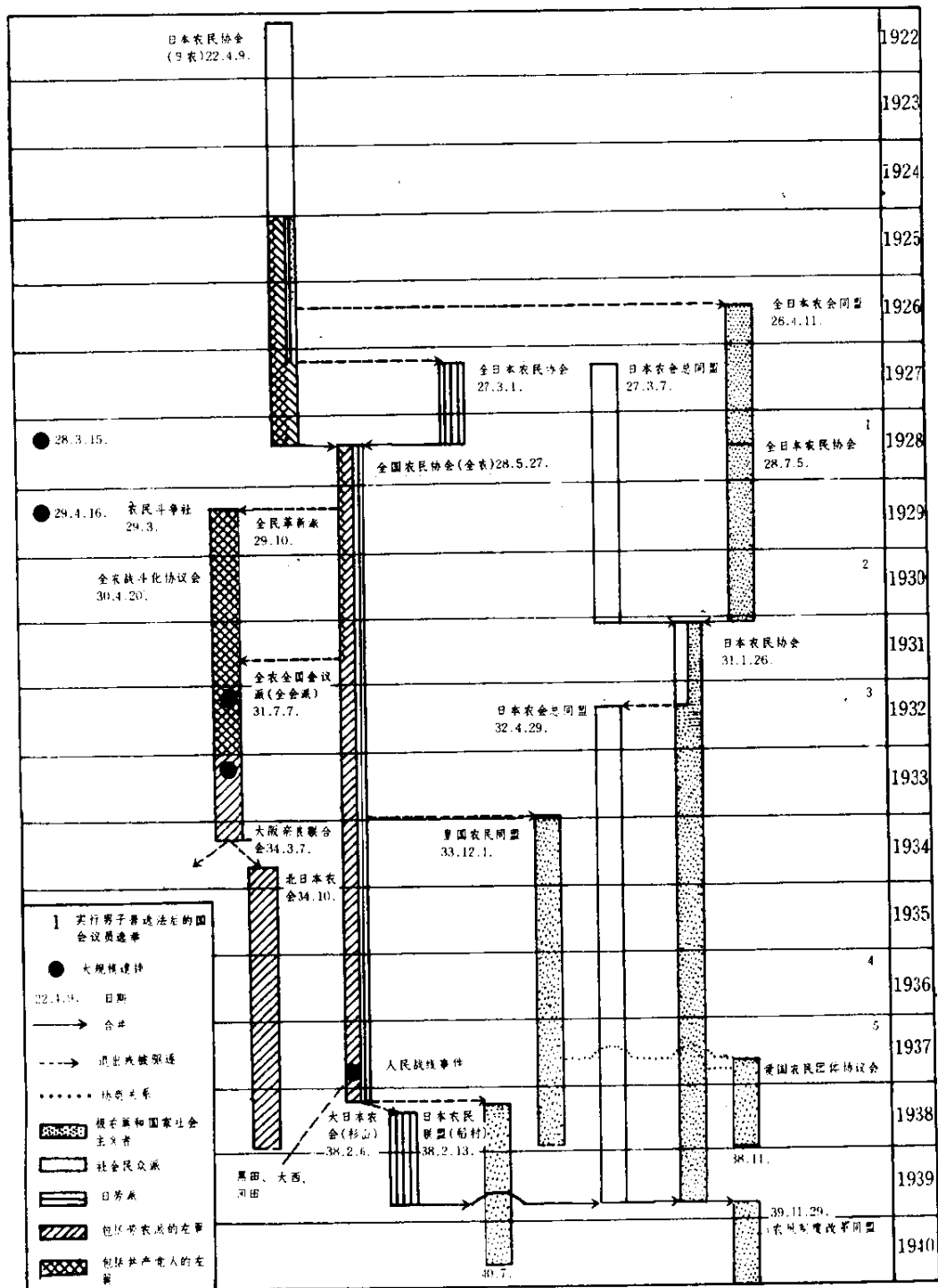
# 图1 日本社会民主政党的变化



### 图2 日本工会的变化



### 图3 日本农会的变化



## 各无产政党代表大会的日期\*

党的名称	代表大会 (解散)	日期
无产政党组织准备会	成立	1925年8月10日
	(解散)	(1925年12月1日)
农民劳动党	成立	1925年12月1日
	(解散)	(1925年12月1日)
劳动农民党	成立	1926年3月5日
	第1次	1926年12月12~13日
	第2次	1927年12月10~12日
	(解散)	(1928年4月10日)
日本农民党	成立	1926年10月17日
	第2次	1927年12月1日
	(解散)	(1928年12月20日)
社会民众党	成立	1926年12月5日
	第2次	1927年12月4~5日
	第3次	1928年12月9~11日
	第4次	1929年12月8~10日
	第5次	1930年12月7~9日
	第6次 (解散)	1931年1月19~20日 (1932年7月24日)
日本劳农党	成立	1926年12月9日
	第2次	1927年11月27~29日
	(解散)	(1928年12月20日)

\*：不包括非法的共产党和大多数国家社会主义政党。

新党组织准备会	成立 (解散)	1928年4月10日 (1928年12月22日)
无产大众党	成立 (解散)	1928年7月22日 (1928年12月20日)
日本大众党	成立 第2次 (解散)	1928年12月20日 1929年12月15~16日 (1930年7月20日)
劳动者农民党	成立 (解散)	1928年12月22~24日 (1928年12月24日)
争取政治自由劳农同盟	成立 (改名为劳农同盟) (解散)	1928年12月28日 (1929年8月16日) (1929年11月1日)
劳农大众党	成立 (解散)	1929年1月17日 (1930年3月17日)
(新)劳农党或劳动农民党	成立 第2次 (解散)	1929年11月1~2日 1930年12月19~21日 (1931年7月5日)
山梨农民劳动党	成立 第1次 (解散)	1929年12月12日 1930年3月17日 (?)
东京无产党	成立 (解散)	1929年12月25日 (1930年7月20日)
全国民众党	成立 第1次 (解散)	1930年1月15日 1930年1月18~19日 (1930年7月20日)

无产政党战线统一 全国协议会	成立 (解散)	1930年3月17日 (1930年7月20日)
全国大众党	成立 第2次 (解散)	1930年7月20日 1930年12月1~3日 (1931年7月5日)
全国劳农大众党	成立 第2次 (解散)	1931年7月5日 1931年12月5~7日 (1932年7月24日)
日本国家社会党	成立 第2次 (解散)	1932年5月29日 1933年1月22日 (1933年12月)
社会大众党	成立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第5次 第6次 第7次 第8次 (解散)	1932年7月24日 1933年12月8~10日 1935年1月20~22日 1936年1月18日 1936年12月20~22日 1937年11月15日 1938年11月20~21日 1939年12月9~10日 (1940年7月6日)
劳农无产协议会	成立 第1次 (决定改变名称)	1936年5月4日 1937年2月21日 (1937年3月18日)
日本无产党	成立 (解散)	1937年3月18日 (1937年12月22日)
勤劳国民党准备会	成立 (解散)	1940年4月26日 (1940年5月7日)

## 各次国会议员选举中的各无产政党候选人及当选者

各次帝国国会议员选举中各无产政党的候选人，按年代、隶属和选区排列，并标出了那些当选者以及有关的其他一些情况。

注：用星号\*标出了那些当选者。如果一个县分为几个选区，选区的序数则标在县名称后面。所使用的资料是：《日本劳动年鉴》和《劳动年鉴》，以及中正雄著《先驱者的系谱：社会党前史》（别处充分引用过）；关于1942年选举：《朝日新闻》（1942年5月3日）。由于这些资料有时相互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则在进一步仔细核查后，选取那些最可靠的材料。对少数一些人，标出了他的化名。有些人的化名比他的原名更广为人知。所有那些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的名字，都同众议院编《议会制度70年史：众议员人名鉴》（东京，大藏省印刷局，1962年）核对过。除1942年选举外，没有列出国家社会主义者。



## 1928年国会议员选举

<b>劳动农民党</b> (40位候选人; 2人当选) 秋和松五郎 天辰正守 荒冈庄太郎 近内金光 藤森成吉 古屋贞雄 布施辰治 畠山松治郎 井口政雄 井上乙吉 石渡春雄 泉国三郎 上村进 唐泽清八 加藤贯一 河合秀夫 木田茂晴 清原一隆 小岩井净 松本治一郎 松尾荣一 三木静次郎	<b>选区</b>		南喜一	东京	6	
			*水谷长三郎	京都	1	
			村上吉藏	鸟取		
		东京	5	中泽辨次郎	冈山	2
		鹿儿岛	2	野田律太	大阪	1
		北海道	2	大桥治房	大阪	4
		兵庫	2	大山郁夫	香川	2
		长野	3	泽田松太郎	秋田	2
		山梨		重松爱三郎	福冈	3
		新潟	2	神道宽次	神奈川	1
		秋田	1	杉浦启一	静冈	1
		冲绳岛		竹尾式	千叶	2
		新潟	1	田村仙之助	福井	
		青森	2	德田球一	福冈	4
		岩手	1	山本龟次郎	鹿儿岛	3
		香川	1	山本悬藏	北海道	1
		东京	4	*山本宣治	京都	
	北海道	3	山崎常吉	爱知	1	
	三重	2				
	北海道	4	<b>社会民众党</b>	<b>选区</b>		
	奈良		(17位候选人;			
	爱媛	2	4人当选)			
	福冈	1	*安部矶雄	东京	2	
	鹿儿岛	1	赤松克磨	宫城	1	
	冈山	1	*龟井贯一郎	福冈	2	

片山哲	神奈川	2	阪本孝三郎	大阪	4
菊池宽	东京		白旗松之助	山形	2
小池四郎	福冈	4	杉山元治郎	大阪	5
宫崎龙介	东京	3	须永好	群馬	1
*西尾末广	大阪	3	纲岛正兴	新潟	3
小川清俊	东京	4	吉田贤一	兵庫	3
冈崎宪	神奈川	1			
下田金助	东京	7	日本农民党：	选区	
*铃木文治	大阪	4	(12位候选人；		
田万清臣	大阪	1	无人当选)		
为藤五郎	东京	6	畑桃作	群馬	2
堤良明	兵庫	1	平原光亲	京都	2
米洼满亮	兵庫	2	堀井久雄	北海道	2
吉川末次郎	京都	1	加藤今一郎	爱知	2
			大石荣	福冈	3
日本劳农党	选区		佐伯仙之助	福冈	2
(13位候选人；			坂本利一	群馬	1
1人当选)			菅舜英	北海道	4
麻生久	栃木	1	须具快天	新潟	2
藤本金助(也得			高桥龟吉	山梨	
到日本农民党的			矢部甚吾	东京	7
支持)	香川	2	横田多门	东京	6
福田狂二	岛根	1			
稻田直道	鸟取		各地方无产政党	选区	
加藤勘十	东京	5	(6位候选人；		
*河上丈太郎	兵庫	1	1人当选)		
松谷与次郎	东京	6	*浅原健三(九州		

民权党)	福冈	2	农民党的支持)	栃木	2
今井嘉幸	大阪	3	太田黑彦八	长崎	2
川岛不二郎	神奈川	2	[高桥政八郎(有		
中泽辨次郎	岐阜	2	时列在地方无产		
大泽一六(也得到			政党候选人中))	[福冈]	
日本劳农党和日本					

1930年国会议员选举

新劳动农民党： (14位候选人； 1人当选) 细迫兼光 石渡春雄 上村进 河上肇 木下源吾 木田茂治 小岩井净 中村高一 *大山郁夫 重松爱三郎 神道宽次 田村仙之助 竹尾式 富吉荣二	选区		麻生久	栃木	1	
			细野三千雄	新潟	2	
			今村等	长崎	1	
	京都	2	金井芳次	神奈川	1	
	青森	2	加藤勘十	东京	5	
	新潟	2	河上丈太郎	兵庫	1	
	京都	1	川俣清音	秋田	2	
	北海道	1	小島小一郎	山形	2	
	北海道	4	小島利雄	青森	1	
	大阪	4	河野密	东京	1	
	东京	2	*松谷与次郎	东京	6	
	东京	5	森胁鲸江	鸟取		
	佐贺	1	大木武雄	埼玉	1	
	神奈川	1	阪本孝三郎	大阪	4	
	福井		白旗松之助	山形	2	
	千叶	2	杉山元治郎	大阪	5	
	日本大众党 (23位候选人； 2人当选) 安艺盛 荒谷宗二 *浅原健三 浅沼稻次郎	鹿儿岛	2	须永好	群马	1
				棚桥小虎	兵庫	2
			吉田贤一	兵庫	3	
	选区		社会民众党	选区		
			(33位候选人； 2人当选)			
高知	1	安部矶雄	东京	2		
爱知	1	阿部温知	东京	3		
福冈	2					
东京	4					

赤松克磨	宫城	1	山崎和雄	长野	3
藤田喜作	长野	2	米洼满亮	兵庫	2
堀越幸四郎	栃木	2	吉田实	东京	1
堀田馨一	三重	2	吉川未次郎	京都	1
贺川丰彦	东京	4			
龟井贯一郎	福冈	2	全国民众党	选区	
*片山哲	神奈川	2	(4位候选人;无		
胜田穗策	静冈	2	人当选)		
小池四郎	福冈	4	古野周藏	大阪	3
栗野谷藏	山口	1	宫崎龙介	东京	4
松永义雄	埼玉	1	大矢省三	大阪	4
松冈驹吉	东京	5	田万清臣	大阪	1
*西尾末广	大阪	3			
小笠原勘一	长崎	2	各地方无产政党	选区	
冈成志	大阪		(24位候选人;		
冈崎宪	神奈川	1	无人当选)		
大泽一六	群马	1	青柿善一郎	兵庫	1
关齐津原	广岛	2	江藤源九郎		
佐竹晴记	高知	2	(奈良联合阵线)	奈良	
岛中雄三	奈良		福田狂二(1929年被		
下田金助	东京	7	日本大众党驱逐)	岛根	1
菅舜英	北海道	4	平野力三	山梨	
铃木文治	大阪	4	猪俣浩三	新潟	3
为藤五郎	东京	6	石桥源四郎		
经冢茂一	富山	1	(千叶劳农党)	千叶	1
臼井治郎	山梨		泉国三郎		
山本龟次郎	鹿儿岛	3	(磐田无产党)	磐田	2

金子洋文 (秋田无产党)	秋田	1	西谦一郎	新潟	
菊池养之辅 (宫城大众党)	宫城	1	大桥治房	大阪	4
栗须七郎 (无产大众党)	大阪	2	大石荣 (福冈勤劳党)	福冈	3
三木静次郎	冈山	1	堺利彦 (东京无产党)	东京	1
宫本熊吉	埼玉		高津正道 (中国无产党)	广岛	
水谷长三郎 (劳农大众党)	京都	1	武田信次郎	福冈	1
中西伊之助 (东京无产党)	东京	6	上田音市 (全国农民协会 地区同盟)	三重	2
中泽辨次郎 (中部民众党)	岐阜	2	上井源治	岐阜	
			上村知清	大阪	

1932年国会议员选举

社会民众党	选区	金井芳次	神奈川	1	
(15位候选人;3人当选)		河上丈太郎	兵庫	1	
*安部矶雄	东京	2	*松谷与次郎	东京	6
阿部温知	东京	3	三宅正一	新潟	3
堀内长荣	神奈川		水谷长三郎	京都	1
*龟井贯一郎	福冈	2	大矢省三	大阪	4
片山哲	神奈川	2	*杉山元治郎	大阪	5
*小池四郎	福冈	4	田万清臣	大阪	1
小山寿夫	东京				
小山亮	长野	2	国民社会党筹备会	选区	
马岛侗	东京		(2位候选人;无人当选)		
松永义雄	埼玉		久留弘三	兵庫	
松冈驹吉	东京	5	阪本孝三郎	大阪	4
西尾末广	大阪	3			
笹井源次郎	京都		各地方无产政党	选区	
铃木文治	东京	6	(5位候选人;无人当选)		
山本龟次郎	鹿儿岛	3	赤松五百磨	大阪	
			上村进		
全国劳农大众党	选区		(全农全国会议派)	新潟	2
(13位候选人;2人当选)			加藤勘十		
浅原健三	福冈	2	(全劳抵制俱乐		
浅沼稻次郎	东京	4	部联合会)	东京	5
麻生久	东京	5	南谨二	东京	6
古市春彦	福冈		吉田由市		
泉国三郎	磐田	2	(东京邮电工会)	东京	5

## 1936年国会议员选举

社会大众党	选区		*杉山元治郎	大阪	5
(30位候选人；			须永好	群马	1
18人当选)			*铃木文治	东京	6
*安部矶雄	东京	2	田原春次	福冈	4
*浅沼稻次郎	东京	4	高桥武夫	广岛	1
*麻生久	东京	5	*田万清臣	大阪	1
堂本为广	福冈	4	*冢本重藏	大阪	3
石山寅吉	栃木	1	*山崎剑二	静冈	2
*龟井贯一郎	福冈	2			
*片山哲	神奈川	2	其他无产阶级候选	选区	
河合义一	兵庫	3	人，独立的或隶属于一		
*河上丈太郎	兵庫	1	个地方政党或工会		
*川俣清音	秋田	2	(11位候选人；		
*川村保太郎	大阪	4	5人当选)		
菊池养之辅	宫城	1	*加藤勘十		
*河野密	东京	1	(全评；劳农无产		
三浦爱二	福冈	2	协议会)	东京	5
*三宅正一	新潟	3	*小山亮		
宫村又八	熊本	1	(接近社会大众党)	长野	2
*水谷长三郎	京都	1	*黑田寿男		
中村高一	东京	7	(全农；冈山无产者		
野口彦一	福冈	3	组织协议会)	冈山	1
*冈崎宪	神奈川	1	前川正一		
佐佐木东吾	宫城	2	(接近全农)	香川	1
*佐竹晴记	高知	2	*松本治一郎		



(全国水平社)	福冈	1	竹尾式		
三上序一			(独立人士)	千葉	2
(广岛农民俱乐部)	广岛	2	*富吉荣二		
三田村武夫			(接近全农)	鹿儿岛	2
(全农)	岐阜	2	梅泽次作		
长尾有			(志贺勤劳民众同	志贺	
(全农)	兵庫	2	盟)		

1937年国会议员选举

社会大众党	选区	菊池武	大分	1	
(66位候选人；		*菊池养之辅	宫城	1	
37人当选)		木下源吾	北海道	2	
*安部矶雄	东京	2	小島小一郎	山形	2
*阿部茂夫	东京	4	*河野密	东京	1
安艺盛	高知	1	*黑田寿男	冈山	1
*浅沼稻次郎	东京	3	前田荣之助	广岛	2
*麻生久	东京	5	*前川正一	香川	1
藤井祥正	长崎	2	*松本治一郎		
古泽斐	秋田	1	(严格说不是党的		
古屋贞雄	山梨		正式的候选人)	福冈	1
林田哲雄	爱媛	2	*松永义雄	埼玉	1
稻村隆一	新潟	2	*三轮寿壮	东京	5
*井上良二	大阪	2	三谷之太郎	广岛	3
*石山寅吉	栃木	1	*三宅正一	新潟	3
伊藤卯四郎	福冈	2	宫村又八	熊本	1
岩渊谦二郎	青森	2	*水谷长三郎	京都	1
*龟井贯一郎	福冈	2	*永江一夫	兵庫	1
金子龟吉	栃木	2	*中村高一	东京	7
*片山哲	神奈川	2	西村荣一	大阪	6
*加藤镣造	岐阜	3	西村菊次郎	青森	1
*河合义一	兵庫	3	*西尾末广	大阪	4
*河上丈太郎	兵庫	2	*野沟胜	长野	3
*川俣清音	秋田	2	小田荣		
*川村保太郎	大阪	4	(作为得票居第二位		

者, 在1938年4月调			(不是正式的		
整政府官员时, 成为			候选人)	长野	1
国会议员)	冲绳		渡边潜	和歌山	2
*冈崎宪	神奈川	1	*山崎剑二	静冈	2
太野高藤	静冈	2	*米洼满亮	兵庫	2
三德岩雄	香川	2			
佐佐木东吾	宫城	2	日本无产党	选区	
*佐竹晴记	高知	2	(5位候选人;		
佐竹新市	广岛	1	1人当选)		
重井鹿治	冈山	2	*加藤勘十	东京	5
*杉山元治郎	大阪	5	黑田保次	东京	3
*须永好	群马	1	三浦爱二	福冈	2
*铃木文治	东京	6	铃木茂三郎	东京	6
*田原春次	福冈	4	玉井润次	新潟	2
*田万清臣	大阪	1			
田村定一	山口	1	地方无产政党	选区	
棚桥小虎	长野	4	(1位候选人;		
田中义男	京都	2	无人当选)		
*富吉荣二	鹿儿岛	2	汤原彦三		
*冢本重藏	大阪	3	(鸟取无产阶级		
上田音市	三重	1	组织协议会)	鸟取	
渡边万作					

## 1942年国会议员选举

<b>前社会民众派</b>	<b>选区</b>		<b>*河上丈太郎</b>		
(15位候选人;1人 被推荐;2人当选)			(被推荐)	兵庫	1
原彪	東京	2	<b>*川俣清音</b>	秋田	2
井上良二	大阪	2	<b>*河野密</b>	東京	1
伊藤卯四郎	福岡	2	<b>*三宅正一</b>	新潟	3
龟井贯一郎	東京	5	永江一夫	兵庫	1
金正米吉	大阪	3	<b>*阪本胜</b>		
片山哲	神奈川	2	(被推荐)	兵庫	2
川村保太郎	大阪	4	<b>*杉山元治郎</b>		
前田荣之助	広島	2	(被推荐)	大阪	5
松永义雄	埼玉	1	須永好	群馬	1
松冈驹吉	東京	5	田原春次	福岡	4
<b>*西尾末广</b>	大阪	4	细田纲吉	東京	3
佐竹晴记	高知	2	矢尾喜三郎	志賀	
<b>*田万清臣</b>					
(被推荐)	大阪	1	<b>其他前无产政党</b>	<b>选区</b>	
氏原一郎	高知	2	<b>领袖</b>		
米洼满亮	兵庫	2	32位候选人;4人 被推荐;7人当选)		
<b>前日劳派</b>	<b>选区</b>		古泽斐	秋田	1
(13位候选人;3人被推荐;6人 当选)			古屋贞雄	山梨	
堂本为广	福岡	2	林田哲雄	爱媛	2
加藤镣造	岐阜	3	井伊诚一	新潟	2
			<b>*今井嘉幸</b>		
			(被推荐)	兵庫	1

稻田直到	鸟取	1	冢本重藏	大阪	3
稻村隆一	新潟	3	渡边万作	长野	1
石河京市	神奈川	1	汤原彦三	鸟取	
石原美行	冈山	1			
*泉国三郎 (被推荐)	磐田	2	成为国家社应主义 者的前无产政党领 袖	选区	
金井芳次	神奈川	1	(14位候选人;无人 被推荐;4人当选)		
金子益太郎	栃木	1	赤松克磨	北海道	4
川岛金次	埼玉	1	安艺盛	高知	1
*菊池养之辅 (被推荐)	宫城	1	(前日劳派)		
木下源吾	北海道	2	藤原繁太郎	长崎	2
熊本虎藏	东京	6	*平野力三	山梨	
*前川正一	香川	1	稻富稜人		
马越央辅	爱媛	2	(前社会民众派)	福冈	3
*正木清	北海道	1	神田兵三		
*松本治一郎 (被推荐)	福冈	1	(最初参加劳动 农民党)	京都	1
水野实郎	爱知	1	小池四郎		
*水谷长三郎	京都	1	(前社会民众派)	福冈	4
中村高一	东京	7	*三田村武夫		
中泽辨次郎	埼玉	2	(东方会)	岐阜	2
小田荣	冲绳		宫崎龙介		
三德岩雄	香川	2	(东方会)	东京	6
庄司彦男	鸟取	1	长尾有		
田中义男	京都	2	(最初参加劳动		
富吉荣二	鹿儿岛	2			

农民党)	兵库	2	山本龟次郎		
大桥治房			(前社会民众党)	鹿儿岛	3
(最初参加劳动			*山崎常吉		
农民党)	大阪	4	(最初参加劳动		
篠田八十八			农民党)	爱知	1
(最初参加新劳动			*吉田贤一		
农民党)	东京	5	(前日劳派)	兵库	3

## ·日本人名译名对照表

(汉字——罗马拼音)

按汉字笔画排列

二画		下田金助 Shimoda kinsuke
八岛太郎 Yashim Tarō		大山郁夫 Ōyama Ikuo
二宫茂明 Ninomiya Shigea-		大川周明 Ōkawa Shūmei
ki		大井宪太郎 Ōi Kentarō
三画		大木武雄 Ōki Takeo
三上序一 Mikami Joichi		大内兵卫 Ōuchi Hyōe
三木治郎 Miki Jirō		大石荣 Oda Sakae
三木静次郎 Miki Sei Jirō		大矢省三 Ōya Shōzō
三田村武夫 Mitamura Takeo		大西十寸男 Ōnishi Toshio
三宅正一 Miyake Shōichi		大曲直 Ōmagari Tadashi
三谷之太郎 Miya Buntarō		大宅壮一 Ōya Sōichi
三轮寿壮 Miwa Jusō		大杉荣 Ōsugi Sakae
三浦三玄洞 Miura Sangendō		大河内一男 Ōkouchi Kazuo
三浦爱二 Miura Aiji		大泽一六 Ōsawa ichiroku
三德岩雄 Santoku Iwao		大桥治房 Ōhashi Harufusa
土井直作 Doi Naosaku		大隈重信 Ōkuma Shigenobu
土屋乔雄 Tsuchiya Takao		大森义太郎 Ōmori Yoshitarō
下中弥三郎 Shimonaka Yasa-		大道宪二 Daidō Kenji
burō		大鹰贵佑 Ōtaka Kisuke

与野晶子	Yosano Akiko	川村保太郎	Kawamura Yasu- tarō
上井源治	Uei Genji	川岛不二郎	Kawashima Fuji- rō
上田音市	Ueda Otoichi	川岛武宜	Kawashima Tak- eyoshi
上村进	Kamimura Susumu	川岛金次	Kawashima Kinji
上村知清	Uemura Tomokiyo	川原次吉郎	Kawahara Jikich- irō
上条爱一	Kamijō Aiichi	川俣清音	Kawamata Seion
山上竹尾	Yamagami Takeo	久津见房子	Kutsumi Hisako
山川均	Yamakawa Hitoshi	久留弘三	Kuru Kōzō
山川菊荣	Yamakawa Kikue	丸山真男	Maruyama Masao
山内美奈	Yamauchi Mina	卫藤沈吉	Etō Shinkichi
山本权兵卫	Yamamoto Gom- bei	小山弘健	Koyama Hirotake
山本龟次郎	Yamamoto Kame- jirō	小山寿夫	Koyama Hisao
山本胜之助	Yamamoto Katsu- nosuke	小山荆冠	Koyama Keikan
山本宣治	Yamamoto Senji	小山亮	Koyama Makoto
山本悬藏	Yamamoto Kenzō	小川涣三	Ogawa Kenzō
山田盛太郎	Yamada Moritarō	小川清俊	Ogawa Kiyotaka
山田清三郎	Yamada Seizaburō	小仓襄二	Ogura Joji
山名义鹤	Yamana Yoshit- surū	小山长三郎	Koyama Chōzab- urō
山花秀雄	Yamahana Hideo	小田荣	Oda Sakae
山崎和雄	Yamazaki Kazuo	小池四郎	Koike Shirō
山崎剑二	Yamazaki Kenji	小島小一郎	Ojima Koichirō
山崎常吉	Yamazaki Tsune- kichi	小島利雄	Ojima Toshio



小林楯	Gumi Ōbayashi	太田博	Ota Hiroshi
小岩井浄	Koiwai Jō	太田黑彦八	Ōtaguro Hikoha-
小堀甚二	Kobori Jinji		chi
小野武夫	Ono Takeo	太养健	Inukai Ken
小笠原勘一	Ogasawara Kan-	太野高藤	Ōno Takafuji
	ichi	犬养毅	Inukai Tsuyoshi
马场恒吾	Baba Tzunego	中川一男	Nakagawa kazuo
马岛侗	Majima Kan	中正雄	Naka Masao
马越央辅	Makoshi Ōsuke	中西伊之助	Nakanishi Inosu-
乡诚之助	Gō Seinosuke		ke
	四画	中江兆民	Nakae Chōmin
天辰正守	Amatatsu Masa-	中江笃介	Nakae Tokusuke
	mori	中村义明	Nakamura Yoshi-
井上乙吉	Inoue Otokichi		aki
井上良二	Inoue Ryōji	中村高一	Nakamura Takai-
井上清	Inoue Kiyoshi		chi
井上缝三郎	Inoue Nuisaburō	中沟多摩吉	Nakamizo Tama-
井口政雄	Iguchi Masao		kichi
井东宪	Itō Ken	中泽辨次郎	Nakazawa Benjirō
井伊诚一	Ii Seiichi	中野正刚	Nakano Seigō
木下半治	Kinoshita Hanji	中野初子	Nakano Hatsuko
木下尚江	Kinoshita Naoe	内田康哉	Uchida Kōsai
木下源吾	Kinoshita Gengo	内村鉴三	Uchimura Kanzō
木田茂晴	Kida Shigeharu	内崎作三郎	Uchigasaki Saku-
木村锭吉	Kimura Jokichi		saburō
木村毅	Kimura Ki	内藤濯	Naito Taku
丰田剑陵	Toyoda Kenryō	冈田启介	Okada Keisuke

冈田宗司 Okada Sōji  
 冈成志 Oka Seishi  
 冈崎宪 Okazaki Ken  
 冈野进 Okano Susumu  
 币原喜重郎 Shidehara Kijūrō  
 今井歌子 Imai Utako  
 今井嘉幸 Imai Yoshiyuki  
 今村等 Imamura Hitoshi  
 升味准之辅 Masumi Junnosuke  
 长谷川如是闲 Hasegawa Nyozeken  
 长尾有 Nagao Tamotsu  
 长野朗 Nagano Rō  
 片山哲 Katayama Tetsu  
 片山潜 Katayama Sen  
 氏原一郎 Ujihara Ichirō  
 氏原正治郎 Ujihara Masajirō  
 风早八十二 Kazahaya Yasoji  
 风间犬吉 Kazama Jōkichi  
 为藤五郎 Tamefuji Gorō  
 水谷长三郎 Mizutani Chōzaburō  
 水野广德 Mizuno Kōtoku  
 水野实郎 Mizuno Jitsurō

五画

平林泰子 Hirabayashi Tai-ko  
 平原光亲 Hirahara Mitsuhika  
 平野力三 Hirano Rikizō  
 平野义太郎 Hirano Yoshitarō  
 平野永一郎 Hirano Eiichirō  
 平野学 Hirano Manabu  
 平野荣太郎 Hirano Eitaro  
 平冢明子 Hiratsuka Akiko  
 正木清 Masaki Kiyoshi  
 玉井润次 Tamai Junji  
 古市春彦 Furuichi Haruhiro  
 古泽斐 Furusawa Hi  
 古屋贞雄 Furuya Sadao  
 古野周藏 Furuno Shūzō  
 古瀬传藏 Furuse Denzō  
 末川博 Suekawa Hiroshi  
 末弘岩太郎 Suehiro Izutarō  
 末次信正 Suetsugu Nobumasa  
 本多谦三 Honda Kenzō  
 甘粕正彦 Amakasu Masahiko  
 东条英机 Tōjō Hideki

布施辰治	Fuse Tatsuji	田中惣五郎	Tanaka Sōgorō
石山寅吉	Ishiyama Toraki- chi	田村先之助	Tamura Sennos- uke
石川旭山	Ishikawa Kyoku- zan	田村定一	Tamura Sadaichi
石川啄木	Ishikawa Takub- oku	田島秀子	Tajima Hideko
石川准十郎	Ishikawa Junjūrō	田所辉明	Tadokoro Terua- ki
石本恵吉	Ishimoto Keikichi	田原春次	Tahara Haruji
石本静枝	Ishimoto Shizue	田部井健次	Tabei Kenji
石河京市	Ishikawa Kyōichi	田添铁二	Tazoe Tetsuji
石原美行	Ishihara Yoshiy- uki	甲斐美和	Kai Miwa
石桥湛山	Ishibashi Tanzan	矢内原忠雄	Yanaihara Tadao
石桥源四郎	Ishibashi Gens- hirō	矢永千利	Yanaga Chitoshi
石渡春雄	Ishiwatari Haruo	矢尾喜三郎	Yao Kisaburō
石滨知行	Ishihama Tomoy- uki	矢部甚吾	Yabe Jingo
北一辉	Kita Ikki	白木正之	Shiroki Masayuki
北泽新次郎	Kitazawa Shinjirō	白旗松之助	Shirahata Matsu- nosuke
北原泰作	Kitahara Taisaku	市川义雄	Ichikawa Yoshio
叶山嘉树	Hayama Yoshiki	市川正一	Ichikawa Shōichi
田万清臣	Taman Kiyoomi	市川房枝	Ichikawa Fusae
田中义一	Tanaka Giichi	广田弘毅	Hirota Kōki
田中义男	Tanaka Yoshio	永田铁山	Nagata Tetsuzan
田中清玄	Tanaka Seigen	永江一夫	Nagae Kazuo
		加藤今一郎	Katō Imaichirō
		加藤弘之	Katō Hiroyuki
		加藤贯一	Katō Kanichi

加藤高明	Katō Takaaki	西尾末广	Nishio Suehiro
加藤勘十	Katō Kanjū	西园寺公望	Saionji Kimmochi
加藤静枝	Katō Shizue	西谦一郎	Nishi Kenichirō
加藤镣造	Katō Ryōzō	有田满穗	Arita Mitsuho
对马忠行	Tsushima Tada- yuki	有泽广巳	Arisawa Hiromi
	六画	早瀬利雄	Hayase Toshio
朴烈	Boku Retsu	竹尾弑	Takeo Hajime
朴恩哲	Boku Ontetsu	仲曾根贞代	Nakasone Sadayo
辻润	Tsuji Jun	伊藤卯四郎	Itō Ushirō
吉川末次郎	Yoshikawa Suej- irō	伊藤好道	Itō Kōdō
吉田由市	Yoshida Yoshiichi	伊藤宪一	Itō Kenichi
吉田茂	Yoshida Shigeru	伊藤博文	Itō Hirobumi
吉田贤一	Yoshida Kenichi	伊藤野枝	Itō Noe
吉田昌男	Yoshida Masao	臼井治郎	Usui Jirō
吉田实	Yoshida Minoru	向坂逸郎	Sakisaka Itsurō
吉野作造	Yoshino Sakuzō	行政长藏	Yukimasa Chōzō
西川文子	Nishikawa Fumi- ko	后藤文夫	Gotō Fumio
西川光次郎	NishiKawa Kōjir- ō	后藤清	Gotō Kiyoshi
西光万吉	Nishimitsu Man- kichi	后藤新平	Gotō Shimpei
西村荣一	Nishimura Eiichi	肋村义太郎	Wakimura Gitarō
西村菊次郎	Nishimura Kiku- irō	庄司彦男	Shōji Hikoo
		庄源达	Sōhara Tōru
		江藤源九郎	Etō Genkurō
		池信鷹	Ike Nobutaka
		汤原彦三	Yubara Hikozaō
		宇垣一成	Ugaki Kazushige
		宇野弘藏	Uno Kōzō

安艺盛	Aki Sakaru	芹泽彪卫	Serizawa Hyōe
安平鹿一	Yasuhira Shikai- chi	赤坂一郎	Akasaka Ichirō
安达谦藏	Adachi Kenzō	赤松五百磨	Akamatsu Iomaro
安积仰也	Azumi Koya	赤松克磨	Akamatsu Katsu- maro
安部矶雄	Abe Isoo	赤松明子	Akamatsu Akiko
关口泰	Sekiguchi Yasus- hi	赤松常子	Akamatsu Tsun- eko
关齐津原	Saitsubara Seki	赤松照憧	Akasaka Ichiro
米内光政	Yonai Mitsumasa	李长满	Rhee Syngman
米洼满亮	Yonekubo Mitsus- suke	我妻博	Wagatsuma Hiro- shi
阪本胜	Sakamoto Masaru	佐久间贞一	Sakuma Teiichi
阪本孝三郎	Sakamoto Kōsa- burō	佐竹晴记	Satake Haruki
	七画	佐竹新市	Satake Shinichi
远山茂树	Tuyama Shigeki	佐多忠竹	Sata Tadatake
远藤清子	Endō Kiyoko	佐佐木东吾	Sasaki Tōgo
坂本利一	Sakamoto Toshi- kazu	佐佐弘雄	Sassa Hiroo
坂本清马	Sakamoto Kiyome	佐伯仙之助	Saeki Sennosuke
村上吉藏	Murakami Kichizō	佐野学	Sano Manabu
村井知至	Murai Tomoyoshi	住谷悦治	Sumiya Etsuji
杉山元治郎	Sugiyama Moto- jirō	近卫文磨	Konoe Fumimaro
杉山谦治	Sugiyama Kenji	近内金光	Chikauchi Kane- mitsu
杉浦启一	Sugiura Keiichi	近藤荣藏	Kondō Eizō
		谷口善太郎	Taniguchi Zentarō
		鳩山一郎	Hatoyama Ichirō

角田柳作	Tsunoda Ryusaku	松本治一郎	Matsumoto Jiichirō
龟井贯一郎	Kamei Kanichirō	松本淳三	Matsumoto Junzō
岛上善五郎	Shimagami Zengoro	松永义雄	Matsunaga Yoshio
		松延繁次	Matsunobu Hanji
岛中雄三	Shimanaka Yūzō	松谷与次郎	Matsutani Yojirō
床次竹次郎	Tokonami Takejirō	松尾荣一	Matsuo Eiichi
		幸德传次郎	Kōtoku Denjirō
尾崎行雄	Ozaki Yukio	明贺房吉	Myōga Fusakichi
尾崎秀实	Ozaki Hotsumi	岸本英太郎	Kishimoto Eitarō
阿部茂夫	Abe Shigeo	岩内善作	Iwauchi Zensaku
阿部勇	Abe Isamu	岩内富江	Iwauchi Tomie
阿部真之助	Abe Shinnosuke	岩渊谦二郎	Iwabuchi Kenjirō
阿部温知	Abe Onchi	国领伍一郎	Kokuryō Goichirō
纲岛正兴	Tsunajima Seikō	和田博雄	Wada Hiroo
	八画	金子龟吉	Kaneko Kamekichi
青木惠一郎	Aoki Keiichirō	金子洋文	Kaneko Yōbun
青柿善一郎	Aogaki Zenichirō	金子益太郎	Kaneko Masutarō
青野季吉	Aono Suekichi	金井芳次	Kanai Yoshiji
武田信次郎	Takeda Nobujirō	金天海	Kin Tenkai
武藤武全	Mutō Buzen	金正米吉	Kanemasa Yonekichi
林田哲雄	Hayashida Tetsuo		
林哲	Hayashi Tetsu	服部之总	Hattori Korefusa
林铎十郎	Hayashi Senjūrō	浅沼稻次郎	Asanuma Inejirō
板垣退助	Itagaki Taisuke	浅原健三	Asahara Kenzō
松冈驹吉	Matsuoka Komakichi	浅野晃	Asano Akira
		河上丈太郎	Kawakami Jōtarō
松冈洋右	Matsuoka Yōsuke	河上民雄	Kawakami Tamio

河上清	Kawakami Kiyoshi	南喜一	Minami Kiichi
河上肇	Kawakami Hajime	南谨二	Minami Kinji
河合义一	Kawai Giichi	荒木贞夫	Araki Sadao
河合秀夫	Kawai Hideo	荒冈庄太郎	Araoka Shōtarō
河合悦三	Kawai Etsuzō	荒谷宗二	Araya Sōji
河野密	Kōnō Mitsu	荒垣秀雄	Aragaki Hideo
泷川幸辰	Takikawa Yuki- toki	荒畑胜三	Arahata Katsuzō
泽田半之助	Sawada Hanno s- uke	荒畑寒村	Arahata Kansō
泽田松太郎	Sawada Matsut- arō	重井鹿治	Shigei Shikaji
宗道太	Sō Michita	重松爱三郎	Shigematsu Aisa- burō
细田纲吉	Hosoda Tsunaki- chi	秋和松五郎	Akiwa Matsugo- rō
细谷松太	Hosoya Matsuta	信夫清三郎	Shinobu Seizabu- rō
细迫兼光	Hososako Kane- mitsu	泉国三郎	Izumi Kunisaburō
细野三千雄	Hosono Michio	泉诚一	Izumi Seiichi
织本贞代	Orimoro Sadayo	须贝快天	Sugai Kaiten
经冢茂一	Tsunetsuka Shi- geichi	须永好	Sunaga Kō
	九画	胜田穗策	Katsuda Hosaku
城常太郎	Jō Tsunetarō	胜间田清一	Katsumada Seiichi
栉田民藏	Kushida Tamizō	畑桃作	Hata Tōsaku
柘茂治	Kida Shigeharu	津久井龙雄	Tsukui Tatsuo
柳鹤	Yanagi Tsuru	前川正一	Maekawa Shōichi
		前田荣之助	Maeda Einosuke
		宫本熊吉	Miyamoto Kuma- kichi

宫村又八 Miyamura Mata-  
                   hachi  
 宫崎龙介 Miyazaki Ryūsū-  
                   ke  
 美浓部达吉 Minobe Tatsukic-  
                   hi  
 美浓部亮吉 Minobe Ryōkichi  
 神山茂夫 Kamiyama Shig-  
                   eo  
 神田兵三 Kanda Hyōzō  
 神道宽次 Shindō Kanji  
 贺川丰彦 Kagawa Toyoh-  
                   iko  
                   十画  
 桂太郎 Katsura Tarō  
 桔孝三郎 Tachibana Kōza-  
                   burō  
 盐田庄兵卫 Shioda Shōbei  
 栗须七郎 Kurusu Shichirō  
 原虎一 Hara Toraiichi  
 原彪 Hara Hyō  
 原敬 Hara Satoshi  
 铃木文治 Suzuki Bunji  
 铃木东民 Suzuki Tōmin  
 铃木秀三郎 Suzuki Hidesabu-  
                   rō  
 铃木茂三郎 Suzuki Mosaburō

畠山松治郎 Hatakeyama Mat-  
                   sujirō  
 高津正道 Takatsu Seidō  
 高桥正八郎 Takahashi Seiha-  
                   chirō  
 高桥正雄 Takahashi Masao  
 高桥龟吉 Takahashi Kame-  
                   kichi  
 高桥武夫 Takahashi Takeo  
 高桑末秀 Takakuwa Suehide  
 高畠素之 Takabatake Mot-  
                   oyuki  
 高野岩三郎 Takano Iwasaburō  
 高野实 Takano Minoru  
 高野房太郎 Takano Fusatarō  
 高群逸枝 Takamure Itsue  
 斋藤实 Saitō Makoto  
 斋藤隆夫 Saitō Takao  
 唐泽清八 Karazawa Seihachi  
 冢本重藏 Tsukamoto Jūzō  
 难波英夫 Naniwa Hiteo  
                   十一画  
 堀井久雄 Horii Hisao  
 堀内长荣 Horiuchi Chōei  
 堀田馨一 Horita Keiichi  
 堀江归一 Horie Kiichi  
 堀越幸四郎 Horigoshi Kōs-



hirō  
 梅泽次作 Umezawa Jisaku  
 菊川忠雄 Kikukawa Tadao  
 菊川静子 Kikukawa Shiz-  
 uko  
 菊池武 Kikuchi Takishi  
 菊池养之辅 Kikuchi Yōno-  
 suke  
 菊池宽 Kikuchi Hiroshi  
 菅舜英 Suga Shunei  
 堂本为广 Dōmoto Tame-  
 hiro  
 野口彦一 Noguchi Hikoichi  
 野田律太 Noda Ritsuta  
 野吕荣太郎 Noro Eitarō  
 野坂龙 Nozaka Ryō  
 野坂参三 Nozaka Sanzō  
 野沟胜 Nomizo Masaru  
 笹井源次郎 Sasai Genjiro  
 笠信太郎 Ryū Shintarō  
 猪俣津南雄 Inomata Tsunao  
 猪俣浩三 Inomata Kōzō  
 望月昭雄 Mochizuki Akio  
 望月源治 Mochizuki Genji  
 麻生久 Asō Hisashi  
 清原一隆 Kiyohara Kazu-  
 taka

绪方竹虎 Ogata Taketora  
 十二画  
 堤良明 Tsutsumi Yoshia-  
 ki  
 堺为子 Sakai Tameko  
 堺利彦 Sakai Toshihiko  
 堺真柄 Sakai Magara  
 植木枝盛 Ueki Emori  
 棚桥小虎 Tanahashi Kotora  
 喜田贞吉 Kida Teikichi  
 栗野谷藏 Kurino Tanizō  
 森户辰男 Morito Tatsuo  
 森正藏 Mori Shōzō  
 森肋鲸江 Moriwaki Isae  
 景山英子 Kageyama Hideko  
 黑田寿男 Kuroda Hisao  
 黑田保次 Kuroda Yasuji  
 锅山贞亲 Nabeyama Sada-  
 chika  
 奥梅生 Oku Mumeo  
 渡边万作 Watanabe Mans-  
 aku  
 渡边政之辅 Watanabe Masa-  
 nosuke  
 渡边道太郎 Watanabe  
 渡边潜 Watanabe Sen  
 渡部义通 Watanabe Yoshi-

michi		nosuke	
渡部彻	Watanabe Tōru	横田多门	Yokota Tamon
富吉荣二	Tomiyoshi Eiji	稻田直道	Inada Naomichi
裕仁	Hirohito	稻村顺三	Inamura Junzō
萩田里见	Hakamada Satomi	稻村隆一	Inamura Ryūichi
丝屋寿雄	Itoya Hisao	稻富稜人	Inatomi Takato
	十三画	德川家达	Tokugawa Iesato
鲇川义介	Aikawa Yoshisuke	德田球一	Tokuda Kyūichi
	ke	鹤见佑辅	Tsurumi Yūsuke
鲇泽严	Ayusawa Iwao		十六画
新妻伊都子	Niizuma Izuko	樽开藤吉	Tarui Tōkichi
满川龟太郎	Mitsukawa Kame-	篠田八十八	Shinoda Yasoha-
	tarō		chi
福本和夫	Fukumoto Kazuo		十八画
福田狂二	Fukuda Kyōji	藤井祥正	Fujii Shōsei
福田德三	Fukuda Tokuzō	藤冈文六	Fujioka Bunroku
	十四画	藤本金助	Fujimoto Kinsuke
蜡山政道	Rōyama Masa-	藤田喜作	Fujita Kisaku
	michi	藤原繁太郎	Fujiwara Shige-
蜡山道雄	Rōyama Michio		tarō
管野须贺子	Kanno Suga	藤森成吉	Fujimori Seikichi
熊本虎藏	Kumamoto Tora-	镗田研一	Yarita Kenichi
	zō		
	十五画		
横山春一	Yokoyama Harui-		
	chi		
横山源之助	Yokoyama Gen-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